



[苏]康·西蒙诺夫 著
章 其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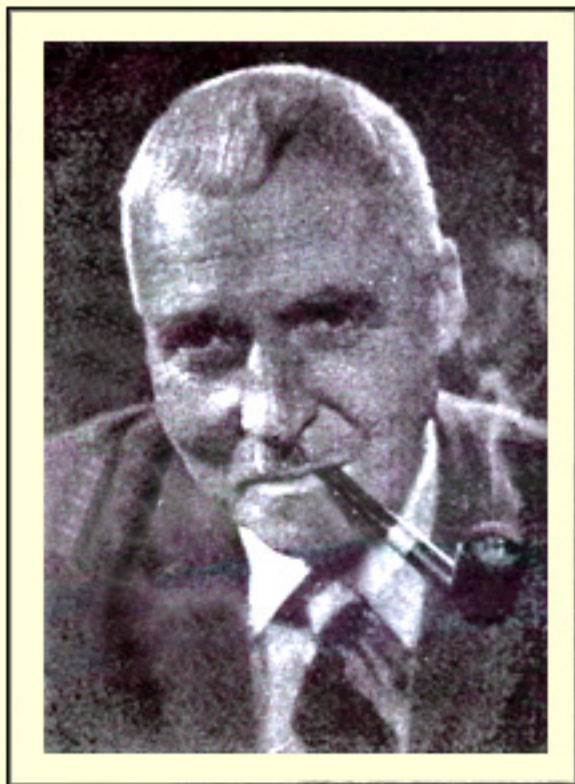
我 写 斯 大 林

——我这一代人的见证

我写斯大林

——我这一代人的见证

〔苏〕康·西蒙诺夫 著
章 其 译



译者的话

这是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可惜这部作品的第二部《斯大林与战争》他还未及执笔，就与世长辞了。

这不是一部稗官野史，而是一部情真意切的回忆录，它完全可以诱发我们对一个曾为之欢呼与哭泣的历史伟大人物作出公正的评价。

任何一个历史伟大人物，特别是象斯大林这样一位曾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达 1/4 多世纪的人物，他的功过是不可能互为抵消的。是功就是功，是过就是过，夸大或缩小都无助于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这是本书作者的写作动饥，也是译者推荐这本书的缘由。

真诚、朴实比什么都美。我就是为作者这种真挚的感情所激动而执笔译出这本书的。

作者不以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而以亲身的经历和见闻，通过自己的思考写出了苏联在各个时期以及各种事件中各方面的反应，翔实地勾勒出斯大林个人的性格、作风和他在苏联历史以及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由于作者是少数能与斯大林接近的作家之一，所以书中有许多史实，特别是文艺界的情况鲜为人知。作者毫不掩饰个人的感受，真诚而朴实地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对斯大林的

功过都作了客观的描述和自己的评判。此书写于苏联实施“公开性”之前，最近才公之于众，可见作者临终前写出这本书时心怀坦荡，不尚虚声。

为了年轻的一代了解一点作者的情况，我在此向读者作简单的介绍：康斯坦丁·米海洛维奇·西蒙诺夫（1915—1979）出生于一个旧军官的家庭。1934年开始写作。1938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曾任《文学报》、《新世界》等报刊主编、苏联作协副总书记和书记处书记等职。1939年任《红星报》军事记者后，一直从事战争题材的创作。他的创作面很广：诗歌、戏剧、小说、随笔、评论都有建树。他的大部分作品也都译成了中文，如：《我城一少年》、《俄罗斯问题》、《俄罗斯人》、《在布拉格栗树下》、《异邦暗影》、《日日夜夜》、《祖国炊烟》、《战斗的中国》、《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最后一个夏天》、《等着我吧……》、《友与敌》等。1949年10月他曾作为副团长率领苏联文化代表团来我国访问，11月初曾来武汉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和中苏友协武汉分会成立大会。西蒙诺夫曾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联中央监察委员。他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并获得一枚列宁勋章。

在这本书的译述过程中，得到许多亲友的帮助，诗人曾卓看了此书的手稿后热情地写了一篇序言，我在此深表谢意。

章 其

1988 . 8 . 31 于武汉

中译本序

曾 卓

康·西蒙诺夫在这部回忆录的开始就表明：“在最近可以看到的将来，我并不希望它全部拿去发表。我打算把它完全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并怀着一点希望：这种出自我这一代人的个人的见证和思考，能够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历史学家发生一定的兴趣。”这部书写于他的晚年，可能是他的最后著作。形势发展很快，他大概不曾料到，这部书写出后不到十年，就得以全文发表了。而且这的确已成为一本历史学家和当代读者普遍感兴趣的书籍。

斯大林是历史上最复杂的人物之一。他有着伟大的功绩，这是不容抹煞的。当他在世时，虽然从西方也传来了一些关于他残酷地镇压坚贞的共产党人和无辜平民等等报道，但一般人并不认为那是可靠的，至少也应该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在我们心目中，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的形象。有两位法国作家所写的关于斯大林的著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是巴比塞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斯大林传》，一本是布洛克的《共产主义人物——斯大林画像》。前者记述了斯大林的前半生，后者则是作者作为记者记载了他在苏联卫国战

争时期，所看到和听到的有关斯大林的事迹。这两本书所刻画的斯大林的形象是光辉的。但是，在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在苏共二十大提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以后，我们才逐渐认识他的另一面，或者说，我们才有可能比较全面地认识他。我当时没有读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看到了一些零星的材料，特别是路易·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引起了我相当大的震动。我认为这是一本写得相当客观的书，勿宁说，作者是在为斯大林辩护，那里面所揭露出来的某些阴暗的事实应该是确凿的。这几年来，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更是大量出现，有助于我们对斯大林的认识和了解。由于斯大林在苏联有着长达数十年的统治地位，只有真正认识和了解斯大林，才有可能真正认识和了解苏联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其中所显示的某些现象，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经验教训，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在众多的有关斯大林的回忆录中，西蒙诺夫的这一本有着其独特的意义。西蒙诺夫出生于1915年，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新人。他在年轻时，就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秘书长、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可见他是深受斯大林重视的，他对斯大林不致怀有偏见。他有多次直接与斯大林接触的经历。作为一个作家，他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就保

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异常生动，他只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关斯大林的过去不大为人所知的新材料，特别是斯大林与文艺界之间的关系。西蒙诺夫并没有企图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只是通过自己的经历和接触，写出他所认识的斯大林，并写出了自己当时的感想、感受，因而就显得特别亲切。同时，他也写到了他所接触到的其他苏共领导人和某些作家的情况。

在回忆录的开始，西蒙诺夫以相当大的篇幅记述了他青少年时期家庭中的遭遇和他的经历，为我们提供了斯大林时代的社会背景，他的继父，苏联海军委员会的军事专家，一个正直、诚实、坚强的人，曾于1931年被逮捕，家也被抄，当时西蒙诺夫的母亲正在病中。他的继父后来虽因无罪被释放了，但在年轻的西蒙诺夫心中不会不留下一些阴影。由于所见到的这一类事件太多，他虽然半信半疑，但也就习以为常了。同时，他参加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工作，亲见了苏联建设的伟大成就。后来，他又经历了卫国战争的艰苦战斗和伟大胜利，所以对斯大林怀着崇敬的心情。——对冤屈习以为常；有困惑而不敢说出来。这就是西蒙诺夫当年的心态，大概也是那个时代一般苏联人的心态。

后来，从1946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他感觉到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发表过许多明智的意见，也作出过一些错误的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他感觉到斯大林是一个

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个伟大的演员。——通过那些详尽的描绘，使我们看到了斯大林的复杂的个性、工作作风，也看到了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以及那些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的态度。

有关斯大林与文学界的情况，当然是使我感兴趣的，但更引起我震动的是斯大林逝世前后的种种情景。在苏共十九大以后的一次中央全体会议上，斯大林以激烈的、严厉的言词抨击了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指责他们不坚定，认为他们怯懦和有投降的倾向。而那两位政治局委员就在他身后不到两公尺的位置上坐着，脸色苍白。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也是面容紧张，一动也不敢动。他俩虽然后来也讲了话，作了辩白，但未必就希望斯大林改变对他们的命运已作出的决定。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但我们却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的晚年，他是孤独的。因为他有无上优越感，没有可以对他进言的人，没有敢与他争论的人，他拥有的无上的权力不仅造成了许多错误，也逐渐把他自己毁掉了。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斯大林去世以后，苏共别的领导人虽表示悲痛，却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紧接着西蒙诺夫又写到了贝利亚的种种阴谋活动和他的可耻的下场。于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西蒙诺夫的这部回忆录，刻画了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他的一些遭遇、感受，也刻画了他直接与斯大林接触中所产生的印象和感受。他的态度是诚恳的，他的记述是真实的。这些有助于我们了解斯大林和苏联的一些历史内幕。这部回忆录是口述后整理的，所以稍嫌零乱，但却保存了一种亲切感。章

其同志的译文忠实地保持了原著的风格。我知道他是在今年武汉的酷暑中赶译这部书的。他的辛勤的劳动将在读者的满足中得到补偿。

1979年2月23日

首先要说，我今天开始动笔的这部手稿，无论如何，在最近可以看到的未来，我并不希图它全部拿去发表。我打算把它完全交给国家档案馆保存，并怀着一点希望：这种出自自我这一代人的个人的见证和思考，能够有朝一日使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历史学家发生一定的兴趣。至于说到这部未来手稿的某些部分，那我并不预先排除，我可能产生一个愿望，或者我本人有可能看到它们发表。

从斯大林去世的那天起，到去年已过了 1/4 世纪。然而我很难想起，在迄今已差不多是 26 年多少有点漫长的一段时间里，对评价斯大林个人及其活动，评价他在我国的历史和现代人的心理中的地位问题，什么时候不曾这样或那样引起我的兴趣——或者是直接地在我从事文学工作的过程中，或者是间接地在同读者的通信中，同各色各样的人就各种不同的问题的谈话中都曾经常地导致我们议论斯大林并为他进行争论。

由此可知：斯大林是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对于这样的人物，无论在书写我们社会历史，还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中

(尽管这一生无限渺小,但总还是这个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要想避而不谈,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将作为我这一代的人来写斯大林。当斯大林在党 16 大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明白而又不可动摇地确定为我国、我党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头号人物时,这一代的人已有 15 岁;而当斯大林谢世的时候,我们已经是 38 岁了。今年,当他满 100 岁时,我们就成了 64 岁的人了。

在讲到我这一代人时,我说的是活到这 64 岁的人们:1936—1938 年的几次镇压把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从生活中除名的,比之我们的前几代人,为数少得多;可是战争却把我们差不多一半人从生活中勾掉了,尽管战争还不是频频发生的。

因此我预先说明,第一,讲到我这一代人时,我指的是那一小部分活得比斯大林长久的人,而不可能指那大部分在斯大林在世时成长或死去了的人。他们如果不是象我经常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所说到的那样喊着斯大林的名字死去的话,那么,不管怎样,也不管他们是什么人,绝大多数都是对斯大林的行为只作同一涵义的评价,而不加任何批评的。所以我将要写到的许多事情,他们绝不会接受——直到他们死前的一年、一天、一小时都不会接受。

第二,在 1915 年出生的一代人中,我属于不太广大的,更正确地说,大概是非常狭窄的圈子里的人。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职务和社会活动而有机会同斯大林多次接近。我曾同两位已故的同事,因苏联作协的事务,受斯大林接见了好几个小时;有一次我同他在电话中谈到我个人的文学工作的问题;

我曾好几次出席政治局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的会议，每次都进行几个小时。参加这些讨论的人有作家，其中包括我。我不仅聆听过斯大林在党 19 大上最后的一次演讲，而且还听过他显然是在这次大会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最后一次发言。后来我又在圆柱大厅内好几个钟头挨近地看着躺在灵柩里的身死的斯大林以及走过这灵柩的人们。因此，一些在我认识这个人的个性及其活动的过程中曾经起过而现在还起着作用的、直接的印象，有一部分我已写了下来，而有一部分还留在记忆中。

第三，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文学工作者，40 年来不变地、几乎毫无例外地从事战争题材，首先是伟大卫国战争题材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我经常接触到有关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有关我军溃败的原因和取得胜利的根源，有关战争的突然性和我们对战争有所准备或毫无准备的程度等各方面的问題。创作三部曲《生者与死者》，而后来注释我那军事年代的日记，使我直截了当地提出这样的一个题目：斯大林和战争。我不认为自己有权在三部曲的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中去写斯大林直接出场的那几章，竟不懂得从谙熟军事问题的、知道伟大卫国战争起因的、在这场战争中起着显著作用并由此而多次或经常地同斯大林打交道的人那里，去获得对一个战前从事军事问题研究、在战时担任最高统帅的人——斯大林的认识和人们对他的态度的可能更鲜明的概念。

在创作长篇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若干年中，我曾就这些问题同一些学识渊博的军人谈过话，谈话后我把他们的

回忆、他们的意见都记了下来，有时我也把自己的想法补充进去，自然，这都是作了严格区分的。在写完长篇小说《军人不是天生的》之后，我继续进一步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在这 10 年的过程中，我还断断续续地作了我那战时日记《战争的不同日子》的注释工作。在战争年代发生的一些事件的许多前因后果都与斯大林个人有关，与他指导战争的性格有关。为了对我在注释自己的日记时接触到的这一系列问题作出自己的结论，我就尽可能广泛地探明那些军人们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自然，这都是一些不同辈分的人，这一点我认为有必要预先声明。但是，所有从听来的和加以比较的材料中得出的结论是我本人作出的，我作为我这一代的人，自然就应该对自己作出的结论担负自己的全部责任。

最后，第四，从开始发表我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起，近 20 年来，乃至今天，不管我收到读过我那些战争题材的著作的读者多少封信，如果不是每隔两封，至少也是每隔三封，不管怎样拐弯抹角，都谈到了这样的题目：斯大林和战争。许多信我都回答了，同意了一些人的见解，也同一些人发生争论，不过，无论如何 20 年来我都同源源不断的信息打交道：看到所有各种不同的人——社会地位不同、辈分不同、职业不同的人怎样看待这个问题：斯大林和战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那些书就成了他们的意见的借口，但这仅仅是借口，而不是思考的理由。成为思考的理由的是我们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社会的实际历史。所以这 20 年来源源不断的有关这方面的问题的信息，过去和现在都影响着我，不影响那才是怪哩——因此，在我现在着手写的这部手稿中，它就必然

会有所反映。

由于我在上面讲到的那4点原因，这部手稿的内容可能显得较狭窄，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相反，它的书名《我这一代人的见证》却又可能稍嫌过宽。

※

※

※

当我着手写过去遥远的事情，写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的时候，最难对付的是这种诱惑：它唆使你把今日的思想同那时的情况拴在一起，以为这一来就显得更有先见之明，对时代的冲击更为敏感，对发生的事情更有批判力，说简单一点，就是比实际上的你更聪明。我竭尽全力摆脱这种诱惑。年轻的时候，我显然不是一个傻瓜，但我却无法想起那时我对斯大林有什么值得注意的思考。我几乎想不起有我在场时家里作过政治性的谈话。我只模糊记得，当我的继父还在梁赞步兵学校担任战术教官时，家里对托洛茨基作为海军人民委员会委员的工作有所不满。我记得，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喜欢他。我认为这可能与他对待在红军中服役的军事专家的态度有关，当时我的继父也属于这些专家之列。我记得，伏龙芝来接替托洛茨基的职位时家里如何欢呼雀跃，后来他的去世又如何叫大家感到哀伤。伏罗希洛夫来接替他时大家有点惊奇，而且还有点不满，——看来，在象我的继父那样的人当中，存在着一种意见，伏龙芝死后的海军人民委员会委员的空缺应

该任命一个比伏罗希洛夫更出色和更懂得军事的人担当。这指的是什么人——我不知道，不过，这种口气在我们家里的谈话中是存在的。

列宁去世的影响在我们家里很强烈，很深刻，而且很伤心。这影响之强烈也许还因为那年我们已经在莫斯科，我的继父已到了高等教育讲习班进修，并且作为这个军事学校的学员在安葬列宁的时候担任值勤守卫的缘故。我记得，我们全家人都痛哭。至于斯大林来接列宁的班，这无论在当时还是小孩的我，无论在我们全家都没有这种感觉。大家都不喜欢托洛茨基，也都听到和知道同托洛茨基的追随者——托派分子进行斗争，何况这斗争是在军队里进行，它的反应就最直接地传到继父的耳朵里。大家对托洛茨基分子很反感，因而同他们作斗争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不过关于斯大林是反托洛茨基主义的一个主要战士的概念，据我回忆，那时还没有产生。就在 1928，甚至 1929 年前，李可夫、斯大林、布哈林、加里宁、契切宁、卢那察尔斯基的名字都是平排的。在上述的那些年月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名字也大致可以听到，可后来他们就从日常生活中消失了。了解斯大林领导一切是在集体化运动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与党 16 大召开之间形成的，16 大召开时我在学校七年级，当时叫做第七班。

很早，在 1927 年，即我 12 岁的时候，那时还没有大规模镇压运动，我就接触到了那个残酷的现实，这个现实在若干年后就被定性为“毫无根据的大规模镇压的年代”了。我同母亲和我的一个表姐到我继父的一个叔伯姊妹家去作客。

她住在克列缅丘格附近的波托基村，姓卡缪斯卡娅，父名我忘记了，我叫她做热尼娅姑妈。热尼娅姑妈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很活跃，非常讲究实际。同时，也象她后来的命运所显示的，是个气质高尚的人。她住在波托基村，同得了难治之症的丈夫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列别杰夫住在一间不大的房子里。他原是沙皇陆军大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便已退休。他双脚瘫痪，一动不动地躺了多年，而热尼娅姑妈就去照料他。她已经不年轻了，但总还比他小许多岁。很明显，她曾经有过自己的一些实际的想法，同意在他这个瘫痪的人身边生活，这主要的不是做他的妻子，而是做他的看护。但是，当一切情况发生变化，一切都翻过来的时候，她还没有抛开这个可怜的老头，依然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这个老头看来是个自由派的军官，他勇敢而又自尊地忍受着自己的瘫痪。不对命运诉苦，也不对苏维埃政权埋怨。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无论他讲什么，我这个 12 岁的孩子都很喜欢听。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尽管他讲些什么我完全没有记住。

有一天，我、妈妈和我的表姐到树林子去采蘑菇。照例，过了约莫 15 分钟，就发现有什么东西忘在家里了——若不是妈妈的头巾或上衣，就是还有什么别的。自然，我最小，就打发我回头去拿。我敲了几下热尼娅姑妈的门，可给我开门的不是她，而是一个陌生人。他让我进屋去，随后就把门关上。房间里还有另一个人——当我进屋的一刹那间，他把放有老头子那双一动不动的瘫痪的脚的褥子稍微掀起，朝这上边的褥垫和弹簧垫之间的地方窥望——不知是找什么，还是想在那里整理什么——这一点我搞不清楚，我只知道，这儿

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这虽然已经明白，但我还是由于习惯而不知不觉地问就站在床边的热尼娅姑妈我母亲忘记带的那件东西放在什么地方，说我需要拿到它转回去。可她还未及回答，那个放我进屋的人就给我指着一把椅子说：“坐一会儿，小孩，坐下来等一会儿。”我仿佛回答说妈妈会等我什么的。“妈妈会等，她会到这儿来找你。你坐一会儿吧。”——他对我指着那把椅子时态度虽不粗野，但却很威严，这时我明白，必须坐下，于是我就听从了他。后来过了几分钟，我明白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老头儿列别杰夫在我进屋时话说一半就停止（我还隔着门就已听到，他正大声说着什么），现在他明白他们要把我留在这里，于是他也不管我在场，就继续把他开始说的话说完。那两个穿便服来抄他家的人，虽然已向他表示过自己的证件，但没有拿出搜查证。于是他痛骂他们作威作福，威胁说要控诉他们。他大发雷霆，奚落了他们一顿。而热尼娅姑妈，看来对抄家相当冷淡，只怕他会因激动而中风，于是尽力教他安静下来，但这全无效用。那两个抄家的人继续做他们的事，把放在书架上和桌子上的书一本一本地看，一页一页地翻，往放在书架上的漆布下面，绣花布下面看了又看。老头儿靠在墙上，半躺着，继续痛骂他们。我坐在椅子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过了一个钟头，我的表姐回来同我在一起了。妈妈见我没转回去，很担心，就派她来找我。她被留在另一把椅子上。妈妈来了，她也被安在另一把椅子上。抄家终于结束，那两个抄他家的人根本什么也没有拿就走了。他们的态度很稳重，没有回骂。也许，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同这个瘫痪的老头有过

交往吧。但是，综合起来，这一切总象一件长期令人难堪的事情留在记忆里。谁知道它呢，也许，这正如我们现在所说，是出自某一个人的主动精神吧。叶甫盖尼·尼古拉耶维奇象他所说的，写了一份控诉书寄出去了，但它是否有结果，我没听说过。真的，以后几年，再也没有人来骚扰他，而他过了几年就死在波托基了，这是我们从信中得知的，因为我们再也没有到过那边了。

我把发生的事一如在童年的记忆中的情况写了下来，我认为，毫无一点夸张。这在记忆中并非什么可怕的，或是可悲的，或是使我震惊的遭遇。当时在我心中不是震惊，而是十分惊奇：我忽然碰上了这种看来与我们的家庭生活格格不入的东西……

一年以后，我们到了萨拉托夫，这时我的继父已在预备指挥官培训学校工作，我们得知，继父的一个远亲，即所谓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也许是他内弟的一个姐夫或者是这一方的什么人，这方面我总搞不清楚，被流放在索洛夫基去了。继父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不喜欢他，甚至也许是瞧不起他这个远亲。继父在当上作战军官的时候，负过5次伤，受过瓦斯毒害，因其个人的勇敢而多次获得过勋章。继父不能原谅他的，正是因为他（也是一个军官）竟耍起滑头来，整个战争期间都呆在军需部队里工作而不上前线，所以继父把他叫作“面粉做的胸甲骑兵”。“面粉做的胸甲骑兵”，在我们家的概念中，不管怎样，都是一个相当热中于反对苏维埃的家伙。但是，据我记得那时的谈话，他流放到索洛夫基并不是为了这，而是为了同另一些更显赫的、跟他一起就同案坐

过牢的人合伙搞外币黑市买卖。继父对于这种事情，正如他素来的脾气那样，是同样不妥协的。他对这个被流放的人的妻子只不过因她是个女人而表示同情，而对这个遭难的人则认为罪有应得，话虽不是这样说，但意思就是如此。

第一个五年计划热火朝天，我们学校有两个五年计划方案（一个是基本方案，一个是最佳方案）研究小组。我对这种活动比对学校的功课更感兴趣。离萨拉托夫不远的地方，在伏尔加，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建设正热火朝天，在萨拉托夫本市，开始建设一座康拜因工厂，同时加速建设一家小型的拖拉机零件厂，以供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的需要，——这一切，综合起来，都在我违背继父的意见中起了作用。我要违背他的意见不是那么简单的，只在母亲保持中立的情况下，我才得以在读完七年级后跟同班的一半同学一起进入工艺学校。

我们是按当时中央劳动学院的制度被录取的。我们通过了某些考核；我们未来的专业就是根据这些考核的结果而定的。我落到当车工，所以从1930年秋天起我就开始在工艺学校的第二机械班学车工。几个月后我开始作为学徒在学校附近的一间名为“通用”的小厂里实习，这间工厂制造美国车床的卡盘。车工这项专业我学起来相当困难，我那双手真不灵巧，再加上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是从儿童保育院来的，而我们所谓有家的人则比较少，这就使情况有点复杂化。在理论课程上学习成绩比他们好不算什么英雄，而在生产上落后于他们则对我这个“有家的”孩子来说意味着落到被人瞧不起的、不爱劳动的人当中，这是我不愿意的，因此我尽可能

努力地去干。

那时工艺学校的学制为两年，1931年春我面临的前景相当近了——转到第二学年就开始拿二级工资，几乎比一级工资多一倍多。这对我们家中的收支有重要意义，当时我们的家境正如常言所说，非常拮据，没有多余的一个戈比。力求在生产实践中不出错误和希图挣得二级工资也与我同继父互不谅解的紧张关系有关。他认为（这是我的设想，尽管我没有同他谈过这个问题），娶了我母亲之后，他就应该把我的教育负责到底，希望我读完九年级后再读大学，毕业后出来当个工程师。他成天只是想这，其部分原因还可能是他自己当年读完实科中学后，希望获得高等技术教育而未成，由于无钱进一步受教育，从未想过军人职业的他，不得不进了士官学校。总之，差不多我在工艺学校读书的那一整年，除了“你好”和“再见”之外，我听不到他说任何一句话。他既不容忍我不听话，也不容忍我的决定。不过，他心里是爱我的，而我心里也爱他。

我们住在一间公家的军人住房里，有两个相邻的房间，屋里有一个公用厨房，那儿还有两个房间，住着两对军人夫妻。有一天晚上，据我记得，我们大家都睡得很早。约在10点钟，有人来敲我们的门。母亲不大舒服，有点发烧。继父起来开门。我睡在前边一个过道房间的橱柜后面，听到一阵嘈杂声后也醒了。我从没有想到过，这种事会在我们家中发生，但又确实已在我们家中发生了——抄家。我打开灯，光着脚板跳下床来，看到有3个我和继父都不认识的人。继父慌忙着，但已穿好衣服了。他，正如后来母亲对我说的，没有穿好衣

服就不开门，所以在穿好衣服以前他对外面人说：“我未穿好衣服——我不开。”于是他象通常那样，穿得整整齐齐的——皮靴、马裤、军便服、风纪带。也是后来母亲对我说的，继父在穿衣服时，外边等得不耐烦了，把门敲了很久。显然我没有一下子就醒来，小孩的梦是很香的啊！当我跳下床来就看见，继父戴上眼镜后又拿了一个放大镜——他的眼睛受了毒害后视力很差，常常要在眼镜前再加一个放大镜。他站在那里看着一张小纸——搜查证，看完后就还给他们。他很安静。母亲也一样，她穿着睡衣，站在隔壁房间的门口。

“你去睡，”继父严厉地说，他平时也是这样对母亲说话的，“这里没有你的事。你病了就该躺下。”

但母亲依然没有躺下，只坐到椅子上，一个劲地坐了几个钟头。

抄家抄了很久，他们干得很认真，很仔细，把两个房间一一地搜查，甚至翻看了我那些工艺学校的金工学练习、我从七年级留下来的学校练习、以及我妈妈无数的信件——她喜欢写很多信，喜欢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给她来信。照我看（不过我不担保我的记忆），这是在4月，天亮还不会那么早，可是，等搜查结束的时候，天已完全大亮了，就是说，它至少进行了6个小时左右，如果不说更多的话。

当搜查结束的时候，那些进行抄家的人拿出一捆文件和书信。我原以为（尽管我可能弄错），他们把拿走的东西写下一张清单就会走的。当时我觉得，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可其中的一个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把它递给继父。现在这已经不是搜查证，而是拘捕证了。那时我没有想到，后来才

明白，拘捕是一开始就打算好了的，并非出于搜查的结果。一看母亲我就感到难过，虽然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妇女，但她有病在身，而且还发烧在椅子上坐了一整夜，这自然使她浑身发抖了。继父很平静。他又从军便服的口袋里掏出放大镜，用它看完递给他的那张纸，确信这是拘捕证后，就匆匆吻了一吻母亲，对她说，只要一查明，他就会回来的，这是一个误会。他默默地，但很使劲地握了一下我的手，然后同拘捕他的人们一起走了。

我同母亲留下来。她还在打颤，但她不喜欢在自己或别人面前显露出软弱，她认为有事会使她发抖和无法控制自己是可耻的。后来她躺到床上，看一看钟后说：“你自己到那边去把稀饭和茶热一热，你马上要走，不然到工艺学校就迟到了。”我说不去，要留下来陪伴她。她说，我必须走，她很快就会镇静下来的。既然她要一个人留下，而我又要走，需要到工艺学校去，那我就要立刻把我们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大家，如果不说，那就会显出我是怯懦。

无论是当天，或是过了一个星期，一个月，这误会都没有解除。我已把家里的事情说了。我还在工艺学校里读书和工作。大家对我的态度依然如故，仿佛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似的，只是申请加入共青团（恰好那几天我已谈妥并准备递交申请了），他们对我说，要等到我的继父释放之后才行。我现在明白，他们说得很委婉。我当时觉得，他们也只能这样说。我毫不怀疑，这是一个误会，我的继父会回来的。虽然我知道，在起诉工业党之后，在我们萨拉托夫就曾经拘捕过相当多的旧知识分子——一般所谓“留用人员”，仿佛记得其

中还有一个是我继父工作的军事学校的旧军官。但对我来说这两件事不能扯在一起：有的人可能要遭逮捕，有的人也可能有什么罪恶，正如工业党的那些人一样，可是我的继父则绝不可能，对他来说，这只能是误会。

如果说在我学习的工艺学校里，大家对我们家中发生的事情还很平静和友善的话，那么，在我继父任教和一向认为他工作得最好的军事学校里，一切都完全相反。我认为，在那个和随后一个时期的严峻甚至残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情况中，也象在其他许多的情况一样，大概总还有许多或某一件事是要看直接处理这些问题的人而定的吧。军校的指挥官和政委已下令立刻把被捕的营长阿·格·伊瓦尼舍夫的家从公家的住房里迁走。第二天，我从工艺学校回来，母亲对我说，她也已接到了由他们两个人签发的文件，说要她第二天就把房子空出来。她想去找他们，可突然打消了这个主意——邻居们劝阻了她。也许，不是邻居劝阻她，而是因为她还在病中，是病起了作用。

第二天早晨，我不记得是一个指挥官还是一个初级指挥官，带着几个红军士兵来了。我们没有地方把两个房间的东西搬走，但他们说，要么我们自己把东西搬走，要么他们强行把东西搬出来，并要把房间贴上封条。邻居们来帮忙了：有的说可以搬到他们那里去，把一些东西沿前室的墙边放着；有的说把东西搬进前室，会妨碍那里走路，看来要把某些东西放到院子里。母亲把手一挥说就把东西搬到院子里。我们的东西幸好不多：一张饭桌，几把绿呢面的椅子，两个书架，两只衣柜，一张床和一个我睡觉用的所谓叠床——是第一次世

世界大战时军官用的可以折过来的箱子，它同一只小箱子连在一起，还有一只窄小的折叠床。两只柜子和一张饭桌就放在外边，其余的东西就摆在暂时收容我们的邻居的前室。

母亲留下来躺在邻居的家里，而我听了邻居们的好主意，就去找房间。我到那个所谓萨拉托夫山，过了格列贝切夫山沟，就到了城市的上部。在城边，可以看到一个象爬上了山顶的村舍，据邻居们说，那儿有几个寡妇（这些小屋的女主人），有时出租房间。这一点我自己也知道，因为在学校读书时，我们有一个互相帮助学习小组，我曾到过那边山上去帮助我们小组中的一个同学准备功课——那是个小女孩，她的父母就在那边租了一个这种私人房屋的房间。我很走运：在那边街上走了约莫一个钟头，就找到了一个愿意把自己家里的两间房租一间给我们的女主人，那间房还相当大，里面足以放下我们为数不多的家具什物。当夜我们还是在邻居家度过，到早上就有一个邻居弄来了一部卡车，帮我们把东西装上去——可他不能再做了，他要去上班。母亲还在发烧，我请她在邻居家再多呆一天，并向她表示，我会亲自来做这一切。

我们就这么办了。不过，我不走运，因为这天下着雨，路面泥泞。在我们将要居住的那个地方，山路很陡，而且不知从什么地方起是没有铺路面的，卡车开始空转起来，再也走不动了。司机同情我，帮忙把东西卸到地上以后便走了。单位里允许他出来跑这一趟车的时间已经过了，他不能再多做他已做过的事情。于是我只好把我们全部的家什慢慢地一段路一段路往上搬。说也奇怪，我竟能背得动那几只空了的衣

柜！当时，1931年春，我只有15岁半，长得瘦小，一点也不魁梧，不过我自己也奇怪，身上的肌肉却还相当多，所以能把东西拖走，不过这一天我还是终生难忘。我记着这一天并无恶意，甚至带点自豪，因为我竟能对付看来无法对付的事情，而且连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委屈是有的，但主要是为母亲。她后来只要想起这段历史，就总也不能原谅那两个决定要我们搬家的人。也许，我就是因为她受了委屈而从少年时代起，尽管忘记了千百个人的姓名，却也总记得这两个人的姓名。不过，我并不想在这里道出他们的姓名来。6年后，其中的一个人的命运在1937年就悲惨地结束了，这我还是在20年后才知道的；而另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我不知道，我也不想昧着良心瞎说。

如果没记错，那年几乎整个夏天我都在工作。我还在工艺学校上学，在工厂里实习，象一般学校里的暑假我们没有，只有短暂的休假。仿佛记得，在这休假之后，我就拿到二级工资，开始领到不知是32个，还是34个卢布，反正不是象当初那样的17个卢布。这些钱，我同母亲在当时就很够用了。

继父蹲的监狱在离市中心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不许同他会见，因为他在被侦讯中，但托交物品是允许的——一周两次。通常是母亲把东西送去，但有时我也送。这些事是怎么发生的，我完全记不起来了。看来，这是因为一切都这么简单而又瞬即过去之故，若是延长一些大概就会记得的吧。

母亲身体复原后，便完全冷静下来，而且谈妥了从9月1日起开始任教师的工作，不知是教法语，还是教德语——她掌握这两门语言。在这一两年之前，由于继父的坚决反对，她

没有工作，继父在这方面有他相当迂腐的观点。尽管靠他一个人的工资我们生活得很勉强，可他还是认为这样比较好：他认为挣钱过日子完全是他的责任；母亲的责任是做饭，把家弄得井井有条，并且教育儿子；而我的责任就是读书。

虽然母亲谈妥了去工作，但这并非意味着她再也不相信继父很快就会回来。在任何情况下，对此她都不表示任何怀疑。相反，她非常有信心地说，如果他在她刚开始工作之前回来，她还是要去工作的，这一次他阻止不了她。而如果他在她已经开始工作之后回来，则无论他为此而对怎样生气，她也不会抛弃工作。简单地说，她没有怀疑他会回来，尽管这种过分的信心和不存在任何怀疑大概是为了我而表示的，但看来她在心底里确实没有怀疑，这个误会（她一直这样说）迟早一定会水落石出。

我记得一个晚上，好象是在8月底。夏天虽已结束，但天气还是很闷热。我们刚吃过晚饭，母亲就叫我把一张小地毯拿到院子靠近我们家的一棵树下，以便我们可在那里坐坐，要不然总在房间里就太闷人了。

我照她的吩咐做了。我们坐在院子里闲谈着，忽然便门打开，继父走进院子——他象平常那样，戴着制帽，穿着制服，肩章上还有几条横杠，腰间挂着一支手枪。他拥吻着向他迎面扑去的母亲，也吻了吻我，这在以前是少有的。我先不明白，他身上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仿佛一切都完全同过去一样。后来我才发现，他的面孔象冬天时一样苍白，而不是象夏天经常到野外去操练之后那样晒得棕黄的。

我不记得，那天晚上他回来之后谈了些什么，以后又谈

了些什么。我只牢牢地记得两次谈话，更确切地说，是两个话题，因为细节我自然是记不起来的。继父一知道我们在他被捕之后立刻被撵出公家的房子，便深深地为母亲的受辱而不平，谈到军校的首长和政委，他说他们的行为象猪猡那样地卑鄙龌龊。我知道当他说到某一个人或对某一个人说，他的行为象猪猡那样卑鄙龌龊的时候，这就表示他非常愤怒。他从不收回这样的话，也不对说过的话翻悔，相反，如果非得要回想某一个使他感到愤怒的人的行为时，哪怕事隔多年，他也会无情地用那同样的话来重复自己对他的评价。过去是这样，后来也是这样——一生都是这样。

关于他如何在监狱里度过4个月，其详情他无论如何不当着我的面说。也许，我不在场他回答母亲的问话时说过什么，而当我在场的时候，他什么也不说。他只在我面前谈到过审讯的情况。他说，所有提出来反对他的，如他所说，那些荒诞的控诉一个个都完全破产了。他说，他们叫他去受审时，显然都不知道他们是跟谁在打交道。他们以为，如果10个钟头不让他睡觉，并且在非常强烈的灯光下使他的眼睛发痛的话，最终就会从他嘴里得到那种有关他自己和别人的荒谬可笑的谎言。他一直都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从他嘴里听到这种谎言。但他最后说，自然他们一无所获。

我认为，他在我面前不讲别的事，只讲审讯的情况是有意图的，目的在教育我。这一点他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他认为这是他对这个前夫之子的一个重要职责。从我4岁起他就负起教育我的责任。我在童年时期，尽管不是很经常，但也有时在母亲和他面前撒谎。对此他从不原谅，而且总记

得我每一次说谎的事情。很明显，就是现在，甚至在讲到对他相当凄惨的情况时，他也不忽略给我上课的可能，告诫无论在任何场合，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即使有人逼你，也不应该撒谎。

他回家后第二天，就去找了学校的领导。我不知道他在那里谈些什么，但我一点也不怀疑，继父会用适当的言词为母亲如何受虐待而向校长陈述自己的屈辱。那时他们没让我知道一些详细情节，我唯一从继父口中听到的有关军校校长的事，是他说再也不会同这个人一起或者在这个人的手下工作了。其他的细节我不知道，显然，正如我现在所了解的，他指的是要去治疗，而要去治疗，就等于要退役。若是考虑到受伤的影响和视力的状况，那么纯属为此而去治疗的理由很早就已经充分了。我认为可能还有别的原因，说不定是同校长发生了冲突。无论如何，继父已作出了决定——而他的决定从来都不容反驳的：离开萨拉托夫，迁往莫斯科，暂时住到彼得罗夫卡他亲姐姐的家里（她答应为此暂时把自己的房间隔开），到莫斯科一所大学的军事教研室去任教。继父谈到这件事时很有把握，因此他想，退役前的最后鉴定会给他有完全可能从事这项工作，要不然，那今年春夏之间几个月所发生的事就不应认为是已经过去了，——看来，也确实是如此。

此后约莫过了一个月，我们就迁到莫斯科去了，我到名为曼德里施塔姆的精密机械工艺学校去读完二年级，而继父则到拉兹古利亚名为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工学院的军事教研室去任教——现在当我到坐落在离此间不远（约两个街坊）的

“文学艺术出版社”去时，不知为什么我总想起这件事。

我现在自问：当时那个夏天在萨拉托夫发生的一切事情是否已在我对生活的总体认识中，或者也可以说，在一个 15、16 岁的少年的心理上留下了某种烙印呢？既是又不是！主要的，是我继父的一切终于得到了它应有的结果。他从我最初的童年起就是我的光明磊落和诚实的标准，现在也还是这样的标准，而那些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深信这一点，就是说，他最主要的是正直。在我们困难的日子里，几乎所有同我们接触过和打过交道的人都对我们很好——这一切也可以看做是一种正直，是我们所能期待的一种正直。继父谈到因为他为人刚强、严正，而在最后审讯他时都很顺利，这种叙述给我留下一种不愉快的沉重感觉，觉得要是另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弄出不一样的结果，另一个人就可能经受不起他所经受过的情況。这种令人不安的音符留在记忆里，它大概比那个首长不漂亮的行为（继父简称它为“卑鄙行径”）更为清晰和更为重要吧。

除了这一切之外，我还感到自己有点不知不觉地成熟了；我觉得自己在危急的情况下能够处理某些事情。就拿那次搬家来说吧，这有一部分是完全靠我自己的背背走的。这一点继父没有夸奖我。一般来说，他是不喜欢夸奖我的。虽说他依然对我在工艺学校读书和准备继续上学不满，但我感到，他对这件事情已开始较为心平气和了。看来，在他不在家时我同母亲一起熬过了 4 个月之后，继父已承认我有权独自作出决定，这一点也使他对我自主选择生活道路的不满情绪有所缓和，尽管这不满情绪依然存在，而且还存在得很久。总之，

过去发生的事情多少有点加深了我对生活的认识，这是很残酷的，但也很幸福，如果从一个开始生活的人的精神发展方面来说的话。

两年后，我在莫斯科索巴奇广场上的一家医院里躺了一个或一个半月，这对我来说也是这种残酷的幸福。当时我躺在医院的一间改为肠伤寒病者的隔离室里。我从那时起就得知，这种肠伤寒传到莫斯科是 1933 年乌克兰闹饥荒的一个后果。从饥馑中得救的人们涌来莫斯科，源源不断，聚集在各个火车站上，这就成了肠伤寒病流行的原因之一，这一点是我当时在医院里听到的。

我躺在重病病房里，我们当中有 5 个人死了，有 3 个活了下来。在最初的日子里，后来死的一个人在半昏迷中给我讲了这次饥荒，他讲述时在发高烧，但话还很清楚。他是在火车站上被抬回来的。自然，我在萨拉托夫时也并非住在真空里，城里不是没有这，就是没有那，多少年来我们都已经习惯使用票证了。我在工艺学校读书时，在我们吃中饭的那间工厂食堂里，它的饭菜想起来也很奇怪：那一年，当没有许多别的东西的时候，下伏尔加却长出了很好的大豆，大家在那边也就忽然都种起大豆来，于是我们每天都吃大豆——大豆汤、大豆丸子、大豆糊羹。不过，我只是 1933 年在医院里才直接听到了饥荒是怎么一回事，直接看到了它的后果，只有在那里生活才教我懂得了这个。现在想起来这也是我成熟的一个残酷的部分。

现在我回过头来回忆在萨拉托夫的那些岁月——1930 年和 1931 年。我想起一些现在向我说明那时在社会情绪中明

显地表现出来的各种各样思想的细节。我记得那时有一些讽刺斯大林的政治歌谣，这些歌谣我没唱过，但听是听到过的。就是说，这些歌谣有人唱过，所以到处流传。当时社会情绪各色各样。我记得，仿佛是在工艺学校，有一个人给我递来一张小纸，象是传单，——我现在很难想起，这是手写的还是用复写纸复写出好几份的，抑或用胶版誊写器印出来的，但无论如何，我感到这种传单是复制了许多份的。在这张传单上仿佛画着一条小河，两边有高岸，一边站着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另一边站着斯大林，叶鲁基泽和不知是米高扬，还是奥尔忠尼启则——总之是个高加索人。在这张画下有一句话：“斯拉夫人开始争论了，看谁能统治俄罗斯。”但是，说不定我搞错了，这张传单也许不是在工艺学校给我的，而是更早，还在小学时就给我了。不过那时在社会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有这种情绪。但是想起来这只是一种可笑的东西，而不是真的要去记在心里或者要人去思考的。

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可在那些岁月中这对我是不起作用的。我不受它的影响是因为常常想到了红军，认为它在未来的战斗中是“最强大的”，我热爱它，从童年起就对它向往。而且我也想到五年计划，它给我们展现这样的一个未来，没有这未来我们将不能生存下去，把五年计划所规定的一切必须实施。想到红军和想到五年计划是由于当时我们受资本主义包围之故：如果我们不把决定的一切做好，那我们就无力自卫，如果一旦有人来进攻我们，那我们就不能战斗，就会灭亡，——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当我听到在我当时认为是由莫洛托夫接替季可夫而结束反右倾斗争的时候，就觉得这

是当然的，必须同右倾作斗争，因为他们反对加速工业化，如果我们不加速工业化，那我们就会被蹂躏，无法自卫，——这是最主要的。虽然在我听到的谈话中，露出了一些对李可夫、布哈林，特别是后者抱有同情的口吻，认为他们是想把我国人民生活搞得更轻松，更富裕，是关怀人民温饱的人，但这只是一种口吻，只是某些不同意见的反应。斯大林赞成国家飞速工业化，力求达到这个目的，并为此而同其他的一些人争论，指出他们的错误，这都是正确的，他的正确性在我当时看来无可怀疑，这在我 14、15、16 岁的时候都是如此。

我不知道对于我的其他的同龄人怎么样，可是对于我，1934 年差不多直到年底，在我的记忆中，是我少年时代最有希望的光辉灿烂的一年。我感到，我国已度过了某些难关，在大家紧张的连续工作下，生活已开始轻松多了——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我感到自己是这个生活的参与者，因为我觉得，我差不多在整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在工作，须知工艺学校虽有学习，但每天都要劳动 4 个小时。后来，读完工艺学校后，我在飞机制造厂工作过一个时期，此后又在当时的“国际工人救济协会制片厂”的一个机械车间里当车工。这是一个小厂，只有 8 个人，一台车床，由我管理，工作多种多样，因而很有意思。此外，在这之前一年，我已开始认真地写诗，写得虽然很差，但我把它看作是一项严肃的、与我未来整个生活有关的工作。

在其他的一些诗中，在作家们游览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之后和后来出版的一些特写、书籍和戏剧的影响下，我写了一首拙劣的长诗《白海运河》——描写了刑事犯的改造情

况。在我把这首长诗经常拿到文学辅导站去之后，其中有几个片段被收进青年作家的选集里，这个选集是由该辅导站编辑在“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加之我在例假时奉派出差，并收到“国家文学出版社”青年作者群众工作组寄来的一笔钱，于是我便作为一个青年工人作家（我真的已有3年工龄了）就这次出差的机会到白海运河去，以便亲自看一看那边发生的事情，也许，我要重新去写自己的那首长诗，虽然它多少有点成就（这我自己也明白），但只是其中的某些段落。

白海运河的建设和在它完成之后立刻开始的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建设，总的说来在那时我的理解中它不只是一种工程建设，而是一所把坏人改造为好人、把刑事犯改造为五年计划建设者的人道主义的学校。作家们在1933年中集体参观了刚开始建设的运河，回来后在报上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写的主要就是这个题材——改造刑事犯。而对那些因各种日常生活的罪行坐牢的人就写得比较少，尽管这一部分人为数很多。但不知怎的新闻记者和作家都对他们不大感兴趣。对于从全国各地派到运河工地上来劳动的过去的富农，写的也比较少，尽管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也很多，不比刑事犯少，也许还多一些。对于工地上占着各种工程师岗位的过去的破坏分子（这个题材也没顺利解决）写的稍微多一点。他们比之刑事犯在作家的注意圈内占第二位。但无论如何，这一切在全社会范围来说都表示出一种非常乐观的情绪，是人们意识上的进展，也是忘却过去、转向新生的一种可能。过去的罪恶豁免了，由于劳动有功而缩短了刑期，并提前释放，甚至在某些场合，还为前不久的犯人戴上了勋章。所有这一切都

表明，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情况就是如此，于是我到白海运河工地上去看看，不是去看人们怎样呆在劳改营里，而是去看他们如何在建设中被改造过来。听起来有点幼稚，但情况确是如此。

运河的建设已经结束，无论如何，这是它的首批工程，各种附加的设施快要建完了——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为它们劳动。道路快要铺好，附属设施也渐渐发展起来，工地现场开始收拾了，地面已经平整。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运河工地并在那里度过大半个月的。我住在一个劳改站里，在那儿劳动的主要是一些在过去多少与刑事案有关的人。劳改站文教组组长在自己与大家的棚屋隔开的小屋里为我加了一个铺位。他是莫斯科人，也是囚犯，跟这个站的其他人一样。我不知道，他犯了哪一条罪，最可能是政治上的，第 58 条，大概就是反苏宣传鼓动，——根据这一条，那时属于或者被认为属于参加托派或一般左倾反对派的人都要送往劳改营。我没有问他犯哪一条罪。我先不明白他竟是个囚犯，因为他的举止象个富有经验的党的宣传员。他是一个招人喜欢的 30 来岁的人，据所有的情况看，他对那个刑事或半刑事犯有过很大的、良好的影响，那个犯人算是这个劳动站的工人阶级。

谁也没有特别对我发生兴趣，当时我只有 19 岁左右，看样子我同其他在这个站里的人很少有什么不同——只是最年轻的一个。当他们偶然知道我是一个年轻的工人作家和写诗的时候，就对我表示同情，甚至还有点优待，——他们说，来吧，把我们写下来。这些人的服刑期不长，他们劳动很认真，想把服刑期更缩短，希望快些获得自由。我认为，我可能迷

于自己的诗歌了，而且一般说来，象常言所说的，我还年轻无知，不过，我从这次古怪的（用今天的观点看）出差到从劳改营回来，在心中没有感到沉重的负担。相反，却准备重新写关于劳动改造人的长诗，感到我虽为期不长，但却亲眼看到了实际发生的情况，而且相信事情大概应是如此，——要不，除了劳动能把一个人过去的罪恶冲刷之外，在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还能有什么其他更好的办法呢？

我没有机会亲自同一些出身于工程师的破坏分子接触，但我从一个多少了解我们家的女人那里知道，她在几年前嫁给一个人，这个人过去是个军事工程师，由于临时政府的局势的巧合，他仿佛当了冬宫的最后一位指挥官，根据第 38 条他被逮捕了，并判了不知是 8 年还是 9 年徒刑，他在白海运河作为这条运河的某一个枢纽的总工程师工作了两三年，而且把自己的工程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于是他被释放了，而且现在还作为雇用人员在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一个更大的建筑枢纽上当总工程师。这类信息补充了我个人这次旅行的印象。

党 17 大发生的事情，仿佛证实了我少年时期这些天真烂漫的乐观态度的正确性：过去的反对派懊悔了，他们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为此便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布他们的声明，原谅他们，并接纳他们回到党内。总之，信任人，——这就为团结一致、共同坚定目标、相信我国的未来和完成一切既定的计划创造了气氛。

凡不记得 1934 年 12 月的人，大概很难想象，基洛夫之被杀究竟出自什么可怕的力量和突然的袭击。在整个生活气

氛中，有什么一种东西轰隆一声垮了，破灭了，一件凶多吉少的事情发生了。这种感觉一下子就产生了，尽管象我这样的一些人甚至还没有想到接着会发生什么和以后又会发生什么。发生在斯莫尔尼宫内的谋杀本身；斯大林又象凶神附体地突然离开莫斯科赶到那边去；所有的文章都谈论着这件事情；人们给基洛夫安葬的情景，以及这一切显露的意义，——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是一桩不祥和可怕的事情。

当时我想象不到基洛夫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只知他是政治局委员，仅此而已。在我看来，他并不与加里宁、伏罗希洛夫或者莫洛托夫的名字排在一起，但是，在他被杀之后，这个名字——基洛夫——就忽然对我，也象对其他的人一样，成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在这之前是一个名字，而在这之后又是另一个名字。仿佛有一件东西悬在空中，随时都会突然爆发，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但它一定会爆发。我们由于自己的年纪和经验不能也不可能成为预言家，不可能预见未来，但事实总是事实。由于基洛夫被害，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意识中，就渗进了一种悲剧的成分，这种悲剧性的东西不仅已经发生，而且它还要在将来某处发生。我想，我现在不必写那些不真实的情况；我认为，这种已经形成的感觉，到那时不仅对我来说可能会变成另一个样子，就是对我那时还是 19 岁的同代人来说也一样。

两三个月后，突然开始了把各种“留用人员”从列宁格勒流放到各地的运动，这在那时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可理解的，甚至现在就我的特殊倾向来说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在这些“留用人员”中，有一些根本不是什么“留用人员”，只不过

是他们还挂着一个贵族的姓氏罢了。

1979年2月27日

在列宁格勒发生流放所谓“留用人员”的事，也涉及到我家：那边几乎有我母亲方面的全部亲戚——她的3个亲姐姐，我的两个表兄和一个表姐。

母亲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她最大的姐姐比她大15岁，名叫柳德米拉·列昂尼多芙娜，嫁给了一个出身俄罗斯化德国家庭的炮兵团长，名叫马克斯米利安·亨利霍维·狄迭曼。我记得在童年时期，大姨很喜欢幽默，革命后她常常暗中嘲笑自己那个德国人的姓，有时人们随便把狄迭曼改叫作季迭曼，德迭曼或者德迭蒙，所以她谈到自己的家庭时也说：“我们那个德迭曼”，或者索性叫：“我们那个迭蒙”。她到死也还喜欢开玩笑（她死时已有80开外，住在莫斯科），但她的生活并不轻松：她的丈夫指挥一个炮兵团，在前线时他的肺病已经加剧了，战争正酣时，1916年他便与世长辞。当时他率领一个团上前线，到前线之前这个团不知是驻在梁赞，还是驻在梁赞附近，所以大姨妈就带着3个孩子留在梁赞那边，而这一点看来在许多方面也决定着我的生活。因为母亲自从生父在前方失踪以后，便孤单地一个人留下来，所以她立刻从彼得格勒迁往梁赞，同大姨妈在一起。只是后来大姨妈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列宁格勒，跟其他的姊妹在一起，而我母亲仍留在梁赞，与我的继父成了婚。

上面提到的 1935 年以前，当时我的祖母已不在人间，她是 1922 年去世的，我的祖父死得更早，于 1911 年便去世了。那时在列宁格勒只住着我母亲的 3 个姐姐。受过师范教育的柳德米拉·列昂尼多芙娜，如果我没有记错，是在彼得格勒从前的一间法律学校的楼房里工作，那栋房子已经改成为残疾儿童的学生宿舍，她就住在这个宿舍之内。在那些年月里，当我到列宁格勒去时，也常常去探望她。我曾经说过，她有 3 个孩子。表兄安德烈比我大 3 岁，表姐马露莎比我大 8 岁，而大表兄列昂尼德则比我大 10 岁。1935 年以前，他们已经是独立的人了：马露莎当女教师，安德烈是建筑师，在列宁格勒国家城市设计院工作，而列昂尼德则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是化学家，是“红色三角”工厂的一个主要车间的主任。

在列宁格勒还住着我的两个姨妈——比母亲大 12 和 13 岁的索菲娅·列昂尼多芙娜和利达丽娅·列昂尼多芙娜。姨妈多里（她与母亲和其他完全具有民主精神的姨妈相反，喜欢大家叫她多里，而不是叫她达丽娅，这在革命前在家中就已经这么叫了）是个老姑娘，而且还是个残疾者：在童年的时候，她的身体因惊吓而局部瘫痪了，肩部弯曲，她的一只脚穿着矫形高帮子皮靴，很辛苦的一瘸一瘸地走路。这一切在家中都怪我外公——他是个暴躁如雷的人，发起火来就会使他的姑娘气得浑身麻木。我虽不知个中真情，但大概就是如此。母亲对我讲到这件事时，并不为外公辩护，尽管她很爱他。这大概是因为他对她这个年纪最小的姑娘，较之对其他的女儿态度完全不同的缘故。她爱他，但不为他辩护，而讲这一切时她都要说明多里姨妈的性格——易怒和爱挖苦

人。多里姨妈不喜欢苏维埃政权，这一点她并不隐瞒，而且常为此与姐妹们发生争执。她盲目地信仰上帝，依我看，她主要的不是自己信仰上帝，而是故意去刺激自己的亲戚和周围的人；她信仰上帝不仅是盲目的，而且是挑衅性的。当我还是 12 岁，她到梁赞来找我们时，我就同她发生过关于神学的争论，这争论使我彻底地不信上帝了。她的宗教说教的主要结果，就是我再也不单独上教堂，只是有时还跟父母一起去。同上帝诀别的过程在我们家中是我们 3 个——母亲、继父和我同时进行的。

总之，多里姨妈是个不幸的、凶狠的，与自己信奉上帝相反，又是个多疑的人。据我记得，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在列宁格勒一般都过着修女的生活。那时虽已没有修道院了，但还有一些秘密的宗教社团可供这样的一些孤独的修道士彼此往来。

在我少年时代，当我同母亲两个人或者我一个人（常有这种情况）来到列宁格勒的时候，就一定去探望多里姨妈，哪怕去一次也行。虽然我不大想去，但这已被看作是一种义务，因为多里姨妈直到最后一天都同垂危的外婆住在一起；外婆死后，她一个人还住在外婆病死的那个房间。我因公外出或是回来之后，便到多里姨妈家一两次。在狄迭曼这个和睦和喜欢嘲弄人的家庭中，我过得很愉快。但我更多的是住在苏瓦洛夫大道上索菲娅·列昂尼多芙娜三姨家里。她那里有一个明亮的大房间，藏书很多，我就睡在她家一排书架后边的沙发上，同她那张老姑娘的窄床隔开。

索菲娅·列昂尼多芙娜不象奥波连斯基家的任何人。柳

德米拉·列昂尼多芙娜和我母亲年轻时都很漂亮，年老后也都各有自己的姿色。多里姨妈虽然是残疾人，但正如大家有时谈到的，也还保持着纤细、高贵的美色。可是索菲娅·列昂尼多芙娜，1935年已有58岁，人老珠黄，翘鼻子，大圆脸。她百事不愁，倒也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俄罗斯妇女，长着一双结实有力的手脚，宽肩，满脸堆着善意的微笑，常常快活地哈哈大笑，心胸坦荡——不是一般的坦荡，而是逢人就敞开。一看她您就会觉得，她定然是一个许多子女的母亲或是一个孙儿满堂的老祖母。但不知为什么，她年轻时并未出嫁，而后来就习惯了老处女的生活。为什么她不出嫁，——这一点从没有人跟她谈过，也没有背地议论她。大概是她的外表，在她青年时期所处的那个社会中，远远达不到那个认为招人喜欢的标准，而且在外公的家中，外公虽有公爵的封号，但一生从职，廉洁奉公，也就无力给她办什么嫁妆。这是我关于我喜爱的姨妈的命运的印象。但我清楚地记得，当她快到50岁时，无论哪一方面都没有显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相反，她在自己的姐妹中显得非常快活，乐观豁达。她受过师范教育后，就献身于图书馆的事业，而且多年来一直主持一间就在苏瓦洛夫大道上离家不远的图书馆。她酷爱各种新的设施，一般说，她全部生活和精神都放在这里；她同读者往来，出主意，组织读书会，津津有味地讲述读书会的情况，——总之，她很喜欢爱读书和珍惜书本的人，因而她也多少有点爱我。在她从列宁格勒流放之前的最后几年，不知为什么转到了植物学院的图书馆去工作，她在那边涅瓦大道上的学院中，

在瓦维洛夫 身边做事,她甚至给我讲过她的一生的趣闻,但是讲的什么,我已记不起来了。

当她休假的时候,通常都会到我们家来作客。同时,如果我们的钱不够让我去列宁格勒,她就单方面给我补足旅途的费用,使我总能到来并住在她的家里。看来,她对自己的侄女和侄儿,最后几年特别是对我,都设法满足自己难以实现的给我们资助的感情。也许,这是因为她同我母亲比同其他姐妹更亲近,但说不定是因为我在所有的侄子当中是最小的一个,在她看来我比所有其他侄子是个更珍贵的孩子。

1934年我没有见过她,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33年,当时我来到列宁格勒,住在她的家里,正好在她的房间里写我认为很重要的最初的诗篇——描写列宁格勒的十四行诗,这首诗是在约瑟·马利亚·埃雷迪亚 的十四行诗的影响下写成的。他的诗已在我们这里出版,是由格鲁希科夫—奥列朗翻译的,不知为什么这本诗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5年冬天,我们已经不是从列宁格勒,而是从奥伦堡的来信中得知,除了一个人之外,我们所有住在列宁格勒的亲戚都已被流放到奥伦堡州或是边区(我不记得当时叫什么边区)。那个不喜欢苏维埃政权的、秘密的修女多里姨妈被流放了;那个喜欢苏维埃政权的、从1917年起便开始忠诚地在

尼·伊·瓦维洛夫(1887—1943),苏联科学家,现代选种生物原理学说和栽培植物发源中心学说的奠基人。——译者注,下同。

约瑟·埃雷迪亚(1842—1905)法国诗人。作品有十四行诗集《锦幡集》。

自己平凡的图书馆工作中帮助这个政权的索尼娅姨妈被流放了；那个严峻而又威风的、无畏而又忠诚地从事残疾儿童工作的柳莉娅姨妈被流放了；那个年轻的苏联女教师、我的表姐马露西娅 被流放了；那个具有才华的年轻的建筑师安德烈也被流放了。在列宁格勒只剩下柳德米拉·列昂尼多芙娜的大儿子——列昂尼德·马克斯米利安诺维奇。大姨妈的大儿子，照传统为纪念外公而取名列昂尼德，父名是德国人的名字，这是从他父名得来的。“红色三角”厂保住了他，大概是这个厂，或许不仅是这个厂，有人起来坚决反对，说工厂不能失掉象他这样一个出色的专家，于是我的一个最大的表兄列昂尼德就带着自己母方的公爵出身以及父方的德国人的姓氏和父名留在列宁格勒那个“红色三角”厂里工作了。在战争开始时，列昂尼德参加了民兵，他作为后备指挥官被任命为连长。后在战斗中因腹部受重伤而阵亡。他的弟弟安德烈在被流放的地方奥伦堡州干自己的专业，尽管我不记得他是否一下子就有事做，但后来确是如此。1941年他参了军，整个战争期间都是士兵，没有受一点伤。他们的母亲柳德米拉·列昂尼多芙娜，同我的表姐马露西娅和她的女儿纳塔莎在一起，纳塔莎跟她一起流放时还是个婴孩；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相当知名的作家和军事记者了，因此在8年流放之后，我就有可能把她们一起迁回莫斯科，所以在1955年，柳德米拉·列昂尼多芙娜还能与那些尚在人间的亲戚一起庆贺自己的80寿辰。

马露西娅为马露莎的爱称。

另外的两个姨妈，在她们流放的地方死了，不是马上就死去的，而是在 1937 年年底或在 1938 年间。当时有人要把正处于流放的她们投进监狱，她们两个就这样死于狱中。我不知道，只能猜测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其中的一个姊妹对苏维埃政权不满，并且对谁说过了什么话；而另一个被带走只是因为她是她的姊妹，——我不知道，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

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了。而在 1935 年，当我母亲从信中得知她的几个姐姐都象其他许多从小就在彼得堡认识的老人一样被流放的时候，有一个晚上她发愁地同我和继父坐在一起，忽然说（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如果我当时象柳莉娅一样离开梁赞回到彼得格勒，那么我现在自然就跟她们在一起了。”

我记得，当时她说出这一句话多么使我震惊。她说这话时觉得自己有错，错就错在她不跟她们在一起；错就错在她逃过了那怀苦酒，而她们，她的姐姐却没能逃过。后来她问继父：“我们说不定也会从这里被流放的吧？”——她说“我们”不是指我们一家，而是指她自己，指她自己的出身和自己娘家的姓氏奥波连斯卡娅。

“那有什么，要流放——咱们就一块走！”继父说，立刻就打消了母亲在考虑她个人时想撇开他的意图。

当母亲对这个问题还说了些什么话的时候，继父就生气了。正如他往常一样，开始变得严厉，近乎粗野。他仿佛说，别再嚼舌头了，要想出点办法来。如果要想什么的话，那就要想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她们。帮助柳德米拉·列昂尼

多芙娜——这是她的儿子的事，而帮助索菲娅和达丽娅·列昂尼多芙娜却是我们的事，再没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了。应该考虑一下，我们怎样才能帮助她们，在什么范围之内，怎样才能办到和什么时候办。

我记得这次谈话，但不记得我自己那时的心境。我知道，我对这件事情是不能漠不关心的，纵然因为我非常喜欢三个姨妈中的一个。那时我得知她已被流放，而后来又没有了她的任何消息，只是有人告诉我们，她已经死了，不知死在什么地方和怎么死的，没有一点详细的情况。我记得，我当时就产生了一种非常强烈的、非常痛苦的感情，觉得她，恰好是她，而最多的也是她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委实太不公平了。这种感情埋在我的心底里（我不怕说出这一点），并且总记得我国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在我个人方面干出了这种非常不公正的事情。这种不公正由于其结果的无法挽回而令人感到极端痛苦，因为，假如索尼娅姨妈还活着，她首先是第一个需要我帮助的人，如果说我能做什么和提供什么帮助的话。要是活着的恰好是她，那我在帮助她以前，绝不会想到去帮助别人。完全是这样。同时我无法想起，我当时想些什么，怎么议论，怎么对自己解释所发生的事情。赶狼就得伤羊，果真是如此吗？也许，有些事情多少有点象这种自我安慰，而现在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要比过去更加恬不知耻。那时是革命，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变革，它不是那么遥远，记得当时谈到这种紧张的话题时，一般都难得听到这样的话。

继父是个办事彻底的人。他不愿多说这些问题，认为帮助她们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记得，在 1935—1936 年间，我

们开始向那边——向奥伦堡还是奥伦堡州的某个城市，这我记不清了，寄去包裹和钱物。

1935年刚好是我那时收入很好的最后一年，我进了高尔基发起组织的工人文学夜大学，每天晚上上课，白天在那年的“技术电影制片厂”里劳动。劳动是计件工资制，我们装配轻便发电机。我的工资不仅足以交付我在家中的伙食费，而且还可以拿出一元钱来同父母的钱拼凑一起寄给几个姨妈。这情况直到我改为白天学习，失去工作，而发表文章还没有真正开始的那一年为止。我在物质方面开始有点坏了，而我应担负给姨妈的一部分资助已逐渐减少，也不经常了——只有忽然发表了什么得点稿费才能寄去。

我不能准确地肯定，照我看，母亲在1936和1937年虽曾去探望过姨妈两次，不过，说不定我会搞错，她只去过一次。如果是这样，那就可能是在1937年去的。但无论如何，她这次远行是在莫斯科发生了几次诉讼案之后，是在后来称为“毫无根据的大规模镇压”刚开始不久之后的事了。她这次远行无论在继父，在我，显然也在母亲本人的内心里，都是很紧张的，不过，她已下了决心要去看看几个姐姐。继父为她担心，提出种种理由，说只需继续做我们己做的事——写信，尽力在物质上帮助她们，这总比冒着将来有可能丢失这种帮助机会的危险而前去要好得多。母亲回答说，她终究是要去的，因为如果不去，那她就不再是她原来的自己了，所以她非去不可。只是现在我写这件事时不能确切地想起，她去过一次还是两次。

如果是两次，那么第一次是在1936年初，那时整个气氛

还不是后来的那个样子，对她这次外出也就不会有我现在想起来的那些紧张的谈话。

我记得，母亲在 1937 年这次外出回来时，显得格外疲惫、忧郁，因在那边的生活和旅途奔波而显得十分疲劳，但同时她却还没有失去对未来的希望。看来，她也许觉得她的姐姐们在那边的生活已是非常之坏和痛苦，再也不可能发生其他什么事会比这更糟。但是后来已经表明，新的事情可能发生而且可能更坏。正如我已经说过，后来，在 1936 年开始刮起来而后在 1937 年底以更可怕的力量越刮越猛的旋风达到最紧张的时候，那种事情也就发生了。我只记得自己与姨妈发生的事情有关的感情，而任何细节，任何行动我都记不得了。很明显，任何细节和任何行动在那时候都是令人难受的，或者想来都是令人难受的。更准确地说，无论是想来的或者是真的都是令人难受的，所以，无论如何，我简直都不大愿意去想它们。

对于有关那些年的气氛，有关我对这种气氛的认识，或者说得准确些，从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对于有关不正常气氛的认识，还需要补充什么呢？我只想讲那些与我个人直接生活经验有关的事情，如果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还可以称作经验的话。

在一些年轻的、开始写作的文学工作者当中，文学院的人也算在内，有些人已被逮捕了，其中有几个可以想得起来，特别是斯梅利亚科夫 的被捕，我多少有点认识他，主要是

通过多尔马托夫斯基，很少直接同他来往。被逮捕的还有我们文学院的几位大学生。一个是在高年级被认为有点古怪和有点装疯卖傻的，但恐怕也是最有天分的阿历山大·舍夫佐夫。随后是波杰尔科夫。有一个是我们班上的小伙子，他没有什么可叫人想起来的——无论是诗，无论是他在学院里的行为，我连他的姓也记不起来了。他后来的命运如何，我也不知道。也许，他后来的命运不会太坏，但无论如何，不会再从事文学工作了。我们班上的一个诗人瓦连金·波尔图加洛夫也被捕了。他是巴格里茨基的崇拜者，常去拜访他，而这位大师那时还在孔采沃。波尔图加洛夫完全是个小孩，长得眉目清秀，是个漂亮的小伙子，他当时写了一些相当奇怪的、我不喜欢的诗。我同他碰面只是过了20多年之后，当时他从科雷马河来到莫斯科；他在科雷马河先是服满刑期，后来就在那边工作，收集民间创作，翻译和写诗。他到莫斯科来还带着一本诗集——看样子他长得很结实，脸庞正正方方，晒得黝黑，象北方的土砖一样，一身饱经风霜。他出版了一本诗集——题材是描写北方刚毅性格的人，音步有其独创。后来他又在高级文学讲习班里工作。尽管他表面上长得很结实，但很早便离开人间，时年刚50岁。看来，他在所经历的生活终归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而且他在谈话中也从不对任何事

叶·阿·多尔马托夫斯基（1915—）苏联俄罗斯诗人。作品有：《明日之歌》。

艾·格·巴格里茨基（1895—1934），苏联俄罗斯诗人，长诗《奥帕纳斯之歌》的作者。

情有所抱怨。有一次，当我们坐在一起为他的书稿付印而埋头准备的时候，他忽然向我提起一个至今还健在的人，此人在当时打了他的报告而使他流放到科雷马河。他谈到这个人时带着半轻视、半谅解的口吻，说他大概真的觉得在他们两人谈话时，他波尔图加洛夫曾说过一些不合适的话。尽管波尔图加洛夫确实没有说过什么特别的情况，而且这一切都分文不值，更不值得往什么地方去写它，但这个人认为值得写就写了，他可以不写，但是写了，也报告了。读到这些，他甚至认为，这个人可能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好事，以为这是他的责任。

不管这看起来多么奇怪，但是现在，当回顾那些岁月时，我已记不清楚，我是否也曾产生过类似的思想，认为在我学习的那间学院里，有人会打个人的（我的或其他人的）小报告。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大家都还在。7、8年后，在战争紧张的年头，我较之现在写到的那个时期，已是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了，但我还是惘然若失地听着一个以前文学院的大学完全发自内心的绝望的忏悔，这种忏悔是无论任何东西、任何情况和任何外部原因都不能诱发出来的。看来，在那些年月里，这个大学生的父亲已经坐牢，这为了什么，我可不知道。而他曾爱人“约定”，要把学院中的情绪和谈话，就是说把我们的谈话内容往上报。这个人对我十分真诚，当他忏悔的时候，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去做这种忏悔，只是在战争最紧张的关头，他来到我的家里，开始为自己过去那一段生活而感到羞愧难当，只为这段生活的事，他当然会讲真话（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对我说，他大概只写过自己身

边的事，如果他写过别的什么，上报过什么，那么就会有人受罪，可是，他很走运，没有一个人受罪。也许，这是因为他没有写过什么特别的东西，或者写不出什么东西来，然而这个事实本身在他的一生中对他都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不过，这次谈话是在战争时期，而我同波尔图加洛夫的谈话却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而在1935—1936年，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当中会有人约定把我们互相谈话的内容和我们的情绪记载下来的。真的完全没有想到。

后来，在1937年夏天，生活第一次教我碰到类似的情况并迫使我去思考这个问题。

1937年夏，弗拉基米尔·彼得罗维奇·斯塔夫斯基——当时是作协书记，相当重视我们的文学院，支持某些散文作家的思想——以及我们的大学生列夫·沙皮罗、弗舍沃洛德·萨布林和季诺维·法津都想到北高加索国内战争事变的地方去，集体写一本描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的纪实性的小册子。我的这几个同学也要我参加这次工作——我已记不清楚，不知是因为我想试一试自己写散文的能力，还是认为这本书中有几首描写奥尔忠尼启则的诗是适当的，根据他们的意见，我可以写——总之，我作为第4个加入了他们一伙。

斯塔夫斯基不仅赞成这个想法，而且还帮助我们，甚至把我们领到不知是北高加索，还是罗斯托夫州委驻莫斯科办事处，去见当时的书记叶夫多基莫夫，他曾跟这个人一起参加过国内战争。我们在这个愁眉苦脸、忧郁的人那里坐了好几个钟头。我觉得，这个人在想着其它过去的事，不知是在发愁，还是被什么事弄得沮丧了。但同时，他回应斯塔夫斯

基的回忆时，也回想起一些对我们来说十分有趣的、当时的详细情节。

一切都已决定，我们都应该走了，可忽然下课后叫我去见斯塔夫斯基，要我马上就到作协去见他。我当时还不是作协会员，只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在几本杂志上发表过几篇组诗和一首长诗的作者。

“好吧，你说说，你在文学院那边讲了什么反对苏维埃的话。你想去写奥尔忠尼启则，可是你在谈话中却夸赞起白匪来。”斯塔夫斯基开始大致这样说。可我真的被这意外的谈话弄得发呆了，因为我从未跟谁谈过任何反对苏维埃的话，从来未夸赞过任何白匪，总之，我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

“瞧，我有你这方面的材料。”斯塔夫斯基说。“你老老实实交代吧——这是你跟我谈话的唯一可能的办法。”

虽然我被开始的谈话吓得手足无措，但我知道，说真话确是唯一的办法，就是说，要彻底否认斯塔夫斯基质问我的事情，否认那个人向他诬告我的东西，而且我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谁来诬告我的。

谈话持续了约莫 10 分钟，也许是 15 分钟，我始终不承认我不能承认的事情，不说我不能说的话，因为完全没有这么一回事。于是斯塔夫斯基发火了。他说，既然如此，那么他们 3 个人走，你就不能走。既然你在这里都不想同我讲实话，那你就用不着去写奥尔忠尼启则了。你要明白，你在宣传一些反革命的诗，而同时又想去追随奥尔忠尼启则。这是结束时他在我背后说的。

我离开他时被这件事弄得精神沮丧。不过，下一次见到他时是在两年之后，在蒙古哈拉哈河地区，他以领导身份把我生平第一次带到临近炮火的地方，正如常言所说，去闻闻炮火的味道，无论如何要在炮火射程内呆上几天。在前线，他对我象个粗笨而又关怀备至的保姆。

但这都是后来的事了，而那一天，正如我现在所记得的那样，尽管我所记得的可能不完全是当时所说的，可能话说得其实有些不同，可能说得比较缓和或者比较粗鲁，但事情确实是那样。回想起当时的心境时那就准确得多。当时的心情十分沉重，十分痛苦，脑子里总盘旋着斯塔夫斯基的最后一句话，他这句话暗示着一个我还摸不透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我赞扬一些反革命的诗人。我忽然想起了（我当时忽然想到）前不久在最近的几个晚上，有两三次同我们讲习班刚来的一位领导人谈心，他有时同这一个，有时同另一个交谈，显然，他是想同我们认识，我们是这样理解的。

那时我迷于吉卜林，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了我认为译得成功的几篇吉卜林的作品，于是我忽然想起，最近有一次，看来是第二次我同讲习班的这个领导人在什么地方的一张长椅子上交谈，想来是在赫尔岑之家前面的一个街心花园那里。开始就谈到了吉卜林的诗，为什么我喜欢这些诗。我喜欢它们表现刚毅的作风，士兵们的严格和磨炼，以

吉卜林（1865—1936），英国作家、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诗集有：《军营歌谣》。

及鲜明地表现出男子汉和士兵勇敢的本质。当我讲到为什么我喜欢吉卜林时，他开始问我，我怎么看待古米廖夫。我对古米廖夫相当冷淡，在阿克梅派的诗人中我喜欢曼德里施塔姆，我喜欢古米廖夫的一些诗，但他的诗一般我觉得比起吉卜林来更唯美主义，更少一些士兵的和刚毅的气质。总之，在我看来，吉卜林胜过古米廖夫，尽管就我的口味来说，古米廖夫的诗似乎应该使我喜欢。后来，在这次谈到古米廖夫之后，我的谈话人就开始背诵起古米廖夫的诗来。有些我是知道的，有些我不知道，有些我是喜欢的，有些我想起以前是喜欢的——《迷路的电车》、《豹》，还有一些我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于是我说，古米廖夫的这些诗我自然都喜欢，但我还是更喜欢吉卜林。

引起斯塔夫斯基追着我抛出那最后一句话的全部谈话内容大概就是如此。我没有同其他任何人谈过任何别的话。简直没有。就是说，这个新来的讲习班领导人干了一桩下流卑鄙的勾当，他说了实际上并非那么一回事的话。须知是他自己向我提起古米廖夫的，是他自己对我讲的，他说，尽管古米廖夫是个反革命，但还是个好诗人。是他自己向我念的诗，是他自己引我说的，我说，是的，古米廖夫自然有一些好诗，但我还是更喜欢吉卜林。

尼·斯·古米廖夫(1886—1921)，俄国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之一。1921年被枪决，现已平反。

奥·艾·曼德里施塔姆(1891—1938)，苏联俄罗斯诗人，阿克梅派代表之一。1938年大清洗时被枪决。

为什么他要向斯塔夫斯基说些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的话呢？是他自己引我参加这次谈话的，却又把这次谈话讲得使斯塔夫斯基召我去，要我承认讲了反对苏维埃的话，结果不信任我并且不让我跟同学们一起到我想去的北高加索的地方。为什么他要这样？是不是想邀功，想表示自己是个多么有警惕性的人，或者他还为着其它某种意图要来诬告我，但为什么呢？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他的事，他对我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不错。

此后，幸亏我们只有一次课，但我还是无法忍受看到这个人，看见他我就感到痛苦。我赶紧走开，以免他又来跟我谈话。后来，一想起这件我清楚记得并历久难忘的事情，我就把它看作是一种奸细行为。显然，他是靠它来巩固或者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的。看来，他有点可怜，或者缠在什么地方了，加之他还是个患有重病的人，走起路来歪歪倒倒的。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当我们秋季返校学习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被捕了，大概死在什么地方。我再也没有从谁那里听到过他的姓名。

生活就这样奇怪地一年一年教我们懂得一些事情，也把我的脑筋搞乱了。

我们早已到处搬迁，租赁各种住房，我们租过那些到别地去工作而一度空下来的房间。我们在继父的姐姐和她的亲戚的住宅里呆过，在那里我们度过了来莫斯科后的第一个冬天，姑母的一个兄弟那时已被逮捕。他是再次被捕的，第一次逮捕他时是在 1930 年，比逮捕继父的时候早些，几个月后也跟继父一样被释放了，他是一个相当有地位的军人，军长

头衔，苏联驻土耳其使馆的一等随员，军事学院的教授和图哈切夫斯基在贵胄军官学校时的同窗——看来就是如此。

20年代，当我们有时到莫斯科去一个星期，或者一个半星期时，就在那时姑妈的家里加铺住几天——没有其他办法。我看见过到伊万·阿历山德罗维奇（姑父的兄弟叫伊万·阿历山德罗维奇）家里来作客的、身材高大而又漂亮的图哈切夫斯基。

当时伊万·阿历山德罗维奇被放出来了，但他没有回到军队，他作为文职人员在一所高等学校里教经济地理课程。他是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忽然第二次把他投进监狱。这是在审判图哈切夫斯基、乌博列维奇和其他人之前或之后的事，我已不记得了，但大概就是在这个时期。母亲很伤心，她说，伊万·阿历山德罗维奇不可能有什么罪过。继父愁眉苦脸，一言不发，他根本不想谈这些问题，而我，我想些什么呢？

大概就象大多数人一样，无论如何，象我这一代大多数的年轻人一样，那时我认为审判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军人说不定是正确的。谁会无缘无故要去审判和枪毙象叶果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苏军总参谋长这样一些元帅呢？我对其他的人比对他们知道的少些，但在我少年的感觉中他们都是我军指挥人员中的精华，如果他们没

米·尼·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苏联元帅。1937年大清洗时被枪决。

叶·彼·乌博列维奇（1896—1937），苏军将领，1937年大清洗时被枪决。

阿·伊·叶果罗夫（1883—1939），苏联元帅，1937年大清洗时被捕，1939年被枪决。

罪，谁会逮捕他们，谁会把他们判处枪决？自然，我更不怀疑，这是一次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可怕的阴谋。我之所以不怀疑，是因为没有什么选择——我说的是那个时候：要么他们没有罪过，要么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当时我认为，他们大概都有罪，伊万·阿历山德罗维奇也有罪，以前，他没有罪就放出来了，而现在没有放出来，就是因为他有罪。继父当年被释放，是因为他什么罪也没有。现在他在一间学院的军事教研室里工作，平安无事。

然而，想这种事情是有点可怕的，谈这个问题也很可怕，因为越来越经常地有人发生同伊万·阿历山德罗维奇一样的事情。不过，这只是一些传闻，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人们，我对他们一无所知。

我就是这么模模糊糊地回想起了这个时期——有些是清楚的，有些则完全模糊。如果是个正直的人，想到这个时候，那么你大概不仅不能原谅斯大林，而且谁也不能原谅，其中也包括你自己。这倒不是因为你本人曾经做过什么坏事，就算你什么坏事也没有做过，但无论如何，骤然一番，你对这种事情已习以为常，这本身就是一件坏事。1937—1938年发生的事，现在看来是不可思议和骇人听闻的，但对你这个当年二十二三岁的人来说，却逐渐地成了一种常规，成为一种几乎是习非成是的事情了。你生活在这中间，却象聋子一样，仿佛听不到周围成天杀人，枪毙人，看不到周围的人们消失了。好象这是可以解释的，尽管它无法解释。大概，在分析我这一代人当时的认识，更确切地说，在试图分析这些认识，自然首先是分析自己的认识时，对发生的事件在一些场合完

全相信它是正确的，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却是半信半疑，或者是下意识地怀疑，这中间哪者多，哪者少，都必须划出界限。我曾相信过军事审判，除了那诉讼案实际上确有其事之外，我不能想象还有别的什么。公开审判常引起某些恐慌的情绪——由原来同意招认一切变为一再推翻自己的供词。对于这些人的招供产生怀疑仿佛是一件怪事。总之，这一切都构成了在当时看来是一幅相当合乎逻辑和合情合理的图景。但同时，为什么他们所有的人又都还是招认了，都认为自己有罪，谁也不否认自己的罪过，或者相反，谁也不坚持说他自己有权象以前那样去做呢？

对于这样的一些人，例如季诺维也夫，我就有过一种昔日的恶感，这也许是出于我在列宁格勒的印象和谈话，因为他在列宁格勒时给人留下了特别坏的印象。相反，对于布哈林，在某种程度上对季可夫，都有一种深厚的好感，特别是对前者。我记得他在第一次作家大会上讨论关于诗歌报告之后的最后发言。我们这些文学院的未来的大学生都得到一些厢座入场券，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某一次会议。我得到了参加这一次会议的入场券。开始我们的诗人都冲着布哈林提问，这我很喜欢；大家都讲得尖锐有力，大胆，挑衅性的——这也合我的心意。但是，当布哈林起来发言回答的时候，他也讲得尖锐有力，大胆，而且也是挑衅性的，这也合我的心意，他总结报告之后的讨论，我很喜欢。当我在文学院的时候，他是《消息报》的主编，他在那里发表了某些文学院的诗人的诗作。他曾两次发表过我的诗。我到过该报文学艺术部去，但并未见到他本人。

有一次我原定会见到他，——布哈林看过了我投到《消息报》去的一些新诗，对它们产生兴趣，想同我谈谈，于是向我约定时间会面，这自然使我发生浓厚的兴趣。因为在这之前我已同母亲约定，正是这个时间要去看她，所以我就提前跑到她那里去，给她留下一张字条。不过这次会面没有进行。布哈林忙于什么事或者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就这样再没有见过他。而我在母亲那里看见自己的字条时已是1944年的事了，当时她从莫洛托夫市回来，她是把我少年时代写的一部分文稿和所有我给她不管什么时候写的信都带到那边去的。我去见她，她正好翻阅我的旧信。她忽然说：“这就是那张字条，我想跟你商量，我保存了它，但这也用不着了。”

这是一个开始写诗的大学生的最普通的字条，他原定会同一个对他的诗发生兴趣的大报主编见面的。但是，由于后来布哈林出了事，这张字纸看起来是十分可怕的。1944年我在母亲家中看到了这张字条时，心想，这张字条恰好在1935年或1936年初放在母亲那里的，而她又把它带到莫洛托夫市去，这使我甚至哆嗦了一下。我在这张字条上写的，我现在可以背出来：“亲爱的妈妈，我不能来了，因为5点钟我要去见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为什么——暂时我不能对你说，这是秘密，以后我对你说，儿子。”这就是那张字条的全文。所谓秘密就是指我还没有对母亲说我向《消息报》投寄新诗，而且大概会象前两次那样发表它们。我想到时再给她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

那时是1944年，我自然把这张字条撕毁了。这时我已经是一个久经风霜、受过两次战争（开始是小的，后来是大

的)洗礼的人,一个荣获战斗红旗勋章的陆军中校,战地新闻记者,作家,写过《等着我吧……》,《俄罗斯人》,《日日夜夜》,两次获得了斯大林奖金。后来,我怀着恐惧的心情想:啊,要是这种情况发生在1936、1937、1938年,有谁翻看母亲保存的文稿,看到了这张字条,那么在那个时候他一定会马上去报告,说你同布哈林有什么秘密。那时不仅对一个在《消息报》上发表自己的诗的文学院学生,而且对他的家属也不会有好下场。甚至还不仅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在1944年,如果我同母亲进行那番谈话,如果当我撕毁那张字条的时候,有一个坏蛋跑来偷听或见到这张字条,——那我们也不会有好结果。可当时我什么也没有对母亲说,只是摇摇头。她也没有说话,只是耸耸肩膀作为回答,仿佛在说,她大概是错了。她习惯把一切东西,包括我给她写的一切信件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对她来说,这习惯要比任何别的想法或者担忧更为有力。

但是,我刚才谈到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和李可夫的那些事情,都属于人们认识的某种非常特殊的情况,而主要的是由于发生的事件带有群众性的性质。这就使人直接地产生了怀疑,不过必须注意到,现在我们来回忆那个时代,讲的是大规模非法镇压的时期,那时所有发生的事情越往后就越多,而且都不是在法庭上进行,只是在有人不知从哪里听到的一个什么三人小组里就解决了,一些人也就从此不见了。自然,我的视野,我知道的事情,我认识的人都有限,我所知道失踪的人也许只是千百万人其中的一个,而对于其他的人我就一无所知,正如其他的人也不知道别人一样。但是,甚至在

这种条件下，也感到发生的事情带有群众性的性质，因而产生一种感觉，这一切都不可能是正确的，可能会有什么错误。这一点有时私下谈谈，而当叶若夫从内务人民委员会调去担任水路运输人民委员，接着又完全消声匿迹的时候，这些怀疑的正确性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加强了。民间的一个词儿“叶若夫作风”不是象其他更年轻的一代人大概有时觉得的那样，产生于 20 大之后，而是产生于叶若夫消失与战争开始之间，它在一部分已失踪的人们重又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了。它仿佛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而且据我的回忆，大家说出这个词儿时并不感到特别害怕，还大声嚷嚷的。我现在想，斯大林在他所支配的情报的帮助下，已知道了这个词儿广为流传并且成为日常用语了，所以他无法下令追究这个词儿。看来就是如此。显然，从那个时候起，斯大林对上述各个年代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开始与亚戈达，而后来主要与他的继任人叶若夫联系起来是很满意的，这一切都已贴上“叶若夫作风”的标签，这就使他很满意了。

顺便谈谈，要回忆那个时候，就不能避开我们当时对贝利亚的一些想法。自然，这都是从远处听来的，任命贝利亚看来是斯大林想叫一个格鲁吉亚人来执行与这种职责有关的一些严峻的任务。这个人是他认识的，显然，也是他信得过的，这个人必须很快地改正叶若夫所做的事情。必须记得，那些在 1938 年底和战争开始之间被释放的人都是在贝利亚当权时放出来的。这样的人很多，我不知道他们在其它的范围占多少百分比，但据《伟大卫国战争史》中所载，正是这些年头，就是说，在贝利亚当权的时候，在叶若夫时期被逮

捕的军人，已被放出来的有 1/4 多。因此，传说贝利亚恢复正义，力图改正叶若夫所干的一切便有了基础。这基础相当牢靠，所以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无论如何，那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过贝利亚后来的所作所为。在“叶若夫作风”的时期，他来莫斯科以前在格鲁吉亚干过什么，这一点，甚至多少接近真实的情况，我也一无所知。

因此，在我们的意识中，斯大林已改正了在这之前由叶若夫和其他一些干蠢事的人所犯的错误的。为改正这些错误就任命了贝利亚。既然贝利亚他已经掌权，而梅耶霍德 和巴别尔 也都是在 1939 年被捕和失踪的，那么我要说句老实话，不管这些被捕的人在文学和戏剧界有多少，也不管这些突然的拘捕（已经是在这个时候）所引起的那种震惊有多大，总之，尽管这些突然拘捕在这一些人中间已经是个别的了，但正因为它们是个别的，也正因为这是在贝利亚已经掌权，而他又是来改正叶若夫时期所犯的错误的，所以就产生了更大的怀疑：这些在 1939 年坐牢的人，莫非真有什么罪过？而其他早在叶若夫时期坐过牢的人，其中大概有许多人没有罪，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些在叶若夫时期谁也没有动过他们的人，却在要开始改正过去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突然被捕了，这莫非真有什么理由？

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可是我那时的这些想法，我看没有

弗·艾·梅耶霍德（1874—1940），苏联导演，共和国人民艺术家。

伟·艾·巴别尔（1894—1941），苏联俄罗斯作家。《敖德萨的故事》的作者。

什么理由要把它们忘掉。这是那个时代的复杂心情的缩影。

1938年夏末，我成了作协会员。这一年，我一下子出版了如果不是三本就是两本最初的作品，所以我总感到自己是一个职业作家了。自然，对这个时候文学界发生的事情，包括一些凄惨的事件，我知道的比以前多一些。

在这些事件中，对我个人来说最凄惨的莫过于米海依尔·科利佐夫的突然被捕和失踪，他连什么门坎都没有跨进去就被捕了。他是在1936年最末时被捕的，当时在作家的圈子里已没有发生逮捕的事情了。他在一次规模盛大的作家集会上发言，博得听众热烈的鼓掌之后就遭到了逮捕。后来我知道，他是直接从那里到《真理报》去的，他是该报的编委，他就是在那里被捕的——几乎还没有走进梅赫利斯的办公室。

我们大家都读过科利佐夫的《西班牙日记》。我们读时比读其他有关西班牙的作品，比读其他人写的、甚至比爱伦堡写的西班牙通讯都更有兴趣。法捷耶夫和阿列克赛·托尔斯泰都写过有关《西班牙日记》一书的文章。他的第二本已准备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并已差不多付排，大家都迫切地等着它。科利佐夫对我们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我们苏联人在西班牙所做的一切事情的象征。我们许多过去在西班牙

米·叶·科利佐夫(前译柯尔卓夫)(1898—1942)，苏联俄罗斯作家。著有《西班牙日记》一书(1938)。

列·扎·梅赫利斯(1889—1953)，苏联国务和党活动家。1930年起在《真理报》工作。

作战的军人，后来都已被捕（有一些释放了，有一些却死了），这件事我知道得很晚；而关于科利佐夫的被捕我们当时一下子就知道了。关于他失踪的传闻瞬息之间就沸扬开了。对于这件事我们怎么也弄不明白，怎么也不能相信，他会有什么罪过，这是不可能的，或者几乎是不可能的。总之，我们不信这件事，应该说，我说的一点也不夸大，就象相信或轻信其他的事件时，我说的一点也不缩小一样。

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卫国战争一开始，就传说有时在这一条战线上，有时在那一条战线上，甚至在卡累利阿的战线上，有人看到过科利佐夫。他已被释放，从集中营回来，现在在作战部队里。此事有过一些见证人，这些见证人仿佛跟谁谈过这件事，而听到的那个人又去跟谁谈过这件事。这样，在战争最初的两年间，这些传闻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到了我们，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这些传闻是有根据的；回到作战队伍的一些军人，后来在前线表现得很出色。关于他们我都曾模模糊糊地知道，他们在战前的年代就已经失踪了，可不知道他们在战前就已回到军队中来。而在战时，他们的名字先在受奖的名单上出现，后来就在命令之中。关于科利佐夫出现在前线的传闻之所以特别持续不止，是因为对他，对他个人，对他在西班牙的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对他的《西班牙日记》一书抱有特别的好感，而且是与相信这个人没有什么罪过有关的。

1949年，当我们率领第一个苏联文化代表团到中国来的时候，法捷耶夫是该团的团长，而我是副团长。有一天很晚的晚上，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法捷耶夫在同我开诚布公谈

话的时候（应该说，他很少谈论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很少同我谈到这些，总共大概也只有三次），我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在我开始谈到科利佐夫，谈到直到如今大家都还不相信他会发生那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对我说，他——法捷耶夫，在科利佐夫被捕之后过了一周或两周，就立即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短信，说许多作家，共产党员与非党人士，都不能相信科利佐夫有罪，而他本人，法捷耶夫，也不能相信这件事。他认为有必要把这件事在文学界所引起的这种普遍的印象告知斯大林并请求接见。

过了一些时候斯大林接见了法捷耶夫。

“那么说，您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斯大林问他。

法捷耶夫说，他不能相信这件事，也不想相信它。

“那您以为我相信了，您以为我想相信了？我不想，但不得不相信。”

斯大林说完这句话后就叫波斯克列贝雪夫来，命令他让法捷耶夫去读完那些已为他准备好的放在一处的材料。

“您去看一看吧，看完后就来找我，谈谈您的观感。”斯大林对他这样说，这是我同法捷耶夫谈话时记得的。

法捷耶夫同波斯克列贝雪夫一起走到另一个房间，坐到一张桌子边，在他面前摆着两卷宗科利佐夫的供词。

照法捷耶夫的话说，这些供词真是吓人，他承认了同托洛茨基分子，同波乌莫维茨分子都有联系。

“总之，那儿什么都写了。”法捷耶夫痛苦地挥一挥手说。看来，照我的理解，他不愿意再涉及这个人提供的细节了。“我读时就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当我把所有这些材料看了一阵

的时候，就叫我再次去见斯大林，于是他问我：‘怎么样，现在只好相信了吧？’”

“只好相信。”法捷耶夫说。

“如果将来有必须回答的人来回，那您可以把您所知道的事情告诉他们。”斯大林最后说，送走了法捷耶夫。

我同法捷耶夫进行这番谈话是在1949年，在斯大林逝世之前3年多的时候。法捷耶夫并没有评论他同斯大林的谈话，不过他讲到这件事情时显得有点痛苦，这种痛苦随你怎样理解都可以。你一方面可能想到，这是由于不得不相信象科利佐夫这样的人有罪而感到痛苦的，而另一方面，你也可能认为这种痛苦是由于法捷耶夫当时处境进退两难，但在他的心底里，看来是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的，不相信或者无论如何也不完全相信他所看过的那两卷宗材料的。当他谈到“那儿什么都写了”这句话时，在他的语气中显露的正是这个思想，他心底里还是不相信科利佐夫有罪。但事隔11年，无论怎样他还是不敢直言这一点，因为科利佐夫已不是“叶若夫作风”的牺牲品，叶若夫已经被撵得无影无踪，这已经不是叶若夫，而是斯大林本人了。

当回顾我少年时代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如此冗长地去讲所有这些回想起来十分痛苦、难以解释而又难以忍受的事情呢？因为那时有许多其他的事情完全不象这一切，离这十万八千里。

正是这样！看来，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尽管到此我所写的许多篇幅仿佛与这部手稿的开头，与声明将要陈述，或者更正确地说，将要试图分析一个人，或者是我这一代的人们

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矛盾。但我不能不写这些篇幅，因为从这里起，从这一点起，就开始讲到一些我内心对斯大林的评价的矛盾。这些矛盾还在当年某个时候就已经有了，只是隐隐约约的，并由于胆怯而有时压抑在心里，有时则顽强地说服自己，有时强迫自己，有时希望你不接触到这些甚至在思想上也不愿意接触到的事情。而这一切对斯大林的双重态度的最初根源是起于 30 年代。这些根源有的是有意识的，有的是无意识的，有的是半意识的，但在心灵的某处它们总还是在生长。不过那时这些矛盾并没有完全长成，也没有发芽，这倒不是因为现在人们常说的那样，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些事情，后来在 20 大之后我们才知道的。自然，只是在 20 大后我们才知道许多事情，这话是对的。但是绝非完全如此，有些事情在 20 大之前可能而且应该想得到，而且这样想的理由也相当充分，只是不敢去想这些事情罢了。

问题不在于我们一无所知，而在于我们虽然也感到和在某种程度上知道那种干出来的坏事，只有后来才不彻底地和过迟地得以改正，而且有时还根本得不到改正，但我们知道的好事却多得多。我有意使用这两个非常概括的、不具体的字眼——“坏”与“好”，是因为叫人不能把那个时候这两个字所表示的意思用到别的地方去。

对我们来说，也包括我在内，在那些年月里，与斯大林名字有关的好事究竟是什么呢？很多很多，几乎是一切。因为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意识中差不多一切都是由他发起的，而且都盖上了他的名字。由他坚决执行全国工业化的总路线就可以说明这方面所发生的一切了。自然，也发生了许多惊人

的事情。国家眼看着改变了。如果有什么事办不出来，那只是因为有人阻挠它的缘故。开始是破坏分子、工业党出来阻挠，后来，正如在审判中所查明的那样，是“左”的和右的反对派。但是，斯大林用铁腕清除了工业化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继续领导了它。他少说多做，为各种事务常与人们会见，很少同记者谈话，很少演讲，并能做到使他的每一个词儿都有分量，使它不仅在我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受到重视。他说话清晰，简明扼要，彻底；他想记着某些想法，就牢牢地楔入脑中，而且在我们的感觉中，他从来没有答应过他后来不做的事情。

我们都是战前的一代人，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着战争。这战争开始看来象是一般同资本主义世界的战争——以什么方式，什么同盟，这很难预料；甚至还有毗邻的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小协约国——这是希特勒上台之前，而在远东又有日本。我们知道，我们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而随着日本占领满洲，希特勒上台，反共国际公约的订立，这未来的轴心就越来越明显了。看来，只好同日本和德国作战，也许意大利还会加入他们一伙。而波兰依然继续敌视我们，这很令人费解，它怎么会站在德国一边的，况且它敌视我们是违反逻辑的。

在中东铁路上给中国的军阀们以有力的反击。这在我们还是孩提的时候就表示赞同了。在哈桑湖地区与日本人发生

小协约国：1920—1938年间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联合而成的集团。

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没有后退。当时有些传闻，说那边的情况开始时并不怎么好，就象报纸上所讲的那样，但我们在那里没有后退。后来是哈拉哈河，这里我已有机会身临其境并亲眼看到许多事情。有一些事令人失望，有一些事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其中之一就是在我们的新飞机还没来，而主要的是我们在西班牙和中国有过战斗经验的飞行员还没有来的时候，日本就首先在空中打击我们了。步兵的行动一开始也不很顺利，还有一些张惶失措的情况——这我没有碰到，但是听到过了。结果炮兵的表现倒很不错。虽然心里还觉得我们的步兵在那边作战不比日本人好，但在整个哈拉哈河冲突的规模中，总的说来，日本人被打败了。这是一个不容置辩的事实，而在这个事实的后面，有许多事是斯大林为军队而做的。他从事研究军队，装备他们，供给他们，为他们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赋予他们应有的意义，并在困难的条件下使全国准备武装斗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尽管有一些使我们感到很不愉快的意外事件，结果我们对他在这方面的活动还是给予高度的评价。

加之我们在蒙古履行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同蒙古人签订的条约已经履行，我们保证给他们援助并已全面援助了他们，这都使人感到满意。据我们当时的想法，斯大林作为我国的领导，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做了实际可能做的一切。我们当时都深信，如果不是不干涉委员会，如果不是封锁西班牙，姑息德国和意大利军人干涉西班牙的事务，让他们从德国和意大利大量输出大炮、坦克和飞机，那么共和国就会对付得了法西斯主义。我们从自己方面看是问心无愧

的人，我们已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而把这一切人格化时，我们就感到，斯大林为拯救西班牙共和国，为撤退西班牙的儿童和孤儿，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总之，一想到无条件地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就会联想起斯大林的名字。

在我们的生活中，与当时对斯大林的看法有关的，属于这种“好”事的还有北极地带——“切柳斯金号”全体船员的脱险，帕帕宁和一些同志们在北极的登陆，契卡洛夫和格罗莫夫的不着陆飞行。在组织所有这些勇敢的行动后面，我们觉得有斯大林。他们回来后都去见他，都向他报告事情的经过。而与这有关的庆祝大会都具有全民的性质，这就使我们大家渐渐地同一般远离我们（很少例外）孤身独处的人物斯大林接近了。我们不能想象，由于基洛夫之死而在后来竟有可能对斯大林提出控诉。后来我同许多其他人一起亲耳从讲坛上听到了这些指控，仿佛这些猜疑差不多是确凿无疑的了。然而后来这些似乎确凿的猜疑，据我所知，因为没有任何人出来作证而消除了。这一切我们不能想象有什么可能。不过，我们知道斯大林为基洛夫送葬的情景。我们不知道斯大林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对妻子的态度

1932年2月13日，苏联轮船“切柳斯金号”在楚科奇海被浮冰撞碎，船员被苏联飞行员救出，这些飞行员是苏联英雄称号的第一批获得者。

伊·德·帕帕宁（1894—？），苏联北极考察家。

瓦·帕·契卡洛夫（1904—1938），苏联飞行员，1937年完成莫斯科—北极—美国温哥华的不着陆飞行。1938年因飞行事故遇难。

米·米·格罗莫夫（1899—），苏联空军上将。1937年与友人共同完成莫斯科—北极—美国的不着陆飞行。

发生了可悲的转变；至于传说他是她的死因的罪魁我们倒没有听到过，但我们知道，他曾为她送葬，而且大家都同情他丧偶。

斯大林在自己的演说中是不容反驳的，但很朴实。他跟人们在一起也表现得很朴实——这我们有时在纪录片上也可以看到。他穿着朴素，老是那个款式。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装门面的东西，没有任何对外表上显示威风或优越感的追求。而这都符合我们觉得一个党的领导人应该是如此的想法。所有这一些感觉，所有这一些实际的和我们所描画的一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优点，总的说来斯大林全都有。

同时，一个人很难不受把做坏事的责任转嫁他人的诱惑。在这方面，斯大林是做得特别彻底的。大规模集体化的过火行为引出了《胜利冲昏头脑》这篇文章，而《胜利冲昏头脑》不仅扩大了有罪过的人数，不仅把一切发生的事情都转到因果关系不同的高度上，由此可以想象出事件的规模，而且它还促使象我这样远不知道在农村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复杂过程的人，都去接受这个只有一个涵义的、对斯大林的威信极有好处的解决方法：正是在他所写的那种狂热上，这些错误也就产生了。如果他不加以制止，不从已加深的错误中抢救出来，那么这些错误还会发展下去。对我们来说，他扮演的的是一个纠错除奸的角色，就象后来贝利亚接替了叶若夫之后他同样扮演这样的角色一样。叶若夫消失了，而斯大林，正如象我这样的人所听到的传说那样（这些传说很不一样，模糊不清，看来是出自党中央的全体会议上的），严厉批评了那些在过火行为中犯有罪过的人，为了标明这些人，他顺口带

出了“叶若夫作风”这个词儿。斯大林本人顺口到这个程度，以至后来这个词儿完全通用了。自然，尽管这并不全是如此，但它多半标明了那两三年的情况，那两三年本身就已构成一个短暂的、但是可怕的时代了。由于一个与上述情况相符、也曾经流行过的、与叶若夫有关的口头语——“刺猬的手套”有着毫厘不差的准确性和简单明了性，所以它在众人口中一下子就用上了，而且广为流传，就象火烧干柴一样。关于这种手套写的相当多，画的也相当多了。

现在我想，在我回忆那个时候，鼓吹叶若夫的淫威；鼓吹他那“手狠心毒”，他那“不可动摇的”人民委员的职务，大概一点也没有克制住，相反，在预见到未来的时候，斯大林却鼓励了它，因为，他当然知道，那个清洗的过程总有一天会终止，而这个清洗在他这位政治家和残酷无情的人看来显然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那么今后的一个时期就必然要有一个完全自然的第一个替罪羊。

但这都是我现在想的。那时我没有想过，甚至不敢想象，我什么时候能够这么想。

同德国人签定条约，里宾特洛甫 来莫斯科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开始并没有在我对斯大林的认识中造成某些明显的裂缝，然而这事件本身在心理上，特别是在西班牙发生的一切之后，在那边同法西斯进行公开交锋之后，却相当猛烈

“刺猬的手套”是俗语，意为“心毒手狠”，叶若夫一名有刺猬的意思。
乔治·里宾特洛甫（1893—1946），希特勒德国外交部长，德国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

地震撼着我，大概也震撼着我的许多同龄人。有一些东西在感情上是不可能理解的。也许，从理智上说——行，然而从感情上说——不行。有些事情不仅在我们周围的世界，就是在我们本身都颠倒过来了。仿佛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人了，仿佛我们在这条约之后必须继续同其它自我感觉一起生活。

在发生这一切事件的日子里，如果我不在哈拉哈河那边正处于我军向日军围攻最紧张的时候的话，那么这第一个感觉和自我感觉大概就会更加厉害。然而问题不仅在于那边发生的事情已直接地消耗了我心中的力量和吞没了我的一切兴趣，而且在那边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军事记者来说，这是一次战斗的洗礼，它经常让我面临死神，看到一些相当可怕的场面，而且个人随时都有危险。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以后会写到它，并尽力准确地表现它，这里我只想把它重复一下），觉得随着这一条约的签订，从背后插一刀的危险已远一些了。在莫斯科生活的那些年，通常都有这种感觉，总觉得就快要同法西斯德国作战了——我们面对着它，它也面对着我们。而日本，不断发生冲突的满洲边界，日本人侵犯的蒙古，他们在1939年的侵犯完全不是第一回——在这之前也有过多次上述的尝试了。这一切都在我们背后。那边有日本人会从背后插上一刀的危险。当我们在哈拉哈河那边打仗的时候，德国就有可能从背后插上一刀。预料这一击是会从西方开始的，也就是在我们的背后。可现在忽然来了一个古怪的、意想不到的、因其新鲜而使人惘然若失的、面临相对安静的纪元：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谁？同法西斯德国！

当德波战争开始的时候，我同一起在一份军事报纸编辑部工作的同志们一样，都同情波兰人，因为这是强者侵犯弱者，因为互不侵犯条约终归是条约，而我们有谁愿意法西斯德国在已开始的欧洲战争中获胜呢？何况是轻而易举的胜利，德国人闯进并占领波兰之神速使大家惊惶失措和惴惴不安。

1939年9月17日，鉴于波兰作为一个国家已经瓦解，我们声明进军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时我还在哈拉哈河地区。在这之前的一昼夜，在蒙古的草原上曾发生一次据我看是规模最大的空战。天空上有好几百架飞机。后来，在1950年，当我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见面的时候，虽然当时我对现在要说的事情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我还是对他说了实话。我说，在哈拉哈河上空的那几次空战之后，我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一次也未见过在我们头上的空战中有那么多的飞机参战。可他冷笑一下，使我感到意外地回答说：“你以为我看见过吗？我也没有看见过。”我之所以回想起这件事情，是因为我们虽然在蒙古的领土上包围了、击溃了，总之，歼灭了（这说起来并不夸张）日本人，但是将来怎样，是否同日本又有一场大战，这都不清楚。正如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这是有可能的。而在欧洲那边，我们的军队进驻西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就我来说，是会受到无条件地欢迎的。应当想到以往年代的气氛：1920年苏波战争，随后是20年同波兰的紧张关系，实行封锁，波兰富农往所谓东方老窝移民，企图把乌克兰，特别是白俄罗斯的居民殖民化，在20年代从波兰领土上常来窜犯的白卫军匪帮，在军中把波兰语作为一个潜在的敌人的语言来学习，审判白俄罗斯的共产党员等等。总

之，如果想到这整个气氛，那么，为什么我当时不会因我们去解放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而感到高兴呢？我们同意那条民族区域分界线。那时，在1920年，甚至如寇松侯爵这样的我国的敌人，从民族的观点上看，也都认为这条界线是正确的，所以大家想起这条界线都叫寇松线。但我们那时不得不从这条界线上退下来，并且把西部乌克兰和西部白俄罗斯送给波兰以换取和平，这是由于军事失败，在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的年月里精力耗尽，经济崩溃，弗兰格尔匪帮还未被歼灭，面临着还有喀琅施塔得的叛乱和安东诺夫匪帮骚扰的缘故。总之，1920年的情况就是如此。

发生的那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正确的，而且我已表示赞同了。当我还在哈拉哈河地区的时候，就已经表示赞同。后来我病倒了一周，以后还是穿起军装，从哈拉哈河到那已经解放的西部白俄罗斯去了。在那里选举人大代表的前夕，我往各地走了一遍，亲眼看见了真正从他们深恶痛绝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的人民，听到了一些谈话，参加了人民大会的第一次会议。我虽年轻，且无经验，但我觉得，就是那时我也能弄明白，会场上的人们怎样鼓掌和为什么鼓掌，他们为什么站起来，同时他们的表情怎么样。对我来说没有疑问的是：在我来到的西部白俄罗斯里，白俄罗斯居同（他们人数极多）都欢迎我们到来，而且也希望我们到来。自然，脑子里还有一个当时对许多人来说不是没有的思想：如果我们不发表声明，不同德国人进行边界谈判，不搞到这条边界线，如果没有这显然（这只好猜想）与不侵犯条约有关的一切，那么谁会进入这些城市和村庄，谁会占领整个西部白俄罗斯，谁会走到

离明斯克 60 公里,差不多就是到明斯克的地方?德国人。不,当时我没有任何这类性质的问题,在我看来,斯大林做这件事是对的。而英法向德国宣战,实际上并不能帮助波兰人,使我信服的是,那些能制止德国发动战争的条约的军事谈判,已表明了他们的不老实和对他们毫无约束力。

再者,不久以前发生的事记得最清楚:无论是慕尼黑,无论是我们准备同法国一起(如果它也想做的话)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也无论是已被德国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切都铭记在心里,而这一切也都证明,斯大林是对的。但是,这一切虽说似乎都很对,可是总觉得还是有些什么地方不对头,觉得好象有条虫咬着和吸吮着我的心似的。然而,有意识的感觉并不完全考虑这一点。很显然,这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概念。我们由于互不侵犯条约而在某些方面从这一种人变成另一种人了。从国家的观点上看,作为这个国家的人的自我感觉,这一切似乎都是对的,而从另一个国家的人的自我感觉的观点上看,那就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头,因为这个国家已是全世界的,更正确地说,不是全世界,而是世界上所有我们志同道合的人的希望了,主要的希望是要同世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那时我们讲到世界法西斯主义,在我们看来,已不仅仅是德国的法西斯主义了。在这种过去的自我感觉中,总觉得有些什么东西丧失了。这是我的感觉,我知道,别人也有这种感觉。

在回想那个时期,回想一个大体上有意识地拥护斯大林,而同时又无意识地不接受这一切方面的某些东西的人当时心理上的感觉时,我现在考虑的是斯大林本人的问题。当时,一

方面法英两国不想缔结不仅我们，而且他们都要担负某些责任的严肃的军事条约；而另一方面法西斯德国又提出了互不侵犯条约并准备在同波兰作战时不越过寇松线，不走到我们的边境上，相反的，还给我们以机会到达这条我们与波兰之间还没来得及划定确切界线的边界，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斯大林决定怎么办了。他亲自作出决定。他也许会同商人商量，征求意见，查阅资料——我不知道这些情况，也没法了解这些。但我知道一点：他在这个时候已保证了自己在党和国家中有这样的地位，如果他决定了什么，那么就没有必要指望有人来直接反对他，他不必在谁的面前来坚持自己有理，既然他作出了决定，他就认定自己是对的。那么，我现在提出一个问题——心理学上的一个问题：对于这种决定，他内心是否有过矛盾？他是否有以（哪怕是一点点）我们内心曾感到过的那种感觉：由于这一决定，我们会渐渐地在某些事情上变成了跟从前完全不同的人？

1979年3月2日

当我现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开始觉得，他可能也有这种感觉。我毫不怀疑，他曾想过同希特勒德国的关系的最后一着，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而这场战斗定会给我们带来胜利。所以他也象我们一样，对互不侵犯条约总有些什么看法（当时我们私下把德国法西斯称为“该死的朋友”）；

认为这是走向未来战争的一步，在这场战争中不会有中间的出路。有或者没有，这场战争我们都必须胜利。

我不知为什么总觉得，他会想到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时期，这个时期列宁必须在党内进行最无情的斗争，以便证实自己有理和缔结这个和约。而斯大林不需要这样做，他已把自己安排到了这样的地位，以至用不着去收集支持他的决定的票数了——这一点是完全不同的。不过，也许由此就觉得自己的责任更重大了。在普遍沉默或者与这种沉默意义相同的全体机械举手赞成下所通过的决定，要比一看就能叫人喜欢的决定困难得多。归根到底，如果加以深思，由一个人代替大家所通过的决定——是一件最困难而又最可怕的事情。这一点，军人要比大家都更清楚。不错，他们常因战争本身条件的实际需要和客观的必要性而采取了某些决定。而斯大林本人已为自己创造类似的必要性了，这是他经历了漫长和血腥的道路走到这一步的。在讲到这一切时，我依然在想：在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前，那时他在心里是否已把自己放到列宁的位置上？把自己想象出来的反对者放到布哈林和左倾共产党人或者托洛茨基的位置上？他是否曾以这种思想来支持自己的决心，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条约（他完全可以在心里这样称呼它，特别是如果他这时想起了列宁的话），这个条约并不比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更糟，认为这个可耻的条约在最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比可耻的布列斯特和约更有必要，尽管它带来思想上的损失，可这些损失后来会以战胜法西斯而告终的。这是我们的胜利，而不是其他什么人的胜利，这些损失显然是可以弥补的。而现在这个条约会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会，这个喘息的机会对于决定未来的任务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试图替象斯大林这样的人来思考问题，试图想象他的思路是太天真了。自然，这些猜想只是建立在直觉的信任或者可能性上，都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我还是不能放弃这些想法，因为其中还有某种逻辑。

※

※

※

如果讲到我的生活，那么从我这方面来说，便可在这里跨过7年，从1939年8月和9月跨到1946年8月和9月，跨到战后的时期。所有那些与斯大林个人有关的问题在战争初期就已经在我和我这一代的其他人面前提出来了，在整个战争时期和战后，或是一下子，或是过了若干年，或是在党的20大之前，或是在其后都提出来了。这一切最终成为这部手稿的基本内容，成为它的主要部分，它不仅写到那个时期的个人感受，而且更多地写到了后面的各种思考：思考我怎样写战后的几部著作和那部作家日记《战争的不同日子》，并且思考我同许多人进行的各次谈话，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比我跟斯大林亲近得多，他们在自己的一生中都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斯大林和战争”，“斯大林和战争准备”，“斯大林和战争开始”。说实在的，这都是我研究的主要对象。也是我思考的主要对象。这都将成为这部手稿的主要内容。

为了转到这方面来，我觉得除了第一部分引言写到我少年时期对斯大林的认识以及有关他的一切之外，还有必要写

另一个引言。

这第二个引言将写到我一生中某些同斯大林私人接触和我亲眼看到斯大林身边的事情（虽然不太多）。这些个人的印象不是与战争，而是与文学有关，尽管有时斯大林和我们的谈话，在某些场合下，也会由文学的问题而想到战争。关于这一点我也将要谈到。

在转到这一部分谈我的回忆以及与此有关的思想之前，我要讲几句在 1939 年秋天和 1941 年 6 月之间的战前生活和战前感受的话。我也许还要回过头来讲讲与这部手稿的主题有关的那个时期，而在这里我要讲的正是那个时期的我自己。

在比亚韦斯托克，不知是人民大会会议的第一天还是第二天，我由于突然发高烧——40 而昏沉得几乎倒下地来。叶甫盖尼·多尔马托夫斯基把已昏迷的我送进了医院，并且令人感动地一直照顾着我，直到我自己能在比亚韦斯托克走动为止。这个医院是波兰医院的基础。我模糊地记得，这医院有一半是我们的，有一半是外国的。那时，在 1939 年，我差不多第二次死掉了——我得了非常严重的格鲁布性肺炎，体温常常高达 40，持续约莫 3 个星期，如果不说更多的话。经过一段时期，我母亲弄到了《红星报》的出差证，就来到我的身边。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大概就不会来到这个环境，可她性格坚强，能够在类似的环境中敢冲敢闯。当我开始复原，体温最后降下来的时候，身体已变得十分虚弱了，于是母亲把我送到莫斯科去治疗。从比亚韦斯托克到明斯克我们是坐

救护飞机去的，我看是“P—25”，而从明斯克到莫斯科却是坐火车去的。在莫斯科我的一只手要开刀，因为手上打了樟脑和咖啡因针后就肿了一块很大的脓性蜂窝组织炎，大概是受了感染吧。后来我在家又躺了一些时候，神志清醒了，就拖着两条软绵绵的腿慢慢地走到彼列杰尔京创作之家去休息，——当时那里有一间小屋，后来被火烧掉了。

我讲这一切时还要涉及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建立苏维埃政权那个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不知怎么的完全被我和我的意识所忽视。我只是在战后，在1947年才到过那些地方，而且我想，1939年那边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遇见了维里斯·邓尼索维奇·拉齐斯，他给我讲了那个时期的复杂情况，态度非常严谨而又非常坦率，他本性上是不喜欢磨光历史棱角的。

芬兰的战争也在心理上被我忽视过去。说实话，在我同戈尔巴托夫、多尔马托夫斯基和哈茨列文几位同志一起从创作之家直接出发到这场战争地去之前，我的不舒服的感情要比本人想到这个战地去的愿望强烈得多。我顾不了那么多，顾不了国家的任务、战略和必须预见到的局势的全部危险，这种危险可能同德国打仗的时候就会发生，——我顾不了这

维·邓·拉齐斯（1904—1966），苏联拉脱维亚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渔人之子》、《暴风雨》和《走向新岸》均有中译本。

波·列·戈尔巴托夫（1908—1954），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顿巴斯》和中篇小说《不屈的人们》已有中译本。

扎·列·哈茨列文（1903—1941），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美国与我们毗邻》、《蒙古的夏天》等。

一切了，因为我心中有一件事妨碍我想到苏芬战场上去。当时我渴望的，是想冲到哈拉哈河地区，因为那边的战斗正在最紧张的关头，而这个事件可能转变为同日本作战。战略终究是战略，而念及国家的需要，念及未来局势的危险，我记得，这些思想对我来说也并不陌生。但无论如何，我渴求了解所发生事情的正确性，或者更准确地说，渴求了解它的必要性。而在我的心中，总还觉得同日本作战是一码事，同芬兰作战又完全是另一码事。

1940年1月，伏龙芝军政学院下设为期两个月的讲习班，以培训军事记者。我虽然还未完全恢复健康，但我还是参加了学习。这时同芬兰的战争已显示出绝非象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当初想象的那样了。然而这个时候我也许因受父亲的教育加上哈拉哈河的经验，心中已对关于胜利盲目乐观的情绪和盲目乐观的谈话产生了相当强烈的反感，这些情绪和谈话在那个时候都使我十分厌恶，我说这句话毫不夸张。在某些方面我还是天真的，可在这方面它也许已经没有了。芬兰战争拖延下去。大概已经暗中拟定，我们在为期两月的讲习班里努力学好一切战术和地形测绘基础课程，学会掌握武器，在3月中旬毕业之后，便作为军事记者到前方去。显然，是去接替那些早些时候去了的人，其中包括那些在那时已经阵亡了的人。在哈拉哈河地区，正如常言所说，上帝保佑了大家，而在这里，在芬兰战场上，有3个军事记者阵亡了。正如我已经谈过，这场战斗并不吸引我，但在哈拉哈河之后，我内心里已感到自己是个军人，或者，无论如何，是个与军队有关的人了，如果不是刚好在我们毕业

的那一天签订了和约，那么我自然也就参加了这场战争。但它结束了，它的结束是因为满足了国家的一些要求，而这些要求是一开始就向芬兰提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看来可说是胜利了，不过在心里，我们大家都觉得这是全国的耻辱。没有人敢这样坦率而大声地说出这一点，但在许多的谈话中都表明了对这件事的这种态度。看来，我们对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许多事情都做不了，而且许多事都做得非常之糟。听说斯大林对军队的情况十分关注，这些传说象我这样的人也曾听到过。后来，把伏罗希洛夫从人民委员的岗位上撤下来，任命了铁木辛哥，并且很快听说军队的教育有了个大转弯，训练它随时备战。这些传说就得到了证实。

接着是 1940 年夏天，德国占领了挪威、丹麦、比利时、荷兰、敦刻尔克，法国的毁灭和投降——这一切事件一下子在脑子里简直容不下了。虽然法国人和英国人不帮助波兰，虽然欧洲这场战争被称为“荒诞的”，但这场“荒诞的”战争的结局，我想，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竟会弄到这样的程度——也许有人知道，它甚至会比西方那边发生的一切更为厉害。

我们说不定在什么时候要同法西斯德国作战，这一点对我来说没有丝毫疑问。从 1933 年开始，从国会纵火案、审判季米特洛夫开始，我这一代的人们就已感到不可避免地要同法西斯发生冲突。西班牙更有感于此，而同德国人签订条约并没有消除这种感觉。也许，对某些人来说已经打消了——

谢·康·铁木辛哥（1895—1970），苏联元帅，两次苏联英雄获得者。法国北部地区。

这我不知道。对于我和我当时年轻的文学界同志来说并没有打消。只觉得这将在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发生，觉得在这之前德、法、英之间的战争将持续很久，而以后在战争快结束时我们将同法西斯作战。条约给我们的就是这种想法，所以在这方面当初有点安心。那场完全暴露了我们军事弱点的芬兰战争，又使我们后来想到这个条约比我当初所想的对我们更为有利。在芬兰战争和在这场战争中暴露出一切之后，我们既然在 1939 年的芬兰战争中就是这个样子，那么要是不签订条约，我们就得一对一地同德国人发生冲突，这想起来实在叫人心寒。

自然，法国所发生的事情只加强了这种感觉，它是不断地加强的。至于往后迟早将有战争，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不过现在感到的是，这场战争已不是或迟或早，而是迫在眉睫了。

军政学院附设的军事记者培训班，是在 1940 年秋开始上课的，而结束是在 1941 年 6 月中旬。当我们从野营地回来的时候，就已得到了军衔，我开始坚信，我们已面临战争。今后，不管我们同德国人的关系有什么变故，在我的心里都不会感到天下太平——这是暗中说的，而且说得好象我曾经有过这种感觉似的。1941 年 6 月 14 日塔斯社的报道，正如后来许多人所说的，是叫人解甲归田，叫人高枕无忧。相反，它却给我一种古怪的、令人不安的印象——它一下子让人有好几种想法，其中包括有严重威胁我们的意思。而在德国侵犯南斯拉夫之后，我就有战争迫在眉睫的感觉了。我知道的并不比人多，也没有任何补充的消息，但我总觉得，在南斯拉

夫发生事情之后，现在大概非此莫属了。

我写的那部剧本《我城一少年》虽然说的是蒙古和描述日军溃败的情形，但我完全有意在落幕时写它的一些人物去作战。我不是用哈拉哈河地区实际发生过的光荣结局来结束它，而是用当时最残酷的战斗还在继续而且以今后还会发生许多事情来落幕的。这一点，我在战争前的几个星期讨论我这个剧本时就已经讲明了；我说，这个带有许多缺点的剧本之所以这样而不是那样写，是因为我觉得不是今天就是明天我们就要打仗。当战争开始的时候，那天早晨，我自然也跟大家一样，为战争真的开始而感到震惊，不过我却没有事态来得突然的感觉。不错，战争当然很突然，但是德国人不这样发起战争又能怎么样呢？他们以前在一切场合都是这么干的，这一次当然也这么干。说实在的，他们为什么要用别的方法来发动战争呢？

这些想法和感受决非表示我在战争开始的最初几天就已经预料到事态会发生这种可悲的转变了；自然，我同绝大多数的其他人一样，绝没有预料到这一点。战争开始后过了两天，我就怀着这些想法和感受，以一张军报的随军记者身份到西部前线去了。

所有后来在战争中发生的一切，都已写在我的《战争的不同日子》一书里，而我还将要写到的一个题目：《战争和斯大林》，就其本质而言，不是别的，而是对那本书的一个补充注释，是和补充我对这个问题的多年研究和思考有关的。

战争结束后我不是一下子就回到莫斯科的，在6月，临近胜利阅兵式的时候，我已呆在什么地方。后来，我曾两次

到过捷克斯洛伐克，而第二次回来之后，我就知道决定派我参加一个到日本去的记者团，目的是要我们暂时参加那边的麦克阿瑟参谋部工作，熟悉环境，然后报道在日本进行的审判日本战犯的情况。从各方面来看，这次出差的期限是很长的，而且我又不大愿意去。出发的日期还没有确定，没有确定的原因，据我当时和现在的理解，是要等我们必须报道的开始审判的日期。我们这一行人是由阿加波夫、戈尔巴托夫、库德烈瓦蒂依和我组成的，但在我们这次出差的决定中并没有写明，我们当中谁来领导这个团。

我等待我的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的初次上演，它的上演那时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这不仅是从个人的观点，而且是从政治的观点上看。我从战争中回来后就着手写它，无论是在写它，还是在它排演的时候，我都真的象雇农一样工作，所以我很不愿意同代表团一起到日本，何况战后我累得甚至连那时我非常渴望得到的新观感都不想要了。

总之，结果是这样：既然我们大家都是代表各报去的（我代表《红星报》，戈尔巴托夫代表《真理报》，库德烈瓦蒂依和阿加波夫代表《消息报》），而我们当中又没有负责这次出差的人，日期也没有指定，所以出发的日期就一拖再拖——有时是出于这一个人的请求，有时又是出于另一个人的请求，一直到11月斯大林知道为止。当时他在南方休假，莫洛托夫留下来替他处理工作。一天，他用电话向斯大林报告工作的

波·尼·阿加波夫（1899—1973），苏联俄罗斯作家、新闻工作者，苏联生产特写的创始人之一。

时候，斯大林忽然问他：“那几位作家的情况怎样，已经到日本去了吗？”莫洛托夫说，他要了解一下。了解之后，他报告说，没有，几位作家还没有到日本去。“为什么还没有去？”斯大林问。“如果我没有弄错，这是政治局决定的吧？也许，他们不同意这个决定，并且准备向党代表大会提出申诉吧？”

这样我就在自己个人的命运中第一次碰到斯大林独具的开玩笑的手法。他的这个玩笑立刻就通知了三家报纸的主编，于是过了整整一个星期（那时要在更短的期间内弄到足够半年出差用的食品是不可能的，而没有食品在那时的情况下到日本去也不可能），足足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就坐上加挂的通勤车厢到海参崴去了。

过了4个月，在1946年4月，我们也是坐上一个加挂的通勤车厢回家来的。在出差期间，我们带有一个女速记员，所以我的日本见闻录（大半都是谈话笔记），后来弄明白，用打字机打就有1200页。但我只是过了几个月后才能亲自过目这些笔记。因为在赤塔附近，在一个车站上，有人给我们的车厢送来一份电报，是由当时中央宣传部部长阿历山德罗夫打来的。电文中说，我是参加华盛顿美国新闻出版界年会的苏联代表团的成员。这个代表团是由3个人（爱伦堡、加拉克季昂诺夫和我）组成的。并说，我必须下车（我现在已记不清楚，是在赤塔还是在伊尔库茨克），改乘从那里回莫斯科的飞机，以便赶上大会开幕。“请签名收到电报”——电文中说。我直接在电报单上签了名，那位送电报来的同志就把它随身带走了，看来，他已提前完成了任务。于是，我从车厢里走出来，依我看，还是在赤塔。我匆匆和同志们分手，并请女

速记员尽快把我的日本见闻录整理出来，然后我就乘“杜格拉斯”，或者说得更正确些，乘坐“利—2”飞机飞往莫斯科。“利—2”飞机是我们在战时根据“杜格拉斯”商号的许可证制造的。我不知道，这是班机还是专机，但我来到机场的时候，它已停在那里了。而那些要坐这架飞机的乘客，却还在那里等着上机。那时飞机的速度不象今天，尽管我们不停地飞行，只是加油和途中某处变换乘务员，但还是飞了一昼夜。

次日下午4时，我回到了莫斯科，从机场径直回到编辑部，他们对我说，要我打电话给洛佐夫斯基，他当时是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不过，我说错了，那时人民委员会已改称部了。我去见洛佐夫斯基，从他那里得知，我要明早飞往柏林，同他谈话一结束，我又要去见莫洛托夫。

我同洛佐夫斯基谈到日本的情况，谈到我们的观感和初步的结论，谈话相当长而且很详细，看来他是预先拨出的两个小时，因为这两个小时一结束，洛佐夫斯基看一看表就说：

“现在您要到维亚切斯拉夫·米海依洛维奇那里去，您会从他那里知道您需要知道的马上出差的事情。”

我在莫洛托夫那里也呆了相当久，比我所想的还要久。我同他原不认识，如果不算在战争后期，他作为外交人民委员有两三次在格拉纳特胡同人民委员部的私邸里举行的招待会上见过的话，这几次招待会主要是为盟军举行的，但也有一部分我们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参加。这种认识只限于握手和最

阿·洛佐夫斯基（1878—1952），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多同时讲两三句话。

真的，在我的记忆里还留着一道与莫洛托夫的名字有关的伤痕，——这伤痕完全是在我个人的计划上。有一天，当年《红星报》的主编奥丁堡告诉我，他们打算在1942年把我作为《红星报》记者派往美国去几个月。是到美国本土还是到美国的作战部队去，既然我是《红星报》的记者，那我就无需问明，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哪些可以一起做。莫洛托夫打电话给奥丁堡问及打算派我出差的事情。奥丁堡肯定说，他作为一个主编，认为派我去是最适合的。但过了一两天，莫洛托夫又打电话来对他说，看来不能派我到美国去，因为听说我爱喝酒。奥丁堡企图争辩，说我虽然不是不喝酒的人，但我喝酒可也并不会喝得烂醉。可是莫洛托夫坚持自己的意见，不要我到美国去。现在我已不记得，不知是要我到卡累利阿战线还是到布良斯克战线。在我从那边回来之后，我从奥丁堡那里得知我不能到美国去的原因。奥丁堡笑着说，也许这还好一些，何况不仅是我，而且任何人也都没有派去。对于一个《红星报》的记者来说，这里的事情要比那边多得多。我当时的感情是两面性的：尽管那时已经情绪低落，但一方面，遇到其他一些上前线去采访的机会便很想能到美国人那边去一趟，特别是，如果有机会能看到他们打仗的情形就更有意思，我对此有着年轻人那样的强烈好奇心；可另一方面，一听到我不能去的理由就感到懊丧。在自我的感觉中，我坚决认为自己是一个不会误事的人——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国外。不过一般说来，我对此也相当淡泊——不去就不去吧。但是，不让我去美国的理由，我自然不会忘怀。在我以后的生

活中，我也碰到各种各样不让我到原先打算要我去的地方的理由（说实话，这倒不很经常，因为我出差的机会很多）。有一次，在 1953 年春天，由于我马上要到斯德哥尔摩去，又发生了甚至这种理由：说我在《文学报》一篇有一半是我写的社论上，对斯大林过分崇拜，就不让我去了。不过，说我是个酒鬼，最好不派我到什么地方去的理由，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了，这大概是因为我特别记得这个理由的缘故吧。

虽说莫洛托夫有许多生硬的政治观点我不能接受，但直到如今我对他还是很尊敬的，总觉得他是一个完整的人。这种尊敬之心主要还由于莫洛托夫在我们这些人的记忆中，大概从 30 年代起就是同斯大林最亲近的人，他在我们的心目中最明显和最有分量地分担斯大林的国家职责的人。

在各个时期中，作为斯大林最亲密的战友的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是伏罗希洛夫，有一个时期是卡冈诺维奇，有一个时期甚至是叶若夫。莫洛托夫却不变地永远是个德高望重的人物（我怕使用这些非常庄重的字眼，尽管它们在这种场合下接近真理），他在我们这些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中享有最稳固的和永恒的崇敬和优先地位。这无论如何大概在 1948 年以前就已是如此。我个人还要加上他在 1942 年飞往美国时给人留下的良好印象。关于这次困难而又危险的越洋飞行，飞行员和领航员在跟我谈话时所讲的我都已记下来了。在这次飞行中，莫洛托夫始终保持了镇静和勇气，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发现和他们的评论。而临危镇静和勇敢正是我最尊敬的人的特征。

当我思考到斯大林的时候，我自然还要不止一次地回过

头来谈论一个人物——莫洛托夫，但看了看往后的7年，我就不知为什么想在这里谈了。我同莫洛托夫第一次详谈是在1946年，而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时候，我深信，他是当时政治局成员中唯一真心诚意地哀悼斯大林去世的人。这个坚强的人在斯大林灵前讲话时，是唯一可以从其嗓音中听到哭声的人，尽管他比其他所有的人都更有理由在斯大林去世后感到轻松、解放和有可能对他本人、对莫洛托夫树立公正的态度。总之，这不过是我现在才想到的，也许是受到不久前读了罗伯斯比尔的著作的影响，我总感到莫洛托夫有点象这位法国大革命活动家——他们都是一样的无私、意志坚定、直爽和刚强。

莫洛托夫以干巴巴的殷勤态度迎接我，问我是怎么飞回莫斯科的，接着一下子就开始谈到即将启程到美国的事情。我不想昧着良心瞎说，我不记得，在这次谈话中莫洛托夫是否提到过斯大林的名字，但从他所讲的和怎么讲的（哪怕是用无人称形式的）话中都可清楚地听出斯大林完全知道这次出差。莫洛托夫说，这次出差有很大的意义；说为这次出差准备提供了一切必需的条件；认为大方地利用这些条件是必要的；说这次出差的意义不在于参加新闻出版年会，虽然这也很重要，而在于会后有可能较长期地到美国各地走一走，在那里我们显然会成为美国国务院的贵宾，这时我们要利用一切条件向所有同我们会面的人解释（这些人越多越好），说我

马·罗伯斯比尔（1758—1794），法国大革命活动家，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被热月政派分子处死。

们不要战争，至于那些反面的传说，纯属荒诞和挑衅；说我们建立和平并为巩固它而作了一切努力，我们是有原则的，只有那些诽谤者才会对它表示怀疑。莫洛托夫重复说我们显然会成为美国国务院的客人之后，又接着说，虽然美国国务院大概会用适当的方式保障我们这次旅行，我们也还应当尽可能地保持自己各方面的完全独立性，其中包括物质方面；为此已作出决定，不仅在出差费方面保证我们，而且还保证我们每个人在3个月的期间有足够的费用；希望不要把行期同原来的计划缩短，我们有足够的财力来开支一切，包括住饭店，到各地旅游，举行回答性的私人招待会以及我们或因推辞国务院提供的译员，或因我们不再是国务院的客人，根据个人意愿而以私人身份在美国停留的一段时间所需要的译员的酬金；这一切开支我们都将实报实销。莫洛托夫所说的这笔金额，虽然没有说明，但其数目之巨一想就使我吃惊，它说明了我们的地位完全独立和在物质问题上没有任何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这次出差就真的有重大的意义了。

在谈话过程中，我明白或者感到（不知道用什么词儿表达更好），这次出差的总体安排，问题提出的广度，显然都是出于斯大林之手。莫洛托夫在这里说的不仅代表他自己，而且还执行了相应的指示。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且后来，当我从斯大林的嘴里听到他如何无情而同时又病态地对待这一切，把一切都统统归到“在外国人面前低三下四”的概念中的时候，我就更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在一个赢得了战争之后举目疮痍、备受饥饿的战胜国里，这是斯大林的一个致命的要害。

1979年3月3日

莫洛托夫告诉我，说爱伦堡和加拉克季昂诺夫已在巴黎，他们后天就从那边飞往纽约，接着他说要我一定赶上他们，同他们一起立即飞走。莫洛托夫说，这个决议中虽没有指明，但为了让您本人知道，我告诉您，您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在美国可能会有一些您不能亲自解决的严重问题。在这种时候，您可通过大使馆或总领事馆直接问我们以解决这些问题。

我以为这是谈话的结束，但我并没有急忙站起来，原因是自从洛佐夫斯基说我要去见莫洛托夫之后，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既然我比其他同志先到莫斯科并且要同莫洛托夫谈话，那么我就要直接向他陈述一个尖锐的敏感问题；这是我们驻日本监察委员会的代表杰列维扬科将军请求我们到莫斯科后一定要跟谁谈一谈的。不过，看来莫洛托夫也不打算放我走，他开始问我有关日本的情况。他的问题，大致地说，主要都是这样的一个题目：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真假程度怎样以及麦克阿瑟参谋部和一般美国人在日本奉行的政策主要是什么？这方面你们有些什么观感？我讲了我们私下常谈的情况，又用一般的话来讲我们那些有好有坏的观感。

莫洛托夫留心和赞许地听我讲着，直到我开始谈到我有一件受托之事要向他谈之前都是如此。

“谁的？什么委托？”莫洛托夫急忙问，脸色顿时变了。

我说这是杰列维扬科将军的委托，问题是：要改善在我

们驻日本监察委员会指挥下的人员很少的一个营的补给，改变供给的性质、期限和定额，并要求能立即解决，因为那现行的政策非常不好（我不想在这里谈我当时向莫洛托夫讲到的那些细节，但我讲到这件事情时有些激动。可能显得过分）。总之，在谈话中我加进了某些个人的意见，看来就是这样。

“这与他什么相干——通过第三者来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还搞一部分人的申请。”莫洛托夫凶狠地说，严厉批评杰列维扬科。我忽然感到5分钟前坐在我面前的人与这个冷酷无情，准备立刻惩罚一些犯有什么错误的人的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我始终不明白，那些人犯有什么错误，但看来这对他是绝不能容忍的。谈话就在这样生硬的语气中骤然中断了。莫洛托夫站起来，祝我顺利完成任务就同我告别。

8小时后我就已经坐在往柏林去的飞机上。

我不写我们到美国去的情况。我所写的经常都会变成自传，虽说在某些方面看来不可避免。我努力在其它这样的一些场合下，即使谈到美国、加拿大、然后到法国之行——这已合并成一次旅行，也只谈那些在我的意识中不管怎样都与我这部手稿的主题有关的事情，即讲斯大林不管生前和死后在我们的生活中，首先是在我这一代人的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许我以后会找到更准确的表达方式，但暂时我就谈到这里。

在这次旅行期间，在无休止地互请的集会、午宴、各社团的大会、报界代表大会上，我们碰到了各种各样的提问。这些问题虽不总是露骨地含有恶意，但有时却使我们感到为难；

有些是讽刺的,有些则是闹着玩的——其中也有这样的问题,意思不在于真的想知道什么,而在于看看我们怎样摆脱他们给我们设置的困境,这种困境多是他们心里想的,但有时也真的是这样。

我们到达华盛顿时,新闻出版界的年会已经开始了,首先他们以掌声欢迎我们的到来。过了几分钟,就有人起来请俄国的同行允许他向他们提几个听众很感兴趣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你们苏联那里有没有可能在临届选举之后,有其他的什么人,例如莫洛托夫先生,出来接替斯大林先生担任国家的首脑?”要是我大概就找不到怎么回答,何况是要马上回答的。可是爱伦堡找到了。他向我明显地点点头,表示他来回答。他冷笑了一下说:“显然,我们跟你们对待家庭生活的政治观点不同,你们天生爱在年轻时风流,每4年就为自己挑选一个新媳妇,而我们,就是在这些年岁都已经成熟了,我们娶媳妇是相当认真的,而且要白头偕老。”这一回答引起哄堂大笑和鼓掌,美国人很称赞他的机智,特别使他们感兴趣的不是爱伦堡的回答,而是他的巧妙脱身。他做得太漂亮了。后来的问题我已经记不起来,它们显然是没有什么使我们感到为难的。

我到美国西部时是一个人,爱伦堡没有去。在一次报界代表大会上,有人问我是否读过托洛茨基讲述斯大林的书,我回答说没有,没有读过。于是有人问我想不想读这本书,我说不想,我没有这种愿望,因为我对这类的书毫不感兴趣。于是又有人问我说,“这类的书”指的是什么。我回答说,就是指那些不是体育的书,一个被人击昏而输了冠军宝座的人要

在其中大书特书他怎样输掉了这个宝座，并且对所发生的事情大发牢骚的书。这个回答使听众颇感满意。也许，问题不仅在于我在这种场合下表现出来的一点机智。而且在于 1946 年对美国人来说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斯大林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相当遥远、相当神秘，在许多方面都是不能同意的人物，但同时对他们许多人（我说的是那些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的问题一般都感兴趣的美国人）来说，斯大林是一个在 20 年代就打败了这样一个当时在美国比他更知名的政治领袖——托洛茨基，而在不久的年月里又击败了希特勒的人物。自然，这都有他们美国人的援助，有他们的租借法案，有他们的武器供应，有他们的轰炸德国以及攻入欧洲的帮助。但是，打败希特勒的终归还是斯大林，是他把希特勒彻底而又不可逆转地赶进柏林，赶进帝国办公室的地下室里，逼得他在那里以自杀告终。

美国人向我们提出类似的问题时，总是嬉皮笑脸的。他们嬉皮笑脸，是针对我们这些比他们更受另一种政治行为准则约束的人的——在谈到自己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政治领袖时不敢随随便便，毫无拘束。所有这些调皮捣蛋也对我们 3 个，认为我们 3 个都是斯大林在我国制定的政治制度人格化的结果。至于始因，亦即斯大林本人，或叫“乔治大叔”，那里有时就这样称呼他，如果有时当着我们的面开他的玩笑的话，那么，据我记得，从没有超过那些界限，即这个玩笑会使人听起来是民族的侮辱，用一些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话来向

这大概指的是“冷战”开始。

我们谈论我国的领袖。不管他们开什么玩笑，很少是带讽刺性的；就是“乔治大叔”这个名字，与其说它是一种亲昵称呼，毋宁说它是斯大林的声望的见证。而一般说来，大家对他都是很严肃的，一部分是因前不久的战争往事表示感激，一部分则是在担心未来——有谁知道，他想要什么，将来又会干什么？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又下了台，现在只有斯大林一个人还留在岗位上，这不仅是存在于“大三驾马车”中的一些美国人脑子里的悬念，而且这种悬念在一切方面都起了作用。

我想，那时已临近 1946 年夏天了，尽管有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讲，尽管有由这个讲话开始的冷战，斯大林的声望还是很大的——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全世界，他的名字较之任何其它的历史时期，更风行了好几十年。1944、1945、1946 年，也许还可从 1943 年算起，从俘虏保卢斯和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惨败算起，这都是斯大林的声望得以达到最高峰的时期。自然，这种声望虽有不同的性质，不同的色彩，但它毕竟是一个政治和社会的事实，这个事实无论何地何人都不能不认账的。

在读我自己在 20 大后所写的诗和同许多军人会面后所写的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的时候，我已在最主要的方面为自己确定了对斯大林的认识和态度，我再也不把几首描写

指丘吉尔 1946 年在富尔顿的演说，从此开始“冷战”。

弗·保卢斯（1890—1958），法西斯德国陆军元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

斯大林或者提起过他的名字的诗放进诗集里了。我很喜欢我写的组诗《我的朋友萨麦德·武尔贡 在伦敦午宴上的演讲》。据我看，这是我一生中所学的最好的诗篇之一，但我在1956年知道有关斯大林的一切之后，我就不能再把这首诗的后部读完，因为那儿把斯大林描写成为国际主义的象征和楷模。这个结尾部分与我这时对斯大林的认识是自相矛盾的，而要修改它，更准确地说，要砍掉它的结尾部分，我又认为不合乎道德，所以就再也不发表它。

1941年11月初，我在雷巴奇岛，还不知道红场即将举行阅兵典礼，我就写了一首诗《严酷的一周年》，开始是这样写的：“斯大林同志，你听见我们吗？你应当听见我们，这我们都知道。”这首诗整个都是写我们当时对斯大林的态度和我们与之有关的希望。这首诗是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写成的，我对莫斯科城下所发生的事情没有完整的概念，——诗中表现了全部不安与紧张的感情。即使今天我也不为这首诗感到羞愧，也不后悔当时写它，因为它绝对真诚地表达了我当时的感情。不过我再也不发表它，因为在诗中对斯大林的那种感情，已在我身上永远泯灭了。在我写这首诗的时候，那时斯大林对我们所具有的那种意义，我觉得在诗中并没有夸大，它在历史上是对的。但我已不能怀着写这首诗时的那种感情来读它了，因为我对斯大林的态度早已不同。我在他身上既看到了伟大，也看到了可怕，我从自己方面就明白他所干的

萨麦德·武尔贡（1906—1956）苏联阿塞拜疆作家，诗人。他的许多诗已译成中文。

事情的手段——既必须，又狠毒，我一点也没有保留象过去那样对他爱戴的感情了。须知这种一时冲动的感情不仅在我，而且在其他的人身上都曾经有过，这种感情当时都是如此真诚，以至虽可以指责它，但无需为它后悔。

有两三首在其他不同年月写的诗提起过斯大林的名字，但这些诗象我其它的一些旧诗一样都不打算发表，因为它们不值得重新刊印。我对它们一点也不可惜，与描写萨麦德·武尔贡的诗相反。

但有一首诗有斯大林的名字，我曾发表过它并准备继续照原样发表它。其中保存着我写这首诗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以及这首诗所描写的事情。我指的是《加拿大集会》一诗；1948年在那里举办我的诗集《友与敌》的书展。我想提一下，诗中讲的是会场上的情况，在会场的第一排座位上坐着一些前来破坏大会的人：

我感到浑身象烫伤，
上前走一步，开始把话讲。
一开头就象冲锋一样，
唯愿不要倒地阵亡：
“俄罗斯，斯大林，斯大林格勒！”
前面三排没有开腔。
但后边起了一阵轻轻的喧嚷，
可我还没有想过来，
突然就喊出一声“乌拉！”
象山崩，象海啸，

象移动的山峦
越过前面沉默的几排人冲过来！

我在这诗中写的是真实的情况，而且写它是怎样发生的。我就是今天也能读它并且不止一次地读它，因为其中表达的是一部分真实的历史，“斯大林”一词对我来说在当时是与“斯大林格勒”和“俄罗斯”联在一起的，其意义就是今天也还是我对战争的感觉的一部分。现在我对战争的全过程，对它的突然性的程度，对它失误的范围，对斯大林为这些失误应负的责任的范围，等等，等等，较之当时，认识已有所不同了。关于这，一些伟大卫国战争的历史学家曾经（也许以后还要）同一些企图抹掉这些问题的人争论过很多和很久了。同时，当我回想这场战争和在这场战争中的自我感觉时，我也就回想起我的这些诗句：“俄罗斯，斯大林，斯大林格勒！”这些诗句在1946年，在美国，就象抛给敌人的一份挑战书，给朋友伸出的一只手一样，而当我心里背诵它或者大声朗诵它时，我心里和喉咙上一点也不打哽。也许，这话说来现在有人不喜欢，不过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顺便谈谈，既然我已经讲到这一点，那么我还想说，不读斯大林在世时所写的苏联文学，其中包括文章和特写的人，有时都倾向于认为那里尽是斯大林的全部引文，适当或不适当地对他歌功颂德。不过我想指出，第一，文学是伟大的和各式各样的，人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写作，一些人不恰当地提到斯大林，另一些人则无缘无故，一些人经常提他，另一些人则很少提他，而且不是出于对这个人物有什么原则上

不同的态度，只不过是出于个人的分寸感，个人的正派作风和对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多余的，什么是表示敬意，什么是阿谀奉承的理解的不同。至于说到我，那我已经讲过我的诗了。当重读我写的军事通讯时，我甚至有点惊奇（因为后来我总觉得自己常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发现在整个战争期间，在所有这些特写和通讯里，他的名字只提到过三四次，而且每一次都是适当的，如果用当时的观点去看斯大林的话。而无缘无故提他——对不起，我想不起来，在我无数的有关政治或文学的文章中，我只有认为必要的时候才引用他的话，而不是斟酌情况去写的，若说有什么地方写得不好，那只不过是一篇，两篇，三篇，四篇，而其它都没有斯大林的引文。我一点也想不起，我本人曾为到处添上这样的引文，免得同编辑的要求发生冲突而苦恼。在这方面我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特殊，只不过觉得在文学中一般都不常那么用。

1979年3月4日

访问了美国，加拿大，再访美国之后，我在回家前还在法国呆了个把月，这样我从日本开始的整个旅行，就花了9个月的时间。

在巴黎及尔后在法国南部的期间，我同第一次革命后就侨居国外的各种人物有过次数颇多的会面。不错，我没有同那些最狂妄的侨民代表见面，这种会面无论对于他们还是对于我都没有任何因由，而且在1946年那个时候，一些在法国

沦陷期间支持过德国人的、法西斯化的侨民都想办法躲得远远，他们都藏在暗角和缝隙里，以免被人听见他们的声音和看到他们的影子，——时间还不利于他们随便露面。但其余的侨民，大多数都站在反德的立场，如果不是亲苏，那无论如何是亲俄的，——我观察得相当多。我们战胜法西斯给这一些人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这些印象一直保留在他们的脑子里。许多侨民参加过抵抗运动，许多人都想回家，回到自己的祖国。我甚至会见过这样的一些侨民，他们一般都站在右倾的立场上，不了解我们，对我们的制度和我们的生活方式都很敌视，也不希望做一个苏联公民，放弃一切做苏联公民的机会。但我深信，他们对我国在战争的年代中所做的事情都表示敬佩，这种心情在那时差不多是很普遍的。

我曾经相当详细地写过一些最有意思的会见——同蒲宁，泰菲 和阿达莫维奇等人的会面。而现在，由于我写的那个题目，要在记忆中搜索当时的谈话时，不得不重新回忆这几次会面。我无法想起这些人，例如蒲宁，当时曾经对斯大林说过任何不仅不够尊重，而且语义双关的轻薄话。对于蒲宁，如果想简单地表明我对他当时的立场的认识的话，那么他同苏维埃政权、同苏维埃制度、同苏联文学还有一笔账，这是一笔老账，这笔账，正如他后来在生命结束时出版的书

伊·阿·蒲宁 (1870—1953) 苏联俄罗斯作家，1920 年侨居国外，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他的代表作：《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已有中译本。

阿·泰菲 (1872—1952)，俄国女作家。1920 年侨居国外，作品有《无风不起浪》。

中所证实的那样，是怨恨的和不可调和的。但与此同时，在1946年，对于蒲宁来说，在战胜德国之后，斯大林已是俄国的民族英雄，是捍卫她免受德国奴役而保持她的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英雄。我认为，在斯大林完成民族的功绩之后，蒲宁对未来的看法好象有点观望态度：在蒲宁看来，在斯大林的无疑是独揽大权之下，俄国那边是否会进行某些使今天与昨天接近的改革——这有什么难的呢！象蒲宁这样一个在法国连续呆了1/4多世纪的人，对于如拿破仑这样的历史例证，在他的脑子里绝不会是陌生的。

我之所以提起我在法国前几次会晤的印象，是因为它们也间接地说明了我回来时对斯大林个人的认识。照我看，我没有弄错，我从法国回来之后，几乎一下子就到斯摩棱辛纳选区去了，因为我还在日本的时候，就缺席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为什么要代表斯摩棱辛纳地区呢？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写过一首诗《阿廖沙，你要记住斯摩棱辛纳的道路……》。但是，我却知道另一种情况：这个选区是最困难的地区之一，也是战争频仍的地区之一。这里有雅尔采沃、多罗戈布什、杜霍夫辛纳、伊兹杰施科沃、萨福诺沃——这些地方从战争一开始我就特别熟悉，到处都是战壕，被炸弹和炮弹一再破坏。总之，我到自己这个选区去时，心里十分不安：我将看到什么呢？结果，我真的看到了许多比我在那个虽曾打仗，但未遭破坏，反而更加富裕的美国所看到的一切更困难、更痛苦和几乎无法忍受的情况。

这种蕴藏在心中的对比和把我们社会的精神力量、人们的心灵美、他们精神力量的坚强与美国的富裕相比的热烈希

望，使我还在旅行的时候就考虑如何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思索着我这个作家在战后未来要做的一件主要工作——写中篇小说《祖国炊烟》的开头的引言。这几乎占满了我的思想，所以我甚至想不起我对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以及围绕着它展开的一切内心反应的详情。

欧洲和我们的生活水平之间的对比，千百万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常与之接触的这种对比，是一种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打击。我国的人民，虽然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是胜利者，但也不容易经受这种打击，这一点我是感觉到了的，也深深地理解。凭良心说，在到美国之前，我不能把自己算作是对这种心理上的危险和精神上的考验估计不足的人。战后，在1945年的夏天，我竭力应付这种对我们许多人来说都是普遍的心理上的困难，并且尽力从这种境况中寻找出路。“是呀，现在我们的妇女有时天晓得穿什么。”《在布拉格的栗树下》一剧中，一个主人公彼得罗夫在战争的最后一天说：“她们穿着补了又补的袜子走路。老乡，你别皱眉头，这是真实的情况。我们现在很多东西都没有，而将来也还不会那么快就全都有，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波热娜太太，您是否知道欧洲人讲战时困苦讲得很多，可是他们不是永远都能知道什么是困苦，真正的困苦。我们拯救了欧洲，尽管我们的妇女穿着打补钉的袜子，尽管我们的后方在打这场战争中有人有时挨饿，尽管我们有人全家住在一间小屋里，但我们不会在谁面前感到可耻。真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我们的军队有武器，有衣穿，有饭吃。是呀，我们目前还不那么富裕，但愿将来我们什么都有。不错，我们没有盖一家独住的私邸，但我们盖了工厂。德国

人曾在巴黎的大街上到处乱逛，可他们没有走过莫斯科的大街！”“您不会喜欢欧洲，”他的谈话者捷克女人波热娜向彼得罗夫冲上一句。“这些一家独住的私邸，这些高级的别墅，这些铁屋顶的房屋一定会刺激您。您能否认这一点吗？”“可以否认思想，但不能否认铁屋顶。铁的就是铁的。”彼得罗夫回答她说。

在我战后当时的观念中，还没有认为象铁屋顶这样的客观现实，在一个已有千百万人谈过或者将要对其他千百万人谈到他们这些胜利者在欧洲所看到的事实的国家里，竟然可以否认这种客观现实或对它有意保持沉默。我觉得，这种对胜利者来说并不轻松的心理状态的出路，就在于公开承认我们比较贫穷，与此同时，也应当自豪地认识到我们所选择的长期勒紧裤带的艰苦奋斗的方针的正确性，没有这样的方针，我确信，我们就不可能走向胜利，我们就会支持不了。

自然，这指的是我们要多年孜孜不倦地工作。“不，我们这一代人生下来就不是为了休息的……”那个《在布拉格的栗树下》一剧中的彼得罗夫说。他考虑到我们在战后绝不是 在一个安逸的环境里工作，就预先说明这个观点。“我昨天从收音机里听到丘吉尔先生的演讲，他讲了自己的理想。照他的意见，地球上不应该有社会主义。因为这是淫佚、腐化和不伦不类。可是照我的看法，地球上应该有社会主义，因为这是快乐和幸福。你瞧，战争结束了，而人们对未来的看法是各不相同的。非常不一样。”我现在觉得，这话说得相当笨拙，但《在布拉格的栗树下》一剧中彼得罗夫上校也清楚地表明了我当时在战后的观点。

我是带着这些观点到日本，后来又从那里转到美国、加拿大和法国去的。这些观点无论在美国、在被完全破坏的斯摩棱辛纳都没有什么原则上的改变，只有对比的力量几乎是以几何级数增加的。我们真的生来不是为了休息的感觉也增大了，甚至成了一种狂热。而战后头一年，国外当时整个的生活水平我们无法可比，而要与它相比的心理危险的感觉自然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但我还是深信，不应该掩盖这方面的真情，企图掩饰它不仅没有好处，反而有害。我就是怀着这些有点苦味的感觉和准备写一部中篇小说的意图而从这次旅行中回到莫斯科，回到斯摩棱辛纳选区去的。可一下子我就碰上了我们文学界的吵吵嚷嚷，骚动不安，这是由于日丹诺夫的报告和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而引起的。

前不久我再翻阅了一下我在 1956 年写给中央的有关这个决议的意见和看法，现在我想转过头来谈这个已经陈述得相当彻底的批评意见了，它的正确性就是今日我也并不怀疑。如果说我在 1946 年的感觉，试图更准确和真实地回想它们，那么，主要的感受是：真正需要做的不完全是过去已做过的事情；必须要说的也不完全是如过去所说的那样。既不是这样，也不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所说过的东西。

我记得，在战争结束时，在战争结束之后，在 1946 年，我一下子就同相当广泛的知识界，无论如何是同艺术知识界的人士更接近了。看来，好象会发生一件什么事要对我们放宽限制似的——是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不是用今天的话，而是用当时的话来表达出来的，说什么即使同那些我们曾与之

共同对敌的国家的记者交往也可以宽容，可以更为爽直和轻松自如了。有人觉得，同国外记者交往，在战时就已相当广泛，战后也不会受到指责的，互访将会增多，美国片子也会很多——而且不是那些从德国搬回来的战利品，而是新的。总之，有一种思想上愉快的气氛，这种愉快的气氛并不要求与那物质困难的环境相适应，因为国家特别在 1946 年歉收之后遭到了困难。

还有一种轻率的态度，以及竭力强调以往不重视官方的观点，认为这是值得敬仰的。顺便说一句，我认为，选择集中打击阿赫马托娃和左琴科，与其说是针对他们本人，毋宁说是针对那个令人头昏目眩的、有点示威性的凯旋，在这样的环境中阿赫马托娃发表了一系列演讲，而且她又参加了同她会面的晚会，而左琴科回到列宁格勒之后所获得的十分显著的权威地位，也成为这次集中打击的理由。这一切都存在着某种示威性，某种不满的对抗，这都是基于对情况的错误估计，基于轻信战后默许扩大开放和缩小禁区所致的。显然，斯大林具有从各方面送来的足够的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经过互相补充，互相对证的。他感到，在人们的情绪中有一种东西，照他的说法，必须立刻拧紧螺丝了，而且要制止那些对未来不抱实际的希望。

对于列宁格勒，斯大林以前、当时和以后都多少抱着怀

安·安·阿赫马托娃（1889—1966），苏联俄罗斯女诗人。原姓戈连科，阿克梅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46 年曾受到批判，50 年代后期恢复名誉。米·米·左琴科（1895—1958），苏联俄罗斯作家。《一本浅蓝色的书》的作者。1946 年曾受到批判。50 年代不再写作，只从事翻译工作。

疑，他从20年代起就一直是这样的。显然，他怀疑那边有人企图建立一个精神的独立王国。目标既已明显，于是便仓促执行任务，无情而又草率地选择打击的对象以及规定犯罪的性质。总之，如果试图说出我当时对决议的感受（我总在尝试，但总不能完全把当时和今天的感受分开），自然，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特别使我激动，例如，关于阿赫马托娃的一部分，我当时就这样想过：我们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提出蒲宁或泰菲可能回归的问题？如果我们象日丹诺夫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能跟谁谈话呢？只能跟阿赫马托娃，因为她并没有出国当侨民，而且在战争时期还发表过文章。我感到这是一种毫无道理的、令人难受的粗野行为。尽管我对战争年代的左琴科并没有象他对阿赫马托娃那样的尊敬，但是，报告中对他所说的一切，读起来也是令人不愉快和不舒服的。

同时，在关于列宁格勒那两份杂志的决议中，我认为没有，更准确地说，不存在斯大林在主观上号召粉饰和轻描淡写生活的口气，虽然其中有许多地方，可以这样理解。说实话，差不多同一个时期，斯大林支持并推动了这样一些在原则上与轻描淡写生活完全不同的作品，例如潘诺娃的《旅伴》或者后来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随

薇·费·潘诺娃（1905—1973），苏联俄罗斯女作家。她的小说《旅伴》、《一年四季》、《克鲁日利哈》、《光明的河岸》等均有中译本。

维·普·涅克拉索夫（1911—），原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小说《在斯大林格勒战壕里》有中译本。60年代遭批判，现侨居法国。

后不久，卡扎凯维奇 的悲剧性的《星》以及潘诺娃的充满冲突的《克鲁日利哈》都获得了奖金。不，这一切都不是这么简单，也不是这同一涵义的。我想，执行这个决议委实是仓促成事，如果我要说的话，是在盛怒之下而作出的，许多地方都与原来计划不同，基本上成了纯政治性的，其目的是想把从知识分子手中稍许放开的东西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消除在知识分子中的幻想，给他们指明其社会地位，并提醒他们面临的任务就是要象战前那样把思想感情明确地表达出来；而战时不仅有一些将军，而且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翘起尾巴了。总之，问题就是叫人安分守己。

战前和战争的头3年，我已经是苏联作协的会员了，是多少有点名望的青年诗人之一，后来也享有戏剧家的声誉，又是在战争年代最初描写战争题材的几本大部头小说之一的作者。1939年，在其他我看大约170位作家中，我是获得“荣誉奖章”的一个，所以那时有人说，我成了获得奖章的作家。这是第一次向作家大幅度授奖，这对获奖的人来说有其意义。我是同多尔马托夫斯基和阿利格尔 一起获奖的，虽然在我们这个圈子里，从狭义上说，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有一些比我们三人不乏才华的人，但却把我们挑选出来了。显然，这是与亚历山大·亚力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的文学趣味和好感

埃·根·卡扎凯维奇（1913—1962），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小说《星》、《奥得河上的春天》等均有中译本。

马·约·阿利格尔（1915—），苏联俄罗斯女诗人。代表作有长诗：《卓娅》。

决定的。他，如果在作协的范围来说，我想，对这个获奖名单有相当充分的发言权。我在战前出版的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在战争期间很流行，并使我的名字比起诗歌方面更加出名。后来我从事《红星报》的军事记者工作，这工作引起我相当广泛的注意。后来写了《俄罗斯人》，在《真理报》上连载了好几天。在这之前不久，在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当时被认为的抒情诗和几首短诗：《等着我吧……》，《阿廖沙，你要记住斯摩棱辛纳的道路……》和《杀死他》，这些诗在各报上一发表就使我作为诗人而扬名了。《日日夜夜》是发表在《旗》杂志上的，部分在《红星报》上连载了，这也多少加强了 my 文学的声望。

1942年，我的剧本《我城一少年》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1943年，《俄罗斯人》获奖。1946年，当我在日本的时候，完全出乎我的意外，《日日夜夜》也获奖了；这本书出版了两年多以后从没有人提议过授奖，这看来是斯大林出的主意。

为什么我要提这一些呢？为的是想解释，在1946年快到夏末的时候，在中央发布了决议之后，已预先决定要改组苏联作协的领导人员，并且打算改组这个领导层的结构。虽然那时我还是一个年轻和初出茅庐的人，但我已是我这一代作家中（我认为我说出这一点并不夸大）最知名的一个。我对作协的活动实际上并无任何作用，就这方面来说我是一个完全涉世未深而且缺乏经验的人。1944年，有几个前方的作家：

特瓦尔多夫斯基、柯热夫尼科夫、戈尔巴托夫、我，看来还有什么人，都已进入，说得正确些，都已被遴选为作协主席团的成员。我当时就这个问题同一起工作的吉洪诺夫谈过话，他是那时的作协主席，作为协会的责任书记是德米特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波里卡尔波夫。好象有一次，也许是两次（在到前方去的往返之间），我曾经参加过我已记不清楚的主席团会议。就是这些。在我工作的其它单位中，直到战争结束还曾有《红星报》社。尽管在我的自我感觉中，我是一个有声望的作家，他的名字反正实际上大家都已知道，不过，这种自我感觉是同我是一个新闻记者，一个报人的自我感觉连在一起的。而且这个报人——就是新闻记者，从不办报（当时我不如其详），只是为该报提供材料，当跑外勤的通讯记者。我就是怀着这种双重的自我感觉到日本和美国去的。可是当我在1946年8月底回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所有作协主席团的成员都被召到日丹诺夫那里聚会，以便讨论作协如何进一步工作的问题。我，我再重复一遍，当时在这方面还是一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

两次讨论中的第一次讨论拉得很长，延续了好几个钟头。各人都提出不同的人作为协会秘书处的候选人。秘书处的工

阿·特·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1971），苏联俄罗斯诗人。他的长诗《春草国》、《瓦西里·焦尔金》、《山外青山天外天》均有中译本。

瓦·米·柯热夫尼科夫（1909—），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有：《迎着朝霞》、《盾与剑》等。50年代曾任《文学报》驻中国记者。

尼·谢·吉洪诺夫（1896—1979），苏联俄罗斯作家、诗人。他的诗集《格鲁吉亚的春天》、《基洛夫和我们在一起》均有中译本。

作人员实际上就是领导协会工作的。当波里斯·戈尔巴托夫突然提议我作为一个候选人领导协会工作的时候，而且他还在提议之前过分地夸奖我是我们那次到日本去的作家代表团的组织者和领导，大家听了只作微笑，认为这个建议是对我非常友好的表示，而同时又不是认真的。当开完会我们回家的时候，我对波里斯痛骂一顿。他在大家对他的建议作出反应之后，看来自己也感到有点难为情，不过他还是照自己的老习惯，唠唠叨叨地回骂起来，说他不知是国际无产阶级作家协会，还是全俄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秘书，而且不是当了13年，而是当了19、20年了，说他干这项工作也象其他人一样，一点也不差。

两三天后，我们又聚会在日丹诺夫那里，日丹诺夫说，上次在这里讨论作家协会的事情，已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决定授权作协党组推荐下面人员组成作协的秘书处：作协总书记是法捷耶夫，副书记是西蒙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吉洪诺夫、书记是列昂诺夫和戈尔巴托夫，同时戈尔巴托夫被确定为党组书记。

法捷耶夫当上作协领导不会使人感到意外。虽然在上次的会议上，他曾十分坚决地表示推辞。他说，刚写完了《青年近卫军》，这些年他对实际的作家工作已感到兴趣了，他半

弗·维·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苏联俄罗斯剧作家。他的剧本《第一骑兵团》、《乐欢的悲剧》、《难忘的1919年》均有中译本。

列·马·列昂诺夫（1899—），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有：《獾》、《贼》《俄罗斯森林》、《索契河》（一译《索溪》）。

开玩笑半严肃地请求大家不要毁了他。总之，这是真诚的，根据法捷耶夫好用权力的性格，根据他的政治敏感的作风，他身上大概总还蕴藏着一些令人不安的疑虑。他作为一个作家不想领导作协，这是真情，但是，作为一个文学政治活动家，我就看不到他有什么诚意，除了他之外，还能有谁来做这项工作呢。这也是一个真理——这不仅是客观的，而且对那个时代来说也是客观的，因此法捷耶夫当上了作协领导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感意外。“总书记”这一提法本身，毫无疑问，除了斯大林之外，任何人都想不出来。他是这种提法的作者。显然，按照他的意见，作为总书记，他无需按字母的顺序排列，而3个副总书记则按副职的次序排列。吉洪诺夫排名第三，是以此来强调斯大林对他的尊敬，强调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有关的对协会的批评、改组和撤掉作协主席的职务——这是一个问题，而吉洪诺夫的名字和他这个人物在新的、重新组建的协会领导班子中的意义——这又是另一个问题。这样，无论如何，我们当时都已明白，这显然是出于斯大林之手，因为在一次会议的谈话中，从没有人提出过吉洪诺夫是新改组的协会秘书处的领导人之一的意思。显然，任命戈尔巴托夫为党组书记也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我认为，他不希望让法捷耶夫这个具有一定威信，又有中央委员地位，又有好用权力性格的人当上总书记后就滥施权力。看来，据斯大林的意见，把戈尔巴托夫任命为党组书记也表示对协会批评的开始。这是斯大林的创举，因为通常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如果他是个共产党员，在必要时就任命他为这个组织的

党组书记。

我补充一点，从各加盟共和国的作家中推荐出的秘书（中亚细亚各共和国 1 名，乌克兰、白俄罗斯各 1 名，外高加索和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各 1 名），也都是斯大林的主意。总之，一切都为我们作出了决定，我们只按斯大林的意见各就其位就是了。既然都已各就其位，那么在最初的几年中，我对作协的工作多少提点意见是相当理智的。一周前我还没有想到，我会成为作协的领导之一，不过这就决定了我今后多年来的活动的性质，决定了我的作家工作的某些特点。

过了一周或是一周半，在我同其他人一起参加作协的工作之后，我就被任命为《新世界》的主编。这与作协的情况相反，对我并不感到十分意外。以前跟我谈过，要我当一个杂志的主编，我甚至向中央谈过我对这份杂志应该如何办的一些想法。尽管我年轻，而且片面，但总还有经验：在战争的后期，我已是《旗》杂志的编委。自然，我没有正式在编辑部工作过，但 1944—1945 年，我曾看过一些我收到的稿件，并且提出过自己的意见，这主要的是诗。虽然我没有经验，但我还是想办一份杂志，我想象的并不很清楚，这杂志该如何办，但对此我总感到自身有一股什么力量。

这样，在我成为作协法捷耶夫的第一副总书记的一个月期间，我就当上了革命后在莫斯科出版的最老的一份大型杂志的主编。《红色处女地》比《新世界》创办更早，但它在 1943 年还是战争的年代里就停刊了。

我全力以赴从事杂志工作。我们《红星报》的一位同事

——克里维茨基 同意来当我的副主编。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有卓越办报才华的人。他性格急躁，意志坚强。老编委人员中留下来的有肖洛霍夫和费定。前者一如既往，不参加杂志的任何工作，相反后者却参加杂志的具体工作，这一点我不准备再讲，因为我在回忆费定的一书中都已经谈过了。没有拒绝参加杂志编委的还有一个杰出的人物——瓦连金·卡达耶夫、一个聪明而又满腹经纶的波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阿加波夫，在我们到日本去的时候我就喜欢他了。他来到《新世界》之后，我同他先后在《新世界》、《文学报》，后来又回过头在《新世界》并肩工作了12年。编辑部最年轻的一个成员，30岁的主编的同龄人，是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博尔夏戈夫斯基，他为此而迁来莫斯科，他原是基辅一个有才华的戏剧（不只是戏剧）评论家。在杂志上开辟一个兄弟文学专栏的责任就落在他的肩上了。

我之所以讲这些事，是因为这一切将在某种范围内与我今后转而讲到我这本书的主题有关；因此我免不了要谈自己在《新世界》和在《文学报》各个不同时期的工作的某些细

阿·尤·克里维茨基（1910—），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政论和特写文章。

康·阿·费定（1892—1977），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城与年》、《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篝火》等均有中译本。

瓦·彼·卡达耶夫（1897—），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时间呀，前进》、《雾海孤帆》、《团的儿子》等均有中译本。

阿·米·博尔夏戈夫斯基（1913—？），苏联俄罗斯评论家，作家。作品有，《铁匠在哪儿安家》。

节。

在以前编辑部成员编辑的第9期《新世界》上，刊登了中央决议和日丹诺夫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报告。自然，我不是说以新主编为首的新编辑部不能用《新世界》的篇幅来转载决议和报告，当然，如果以前并没有刊登过，那是要转载的。但结果呢，刊登了中央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报告的第9期，是以前编辑部工作的一个尾声，他们已做完一件事了，而我们仿佛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似的。现在翻阅1946年我们开始工作的那一期《新世界》的双月刊（10—11月）我认为，在我们工作的很短的期间里，它已发表了一些不坏的甚至是很好的作品。其中可以看出（在这之前，在各大型杂志上，如果不是从来没有，那至少也是长期没有刊登过的），有波里斯·加林的不是长篇小说，也不是诗歌，而是特写的《在顿巴斯》。它发表了纳罗夫恰托夫、斯梅利亚科夫、卢科宁的诗，巴乌斯托夫斯基的散文，爱伦堡给编辑部提醒要纪念阵亡将士的信，多夫任科的电影脚本《生命在开花》，随后他又发表了《米丘林》，此外还有安德烈·普拉托

波·阿·加林（1904—），苏联俄罗斯作家、新闻记者。作品有：《在一个居民点里》、《新世界的建设者》等。获苏联国家奖。

谢·谢·纳罗夫恰托夫（1919—1981），苏联俄罗斯诗人。诗集有《篝火》、《中午》等。

米·库·卢科宁（1918—1976），苏联俄罗斯诗人。诗集有：《心悸》、《必要性》、《五本书》等。两次获苏联国家奖。

阿·彼·多夫任科（1894—1956）。苏联电影导演。苏联电影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诺夫 的短篇小说《伊万诺夫一家》（《归来》）。发表这两篇东西在当时是要冒点风险的，因为在 1940 年严厉批判多夫任科描写乌克兰的电影脚本之后，这还是第一次发表他的新作，象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喜欢用放大镜看这部作品的人都找不出它的毛病来。至于普拉托诺夫的短篇小说《伊万诺夫一家》，我和克里维茨基都很喜欢它。我们想在这一期由我们编的杂志上发表我们《红星报》的同事普拉托诺夫的作品……

1979 年 3 月 5 日

我很想利用这个机会，就这篇描写从战争归来的情景的短篇小说，继续谈谈普拉托诺夫在战争的年月里为《红星报》所写的东西，谈谈他在 30 年代遭到毁灭性的批判之后，我们怎样帮助他重新获得在文学界里多少有点正常的地位。我和克里维茨基都没有预见到将会发生灾难，只有阿加波夫预见到了。他同意我们对这篇小说的好评，甚至还说这篇小说不仅是好，而且是非常之好。这个聪明的阿加波夫后来又说：“一旦发生了什么事，那我们会认为，我跟你们一样，都是同意它发表的。不过我预先提醒你们，这篇小说会使我们遇上灾难。这是我的老人的记性向我提示的。（阿加波夫那年

安·普·普拉托诺夫（1899—1951），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叶皮凡水闸》。

47岁，他有点喜欢卖俏，讲到自己老年的记性、习惯和毛病时，总考虑到自己那结实的、看来永不会垮的身体。)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红色处女地》差一点为发表普拉托诺夫的小说而关门了。更有一桩难以置信的丑闻，叶尔米洛夫看来还有法捷耶夫都为此事而被叫到上边去挨批呢。”

根据阿加波夫的口气和他的面部表情来看，毫无疑问，为普拉托诺夫而训斥法捷耶夫的正是斯大林。

“在这篇小说中，”阿加波夫继续说。“有一些普拉托诺夫所独有的笔调表现出他对生活和人们的行为的特殊态度，这种态度在过去是非常不受欢迎的。这一点我要预先提醒你们，我再重复一遍，虽然这篇小说写得非常好，但如果将来发生什么灾难，那我们会认为，我什么也没有提醒过你们。”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和克里维茨基都对这个警告不加重视。心里想，对我们来说，这篇小说只不过是在《红星报》上多次发表的东西的继续，都是普拉托诺夫写的东西，那些东西也从未引起过任何责难，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发表他的作品也将是如此。加之我们还有一种想法：刚刚任命一个新的主编，批准一个新的编辑部，就为了他们出版的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东西而狠揍他们一顿，照理是不会这样做的。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一般都会宽恕初犯的过失的。

但是，哎呀，阿加波夫显然是对的。杂志刚一出来，叶尔米洛夫就在《文学报》上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普拉托诺夫的一篇诽谤性小说》。普拉托诺夫的短篇小说一共只占杂志的

14页，而叶尔米洛夫的文章却差不多和小说一样长，占了报纸的整版。《文学报》按职责分工是属于作协法捷耶夫直接管辖。叶尔米洛夫是他在拉普时期的老战友，1946年那些时候，他们都是好朋友，在别的情况下，叶尔米洛夫是法捷耶夫的帮工（我用这个词绝不后悔），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不过是他们集体的意见和决定的结果。这篇文章毫不留情，给人的打击是猝不及防的，还未站稳就给了你一击。这件事对我来说是我同法捷耶夫的关系上的第一个疤痕，这个疤痕我永不会忘记。我曾抬举过他，尊重他，虽然不是无条件的，但还是喜欢他，可是我无法原谅他的一些事情。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这些事情象倒钩一样挂在我的心底里，在他决定离开人间之后，它们依然留在我的心间。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了什么？这使我激动万分。至于叶尔米洛夫，在这之前我早已坚决不喜欢他、不尊重他了。我没有就这个问题同法捷耶夫谈过，因为，尽管我涉世不深，但我还是感到，这种谈话不会有什么结果，或者他会不吐真情。问题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政治家，他不应该害怕，随着决议的颁布，他可以就在普拉托诺夫的小说上加码。这不是斯大林的作风，不象是他干的。或者是法捷耶夫老记得他那年为普拉托诺夫而陷于危险的境地，因而再也不愿冒一部分，甚至一点点风险，因为要是出了点什么事情，他首先就得承担责任；或者是，就象他

“拉普”全称为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苏联群众性的文学团体（1925—1932）。

过去年轻时对某些同他意见相左，或者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的态度一样，他总记得普拉托诺夫是使他法捷耶夫受过的人，于是心中就怀恨了呢？怎么会为这件事就永远一点也不能原谅人？我认识一些文学界的人，他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无情，不宽恕任何过错。我不知道，也许我弄错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事情就是这样。

也许，他由于斯大林的倡议而刚回到作协之后，就想在这最初的几个月里表现一下自己负有最高的使命，因而就穿起了坚定不移、绝对正确和好记忆力（政治上的好记忆力，其例就表现在普拉托诺夫身上）的铠甲的吧？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我相信，对于这篇普拉托诺夫的文章上边不会有任何示意，也不曾有过这种示意。我的根据是：这篇文章来势汹汹，力量甚猛，以至它得不到任何进一步的反应。我没有因叶尔米洛夫的文章而挨整，杂志也没有受到严厉批评。但是，那几个月的环境不利于为这篇文章向什么地方申诉。普拉托诺夫的小说按当时的情绪和颁布决议之后新构成的环境，自然有些地方是容易被人找岔的。不理它，不纠缠它是可以的，但是，既然有人纠缠它，而且是那么大声疾呼的，象叶尔米洛夫所干的那样，加以叶尔米洛夫暂时（我再说一遍，是暂时的）还有法捷耶夫的沉默的支持，要是出来为这篇小说辩护，那是危险的，——这与其说是为了杂志和它的主编，毋宁说是为了作者本人。总之，我们吞下了这颗苦丸，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去走到底，走到最上层去。

这事发生之后不久，在列宁格勒杂志《星》的第12期上，我发表了迅速写成的剧本《俄罗斯问题》。我的思想主要是想

到一部中篇小说，它后来问世时取名《祖国炊烟》。我为写这部小说作了准备，写了一些最初的笔记，但美国之行要写政论文章。爱伦堡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而我，除了发表两篇有关美国戏剧的文章之外，一篇政论文章也没有发表过。我觉得，要谈我较为熟悉的、观察得较多的（不单是在美国，而且还有在日本）与美国报界生活和活动有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最好能用戏剧的形式。所以我就写下了《俄罗斯问题》一剧。这个剧本的情节很集中，一般说，都是围绕着与我们到美国去有关的问题——俄国人是否想要打仗？我们已尽可能在那边给他们表示和说明，俄国人不想打仗，不想，而且不能想——这是毫无疑问的真理。陈述和证明，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不管是亲密的谈话，还是宣传，随便什么形式都可以，只要完全合乎真理。我们到美国的时候，那些以各种方式冲着我们、反对苏联的主要攻击都是基于反面的观点：俄国的共产党人想要征服自由世界。美国当然明白这种危险的范围。现在，当我回忆这件事而在写这个剧本的时候，这种调子已经很老了，那时它还比较新鲜，所以我们真的打从心里恨它。

这样一来，我就没有写各编辑部等着要的有关美国的政论文章，而花了3周的时间写出了《俄罗斯问题》一剧，正如我上面提到的，它发表在《星》杂志上。它本来是给一家剧院——列宁共青团剧院上演的，可后来在莫斯科的5家剧院——艺术剧院、小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莫斯科苏维埃剧院、列宁共青团剧院上演了，而在列宁格勒还有3家——阿历山德林卡剧院、大剧院、喜剧剧院。后来知道，在颁布

中央决议后特别注意《星》杂志（该杂志主编是中央宣传部莫斯科工作人员叶果林教授兼任）的斯大林读了这个剧本，他对这个剧本不知道是觉得好呢，还是觉得有用，对他这个政治家来说大概是后者，这一点我后来不止一次地相信，自然是后者起着头等作用，而趣味的印象只属次要的；所以他就下令广为上演《俄罗斯问题》，这个剧本大概就是这样得以在全国传开，而莫斯科的那5家剧院也就一下子谁都不再上演它了。

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什么发生在前——斯大林奖金为这个剧本在莫斯科5家剧院演出而颁发的还是一上演就颁发奖金。不过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在于指令是绝对的。当我来到艺术事务委员会并请求当时的主任不要再上演这个剧本（这后来我才得到谅解），哪怕是在莫斯科的第5家剧院——瓦赫坦戈夫剧院（在这家剧院上演我后来才知道），可他把手一挥，回答说，这是已经决定了的问题，不是由他来决定，他没有办法去改变它。

1947年春，《俄罗斯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初次上演了。我从列宁格勒的朋友们那里，从我们在北方，在摩尔曼斯克、在波利亚尔内就相好的尤利·巴甫洛维奇·格尔曼那里得知，米哈伊尔·左琴科有几十篇他在战争年代写成，但未发表的描写游击队的短篇小说。左琴科的这些小说在当时是想拿去发表的，但后来出了事，他的这些小说就原封不动地和毫无出路地搁在身边。这些小说按其本质不可

尤·巴·格尔曼（1910—1967），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你为之服务的事业》。

能招致任何非议，只不过它们不是所有的人都一样感到兴趣——一部分人感兴趣一些，另一部分则不大感兴趣。但是，从可靠性的观点上看，这些小说都已说得清清楚楚，而从尊重作者的观点上看，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无懈可击的。问题不在于小说本身，而在于它们是左琴科写的。他已在日丹诺夫的报告中了名，说他的社会政治和文学的面貌是陈腐和堕落的，而在中央的决议中他竟被称为庸人和蠢贼。这些小说本身自然可以发表，但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就得把左琴科从他所处的可怕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要是你忽然想起来，就下决心做吧……”

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或者大致是这样结束。我考虑再三，于是下定决心：首先叫左琴科到莫斯科来，读完他的短篇小说，然后挑选将近一半我认为是最好的，担心而又冒险地把这些小说连同左琴科的简短序言重打出来，不经编辑部的讨论，就打算把它们送给日丹诺夫，当时他在莫斯科指导思想意识问题。我还写了一封信，说我认为可以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这些小说，但由于大家所知道的以前发生的事件，我请求中央批准。

我把这些小说连同我的信交给日丹诺夫的助手——阿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涅佐夫转达。据我看，他是一个好人，对作家，也包括对我都怀有好感。

过了一段时间。我给库兹涅佐夫打去电话。“不，暂时还没有看。”再一次打电话。“不，安德烈·阿历山德罗维奇 暂

时还没有时间看。”“对，我提醒过了，可是目前还没有时间看。”

终于，在一次一次的电话之后，库兹涅佐夫有把握地对我说，据他所知，安德烈·阿历山德罗维奇看过了这些小说，不过，他觉得，安德烈·阿历山德罗维奇现在没有时间同我会见，他建议我给他本人打电话，不过，要等两周之后。

我接受这个建议，开始等待。

就在这个时候，法捷耶夫同我们，同其他的书记一起准备了一些相应的材料，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请求就信中所提出的那两个问题来接见作协的领导人。

1979年3月6日

这两个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由于战后作家的物质生活的困难状况，需要改变作家的权益；第二个问题是：由于作协面临的业务范围较之过去大得多，需要改组作协并改变它的编制和工资。

于是，不知是5月13日早晨，还是前一晚，我现在记不清楚，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我被告知，斯大林定于5月13日晚上6时接见我们，要我们在这个时间之前到达克里姆林宫。

下面我就引用这次会见后的第二天我口授给女速记员作出的笔记。后来我们被召去见斯大林的时候，我就在当天或第二天认真地作出这样的笔记。那时所有我记下来的东西都

是直接的，我完全引用当时的记载。不过我并没有把一切情况都照样写下来。我把当时认为不可能记下来的问话、问题、人名都省略过去。这些会见我记得很清楚，可是，这并不排除有某些微小的不够准确的地方，但因为是微小的，所以就给我有可能现在做些增补工作，在当时省下来的地方增补一些句子。为了能理解这些笔记的体系，就必须从心理上钻进这个时间里去，并且要想一想，在同斯大林会面的时候，自然而然，不仅不应该和不可能做任何笔记，也没有想到去做笔记，而且，就是晚些时候去做这种笔记也未必有可能。总之，我记下了我认为自己有权记下的东西，并且尽可能牢记着我认为自己无权记下的东西。在回忆这些会见时，我在每一个场合都根据事态的进程，指出哪儿是引用当时记下的本文，哪儿是我现在给它的增补。这些笔记本身我在引用时都作了一些小小的修改，这些修改不影响到问题的本质，只是作了些文字的加工。因为它们写得那样仓促，所以小小的合乎语法规则的修改是有必要的。不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要避免把自己显得比当时更为聪明和更有远见的诱惑，换句话说，要避免对旧的笔记作实质修改，这我早在多年以前，还是在开始写军事日记的时候就对自己提出过警告了。所以我把自己所有的旧日记（其中包括现在所讲的笔记）的原稿送交国家中央文学艺术档案馆作内部存档。

下面就是 1947 年 5 月 14 日所做的笔记：

5 月 13 日，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我被告知在晚上 6 时之前到克里姆林宫去见斯大林。6 点差 5 分我们

就到了他的会客室，那是一个非常暖和的五月天，由于窗户被太阳晒得滚烫，会客室里甚至很热。会客室的中央摆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些外国的报刊——周刊和报纸。我激动得直灌水。

6时34分，波斯克列贝雪夫走进会客室未请我们。我们走过了一个房间，便打开进入第三个房间的门。这是一间大办公室，用明亮的木板装修的，有两道门，一道是我们走进来的，第二道就在办公室里面的左边。右边也在办公室里面，离门稍远的地方，放着一张写字台，左边靠墙还有一张长桌，可坐20个人开会。

这张桌子的前头，在它的最顶端，坐着斯大林，他旁边坐着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旁边是日丹诺夫。他们都站起来迎接我们。斯大林的面孔是严肃的，没有一丝笑意。他认真地同我们一一握手后就转身回到座位上。莫洛托夫亲切地向我们问候，说会同法捷耶夫一起刚从英国回来，一路辛苦了。我们是作为我国议会代表团的成员在英国呆了将近两个月的。

后来我们3个（法捷耶夫、戈尔巴托夫和我）并排坐在一起；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坐在我们对面，但不完全是正对面，而是稍微远一点，靠近坐在桌端的斯大林。

这一切自然不那么重要，但我想把这一次会见的详情牢牢地记住。

在日丹诺夫面前放着一个红色呈文卷宗，而在斯大林面前则是一个薄薄的卷宗。他一下子就把它揭开了，里面放着我们为作家的事情写的信件。他朗读着标题：《致

苏联部长会议》，然后说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楚，仿佛是说我们收到了你们的信了，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吧。

谈话是从稿酬问题开始的。

“你们提出重新考虑稿酬问题，”斯大林说，“这我们已经重新考虑过了。”

“是的，但是解决得不对。”法捷耶夫说。他开始解释，在今天稿酬制度的条件下，作家为自己一版再版的好书，很快就再也得不到什么收入。法捷耶夫从这里起就转到了印数很少的书的稿酬不相适合的问题，这些书的稿酬也少得可怜。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法捷耶夫再一次重复，稿酬问题解决得不对。

听完他的话后，斯大林说：

“我们肯定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当我们订立这些稿酬制度的时候，我们就是想避免这种现象的。一个作家写了一部好书，他以后就可以靠它吃饭，什么事情也不做了。要不他们写了一部好书，就为自己盖起别墅，不再工作了。我们不惜花钱。”他微笑了一下接着说，“但必须不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文学界订立4个评定的等级，一些级别。一等是最优秀的作品，二等是优秀作品，三等和四等——要订立等级表，你们认为怎样？”

我们回答说，这是正确的。

“那好吧，”斯大林说，“我认为，这个问题不能用信或者决议来解决，而要开始为它工作，要建立一个委员会。日丹诺夫同志，”他转过来对日丹诺夫说，“关于委员会的成员您有什么建议？”

“我能进入委员会就好。”日丹诺夫说。

斯大林笑起来，说：

“您的建议非常谦逊。”

大家哈哈大笑。

此后斯大林说，应该使在坐的几位作家参加到委员会去。

“财政部长兹韦列夫最好也参加进去。”法捷耶夫说。

“那好吧，”斯大林说，“他是个经验丰富的人，如果你们想要的话。”斯大林特别强调“你们”这个词。“可以使兹韦列夫参加。还有什么人呢？”他补充说，“梅赫利斯怎样？”说完用考察的眼光看看我们，“不过他会把你们大家一下子从那里赶跑的，不是吗？”

大家又笑了起来。

“他总还是一个老文学家。”日丹诺夫说。

我停下那时的笔记，不依顺序地往前说，那天成立的委员会后来开过两三次会议，梅赫利斯瞒过了我们真正为他的担忧，这是因为我们早就清楚他的性格刚直所引起的。在讨论稿酬的一切问题上，他都支持了作家的建议，可当财务人员提出一个方案——要从某个年收入的水平开始，若是超出这个水平，就得从作家身上抽所得税 51%，这一下梅赫利斯真的发火了：

“在提出这些玩艺儿之前，总应该想一想。你们搞什么名堂，想把文学看成是私人做买卖么？还是打算把单独工作的作家看成是没有发动机的手工业者？你们想干什么，想代表

另一个文学组织准备同作家进行斗争，就象同个体户作斗争一样，要他们不单独地写作，不在自己家里的桌子上写书？”

梅赫利斯在这次委员会所说的这番冗长的气话，是大家长期清楚记得的气话之一。他这番大动肝火的气话一下子就把打算在文学界施行的税收制度全部搞垮了。据我所知，梅赫利斯对文学和作家都没有偏袒之心。他是一个政治家，他认为文学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作家是苏维埃的职员，并不是个体手工业者。

我写完了这段离题的话，说得正确些，有点跑到前头去的话，现在就回到 1947 年 5 月 14 日的笔记上来：

“那么，还有谁可以参加委员会？”斯大林问。

日丹诺夫列举了所有打算要他们参加委员会的名单。

“好”斯大林说，“现在谈第二个问题：你们要求扩大编制。应该给他们扩大编制。”

日丹诺夫反驳说，作协的编制够庞大了，从 70 人增加到了 122 人。

“他们有新的工作范围。”斯大林说，“应该扩大编制。”

日丹诺夫重复说，作协提出的编制总得要削减一些。

“总得要扩大。”斯大林说，“有的新部门要设立，这里不仅需要扩大，而且还需要新订编制。而有些部门，编制庞大，它们就得削减。应该给他们扩大编制。”

关于编制的问题至此便结束。

下一个问题是作家的住房问题。

法捷耶夫开始说明，目前作家的住房条件很差，他们需要真正的帮助，何况作家的住房，实质上就是他的工作场所。

斯大林留心地听完了法捷耶夫的解释之后就说，要莫斯科市苏维埃主席也参加到委员会里去，共同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沉默一阵后便问：

“喏，看来你们就是这些问题了吧？”

我们同斯大林会见的时间就这样短暂，以至我忽然感到非常可惜：现在一切就快完了，马上就要结束了，说实在的，一切都已结束了。

“如果你们就是这些，那我向你们提个问题，现在作家写些什么题材？”

法捷耶夫回答说，战争依然是作家集中写的题材，而现代生活，包括生产、工业，目前在文学中反映得还比较少，而且，有所反映的多是一般作家的作品。

“的确，”法捷耶夫说，“我们派了一些作家出差去搞创作，派了将近 100 人，不过大部分也都是一个一般作家。”

“为什么大作家不去呢？”斯大林问，“他们不想去？”

“很难推动他们。”法捷耶夫说。

“他们不想去。”斯大林说，“那您怎么看，这种出差有意义吗？”

我们都回答说，出差的意义还是有的。为证明这一

点，法捷耶夫引证了最初几个五年计划，引证了沙金娘的《中央水电站》，卡达耶夫的《时间呀前进》和其它几本书。

“可托尔斯泰并没有出过差。”斯大林说。

法捷耶夫反驳说，托尔斯泰在雅斯纳雅·波良纳的时候，写的恰好是他生活在其中的那一些人物。

“我认为，当一个严肃的作家认真工作的时候，如果需要，他自己就会出差。”斯大林说，“怎么，肖洛霍夫并没有出差吧？”

“他总是在出差。”法捷耶夫谈到肖洛霍夫时说。

“他不想离开那里？”斯大林问。

“不想。”法捷耶夫说，“他不想搬到城里来。”

“他害怕城市。”斯大林说。

大家沉默。在这之前，讲到创作出差的时候，法捷耶夫举了几个例子，以说明很难派大作家去出差。其中他提到卡达耶夫的名字。显然，斯大林想起了他，忽然问：

“怎么卡达耶夫也不想去？”

法捷耶夫回答说，卡达耶夫现在正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本书是他的《雾海孤帆》的续篇，卡达耶夫的新书也是描写敖得萨的，这是卡达耶夫的主要的题材。

“那么他是在写严肃的题材罗？”斯大林问。

马·谢·沙金娘（1888—1982），苏联俄罗斯女作家。《乌里扬诺夫一家》的作者。

“是严肃的题材，是他主要的题材。”我们大家都肯定说。

又是一片沉默。

“有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题材。”斯大林说，“这样的题材需要引起作家的兴趣，这是我们苏联爱国主义的题材。如果拿我们的普通知识分子、科学界的知识分子、教授、医生来说的话，”斯大林说。他出言吐语，有他独特的语调，这语调我记得很清楚，依我看，我能够模仿它，一字不差。“那么他们受苏联爱国主义的情感教育是很不够的。他们不合理地崇拜外国文化。老觉得自己还未成年，习惯于认为自己永远是个小学生，这是落后的传统，从彼得大帝起就有。彼得大帝有一些好思想，但不久就被许多德国人蛀蚀了。这是崇拜德国人的时期。你们看看，比方说，罗蒙诺索夫 的日子多不好过，工作多么困难，开始是德国人，后来是法国人，都是崇拜外国人。”斯大林说着，忽然又狡猾地眯起眼睛，用快得听不清楚的话说：“崇拜洋人。”他冷笑一下，又变得严肃起来。

米·瓦·罗蒙诺索夫（1711—1765），俄国第一个世界知名的自然科学家、诗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的奠基人、画家、历史学家。

1979年3月7日

“一个普通的农民不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卑躬屈节，不会谄媚逢迎。可是这样的一些人却缺乏尊严，缺乏爱国主义，不理解俄国所起的作用。军人也有这种卑躬屈节的情况。现在变得少些了。现在不，现在他们翘起尾巴来了。”

斯大林停下来，冷笑一下，用几乎觉察不到的手势表示军人如何翘尾巴。

后来他问：

“为什么我们坏一些？问题在哪里？要把这一点讲它个若干年，把这个问题讲它个十来年。常有这种情况：一个人在做一件伟大的事业，可他们自己还不了解这一点。”于是他又提起那个教授。“就拿这个人来说吧，他并不太差。”斯大林再次强调，“可他在一个外国的无赖面前，在一个比他矮三个脑袋的学者面前卑躬屈节，丧失自己的尊严。所以我觉得，要同我们许多知识分子的自卑感作斗争。”

斯大林转身对日丹诺夫说：

“请把文件给我。”

日丹诺夫从卷宗里拿出几张别在一起的印有文字的纸。斯大林翻一翻它们，这份文件大约有4、5页。翻完后，斯大林从桌边站起来，把文件递给法捷耶夫说：

“喏，您拿去，现在就朗读给大家听。”

法捷耶夫朗读起来。这是斯大林刚才谈到的那件事情的文件，其内容我暂且不说……

我当时(1947年5月14日)认为不能将其内容说出来的文件，后来作为所谓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的公开信发表了。这封信的发表就是反自暴自弃，反信心不足，反崇洋媚外的开始。这正如斯大林说过的，要把这一点讲它个若干年。

这场斗争很快就简称为与崇洋媚外作斗争，并且同样很快地采取了各种荒诞的形式，这些形式差不多总是思想斗争的独特表现，这种斗争总是变成轰动一时的政治运动，它常被人推波助澜，而另一方面，它又带有自发的危险成分。当时所写的和印发的许多东西，现在读起来都令人感到可耻，其中有出自你笔下或是你的编辑签名的。但是，尽管后来一切都如此荒谬地变成了运动，在某些方面还以野蛮的、有时简直是卑鄙的出版物表现出来。可在必须同自暴自弃、信心不足、崇洋媚外兼忘本作斗争的思想当中，即使在那个时候，在

战前：克柳耶娃和罗斯金两位教授发明一种抗癌药剂“KP”。这种药剂的效用至今还引起专家的争论。他们的专题论文《癌肿的生物治疗》曾在1946年医学科学院的通报上发表过。是年医科院的秘书帕林访美，就将他们的原稿作为科学情报方式转交美国出版商。斯大林深信“KP”很有价值，便认为此举是出卖国家机密。将帕林判以间谍罪坐牢25年。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还有被撤职的卫生部长米捷廖夫均受“荣誉法庭”审判，由此全国掀起了批判世界主义者运动。20大后，他们都已彻底平反。——原注

1947年春天，健康的种子当然也还是有的。所有这些健康的成分在社会中都曾实际地存在并且表现出来过，然而由此而引起的精神上的危机也并非随心捏造。显然，问题不在于放弃同类似的现象作思想斗争，其中包括国文学这种思想工具作斗争，而在于怎样进行这场斗争——用适合于斗争和对斗争有益的方法（说实话，这种方法对崇高的社会目的会有好处），还是用粗野的、可耻的和恐吓的方法，但这种方法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可是，用这种方法进行斗争后来都已司空见惯了。

法捷耶夫开始读斯大林送给他的信。斯大林在此之前，在开始谈话的时候，站着比坐着的时间多，或者在他的椅子后边前后走动几步。当法捷耶夫开始读信的时候，斯大林继续在走，但已经不是在那里，而是沿着我们这边的桌子来回走动，不时看一看我们。虽然过去了许多年，但我还非常清楚地记得我那时没记下来的我的感觉。为了不背对着来回走动的斯大林，法捷耶夫本能地转过半身来对着他，继续读信，于是我和戈尔巴托夫也转过身来。斯大林走着，听着，很留心地看着法捷耶夫读信，脸上表情严肃，甚至有点紧张。他听着，看法捷耶夫用什么语调读它。他想知道，法捷耶夫在读这封信时有什么感想，我们在听他读时又有什么体会。他一边走，一边看看我们，注意读信给我们产生的印象。

在这次会晤开始之前，我感到自己是另外一个人，在以斯大林为转移的和由他创造的那种气氛中，我感到相当自由。但现在我却感到紧张和不舒服了。他这样看着我们和这样听着法捷耶夫读信，使人觉得在这后边有什么危险的东西，这

不仅是指一般而言，而且是包括我们在坐的3个人在内。显然，他在检验我们，检验这一类人的几个头面人物——一个知名的人士和两个知名的作家，看看这封信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的身上有什么反应，因为在这封有关克柳耶娃和罗斯金的信中他口授的也是关于两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他口授还是他亲自写的，这都完全有可能。不管怎样，这封信是根据他的要求而写的，不会根据别的什么人。

当法捷耶夫最后把信念完的时候，斯大林相信所念的内容已对我们产生了影响——实际也是如此。看来，他认为无需再问我们对所读的信有什么意见了。

现在，过了若干年，我一想到这一刻的时候，还是感谢他没来问我们。

我在1947年5月14日所写的笔记可以作证，当信一念完，斯大林只重复他开始讲的那些话：

“要消灭自卑感。”接着他补充说：“要写这种题材的作品，写长篇小说。”

我说，这对写剧本也是最好的题材。

在进一步引用我的旧笔记之前，我要中断一下上面所写的当时的情况。我补充一点，我当时说出这句话是完全无意的，只不过是一种职业的想法。这种想法的确向我提示，讲到这个题材，写剧本要比写书更好。那时候我完全没有考虑自己，也没有想到自己是个戏剧家；我当时已把中篇小说《祖国炊烟》写了一半，没有想也不可能想任何其它的事情。我只认为，我把这本书写完，就是一个作家完成自己的最直接的党的任务。也许，正是由于忘记了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

可能性，所以我就突然说出了这句该死的话：“对写剧本也是最好的题材。”我当时一点也没有估计到，这句话以后会给我带来非常困难的问题，何况斯大林看来一点也没留意我这句话。

现在我回到那天写的笔记：

“必须把这些人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象这里所写的，”斯大林说，向放在桌子上的文件点一点头，“同普通的战士、士兵、普通的人民的态度对比一下。这种病症是存在的，它已流行很久了，从彼得大帝时代起就有，直到现在还留在人们中间。”

“存在是新的，可意识是旧的。”日丹诺夫说。

“意识，”斯大林冷笑一下，“它总是落后的。意识总是姗姗来迟。”他又转回到那个他已开始谈的事情，“必须写这类的题材。”

后来他又转到我不能在这里写下的一个问题……

在这里，我要把那句当时写下来的半截话讲一讲是什么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我们3个人来说是完全出乎意外的。自然，过了这许多年，要求把当时说过、但没有记下来的话逐字逐句地讲出来，那是荒谬的。但是，我后来曾多次想到这件事，特别是在我担任《文学报》的主编时，根据内心的、也根据职务的需要，心里经常重温那时的谈话，因此它就比其它的许多事情更牢牢地扎在脑子里。实际上，这不是什么谈话，而是斯大林的半个钟头的独白。开始是这样说的：“我们

在这里想”，——据我回忆，正如我当时所记下来的那样，斯大林一般都很少说“我”，而比较喜欢说“我们”。

“我们在这里想，”他说，“作协要是能出版一份与现在所出的完全不同的《文学报》就好了。作协要是能够用自己的力量出版一份这样的《文学报》就好，它不仅是文学的，同时又是政治的、大型的、群众性的报纸。作协要是能够出版这样的报纸就好了，它比其他的报纸更尖锐。它既提出国际生活的问题，如果必要，也提出国内的生活问题。我们所有的报纸，不管怎样都是官方的报纸，而《文学报》，这是作协的报纸，它可以提出非官方的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官方不能或不想提的问题。《文学报》作为一份非官方的报纸也许在某些问题上比我们更尖锐，更左，它可以在提问题的尖锐方面与官方表现出来的观点不同。我们有时会为此而批评《文学报》，这完全有可能，但它不应害怕这一点，它应该不管批评，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我清楚记得，斯大林讲到这句话时微微一笑。

“你们应当明白，我们不总是能够用官方的腔调说出我们想说的事情，这在政治上是常有的事。而《文学报》应该在这方面帮助我们。总之，它不应该过于害怕，过于瞻前顾后，不应当把自己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都拿去征求外交部的意见，外交部不应当看这些文章，外交部只做自己的事情，《文学报》也只做自己的工作。现在你们的报纸发行多少份？”

法捷耶夫回答说，报纸发行 5 万份左右。

“要把发行量提高到 10 倍。你们一个月出几次报纸？”

“4 次，每周 1 次。”法捷耶夫回答。

“新的《文学报》应该每周出两次，以便一周不是读一次，而是读两次，这样就会多 10 倍人来读它。你们看怎样，你们作协能不能出这样的报纸？”

我们回答说大概可以。

“那什么时候你们能开始做这个工作呢？”

我不记得，我们当中哪一个，说不定是我，想起曾仓猝接编一份杂志的复杂情况，就回答说，出版一份这样完全新的报纸，大概要有好几个月准备才行。看来，它可以从 9 月 1 日，从秋天开始出版。

“对，”斯大林说，“自然，需要准备，不要太匆忙。你们为出版这样的报纸需要的东西，你们都可以申请，而我们应该给你们帮助。我们还想，你们开始出版报纸并能对付得了的时候，我们大概会向你们建议，你们要在《文学报》领导下创办一个自己的、非官方的通讯社，以便收发非官方的消息报道。”

斯大林的独白大概是如此，正如那时我所记载的那样，约莫有半个钟头。

我现在记下来的文字，朗读起来，大致只要 10 分钟，但我并不认为，我那时写的“半个钟头”是搞错了。斯大林象往常一样，讲起话来不慌不忙，有时重复已经说过的话，停下来，默不作声，慢慢地走来走去在想什么。看来，他对这个问题早已深思熟虑过了，只是某些详细情节，某些变动是在谈话时才想起来的。比如，我觉得，创办通讯社的念头是忽然想起来的，正是在他长久停顿之后，在这个时间里，他反复思考这个问题，他对这个想法感到满意，就高兴地把它

说出来了。

总之，我觉得，创办另一份新的《文学报》以及一个非官方的通讯社的想法，他本人很喜欢，所以他谈到这个问题时是很愉快的。他也喜欢我们喜欢他这个想法。我觉得他想引导我们更大胆和更自由地去解决与这份未来的报纸有关的一切问题。

在结束自己有关《文学报》的谈话时，斯大林说，看来，我们要为新的报纸考虑考虑，它的新人，新工作人员，新编辑部，也许，还有新的主编都得考虑。不过，这一切都要我们自己去想，这已经是我们的事情了。

就这样，不是按通常的惯例由作协出主意，而是按斯大林的意志，几个月后就开始出版与先前完全不同的《文学报》了。说实话，那时还没有自己的非官方的通讯社。1947年5月13日那天开始想到要创办的新闻通讯社，过了若干年，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才办起来。

现在我又转回到 1947 年的笔记上：

《文学报》的问题一解决，斯大林就顺口问我们一句：

“看来，就这些问题了吧？”

我说：

“斯大林同志，能允许我提个问题吗？”

“请吧，两个问题也可以。”斯大林说。

我说，我编杂志已有半年，在安排社会问题的稿件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要把一个杂志办成不仅是文学艺术的，而且是社会政治的，我就感到篇幅不够。因为如

果我们，比方说，在一期内发表一部中篇小说，那么在杂志的篇幅只有 12 个印张的情况下，我们又想把这部小说给读者一下子看完，这样 12 个印张的纸只够它用。还有几首诗，一两篇评论文章和书刊评介。为此就不得不放弃一些特写，一些有趣的科学稿件，可又想把杂志的知识面办得更宽一点。

我开始讲话时，竟忘记了说我在编什么杂志，于是日丹诺夫认为需要介绍我是《新世界》杂志的主编。

“是这样，”斯大林说，“你们这种杂志的稿件不够，那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我看，一些编辑都有一个同我们相反的倾向——出双月刊。无论是《旗》、《十月》还是《新世界》都出双月刊。”

我回答说，我们《新世界》今年一次也没有出过双月刊，我不打算把它出双月刊，我有稿件。而且，要是想到外省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他不可能订阅 3、4 份杂志，只订 1 份，那么，我就希望他能收到一本有多方面知识的杂志，以便读到这样的一本杂志时能够更全面地提高他的文化水平。对此我还补充说，在开始编杂志的时候，我曾看过许多期的《现代人》杂志，我相信那里所提出的问题确是广泛和多种多样。

斯大林说：

“这是对的。您瞧，比如《当今世界》杂志，《世界月刊》（日丹诺夫说，开始叫《世界月刊》，后来叫《当今世界》）提出的科学问题就非常广泛，这自然使读者很感兴趣。说实话，那时还没有象《知识就是力量》、《青

年技术》以及其他的科学杂志。”

到此我要中断当时所写的笔记。现在我说，在我举出《现代人》杂志为例之后，斯大林忽然说出不仅《当今世界》，而且还有《世界》月刊的名字。我顿时想，是不是我听错了，把《世界》月刊的名字同斯大林自己提到《现代人》杂志混在一起，我觉得十分奇怪。只有第二天或隔了一天，在列宁图书馆的帮助下，我才看到全套《世界》月刊，此时我才从惊讶的感觉中清醒过来。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想起来，《世界》月刊是波格丹诺维奇主编的，他是本世纪初最左和最进步的俄国编辑之一。这份杂志所提供的科学题目相当广泛，而从一般倾向的观点上看，这份杂志又进行合法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由此它的刊名《世界》就成了一个合适和便于工作的招牌，所以斯大林就想起了这份杂志，随之日丹诺夫也想起了它。

现在我回到当时的笔记上来：

“如果我们给您扩大篇幅，您能保证有稿源？”斯大林又问。

我说，我们不是不会犯错的人；以前一期只有12个印张的时候，我们也犯过错误，就是在将来，错误和失算也有可能犯。但我认为，稿件是足够的，为了把18个

安·伊·波格丹诺维奇（1860—1907），俄国政治家、评论家、民粹派分子，后为“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894年起担任《世界》杂志主编。

印张的篇幅的杂志办得完全合乎要求，我将付出全部精力。不管将来能否做到把这样篇幅的杂志办得完全合乎要求，我请求让我去试一试。如果在 1947 年下半年我能够对付得了，那么可以提出这样篇幅的杂志进一步的出路问题，如果我对付不了，那么它的篇幅永远可以缩小，再使它回到今天这个样子。

“是的，”斯大林说，“杂志变得好多了，就是《星》也发表了一些有趣的文章，常比《布尔什维克》杂志更有趣，有哲学的文章，也有科学的。《星》和《新世界》都显然有进步了。但你们总不能将来也是这样没有稿子吧？”斯大林第三次坚持说。

我再说一遍我将付出全部精力。

“那好吧。要给您篇幅，要试一试。”斯大林说，“不过，如果给了您，那么其它的杂志就会起哄，这怎么办呢？”

我请求先从我们，从《新世界》杂志开始试一试，那将可以看到我们的经验。

法捷耶夫支持我的意见，他说，从一份杂志上试一试，真的到年底就可以看得清楚。

“好，”斯大林同意说，“就这么办。我们就扩大《新世界》的篇幅，您要多少个印张？”

我重复我已经说过的——18 个印张。

“我们给 17 个印张。”斯大林说。

我说，根据杂志将要成立科学和国际部，那么我们就需要扩大编制，我需要两个部的主任。

斯大林微笑着说：

“好吧，这也给提到委员会去。”

日丹诺夫说，他那里有我的杂志工作人员工资的申报表。

“我们不惜花钱。”斯大林说，接着再次重复：“我们不惜花钱。”

我解释，我们的一个部主任只领 1200 卢布工资（自然是指当时的钱——作者注）。

“这个问题也在委员会里解决。”

此后，法捷耶夫开始谈到一个家境特别困难的作家。

“应该帮助他。”斯大林说，接着再次重复：“应该帮助他。给他一些钱。不过您可以聘用他，给他发表东西，付稿酬，为什么要施舍呢？给他发表东西——付稿酬。”

日丹诺夫说，他前不久收到一位作家的一封充满感情的信。斯大林冷笑了一下。

“日丹诺夫同志，别相信那些充满感情的信件。”

大家都笑了起来。

“以后，当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的时候，这个地方我还是要补充的。”——我当时的笔记就写着这样的一句话。当一切都将成为过去的时候，我打算要补充什么呢？要补充的就是：在斯大林对我这个《新世界》杂志主编的所有提议都作了肯定答复之后，在他还回答了法捷耶夫关于那位作家（他的名字我当时显然出于分寸感而没有记下来，而现在又忘记了）的情况之后，“给他发表东西并付给稿酬。”——这句话使我突

然决定（在这之前虽然萦绕在脑际但还下不了决心）去谈谈左琴科的事情，谈谈他根据游击队员的叙述而写成的《游击队员故事》一书，说我已挑选了一部分这些短篇小说，想把它们发表在《新世界》上，并请求予以允许。

“您读过左琴科的这些小说吗？”斯大林转身问日丹诺夫。

“不，”日丹诺夫说，“没有读过。”

“那您读过吗？”斯大林转身问我。

“我读过，”我说，说明左琴科的这些小说共有20篇左右，但我只挑选其中我认为最好的10篇。

“那么说，您作为主编已认为这是好小说了？认为可以发表它们了？”

我回答说是的。

“啊，既然您作为主编认为要发表它们，那您就发表吧，等您发表出来我们就来读一读。”

过了这许多年，我现在想，斯大林最后这句话含有一种他所独具的、半隐半现的、对他的谈话者来说不无危险的幽默口吻。当然，我不能保证这一点。这是我今天的猜想，那时我没有想过，因为我太激动了——首先，我自己下了决心谈左琴科的问题；其次，日丹诺夫让我出乎意料，我以为他读过那些小说，可是他说，他没读过它们；最后，斯大林允许发表这些小说了。

自然，一切都有可能，而且也会与我当时想的有些不同，也应该允许有这种可能：虽然日丹诺夫已读过那些小说，但他不想同我谈起它们，他知道或者推测到，很快就会在斯大林那里举行作家的会晤，其中也有我。我想可能是在这次会

晤之前，当日丹诺夫从我手里收到左琴科的小说时，他猜想不到我会下决心来谈这些小说；或者他早已读过它们，也先同斯大林商谈过这个问题，所以他回答说，他没有读过这些小说，以便看看我怎样在斯大林那里说出自己的意见。这是我今天对日丹诺夫的思考的一个过程。但也可能不是这样，可能没有预先读过什么，斯大林也不相信或者不完全相信日丹诺夫没有读过这些小说，所以他最后那句暗藏着讥讽的话大概不是对我而言。

我现在只有把 1947 年所写的笔记引用完，作点唯一的补充——把我当时漏记的姓名还原。

最后的一部分笔记如下：

“你们对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这位作家有什么意见？”斯大林在谈话结束时问：“在你们作家内部的意见怎样？他们对她最近的一部小说怎样看？”

“不大好。”法捷耶夫回答。

“为什么？”斯大林问。

“大家认为这部小说写得不好。”

“总的说来在你们圈子里怎样评价她这位作家？”

“一般的作家。”法捷耶夫说。

“什么一般作家？”斯大林反问。

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1905—1964），苏籍波兰女作家。她的中篇小说《虹》、《只不过是爱情》等均有中译本。这里指的可能是她的《何时灯才会亮》。

“就是一般的作家。”法捷耶夫重复说。

斯大林看一看他，沉默无言。我觉得，这个评价有点使他生气了。但外表上他一点也不流露出来，也不进行反驳，他问我们是否还有问题，我们回答说没有。

“好，就这样。”

斯大林站起来。随之日丹诺夫和莫洛托夫也站起来。

“再见！”斯大林向我们作了一个表示致意的手势，这个手势我头一回看到。许多年前，当我第一次在游行时走过红场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他的半致意、半挥动的手势。

斯大林昨天穿着一件灰色的直领制服，一条灰色的散腿裤子。制服很宽，后边有条扣带。斯大林的脸庞现在已相当消瘦了。谈话的大部分时间他都站着或者在桌子跟前来回走动几步。他吸着一只弯曲的烟斗。但他很少抽。点燃它，吸了一口，然后过几分钟又点燃它，又吸一口，烟斗又熄了，但他几乎总是拿着它。有时他走到自己的椅子跟前，两只大拇指放在椅背上，用其他的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椅子。谈话时他常常微笑，但一讲到他感兴趣的主要问题——关于爱国主义，卑躬屈节等，他的面孔就变得严肃，而且他讲到这些问题时声音里带点苦恼。在他通常平静的说话声里，有两三次显出激动的语气。

我在 1947 年 5 月 14 日所做的笔记就以这些话结束。这是记载着我生平第一次同斯大林会面的情形，说得更准确些，

是记载我能有机会参加的同斯大林第一次的会见；据我的回忆，这次会见延续了将近3个小时。可能在我的笔记中，在我对它所作的某些细节的补充中，由于记忆不全而有所遗漏，但是，我绝没有有意地漏过什么，正如我现在所觉得的那样，我没有什么忘掉没记的。

1979年3月9日

我们同斯大林会见后隔了几天，日丹诺夫的助手库兹涅佐夫给我来电话说，我可以到他那儿去看看材料，这些材料对我的工作可能有用。

我到了库兹涅佐夫那里，他就给我一个夹着各种文件的卷宗，并说，这是安德烈·阿历山德罗维奇要他给我看的。在到那边去的时候，我就模糊地推测，他说的可能是那一回事。到了那边，我便相信，我的猜测果然不差。这些材料不多，我在库兹涅佐夫的办公室里坐下来只花三四十分钟就全都看完了。我表示感谢，把材料归还给他。看来，库兹涅佐夫有点惊奇，我怎么这样快就读完了呢。当我站起来，他就问：

“那么，我能不能向安德烈·阿历山德罗维奇说，您已经看过了这些材料？”

我回答说可以，再感谢他一声后便回家去了。

这些材料简直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因为它们主要的不是加深我对克柳耶娃和罗斯金这一案件的认识，而是补充说明如斯大林所说的要消灭自卑感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不

是那么幼稚无知，竟不明白要看这些补充文件的意义。显然，我那时讲的“这对写剧本也是很好的题材”这句话已使人想到我在写这个题材的剧本了。但事实上我一点也没有这个打算，这样理解我那个纯粹是职业上的意见就使我困惑不安。我觉得，要写这个题材的剧本我基本上也能写，但不是现在，现在我要写中篇小说《祖国炊烟》。我已经决定尽可能用它来表达真正的苏联爱国主义的问题，把它同表面上的、发了酵的、自吹自擂的、只要是外国的就一律反感的所谓爱国主义相对比。斯大林关于消灭自卑感的话之所以特别合我的心意，正是因为它同我在小说中所写的东西相近。我要去着手描写的人物也就是那些在整个战后美国的强大和幸福面前，不为自己的国家贫穷、灾难深重和极端痛苦而气馁的人们。

我已热衷于这项工作，而且我写它还有个个人饱经忧患的素材，所以我不想半途而废，去另写一个剧本。这剧本的题材在某些方面固然合我的心意——写卑躬屈节的危害与精神上的颓丧，但它对我还是一个非常疏远的和目前完全陌生的题材。

我明白我已陷于含糊不清的境地。我为那句不够慎重的插话而责备自己了，但我稍感安慰的是，以后我会写出剧本来。不过最后我还是深信，一切都会应付过去的。我没有接受直接的任务，也没有承担直接的义务。我对这一切应该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把自己的中篇小说一直写完，在那儿将来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一决定对我这个作家来说显然是正确的和唯一可行的。尽管这个决定后来使我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但我还是不为此而后悔。

那年夏末，我写完了《祖国炊烟》，它用于杂志上的第一个文本占有 11 个多印张。关于他们给我看的那些材料，谁也没有再提起了。我觉得，直接与克柳耶娃和罗斯金案件有关的这个题目，一切都已应付过去了。可是把这些材料让我看的那个地方却相反。后来知道，他们以为我正在写这个剧本哩。

《新世界》9 月号顺利地发表了左琴科的 10 篇小说，并附有前言。而在 11 月号则刊登了我的中篇小说。这个中篇我本人很喜欢。也许，我过去不曾而今后也不会对自己的任何一部作品有这样偏爱和不作自我批评的。我真的感到，虽然我是《新世界》的主编，但我不怕把这样的中篇小说发表在它的篇幅上，以迎接苏维埃政权建立 30 周年。

根据这部小说的题材，根据其内在的、主观的、精神上的教育作用，这也许并不是那样不可信赖的。然而这部小说在当时发表的形式，它还是非常不成熟，有许多地方过于罗嗦，不够紧凑。7 年后，当准备将它出单行本的时候，这一切我都很清楚了。我一点也没有改变它的精神和倾向，没有改动它的情节，不费特别的工夫就把它压缩了，象泼掉多余的水一样，差不多从 11 个印张中减少了 4 个印张。但是，在 1947 年 9 月，我觉得，我犯了一个错误。在作协讨论这部中篇小说的时候，法捷耶夫，费定，爱伦堡，虽然各人的趣味不同，但都喜欢我这部小说的精神。他们 3 个都不留意它的疏漏之处，慷慨地夸奖了我这部小说的主要东西，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我的错误。

至于我，我是为自己所写的东西感到幸福的。我觉得，我

已把人民崇高的精神境界以及精神力量都表现出来了。他们从战争的灰烬中，把已被彻底破坏的、灾难深重的斯摩棱辛纳重建起来，并把这一切与美国因其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而自满的心情相对照。因此我认为在长期出国旅行回来并立即到斯摩棱辛纳去之后，我已完成了党交给自己的一个重要的任务。这个重要的任务不是指我当时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的《俄罗斯问题》，因为它毕竟不是写我们，而是写美国人的；所指的是我的《祖国炊烟》，因为它写的是我们，写我们充满艰难、困苦而又自豪的战后初期的生活。我就是怀着这个意识等到了杂志的出版，同时也等到了一个决非可爱的日子（现在我已不记得它的日期，要想知道就得翻阅 1947 年《文化与生活》的合订本）。当时在《文化与生活》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我心爱的《祖国炊烟》的文章，标题是《违反生活真实》，这个标题说明了它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这篇文章非常恶毒，非常难以理解，而且许多地方简直摸不透它的用词的最基本的涵义。后来，一个当时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接着又有《文学报》的一个战友，现在已故的波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留里科夫把这篇文章的出笼情况告诉了我。留里科夫喜欢我这部小说。日丹诺夫也喜欢这部小说。当时，他曾打听过宣传部的机关报《文化与生活》里有谁愿意根据其精神和指示在报上写一篇评论《祖国炊烟》的文章。留里科夫自告奋勇写了这篇文章。文章已经付排了，忽然一切都翻了过来。日丹诺夫从斯大林那里回来，就把留里

科夫的文章撤下。日丹诺夫叫了另一个作者来，要他立刻写另一篇文章来代替它，此人听了相应的指示之后，便火烧火燎地在延误的一期报纸上写出了那篇我翌日读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的文章。为什么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因为我明白，正如在同一天、同一版的报纸上批判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一样，发表对我的《祖国炊烟》的毁灭性的批判文章，只是因为斯大林极其不喜欢这部小说而已。我没有寻找其它解释，我这样做对了。我之所以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还因为我深信，这部小说恰恰是现在人们所需要的，它增强人们对自己的力量的信心，增强他们在战后我们处境困难时期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我总觉得，斯大林绝不会不喜欢这部小说。但是，结果完全相反。

我把这篇文章反复读了好几遍，它的某些段落对我来说依然是不可理解的，就象一只弄坏了的电话机一样。我忽然想到，斯大林可能对这部小说讲过一些不怀好意的、恼怒的话，——他会讲过，特别是当他慢慢地走来走去，不太关心人们是否能听清楚他的话的时候。这是我们同斯大林谈话后都有的一种感觉，何况在那次3个钟头的谈话中，我们都竭力不想漏过他讲的每一句话，因而紧张得十分疲劳，难免有所听漏。他讲话时，有时走近，有时走远，有时大声，有时小声，有时把背几乎对着听者，还没转过身来就开始或结束自己的讲话。所出我想，他用某种措词表达自己的不满时，其中有一部分是可以听清楚的，有一部分则听不清楚。他表示不满，但具体指什么，不是全都能听清楚的，而要再问他，显然又不可能。

日丹诺夫从斯大林那里回来，向文章的作者传达了斯大林讲过的话。看来，他把他听到的话都说了，但是他听到的显然不是全部。唉，以后这只被弄坏了的电话讲些什么就全凭文章作者的良心了。他不能漏掉一句对他说过话以及他所记起来的东西，不过，他也不能把这一切做得很彻底和很严整。约莫过了一周，我想，我的小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谴责我，说其中的人物只说不做。整本小说只讲我的一个主人公第一天回到故乡的情况，只讲他同亲人第一天会面的情况，其余的都是关于战争和美国的片断回忆。他在家这一天能干什么呢？我竭力想弄明白，斯大林究竟不满意什么。我一点也不对这篇文章和它的作者生气——反正你错了，撞到一把椅子上，你能对椅子生气吗？我很伤心，也想弄明白，我写的毕竟不是这样的东西啊！为什么他们要我去写别的东西，而不让我这个共产党员，一个相信自己有理，同时又不能也不希望心中对斯大林的正确性产生怀疑的人去做他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呢？在小说中谈到的那些思想和政治问题，对我来说，斯大林是有最高权威的。

一周以后，我请求日丹诺夫接见我。一见到他，我就直截了当地说，我反复读了那篇显然对我提出正确批评的文章，但它许多地方怎么也弄不明白，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这部小说会是违反生活真实的？更重要的是，我不能理解，为了使这部小说不违反生活真实，我需要进一步对它做些什么？我一点也不掩饰自己的惊惶失措，也不掩饰自己的伤心和懵懂的程度。

日丹诺夫差不多花了个把钟头试图耐心地向我解释，说

我的小说并非如此。他讲的依然是刊登在《文化与生活》上那篇文章的范围，不过他用自己的话来讲——用比那篇文章所写的更聪明、更委婉和更知识分子气的话来讲。但是，他越向我解释，我就越加明显地产生一种感觉，觉得他连自己都不知道怎样向我解释那篇文章所写的东西。而且我还觉得，他象我一样，既不明白为什么我的小说就象文章中所提到的那样坏，也不明白以后对它怎么修改。以前我见到的日丹诺夫是个既严厉又容易发怒的人，当然，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这一次我来见他，也完全准备会听到他的一次严厉的谈话。可是相反，他却很有耐性，怀着好意。使我惊奇的是：他心里也不相信他对我讲的话，因而前言不对后语，乱了方寸。所以我不知道，他本人是不是也喜欢我的小说，是不是被迫要对我说与他原来对它的理解完全相反的意见。我不知道，但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感到有什么一件东西使我惊奇。

我感谢这番谈话，走了出来，没有从这次谈话中得到任何新的东西，也不明白，在这部小说中有什么地方不对头，而且也不知道应该拿它怎么办。

还有一个时期我想过修改这部小说，考虑过如何修改它，甚至为防止将来无疑会对这方面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把多少能引起各种批评意见的地方，不管怎样，要比这篇文章所提到的更多的地方明白地表示出来。我要考虑这些批评的意见，不过实际上我已无法更多地去考虑它们了。所以我下定决心，向自己保证至少在5年内不看这部小说一眼，不为此而苦恼，并且我给将要出版它的出版社去了一封信，请求他们同我解除合同，因为我不想再出版《祖国炊烟》了。

同日丹诺夫谈话后过了一些时，他的助手库兹涅佐夫请我到 he 那里去，问我那个剧本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问我同斯大林会晤之后今春为写这个剧本给我看的那些材料怎么样。除了让我看过的材料之外，我是否还需要什么帮助。

在这之前，我已被《祖国炊烟》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这在当时也是令人震惊的）所发生的事弄得晕头转向了。根本没有想到把我已发表的《祖国炊烟》同未开始写的那个剧本联系起来。只有在这个时候，坐在库兹涅佐夫身边，我才明白，这种联系大概是存在的。除了其它一切之外，他们期待我的并不是这部小说，而是那个剧本。从我们见斯大林那天开始，写这个剧本就算是我的任务了。在《祖国炊烟》之后，我的情绪很坏，很沉重，没有比这更糟的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已经自知，要使我心情平静和振作起来的唯一办法只有工作，越快越好。于是我突然不加思索地对库兹涅佐夫说，我要写这个剧本，最近这几天就着手写它；我需要帮助，需要一个严肃的顾问——一个能帮助我了解某些微生物学问题的学者，因为这个剧本的情节将与这些问题有关。

简单地说，第二天我就来到卫生部长叶菲姆·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那里，隔了两天，我又同科学院院士兹德罗德夫斯基会面。在我写作《异邦暗影》一剧时，他也成了我的顾问。

巴·费·兹德罗德夫斯基（1890—1976），苏联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流行病学家。

医学科学院院士巴维尔·费里克索维奇·兹德罗多夫斯基教授是我们老一辈最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之一。他对科学和人类所建树的功绩，有一项是发明抗肠伤寒疫苗。使用这种疫苗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及其后都曾起过重大的作用。自然，兹德罗多夫斯基对我所写的剧本没有丝毫责任，这个剧本的构思完全与他无关。我向他请教的东西完全是另一码事。我刚开始考虑这个剧本时，就生了这样的念头：剧本中一个主要人物，就其主观来说是绝对忠诚的，不过他同时虚荣心重，爱把自己的科学成就名闻国外看作是了不起的一件事。他研究微生物学的问题，这是一个福祸难测的问题：一方面，它会造福人类，这是他常提到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可能被用于危害人类的目的。正因为他没有估计到这一点，所以就把自己的发明资料送到国外去了。他简直没有想到，他的发明有可能被这样利用。

这个构思完全是抽象的，它并不是因为知道或了解某些微生物学的问题而产生的，只不过我想写这个剧本时不谈什么无赖或叛徒，而谈一个在主观上是诚实的人，他只受到我们统称为崇洋媚外的思想影响，出乎意外地把自己放到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潜在叛徒的地位上。整个抽象的构思看来就是如此。我把这个构思讲给兹德罗多夫斯基听，目的是想向他探明在微生物这一学科中，在它的某些部门里，实际上能否形成这种研究问题的过程，在这样的条件下，这门科学在不同的解决方法中能否既给人类带来幸福，也给人类带来祸患。

经过几天思考和两三次谈话之后，兹德罗多夫斯基从纯

粹科学的观点出发给我指出了那个实际可能的原理，根据这个原理我基本上可以写出这个剧本。

我为自己探明了纯属理论的问题之后过了几天，就开始到萨拉托夫微生物学学院去。这所学院早已从事制造和完善抗兔热病和黑死病的疫苗的工作。我到那边去已经不是为了讨论我准备在剧本中提出的问题，而是为了多少能了解一下那里人们的生活，那里科学研究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定然会有我所构思的剧本的情节。自然，在考虑到这个剧本的题材时，我也不打算在这里寻找什么原型或者为剧本作些直接的观察。我只想体验一下这样的科学机关的气氛，这种气氛在剧本上定然会讲到的。

这次出访看来是挺有意思的。我在学院那边会见了几位非常好的人。他们讲到自己有时带有危险的、戏剧性的工作时，情真意切，足以构成一部描写我们科学界的真人真事的剧本，而不是写成那种坏的、使我感到伤心的难忘之作，其结果就象我在 1948 年初所写的那个剧本《异邦暗影》一样。我写它并无坏的意图，但我写它是痛苦的，勉强的，迫着自己相信我所做的事情很有必要。而特别感到痛苦的是因为斯大林谈到必须消灭本身的自卑感这个确实存在的真理种子，在我自由而竭诚地写下的那部中篇小说《祖国炊烟》里就已经完全有了。那部小说虽然有些地方显得拙劣，但我是绝对真诚和无拘无束地写它的。那颗真理种子是由我人工地硬栽到《异邦暗影》中来的，用人工创造的环境培植它，结果那颗种子就被杂草压死了，以至今天我只有用最大的压力强迫自己去读完这部使我这个作家感到可耻的应景之作。这样的

一个剧本，不管当时情况怎样，我是不应该写的，无论如何不应该写它，要是我能最后不把它写出来，那么它就具有反对这种自我强制的性质。可是现在，事隔 30 多年，我仍然为它没有获得这种性质而感到羞愧。1941 年写的《斯大林同志，你听见我们吗？》这一首诗，我丝毫不感到羞愧，因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纵然一个人的内心的声音，如果指这首诗的话，在那时有些地方是有意识的，有些地方则是盲目的，但它终归是发自内心的声音。而对于《异邦暗影》，那我只有感到羞愧。我丝毫不为当时写它吃尽苦头而怜悯自己。我活该！

我暂且不转过头去谈这个我感到不愉快的《异邦暗影》的题目。我往前讲下去，谈谈这个剧本以后的可悲的命运。

1948 年春，我写完这个剧本后，做了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我既没有把它拿去发表，也没有拿给剧院去上演。我把一份剧本的手稿送给日丹诺夫并写了一封短信给斯大林的助手波斯克列贝雪夫，说我已写完了剧本，写这个剧本的动机是去年 5 月斯大林同志接见作家时引起的，并说我已把它的一份手稿寄给了日丹诺夫。

我的行动就是这样。我违反了自己往来的习惯，没有把剧本送到其它任何地方，因为在同库兹涅佐夫谈话之后，我就知道，我写这个剧本是作为完成自己揽在身上的委托或任务（我不知道怎么说才接近我当时心里的话），所以，我所写的东西就应该送交委托我做的地方去。这个与我平日的习惯（写完了就送交编辑部）相反的行动的逻辑就是如此。还能往什么地方送呢？

这个剧本送交日丹诺夫时不知是在 1948 年 4 月还是 5 月。过了 8 个月，它杳无音信。我不想它了，也不愿想起它，而且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希望。日丹诺夫病了，接着死了。我再也不想这个剧本，早在夏天的时候我就在记忆中砍断了与它的一切联系。在作协和《新世界》的全部业余时间都用于写我的一部新诗集《友与敌》。我写这部诗集跟写《祖国炊烟》时一样或者几乎一样地着迷。越往后写，就越加觉得我已甩开这个剧本了。我仿佛是从《祖国炊烟》直跨到这部诗集来的。不再管它，不再管这部《异邦暗影》了。

但是，在 1949 年 1 月的一天，给我晚上坐下来为《新世界》开始工作的时候，《消息报》主编的助手突然进来（当时《新世界》就在《消息报》编辑部隔壁的厢房里），说波斯克列贝雪夫打电话给他们编辑部，要我立刻给斯大林同志挂个电话，并拿出我要打的电话号码。我本来拿起了电话筒，但想到这是专线电话机的号码，而在《新世界》又没有这种电话，于是我就跑到《消息报》去。《消息报》的主编不知是没上班还是出于礼貌走开了。我只有一个人面对着专线电话机，取下话筒，拨动号码——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斯大林是说的“斯大林”还是“是我”，两者必是其一。我道了一声问好，就说我是西蒙诺夫。

下面的谈话我回到《新世界》编辑部后就记下来了，当时有一段话我没有记，现在补上。我认为，我记下来的是绝对正确的。说得更准确些，这不是谈话，而只是斯大林读完了《异邦暗影》后认为有必要告诉我的事情。下面就是这个笔记：

我看了您的剧本《异邦暗影》，我的意见是：这个剧本写得很好，但有一个问题处理得不正确，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和改正。特鲁布尼科夫认为实验室是他的私有财产。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认为他们有权参加劳动的实验室是他们的财产。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实验室是人民的和政府的财产。而在您的剧本中政府没有任何活动，活动的只是一些科学工作人员。须知这个问题涉及到国家的重要机密。我认为，马凯耶夫到莫斯科去之后，钻营家奥库涅夫自杀之后，政府不能不干涉这个问题，可是在您的剧本中政府没有出来干涉。这是不对的。依我看，剧中的结尾部分应该让马凯耶夫从莫斯科回到实验室之后，在同全体人员以及同特鲁布尼科夫谈话时，要讲明他曾到过卫生部长那里，卫生部长已把问题向政府作了报告，政府责成他，尽管特鲁布尼科夫犯了许多错误，还是要留他在实验室里工作，并责成他向特鲁布尼科夫传达，尽管他曾做过那一些事情，但政府还是不怀疑他的正直，不怀疑他有能力把他已开始做的工作做完。所以，我认为，您需要把这里修改一下。具体如何做，这您自己知道。您修改了，剧本就可以发表。

均为《异邦暗影》中的人物。

均为《异邦暗影》中的人物。

均为《异邦暗影》中的人物。

我记得，这些话之后我没有记下“再见”这两个字，就是说谈话到此结束。

这个笔记的开头我当时没记下一段话是出于分寸感。因为谈话笔记什么都有可能发生，要是我忽然把它拿给谁看了呢，尽管在原则上我不会这样做，但毕竟还是有可能。而斯大林在谈话开始时，说了他看过了我的剧本之后，就相当气愤地补充说：

“只有昨天我才收到并且看完了，半年都不告诉我，这剧本就放在他们那里，总之……”他在这里停了下来，显然，他决定不继续谈这个问题，转而谈我所写的那个剧本。

我当时认为，现在也还认为，日丹诺夫或者出于他所知道的某些原因，或者出于我所不知道的某些情况（这些情况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看来已经复杂了），没有或者没有机会向斯大林说他已经收到了我送给他看的剧本，或者他认为这样做没有必要。大概，有人向斯大林报告了日丹诺夫身后留下来的档案文件和呈报了这些文件的清单之后，我的剧本就落到他的手里了。而我在电话里听到的那些气愤的话——我不知道，是对已故的日丹诺夫，还是对波斯克列贝雪夫而说的，此人虽已知道我的剧本，但也可能认为没有必要报告这个剧本已由我送来了。

我之所以写出这次谈话没有记载下来的部分，是因为其中可以评定斯大林性格的某些特点：这既表现在他认为没有及时向他报告与他直接有关的事情而大发雷霆上，也表现在他“昨天我才收到并且看完了”这句话里。我立刻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记下来并反复读了两三遍之后就明白：第一，在他

的谈话中不只是对剧本的意见，而且几乎是修改它的结尾部分的详细提纲；第二，正是这样，若不愿把这个剧本束之高阁，那我就得照他的意见办。

应该说，在当时严厉提出崇洋媚外的问题的情况下，我自己是不敢以斯大林所提的意见来结束这个剧本的。我的剧本的结局原来不同，剧中主人公特鲁布尼科夫教授的命运坏得多，他由于自己的虚荣心加上轻信，险些儿把国家的重要机密变成了那些完全不应该知道的人的财产。在落幕时他一发千钧，不知将如何了结。斯大林的建议显然反映了他当时的某些情绪，他所说的“政府”就是以第三者来暗指自己的，并以此来表明他对特鲁布尼科夫的态度，从而作出了一个温和的充满信任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在斯大林身上是很难有的，何况是有关这类的问题。

坦白说，剧本的结局如此改变是符合我的心意的，何况我早已有把剧中主人公的命运改得好一些的打算。现在既然斯大林亲自原谅剧中的特鲁布尼科夫，那岂不更好。可是，当问题涉及到现实生活时，斯大林讲起它来就无法容忍了。我甚至惊奇，斯大林的这个建议以及他的谈话都隐伏着对剧中所提到的那个问题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态度。这些极端措施越做下去，就越使我这一代的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的良知感到不安。

唉，差不多就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却得到了一个明显的证据，说明情况并非如此。不过，这一切我以后再说，现在只谈我那《异邦暗影》一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

我把剧本的结局按斯大林的意見作了修改，我再重复，这

些修改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我一天就把它逐字修改完了，赶上发表在《旗》的1月号上。后来，它同其它的剧本一起被推荐获得斯大林奖金（我已记不起是谁推荐的，是戏院委员会或者是杂志）。当时我不在，不知道此事。我径直来到作协秘书处，参加斯大林奖金评奖委员会会议之前的一个预备会议，讨论由各个文学团体推荐获斯大林奖金的文学作品。

在其它一些推荐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我的剧本的名字。与己无关则无论如何要谈这个题目。后来，我有时就下过决心，照例写过一些意见，比如说，对于长篇小说《战友》，我就请求撤销它，不予讨论。但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既不能说赞成自己的剧本，也不能说反对它，所以我只好一言不发。

然而，我的一些出席秘书处会议的同行人却相当严厉地批评这个剧本，主要的不是批评它的全部，而是批评它的结局，说这种结局是不对的，太软弱了，太自由主义了。照某些人的说法，它的结局甚至差不多是投降主义的。一些人说，特鲁布尼科夫一定要当着观众受到惩罚；另一些人则建议把它修改成我原先的样子——要在结局时使特鲁布尼科夫处于一发千钧的、将受到未来惩罚的危险境地。发言的人都坚决不同意政府原谅他，而且认为剧本的这种结局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它推荐获得斯大林奖金。我坐着，一言不发，感到自己和别人都完全处于糊涂的境地。关于我同斯大林就这个剧本问题在电话里的谈话，我一直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而且认为援引他的话对自己是不恰当的，甚至认为我没有这个权利。在把剧本送到杂志去发表和交给剧院去上演时，我只说，如果发生什么障碍，那就让他们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去，让他们

照中央所说的去办。但是没有发生任何障碍，也没有人向中央告发。困境只发生在秘书处会议这个时候。如果说一切事情都各有其名，那么这个困境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糊涂的。我坐着，默默地听着我的同行们怎样抨击斯大林在我的剧本的结局上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看来，他们都等我的反驳，但都没有等到。对我的沉默表示惊讶的法捷耶夫甚至问我：

“喏，你有什么意见？”我说，既然讲到我的剧本，那我大概不应该说什么，而且我也不会说什么。

事情就这样结束。在作协秘书处会议的那一个阶段上，这个剧本就不予讨论了。但以后的各个阶段，法捷耶夫作为斯大林奖金委员会的主席还是要面临这个问题。如果我不秘密地跟他一个人，即我们两个人私下谈谈这种情况的反常性，那么在我这方面是不对的和不体面的。所以就在那一天，过了几个钟头，我碰到他一个人的时候，就对他说了。法捷耶夫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忍不住地哈哈大笑，他久久地和尽情地哈哈大笑，随即，几乎没有一点停顿，变得完全严肃的样子。

“你为什么不早说，为什么要把我们大家弄到这种糊涂的地步？”

我相当有道理地回答说，第一，斯大林并没有委托我把这次电话里的谈话、剧本的结局、乃至一些尾白都是根据他的提议而一字不差地改写的情况告诉别人；第二，把这件事宣扬出去，哪怕是暗示一下，我觉得都是不体面的，甚至是非常不礼貌的；第三，我哪能预先知道，在秘书处的会议上，好几个人一下子就对这个结尾提出批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个，相反，我个人很喜欢这个结局，所以我觉得，别

人也会喜欢它。

“是呀，你把我们弄得一鼻子灰。”法捷耶夫又哈哈大笑起来，随即又变得严肃地说：“下一回你应该把这种事情哪怕只跟我一个人也得讲讲。而我呢，照样地只跟你一个人讲。”

我当时同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对我发狠的法捷耶夫的谈话到此结束。

莫斯科艺术剧院和列宁格勒的大剧院都上演了《异邦暗影》。尽管这个剧本有许多缺点——有些地方直爽得近乎粗野，虚情假意，在讨论科学和卑躬屈节时口是心非，而另一些地方则显出许多心理上的紧张，但是，利瓦诺夫 和博尔杜曼 都以其卓越的表演才华扮演了自己的角色，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列宁格勒大剧院的波利采伊马科 也可以这样说。

这个剧本和话剧在报刊上深受赞誉，它已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但这一切在那 1949 年发生的许多严重事件中对我来说已不是怎么愉快或者几乎是不愉快的事了。

现在，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我就回到约莫 1 年以前，大概是 1948 年 3 月 31 日那一天。这天是我第二次同斯大林会晤的日子。这次会面我已记了下来，虽不完全，且有遗漏。不

波·尼·利瓦诺夫 (1904—1972)，苏联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六次获苏联国家奖。

米·潘·博尔杜曼 (1898—?)，苏联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三次获苏联国家奖。

维·巴·波利采伊马科 (1906—1967)，苏联演员，苏联人民艺术家。获苏联国家奖。

过，在引用我的笔记之前，我还得把我出席的这次会议的情况讲上几句。这次会议是在1947年6月召开的，是在斯大林就文学问题接见我们之后两周。关于这次会议的笔记我已没有保留，显然，这是因为会议是在斯大林同我们谈话之后不久召开的，而且对这次谈话没有什么重要的补充。据我现在回忆，这次会议几乎没有谈到文学问题，无论如何，所谈的事情一点也不记得了。这次会议比我以前参加的其它会议更为官方化，人数更多，也许，时间也更短。在这次会议上同时讨论了科学技术奖和文学艺术奖。后来，它们永远单独讨论了。代表中央有关文学艺术方面的报告人是日丹诺夫，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是沃兹涅先斯基。

我对这次会议的一个回忆就是回忆沃兹涅先斯基。如果我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人就喜欢他，正如常言所说，一见钟情，那这是假话。这是另一回事：我之所以记得他，并不是因为我喜欢他，而是因为他有些地方使我吃惊。你看他说话那么不顾情面，那么随便，在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时，那么坚决而又果断地解释为什么要对科学技术评奖委员会的原先决定作出种种改变，他好几次坚持自己的观点——坚决而又不顾情面。总之，由于他在那里的举止言谈与别人所唱的调子完全不同而显得十分不和谐。这是我所记得的。

至于文学艺术，那我记得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表面上看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1903—1950)，苏联国务和党活动家。1946年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年起被选为政治局委员，1948年获苏联国家奖，1949年被撤职，1950年被枪决。

来是完全滑稽可笑的，但是，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那是双方的，两边都以某种恬不知耻的羽毛装饰着。开始讨论影片《海军上将纳希莫夫》了。当日丹诺夫作为委员会主席报告授予这部影片以一等奖并列举所有推荐这部影片获奖的人名时，斯大林问他，关于这部影片是否都说完了。我认为，斯大林问时可能早已知道，话并没有说完，而且早就想用将要讲的话来解闷了。

“不，没有说完。”日丹诺夫说。

“什么？”

“斯大林同志，这儿有一封信。”

“谁的？”

日丹诺夫讲出一个非常著名、非常好的演员的名字。

“他写什么？”

日丹诺夫说，他在信中说，如果因为他在这部获奖影片中扮演土耳其总督——一个我们的主要敌人，就不把他算作这部获奖影片的演员，那么这在政策上是不完全对的，如果不给他发奖，那么这会被认为是对一个在影片中扮演我们敌人的角色的不公正的评价，是力量对比的歪曲。

我不担保每一句话都记得准确，但是，日丹诺夫念这封信的意思大概就是如此。

斯大林冷笑一下，继续笑着问：

“日丹诺夫同志，他想获得奖金吗？”

“想，斯大林同志。”

“很想吗？”

“很想。”

“拼命要吗？”

“拼命要。”

“啊，既然这么想，这么要求，那就应该给人家发奖。”斯大林说，依然继续笑着。但忽然变得严肃起来，补充说：“那个演水兵柯斯卡的演员没有要求过奖金吧？”

“没有要求过，斯大林同志。”

“可是他也演得很好呀，只是不要求奖金。好，一个人不要求奖金，那我们就发给他，你们认为怎样？”

除了日丹诺夫转述那封申请书的陈述之外，后来我一字一句都记得，而且随时保证所讲的话一点不差，不过我不想在这里加以评述。

众所周知，过了两年多，沃兹涅先斯基由于所谓列宁格勒案件 而无缘无故地死了。既然我在这里提到了他，那么也许应该在这里引用一个（不是我的）有关沃兹涅先斯基的回忆。

在沃兹涅先斯基的举止引起我注意的那次会议之后 30 年，一个当时的部长——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科瓦廖夫同我住在一间医院里。我们来到两排栽下不久的、蔫了的小树之间。他回想起自己作为铁路运输部长时怎样护送斯大林在战后最初的一次旅行，这次旅行的时间算来大约就是我提

前列宁格勒州委兼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阿·库兹涅佐夫及其继任人波普科夫，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卡斯普京以及曾在列宁格勒生活和作过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等人被诬为反党集团，受牵连的有 200 多人，于 1949 年初先后被撤职、逮捕、处决。

过的那些年份。他从斯大林的口中听到了赞扬沃兹涅先斯基的话：

“这就是沃兹涅先斯基的优点与其他的主任不同的地方。”科瓦廖夫向我解释，斯大林有时讽刺地把一些对自己管辖的部的活动茫无所知的政治局委员称之为“主任”。“别的主任，如果他们之间有意见分歧，开始都竭力调和他们之间的分歧，然后在协同一致的形式下向我报告，甚至如果他们互相之间仍有不同意见，那还是要在文件上写上同意，以表示意见一致。可是沃兹涅先斯基，如果他不同意，他就不会在文件上写上同意。他到我这里来总是带着反对意见，带着不同的意见。他们明白，我不能无所不知。我留意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反对意见，我分析，为什么会产生反对意见，问题在哪里。可他们把这个瞒着我。他们一面表决，一面隐瞒，好让我提供传真。他们想把我变成传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意见要比他们的一致同意好。”

根据科瓦廖夫的回忆，斯大林这样谈论沃兹涅先斯基和他当时所喜欢的沃兹涅先斯基的工作作风，是在杀掉沃兹涅先斯基之前一年或两年的时候。

过了 30 年听到这番话实在太可怕了。

现在来谈谈那次会见，我是在 1948 年 4 月 1 日，就是会晤后的第二天，把它记下来的。这个笔记我当时做了一些评述，而我现在认为很有必要的一切补充，我将在引用当时的笔记和当时的评述之后写下来。

下面就是那篇笔记：

我想趁热打铁，把昨天，1948年3月31日，讨论斯大林奖金所引起的有关文学问题的谈话基本上记下来。

这一次被召来见斯大林的有法捷耶夫和各大型杂志的主编——潘菲洛夫、维什涅夫斯基、我和德鲁津。在讨论推荐获奖作品的过程中，斯大林开始讲到奖金的数量问题，——说这是一种形式，如果有值得获奖的作品多于规定的奖金数目，那么可以把奖金的数额增加。这在当时实际上已做了，其中包括制定过去没有的三等奖的前言。

斯大林几次重复自己的想法，认为形式的意见不应该具有决定性的。后来，在开会的时候（一般都是他带领讨论的），就完全明显地表现出他的意图——既扩大讨论作品的范围，也扩大被讨论的作家范围。如果有大量值得重视的作品，那就扩大给它们发奖。我想，大概由于扩大这个范围，所以就第一次约请所有巨型杂志的主编来参加这种会议。

在讨论一系列作品的时候，斯大林发表了对我们来说具有一般文学意义的意见。当讨论爱伦堡的《暴风雨》时，一个出席会议的人（代表中央文学艺术评奖委员会的报告人德·季·谢皮洛夫——作者注）在解释为

费·伊·潘菲洛夫（1896—1960），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和《为和平而斗争》等均有中译本。

瓦·帕·德鲁津（1903—），苏联俄罗斯评论家。写有专著《谢尔盖·叶赛宁》、《弗·柯切托夫的创作》等。

什么委员会建议改变下面评奖委员会的决定，不给这部长篇小说以一等奖，而给予二等奖时，说《暴风雨》这部长篇小说有一些缺点，而主要的缺点是把法国人描写得比俄国人好。

斯大林反驳说：

“难道真是这样？难道书中法国人写得比俄国人好？这是真的吗？”

这时他停下来，看看其他出席会议的人将要发表什么意见。所有发表的意见在别的方面都是互相不同的。然而在大多数的场合下，大家的意见都不谋而合，认为书中的俄国人被描写得很有力，当描写到法国人时，既表现了法国游击队员和共产党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表现了苏联的胜利对这些人的意识和他们的工作所起的作用。同时，在梅维季这个人物的形象中，也表现了一些在法国抵抗法西斯的队伍中阵亡的俄国人的积极作用。等大家发表了意见之后，斯大林总的来说都支持这些意见，他说：

“不，照我看，说爱伦堡在书中把法国人描写得比俄国人强，这是不对的。”他沉默一会儿，后来补充说：“也许，爱伦堡对法国了解得更清楚，这是可能的。自然，他也有一些缺点，他写得不够稳定，有时匆忙，但《暴风雨》却是一部伟大的作品。而人物，不管怎么说，他写的人物都是中间人物。有一些作家不表现大人物而表现中间人物，表现普通的人物。爱伦堡就属于这类作家。”斯大林又沉默一会儿，然后又补充说：“他在小说中很好

地表现一些有缺点的人物，一些小人物，有时甚至是一些坏人，他们在战争中了解到自己的使命，变了，变成不同的人了。这种写法很好。”

以下我的笔记有一个空白处，上面写着：“要加几句注解”。现在我再次回想起当时所加的注解，就把它写在下面：

这不是只照直说就可以了。对这次谈话中提到爱伦堡的那些缺点，我个人就觉得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在讨论这部长篇小说时，第一个起来发言的，只是我们报刊上早已讲过的评论的反映。这些评论指出爱伦堡这部长篇小说在描写苏联人方面的缺点时，是倾向美学和道德心理学方面的。讲到这些人被写得比法国人差，第一，是从他们怎样被描写的观点上出发的；第二，是从怎样描写他们心灵的扭曲，他们心理上的细微差别以及其精确程度等等的观点出发的。正因为从这个观点出发，所以一些评论家就作出结论说，爱伦堡这部长篇小说中的法国人被描写得强一些，而俄国人则写得弱一些。

斯大林（至少我是这样理解他的）对于这个问题则从另一个主要方面去看，认为小说中的苏联人写得真正地比法国人强。他们之所以比较强，是因为他们有保护他们的制度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他们的苏联教育的力量。从所有这些观点出发，他们在小说中就显得比法国人强。尽管《暴风雨》中有一些缺点，使这些缺点用一句简单的话就完全可以准确地表达出来：“也许，他对法

国了解得更清楚。”“了解”，这个词要特别标出来。所以这些缺点不会压倒对“强一些”这个词的真正理解的积极效果。

我当时的注解就写到这里，现在继续抄我那次会议的情况的笔记：

由于爱伦堡而谈到那些描写普通人物的作家时，斯大林想起了高尔基。既一般性地提起他，也具体地提到他的长篇小说《母亲》。

“瞧，高尔基的《母亲》。其中一个大人物也没有全是普通的人物。”

当开始讨论薇拉·潘诺娃的长篇小说《克鲁日利哈》时，谈话就比谈《暴风雨》更详细了。法捷耶夫解释了在斯大林奖金评选委员会上把这部原先提出来获奖的小说撤销的原因，开始说到作者在描写人物上素有的客观主义，并说这种客观主义已遭到了报刊上的批评。

维什涅夫斯基为这部小说辩护，他讲了很久，说评论界对这部作品简直是攻击，他们所做的只不过是谩骂。

“照我看，也有夸奖的！”斯大林反驳说。“我也读过一些肯定的文章。”

（我用括号说一句，关于文学的一切问题，甚至是最不关紧要的问题，斯大林都一清二楚，这使我十分惊讶。）

“怎么样？”斯大林反驳了维什涅夫斯基之后，问法捷耶夫：“客观的态度——不好吗？”

法捷耶夫说，照他的看法，客观的态度是绝对不好的。

“那么您说，”斯大林问，“高尔基的《奥古洛夫镇》，您怎样评价它呢？”

法捷耶夫说，在《奥古洛夫镇》中，高尔基是以客观的观点来描写那边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一般来说都很清楚，他同情谁，憎恨谁……

“不过，”法捷耶夫补充说，“我个人觉得，在这部作品中有非常多的地方都是用极浓重的笔墨描绘的，而且表现出高尔基的创作倾向。他的客观的观点不是随处都可以摸到的。”

斯大林听了他的话后又问：

“那么，《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怎么样？高尔基站在谁的一边？您清楚吗？”

法捷耶夫说，他清楚高尔基站在谁的一边。

斯大林稍微把两手一摊，笑了一下，对我们大家（不是专对某一个人）半重复半问道：

“清楚吗？”在回过头来讨论《克鲁日利哈》之前，他双手做了一个不明确的含讥讽意味的姿态。我觉得，这个姿态好象在说：“可我，比方说，就不那么清楚，高尔基在《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中究竟站在谁的一边。

会上有人开始批评《克鲁日利哈》，说它把工厂工会主席乌兹杰奇金描写成那个模样。

“有什么不好，”斯大林说。“我们还有许多乌兹杰奇金。”

日丹诺夫插嘴说，乌兹杰奇金是那些存在与意识之间明显不调和的人之一。

“他是许许多多种人之一。”斯大林说，“人们老是批评潘诺娃，说她的小说人物在个人与社会之间没有统一，批评她的个人冲突。可是，难道这在生活中就这么容易解决，就这么容易结合的吗？常有不能结合的。”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为结束关于《克鲁日利哈》的争论，他谈到潘诺娃时说：“她的人物描写得很真实。”

后来大家转到讨论其它的作品。在讨论的过程中，斯大林忽然问：

“你们看，这是波列伏依 的最近的短篇小说——照你们的意见，它们怎么样？”

大家回答说，波列伏依的短篇小说写得不坏，但比他的《真正的人》差多了。

“哦，请大家注意。”斯大林说，“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在这篇小说上头写上‘责任编辑卢金’？编辑部当然要审订作者的原稿……这是它的责任。为什么要专门写上‘责任编辑卢金’？”

潘菲洛夫回答这个问题时解释说，在一切书籍上一向都写上这本书的编辑是谁。而当一部作品在杂志上发表的时候，谁是它的审订人，通常都不写上。要是发表时指明这部作品是谁审订的，那么这就有特殊的意义，就

鲍·尼·波列伏依（1908—1981），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小说《沸腾的车间》、《真正的人》、《我们是苏维埃人》等均有中译本。

是说，这是感谢编辑花去大量劳动的一种形式。

斯大林不同意这种做法。

“每一本杂志都有编辑部，如果作者有许多缺点，如果他年轻，编辑部就应该帮助他，应该修改他的作品，这是编辑部的责任。”斯大林特别强调地说，“为什么要写‘责任编辑’这几个字？瞧，比如说，在《旗》第三期上就发表过一篇《在杰尼索夫参与下写成的博克雷施金的笔记》。这也就是责任编辑杰尼索夫或感谢杰尼索夫的意思。”

维什涅夫斯基向斯大林解释，这本书是怎样产生的，说博克雷施金想讲述自己一生的故事，但这本书从头到尾都是杰尼索夫上校写成的。于是他们就选择了这个最微妙的形式：博克雷施金感谢杰尼索夫的帮助。

“如果是杰尼索夫写的，”斯大林说，“那就让他这么写：杰尼索夫谈博克雷施金。要不然，我们的作家可就太多了。”

1979年3月10日

对于这个问题大家还谈了很久，而且谈得很详细。斯大林引出这番谈话的一般意义以及他在谈话的过程中简单插上几句话的意义，据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审校工作，即使是最沉重的和最费力的，也是编辑部的事情，是社会性的工作，没有任何理由为此要求特殊的感谢、荣誉和宣扬。至于一个人写的作品，而又在其前后写上另

一个人的名字，以及各种各样“救世主”的形式：如“责任编辑”或“文字整理”，感谢帮助等等，这一切都引起斯大林的坚决反对。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自然，我们也要好好地考虑它，因为解决的办法是绝对有的。比如：联合署名，或者写个人陈述工作方法的前言。最后，还可以用这种形式：“本书系根据他个人口述而写的”；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前言既可以由写书的人来写，也可以由本书口述的人来写。

谈完了波列伏依的小说之后，就开始讲到瓦西里·斯米尔诺夫的《儿子们》。法捷耶夫先概述了这本书的内容，然后解释为什么评选委员会要撤销这本书——因为它的题材是描写本世纪初的农村状况的，现在看来它已不那么特别迫切了。

斯大林沉思地说：

“是呀，他写得很好，是个有才能的人。”沉默一会儿后，接着他半似提问，半似肯定地说：“不过这本书我们现在是否需要？”

潘菲洛夫开始讲到巴巴耶夫斯基和肖穆什金的书。他坚持说它们可以列进获奖作品的名单里。虽然这两部长篇小说都只出了头一部，但可以作为例外，给它

瓦·阿·斯米尔诺夫（1904—1979），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儿子们》是反映农村集体化运动的，有中译本。

谢·彼·巴巴耶夫斯基（1909—），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金星英雄》、《阳光普照大地》、《人世间》等均有中译本。

吉·扎·肖穆什金（1900—1970），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阿里泰到山里去》有中译本。

们颁奖，借以鼓励青年作家。

斯大林不同意。

“青年作家，”他说，“什么是青年作家？这是什么论据？问题在于书写得怎么样——是不是好书？而青年作家——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他这番话不是对潘菲洛夫提出的那两本书作否定的评价，相反，他对这两本书的意见一般说都是肯定的。而他这句话：“青年作家是什么意思？”在这种场合下就具有原则的性质。

这就是当时写下来的笔记，包括我在会后和写这篇笔记前的一些想法。

现在我作一点有关那次会议的补充，这些补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我当时不能写下来，何况有一些是我今天的回忆和思考。

第一个补充是：斯大林有一个习惯（这习惯我在历次会议上，包括现在我所写的那次会议上都看见过），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小捆书和杂志来参加会议的。这捆书放在他的左手边，那里边是什么，不到相当的时候谁都不知道。不过，这捆东西不仅使在坐的人发生兴趣，而且会引起某种不安——那里边大概有什么东西吧。而那儿放着的是一些以书的形式出版的和在杂志上发表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都没有被评选委员会提到任何名单上。那些在会上谈过，更正确地说，可能要在会上谈到的，由斯大林奖金评选委员会推荐出来的作品，斯大林通常都读过。我不能肯定，他总是把一切都读了。我只

可以认为，他可能有些作品没有读过，尽管这在我的记忆中一次也没有留下影子。所有在开会时引起普遍注意的东西，其中包括在作协、在评选委员会、在中央斯大林奖金委员会上发生意见分歧——给奖或不给奖，从一等奖降为二等奖或者相反的一切东西，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争论和产生意见分歧的一切东西，他都读过。这一点，我每次参加这些会议时都确信不疑。

当他想到要在推荐的作品之外还给哪一部作品授奖时，这时，他是不太重视奖金的条件。他可以把两年前出版的书推荐出来，比如我不在的时候他就曾把我的《日日夜夜》提出来过，甚至把4年前发表的作品也提出来，这是我在的时候，在1948年。那一次我同《星》的主编德鲁津坐在一起，离斯大林相当远，坐在桌子的一端。诗歌，散文，戏剧都已讨论过了。斯大林忽然从他左手边的一捆书里拿出一本折成两半的杂志，这杂志明显地露出了他感兴趣的一页。他向在坐的人问：

“谁读过《乌鸦石》这个剧本？这是格鲁兹杰夫和切特维里科夫写的。”

大家沉默不语，我们谁也没有读过《乌鸦石》一剧。

“它发表在1944年《星》杂志上。”斯大林说，“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剧本。当时我们没有注意到它，不过我认为，应该给格鲁兹杰夫和切特维里科夫同志这部好剧本发奖。还有什么意见吗？”

根据政治局这种讨论的精神，斯大林问：“还有什么意见吗？”这一问不能认为再也不可能有别的意见，因为情况很清

楚，除了他本人之外，谁也没有读过这个剧本。

接着停顿了一下。这时德鲁津猛然地扯了一下我的胳膊肘，附着我的耳朵低声说：

“怎么办？这个剧本发表在我们的《星》杂志上，可是切特维里科夫被捕了，现在坐牢。怎么办，讲还是不讲？”

“当然要讲。”我小声地回答德鲁津。我暗自想，如果德鲁津说出来，斯大林也许会把他所爱的剧本的作者放出来的吧。他做这个花什么气力呢？要是德鲁津现在不说，那以后他就得为这件他明知而不说的事情付出高昂的代价。

“现在就来决定，给这个剧本什么奖，哪一等奖？”等了一阵之后，斯大林急忙地说：“我认为……”

这时德鲁津终于下了决心，几乎象绝望似的一口气非常大声地说：

“他在坐牢，斯大林同志。”

“谁在坐牢？”斯大林不明白。

“这个剧本的两个作者之一，切特维里科夫在坐牢，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默不作声。他把手中的杂志转动了一阵，接着把它合起来，放回原处，继续沉默着。我觉得，他犹豫了好一会儿——怎么办呢。最后，他完全不是如我所想的那样去解决这个问题。他看了一眼推荐获奖的名单之后说：

“咱们往下谈一部文学评论作品。谈谈《格林卡》这本书……”

谈了那部评论作品之后，就谈一部电影。这里我记得很清楚，当决定给《俄罗斯问题》这部电影颁奖的时候，我感

到有点报复性的高兴。对于这部电影，我只有电影脚本的原著——剧本的作者关系，其余的都是由米哈伊尔·伊里奇·罗姆做的。他不仅执导，而且是电影脚本的编者。我为这个电影脚本一共只写了几句话，这些话罗姆认为对剧本主人公密特的最后独白是很有必要的。我的《俄罗斯问题》一剧早在1年前就已得过奖了，这一次自然不会被提名获奖，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产生这种报复性的高兴。还在战争最后几年，当电影事业的主席还在的时候，就成立了一个不以他为转移的艺术委员会。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艺术、文学界的知名人士、新闻记者、哲学家。主席是列昂尼德·费奥多罗维奇·伊利乔夫。此人的非凡才智我很敬重，但同时我不管他在什么时候，也不管他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一样坚决地不喜欢他，我不喜欢他在各种不同的冲突场合下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的那种手法。

差不多在战后的第一个夏天——不知是两年还是3年，我已没有到过艺术委员会了，但在讨论《俄罗斯问题》这部影片时我曾去过。在长期停止活动之后，这次讨论的性质无论就其实质或方式而言都使我吃惊。在方式上，主席说话的腔调是恼怒和粗暴的，而在实质上，他们都要求罗姆写出在《俄罗斯问题》一剧中所没有的事情：在制这部片子的时候，

米·伊·罗姆（1901—1971），苏联电影导演，苏联人民艺术家。5次获苏联国家奖。

列·费·伊利乔夫（1906—），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和外交部副部长。

我们同美国的关系已变得非常尖锐和更加严峻了，于是他们要求罗姆把这个新的、双方关系变得非常冷酷的情况机械地搬到影片中来；它的情节，就象剧本一样，立刻在战争结束后当时的气氛中转变过来，而不是在临近 1948 年所形成的那种气氛之中。实际上，他们要求他另制一部电影，而这一部就不打算推出去放映了，并且他们还对一些演员说出了许多粗暴的意见——应该说，这是针对罗姆的妻子（出色的女演员库兹明娜）在《俄罗斯问题》一片中扮演女主角而说的，这就加深了所提的意见的粗暴性。

我在这个艺术委员会里，既不同意对罗姆指责的实质，也不同意那种方式。由于这种方式，我最后说，我不认识这个艺术委员会了。看来，我不参加它的会议的时候，这里已习惯于使我们的会议十分难看的粗暴和蛮横无理了。情况大概就是如此。我的一些同行认为自己受到了侮辱，于是在艺术委员会的第二天会议上，就提出来指责我的不可容忍的行为。

正因为如此，所以给罗姆的影片颁发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我就感到有个人的一种报复性的高兴，或者也可以说，有一种个人的报复性的心满意足。自然，从原则方面说，象我当时所感到的那样，更重要的是那时已有了同这些超级投机分子作斗争的某些基础。由于这种或那种的社会风向的变动，我们不得不听从于这些超级投机分子而差不多每年都要重新把以前写出来的东西乱改或补写一通。

我之所以想起这个一般说来不那么重要的、只与我和罗姆有关的事情，是因为它对于一些人来说很有代表性。这些人的境遇在许多方面都十分艰难，而事情绝非永远都象我和

罗姆那样就此结束。有时恰恰相反，要遭到不少的损失，而有时简直就成了我们的艺术和文学的可耻的损失。

所有奖金的讨论业已结束，但斯大林直到讨论快结束时还坐在桌子跟前，没有站起身来，仿佛还打算给我们讲些准备在会晤结束前要说的话似的。不过我们一般都想听他讲，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在诗歌方面推荐的名单上有一本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的书《南斯拉夫诗钞》。这本书收进了许多很好的诗。关于《南斯拉夫诗钞》大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都完全一致同意推荐它获奖。但这个奖却不翼而飞了，在讨论时仿佛没有任何人推荐这本书，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于世界上似的。这意味着有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但是什么事情？我和别的同志都没有就这方面提出问题。我想，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能问的话，那这应该是由法捷耶夫去问，因为他是我们的长辈，而且是中央委员。但法捷耶夫直到最后也一样不提出关于吉洪诺夫《南斯拉夫诗钞》一书的问题——或者他认为没有必要提出，或者他知道了我们不知道的什么事情，这事情他认为没有必要或者认为无权告诉我们。

沉默地坐了一会儿之后，斯大林这一次不是象通常那样对我们，而象是只对坐在坐的政治局委员说：

“我认为，我们终归要向同志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取消讨论吉洪诺夫同志的《南斯拉夫诗钞》一书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必须知道这件事，无论是他们，还是吉洪诺夫同志都不应该产生疑惑。”

有一个人回答这个半询问半肯定的话说，是的，自然要

解释。总之，大家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

这里必须指出，我总觉得，如果某一个问题的斯大林早在我们没来之前就同某个政治局成员或者全体成员商量好了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就不会放过机会以对我们特别指明，他讲的是大家的意见，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

另一个问题是：这究竟有多少出于有意和多少出于自然？这是出于他的老习惯，还是出于他一时想到要给那些知识分子的代表留下一个明显的印象？在斯大林看来，我们参加这些会议就是这类的代表人物。

“问题是，”斯大林说，“吉洪诺夫同志与此事完全无关。我们对他的诗没有什么不满，但我们不能给他发奖，因为最近一个时期，铁托的表现很糟。”

斯大林站起身来，走过去。走过来又重复说：

“他的表现很糟。很糟。”

后来斯大林还来回走动，不知是在专为我们寻找措词，还是再次斟酌一下是否要用他早已准备好的话对我们说：

“我是说，他的表现很敌对。”斯大林最后说，又走向桌子边。“我们不会叫吉洪诺夫同志受委屈，也不会忘记他，我们下一年要给他的新作发奖。唔，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这么做，应该向他解释，免得他产生怀疑。你们谁来做这件工作？”

我自告奋勇去做这件工作。会议大概到此结束。任何有关铁托的更详细的解释，斯大林认为没有必要。

我现在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当时要自告奋勇去见吉洪诺夫，并给他讲明《南斯拉夫诗钞》所发生的事情呢？也许，除了我同吉洪诺夫的友谊之外，我比别的同志更

敏锐地感到我们同铁托的关系日渐恶化，因而想把这个对他来说并不愉快的谈话担负起来。

1947年秋天，我率领一个由团中央书记谢列平，莫斯科党委办公室主任、前作协党组书记赫瓦列布诺夫组成的小型的代表团到南斯拉夫去参加人民阵线的代表大会。这是苏联代表在那些年月里参加的的最后的一次会议。当我们飞抵贝尔格莱德的时候，机场上连一个我们大使馆的人都没有，只有当时南斯拉夫政治局的一位成员，他们的计委主任安德烈·赫布兰来迎接我们。我们直驱大会会场，因为我们在那些年月里差不多总是迟到或者刚好赶上开会，所以我们就没有先到大使馆。

在人民阵线开会期间，我们同其他代表团一样，坐在台上向下倾斜的前一排。担任大会主席的斯列坚·胡依奥维奇在我们背后上边主持会议。我们前面是大厅，大厅中间有一条宽阔的过道，两边分放着靠椅，直对前台。在几天开会的期间，铁托和兰科维奇都坐在那里，直对着我们，离我们只有几公尺，面对面的。

从1944年秋天算起，我有3年没有看见过铁托了。我觉得，他保养得很好，穿的也很漂亮，特别是同穿一身西装的兰科维奇坐在一起时就更加显眼。1944年那一阵子，他显得有点贵族老爷的习气。而这3年来，这种习气就更加明显，他也更关心自己的外表和穿着了。

在这两个座位上，有一种令人奇怪的东西——它仿佛与大家无别，但又与大家不同；它仿佛有点大众化，但又象有点故意炫耀。这在第一天使我特别吃惊，使我特别刺眼。后

来，在往后几天里（会议开了三四天），我对此已经习惯了，因为铁托和兰科维奇每天都来参加会议。

第一天晚上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大使馆。大使馆里显得有点令人奇怪的混乱。性格直爽的谢列平把自己所想的一切统统向拉甫连季耶夫大使说了，他说既不派人来接我们，也不关心给我们提供情报，他说要把这种岂有此理的事情向莫斯科报告。拉甫连季耶夫回答了几句听不清楚的话。他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情报要告诉我们，关于他的观察和结论，他会向莫斯科汇报的，而我们要做的也同样是根据我们的观察向莫斯科汇报。他显然不想同我们谈具体情况，只是让我们自己去想。

在这次出访中有两件事留在我的记忆里。

第一：铁托在郊外或近郊的一个宫中举行的招待会。这个招待会是在宫中（好在天气还好，而且是金色的秋季）、花园、宫殿附近的露天广场上举行的。铁托打扮得特别漂亮，穿着一套非常合身的制服，手指上戴着几颗宝石戒指。他很好客，我可以说他很有魅力，如果这种魅力不是有点故意引人注目、有意识的和巧妙滥用的话。他对所有的人都很亲热，对我们也一样。总之，从他对我们的态度中一点也没有让人觉得我们的关系马上会发生变化。但他本人已不象 1944 年那样了。他比 11 月 1 日庆祝贝尔格莱德解放时已判若两人。那时他在自己的同志们中间是首席，无可争辩的首席，而这时他却是以一个领袖身分同人民会见，这种会见若不要求高声欢呼，也得要求低声赞叹。

现在，当我回忆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忽然联想起《攻克

柏林》一片中那一个或其中一个场面。这个场面是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增补进去的。斯大林（由阿历克谢·季基饰演）打扮得异常漂亮，已不象他本人了，站在柏林机场一群来迎接他的、欣喜若狂的人们中间。有谁知道，为什么斯大林凭着他的才智和讽刺竟会把这个趣味低劣得出奇的场面硬塞到影片中去呢？顺便说说，这个场面没有任何一点历史的真实，因为这根本没有发生过，他个人也没有做过这类的事情。他在这部影片中，在他的这个场面上，已完全不象他本人了。我只有一个解释：斯大林认为，战胜国的主要人物是它的最高统帅，他在人民的记忆中应当是这么一个用青铜铸成的徽章，是这么一个富丽堂皇的胜利者，丝毫也不象他在现实生活中的本人。如果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么这是对普通人民的蔑视，仿佛没有这种豪华而又廉价的、把他奉若神明的场面，这些人就不能理解他在历史中的作用似的。

我现在之所以想起《攻克柏林》一片中这个我当时也感到刺眼的场面，是因为我们在贝尔格莱德看到了铁托会见人民时那种场合而联想起来的。铁托当时的表现已使我们心中感到不舒服和不赞同了。

第二：铁托在这次招待会上的表现，我们3个人都不喜欢。可是，送我们到机场的胡依奥维奇的表现却使我们，尤其是使我深感忧虑。我们在机场上坐下来，同他在一起呆多久就谈多久，喝了葡萄酒，又谈个不已。他很激动，显然不想让我们走。已经有两次拖延上飞机的时间了，再拖几秒钟，飞机也许就飞走了。当时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个人仿佛在最后一秒钟也还想跟我们说些什么或者想让我们知道什

么。但是什么呢？这里面使人感到情况不妙，但当时我们还

不了解。

无论是来接我们的赫布兰，还是来送的胡依奥维奇，我们后来都听到他们的一些情况——开始是许多好话，后来则是许多坏话。但他们两个最后都在南斯拉夫被处决了，是在斯大林同铁托公开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一切，连同他们的悲惨结局，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1979年3月16日

当我来到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吉洪诺夫家里，跟他谈话会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那时面临的悲剧还刚刚展开；不过斯大林谈到铁托的那些话，尽管对我来说十分突然，然而总还给我本人有理由产生疑惑和感到情况不妙，或者说，不管怎样，情况不完全顺利的感觉。

既然我已触动了这个题目。那么就必须把有关我个人的事情全都说完，何况我在那个时候已经确信，我现在所写的这部草稿的题目《斯大林，我这一代人的见证》，在许多地方，都几乎与这个题目《若干年后你会亲眼看见》是分不开的，这个题目有时在心里还感到更为难。

有一次，在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会议和同铁托的关系完全破裂之后，我被叫去看塔斯社有关铁托和南共联盟会议主席莫舍·皮亚狄的演讲的许多材料。他们建议我对这些演讲写篇政论性的抨击文章，并且补充说，我应该把这项工作

看作是斯大林同志的直接委托。

现在就来谈谈这篇出自我笔下的所谓政论性的抨击文章。我费了不少气力才迫使自己去写完这篇作品，它满篇都是可耻的粗野话，而主要的，就其出发点以及材料来说都是满篇谎言。当时莫洛托夫为这篇文章叫我去。他让我坐在他的办公室的一张会议桌边，并同我坐在一起，拿出我的文章，一页一页地翻着，但不把它交到我的手里。看来，这篇文章斯大林已经改过，并委托莫洛托夫在把文章发表之前让我这个作者看看修改的地方。我不想重复我已经谈过的我现在对这篇文章的想法，没有这些修改，这篇文章也还写得可以，但经此一改，而且改得相当可观，这就加深了这篇文章的粗野性。最后一段完全是由斯大林写的，标题也是他想出来的，这就使文章的粗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莫洛托夫装门面地问我是否同意文中的修改，却依然连一页都不交到我的手里，把文章留在他自己那边，这样就同我分手了。第二天，我有幸读到了这篇修改过的文章。这篇既不美化我的生活道路，也不美化我的记者生涯的文章的全部出笼情况，看来就是如此。

如果要回忆当时我们对南斯拉夫问题的感受，那么以我为例，我身上就有各种不同的感情在斗争。我相信一些文章和文件上所写的有关南斯拉夫的事情，但有些则不相信；我们和南斯拉夫之间所发生的事情象一块石头沉重地压在心里。竭力使自己相信南斯拉夫的领导对所发生的事比之我们更有过错，这一点我现在也能很容易理解。但最主要的矛盾在于：我总记得 1944 年的南斯拉夫，不仅记得那时的铁托，而且还记得其他许多各色各样的人，包括科丘·波波维奇在

内；我们曾跟他在塞尔维亚南部朝夕相处过很多日子。他后来当了总参谋长，此后又担任了联邦国务秘书，可见他是赞同铁托的政治立场的。而科丘·波波维奇的容貌，对我来说，所有对他的回忆都不能与背叛行为的概念联在一起。总之，把一切堆在一起也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想起1944年的南斯拉夫，我心里不能把这一切与现在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如果相信所写和所说的一切的话）兼收并蓄。

1955年，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恢复了两国的关系，在中央全会讨论这次出访的总结时坦率地说明了我们的责任范围，——这一切不仅符合我的心意，而且搬走了我心中的那块石头。1955年，当我准备同莫斯科市的党积极分子作报告的时候，就已决定，如果我对自己那一部分责任缄口不言，那我是不正派的。但要重复这样的一些话题却相当痛苦，所以我在这里只引用当时说过的话：

“我很痛苦，在同南斯拉夫断交的那些年月里，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参加了那次大合唱，照直说，咒骂了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那次大合唱在我们的报章上已叫喊不止一年了。我想，现在自然也可以推诿到那种骇人听闻的虚假情报上，说这是贝利亚——阿巴库莫夫一伙人怀着罪恶的目的而有意提供的；可以推诿到那些非常有权威的文件上，说这是由于错误地相信这种骇人听闻的虚假情报而编造出来的。但是，我现在无需捶胸（我们谁需要它呢），而只照人的良心反躬自问：啊，毫无疑问，当时可能相信南斯拉夫有人辜负了人民的信任，他的表现有失众望，我们知道，这在历史中是常有的。但

怎么可能完全相信，就是那些在战争岁月中领导南共、领导共产党、成为政府首脑、指挥游击的连队和师团作战的人，所有他们都是负众望的呢？不能相信这一点，这种轻信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荣誉，照人的良心直说了吧，这不可能是那样，也完全没有那么一回事情。”

现在只补充一点：1955年以后，在许多年间，甚至在非常有必要到我曾经在那边游击队呆过的地方去的时候，我也没有勇气到南斯拉夫去。我羞于到那边去，就是因为那篇该死的文章。近10年来在南斯拉夫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没有引起我对铁托个人的好感，相反，我却经常地想到他在自己的宫邸里以领袖身份接见人民的情景，这一点我在上面已经提过，而很少想到他在1944年11月7日那个节日里，他同游击队的师团的指挥官们一起唱着《喂，连长，把机关枪给我》，情况就是如此。但我以前写的那篇谈到这个人的文章，依然是一篇谎言，我仍然为它而感到羞愧。

当我得到邀请参加在斯普利特举行的国际旅游会议时，我最后决定还是借此之机到南斯拉夫去，不仅到了斯普利特，而且还到了我在战时熟悉的地方。虽然我所碰到的所有南斯拉夫人对我的态度都十分亲热和友好，虽然他们明显地表示不愿回忆过去那些痛苦的篇章，但我依然怀着一个重要而痛苦的问题：科丘·波波维奇现在是否愿意同我会面？在他当时不知是总参谋长还是国务秘书无疑读了我那篇文章之后，他是否愿意同我会面呢？

当我来到南斯拉夫的时候，虽说他已不在位了，但他所占的岗位却比原来掌握实权时还荣誉得多。我通过第三者告诉他，我很想同他会面，如果他也有这个愿望的话。他肯定地回话说，他准备来会面，指定时间来旅馆找我。后来知道，他要同我一起到一个他所喜欢的鲜鱼饭馆去共进午餐。他仍旧象以前一样，风度翩翩，消瘦，跟 20 多年前一模一样。谈话时，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依然如故。所以我对他也跟过去一样抱有好感。我没有避而不谈那篇使我感到苦恼的文章。他沉思着，默不作声。后来他说，当时情况很糟，自然，你们在许多方面都有过错。“但我们也一样有错。”他忧郁地补充说。我总觉得，他是个忧郁的人。在南斯拉夫当时的环境中，有一件什么事情使他苦恼，有什么事情不是或不完全是象他在 1944 年（当时我和他坐在一辆“吉普”车里）所想的那样，也许，一回忆这件事情就使他的外表格外显得忧郁。

我们一起呆了相当久，后来他把我送回旅馆，于是我们就分手了。在街上，在饭馆里，在旅馆中，所有的人都认出他，但他表现得若无其事。他披上雨衣，就飞快地跑到街上去了。在这个人的身上，在他消瘦的、轻盈的体态中，在他整个俭朴的生活里，在他谦逊同时又严格的行动上，在他带有讥讽意味的忧郁的情绪中，没有一点能与铁托这个人的容貌相调和。一个人的容貌也许就是他为本质的本质的一部分。这是两个迥然不同的人。我那时已经有所感觉，但我们之间一个字也没有谈到这个题目。看来，他们早已（远非第一年）在某些方面不同路了。

但我想回到与 1948 年政治局那次会议有关的我的思考

上来。尽管这已讲过而且讲得很多，但依然言犹未尽。首先，谈谈出席会议的人们，这些会议（无论是 1948 年还是以后各年，直到 1952 年，我都已在一个地方完全讲过）从来都是人数不多的。参加这些会议的通常是政治局的成员和中央宣传部部长或副部长；有时电影部长、艺术事业委员会主席和作协秘书处的三四位作家也来参加。有一次还有两个大型杂志的主编和几位与作协秘书处有工作关系的主编，比如我们的维什涅夫斯基也参加过。就是这些。依我看，曾经参加过这些会议的还有音乐家吉洪·赫连尼科夫。至于有时也有一些演员和艺术家，或者一些戏剧和电影的导演参加，那我就不能一一记清了。总之，这些会议都是人数不多的。因而就产生了一种保密的格调（不仅是有关会议，而且还有同我们的谈话），这种格调是斯大林同志同我们进行会晤时所具有的。政治局委员很少发言，尤其是谈到文学的题目时。看来，特别在日丹诺夫死后，文学就完全成为斯大林本人的、也仅仅是他本人的一个教区了。

有时谈到绘画，大家都是根据艺术事务委员会提供的复制品来评论的。有时谈到话剧，但更多的谈到电影。我觉得，除了斯大林之外，没有什么人这样留心过文学。这也许是容易理解的。每个人自然只读一部作品，这个人读这一本，那个人则读另一本。可是，一部电影却由大家一起看，而且往

吉·尼·赫连尼科夫（1913—），苏联作曲家：作有歌剧《冲向暴风雨》、《百鬼与一女》等，4 次获苏联国家奖。

意指管辖范围。

往不只看一回。这就产生了对这个题目的共同意见，给某一部影片以哪一等奖。但是，在电影这个独特的范畴内发生不同的意见时，斯大林就采取表决：

“咱们来表决吧，谁赞成一等奖？谁赞成二等奖？”

他自己是不举手的，只看举起来的手，心里显然把自己归到某一边，然后把结果说出来：

“那么，给一等奖。”

或者：

“那么，给二等奖。”

在我的记忆中，在讨论其它艺术范畴时，从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当问题涉及到电影，斯大林就同政治局委员更多地交换意见。他关心的是他们的意见，而不是我们的。我无法想起，在举行这些会议的期间，他曾在什么时候征求过我们对某一部影片的意见。然而对文学却完全相反。除了我们的意见之外，在我的记忆中，他根本就没有征求过另外什么人对文学作品的意见。

我记得，在我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上（这是在 1952 年举行的，不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而在一个放着乐谱架小桌子的不大的厅内。当我们来到内厅并坐得远一些，等跟他一起进来的政治局委员靠近他坐下来时），斯大林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

“你们靠近坐，他们每天都在这里，而我们不常见面。”（或者，你们在这里是稀客——话的精神大致是如此。）

但我当时不完全明白斯大林赋予这些一年一度同我们会晤的意义。只是在他死后，我才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很少接见人们，甚至连一些政治局委员也有好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他同世界的一切接触大多数都是借助几个人，不再举行任何盛大的会晤。只有后来我才知道，斯大林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邀请我们去见他，参加这些会议，并在举行这些会议时不急不忙地、我是说非常耐心地发表和重复各种的意见，仿佛是想一年一度通过我们这些人和通过同我们谈论哪些书在执笔，哪些书在出版来触摸知识分子的脉搏。依我看，这不仅与讨论的性质有关，而且与斯大林的作风有关。我曾多次谈过和听说过他对人残酷无情和十分粗暴，其中包括对那些与他朝夕共事和在战争期间有赖于他们的军事人员。那么，我在这些会议中一次也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斯大林。他对我们没有一次表现过粗暴——这并不是说，别人讲的都是假话，这样考虑问题是可笑的。人们讲的都是真话，他们所讲的都完全可信，只不过这是一年一度的会晤，而且要从我们身上摸到知识界的脉搏，他就认为有必要始终如一地在我们面前创造出一个他正想创造的有关自己的概念。在这个有关他的概念中找不到任何粗暴之处。

现在，翻阅 1948 年我的笔记时，我注意到了斯大林的一句话。以前，我曾不止一次翻阅过这本笔记，但都没有注意到它。我想一想，他讲“这本书现在我们是否需要”这句话（斯大林当时说的是瓦西里·斯米尔诺夫描写本世纪初俄国农村的一部小说，照他本人的意见，书是写得很好的）是抱什么态度呢？而根据他的意见，将不给这本写得很好的书发奖，那他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斯大林首先是政治家，而后才是文学艺术鉴赏家吗？自然是这个意思，但又不

仅是这个意思。谈到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时，与这个具体的例子有关的，我觉得，要考虑考虑他对历史的极其功利主义的态度。

1979年3月17日

我现在作些补充。在某些场合下，斯大林对历史的功利主义态度基本上是与个人对待某些历史人物的态度相结合的，因此他在这些历史人物的活动中就获得了附加的历史支柱。我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想先广泛地谈谈斯大林的历史功利主义，谈谈这个也包括个人成分在内的一般概念。

我首先要说，斯大林从没有表示过反对沉迷于一般的历史题材，从没有号召过作家一定要描写现代生活，把这作为他们最主要的和最迫切的任务。我记不起他有这样的意见。但是在分析他历年所支持的作品时，我发现他有一个倾向于描写当代生活作品的概念，这个概念归根结底是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本书我们现在是否需要？”需要还是不需要？

如果不从文学，而从历史开始来谈，那么，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日丹诺夫和基洛夫对1936年1月公布的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意见，绝不是斯大林忽然对沙皇和沙俄时代其他政治家抱有好感的见证。波克罗夫斯基遭到批评了，代之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苏联历史学家，著有《俄国历史概要》，他阐述历史进程的方法曾在苏联学术界受到批评。

而起的是舍斯塔科夫的历史教科书；这倒不是因为忽然对俄国历史的某些阶级范畴产生了怀疑，而是因为要强调民族感情在历史和当代生活中的力量 and 意义，问题的根源就在这里。强调民族历史的传统，特别是军事的传统力量是有利于当代的任务的。这个任务在当时主要的是要动员一切感情，其中包括传统的、民族的、爱国主义的感情，以便同德国纳粹主义，同它对东方领土的野心，同它蔑视斯拉夫民族的理论进行斗争。

如果讲到文学，那么斯大林在有使他的评价更为突出的斯大林奖金的那些年月里，曾支持或亲自推荐过许多历史题材的作品获奖。如果讲到电影，那么他甚至编写过提纲——哪些历史事件和哪些历史人物应该拍片。

每一次，不管是主张已经获奖的作品，还是主张创作某些后来一定会获奖的作品的思想时，都非常注意当前的政治任务。斯大林当时先支持《夏伯阳》，后来又提出拍摄肖尔斯的影片的思想。夏伯阳和肖尔斯都是国内战争的真正英雄，但从一般的观点上看，他们自然都是次要的人物。而斯大林在当时之所以要支持《夏伯阳》以及提出拍摄肖尔斯一片的思想，是因为那些在现代军队中占有高级职位的主要人物，如

安·瓦·舍斯塔科夫(1877—1941)，苏联历史学家。写过中小学用的第一本苏联通史。

尼·阿·肖尔斯(1895—1919)，苏联国内战争英雄。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

瓦·伊·夏伯阳(1887—1919)，一译恰巴耶夫。苏联国内战争英雄。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

叶果罗夫、图哈切夫斯基或乌博列维奇（他们都曾指挥西南、西部和远东战线）都注定要从国内战争的历史中消失，——不仅是从生活中，而且还从历史中消失。托洛茨基是公开的政治敌人，在这个场合下，自然不会谈起他和他的追随者。而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摄制出来的《肖尔斯》一片，也绝不谈及象肖尔斯一样已经离开人间，但比他更重大、而且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污点的人物，如伏龙芝和古谢夫，这自然也不属偶然。

随着《肖尔斯》一片问世，电影界就多了一部很精彩的片子。就整个来说，它是写得很精彩的，但有许多地方却叫人感到震惊，不过它同时也巩固了斯大林当时对国内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现代公式是：列宁——斯大林——肖尔斯——夏伯阳——拉佐。在伟大的《夏伯阳》之后，瓦西里耶夫兄弟又制作了一部非常好的片子《在沃洛恰耶夫卡的日子》。这部片子也巩固了斯大林的另一概念。在这一概念下，那些在远东领导过斗争的人物，如乌博列维奇和波斯特舍夫也从观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谢·格·拉佐（1894—1920），西伯利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内战争英雄。

两位同姓瓦西里耶夫的苏联电影导演和电影剧作家在艺术上合作时的笔名。其一是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1899—1949），另一个是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1900—1959）。他们两人合作导演的影片有《夏伯阳》、《在沃洛恰耶夫卡的日子》、《前线》等。

巴·彼·波斯特舍夫（1887—1939），东西伯利亚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者之一。大清洗时被捕，死于狱中。

1942年，在战争最炽烈的时期，公布了第一批获斯大林奖金的名单，其中有两部历史长篇小说摆在一起：一部是扬的《成吉思汗》，另一部是博罗金的《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这两部小说讲的是离1942年大概六七十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件。显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这两部小说都有非常现实的意义。长篇小说《成吉思汗》警告那些不能抵抗侵略，终被胜利者征服的各少数民族将要发生的事情。长篇小说《德米特里·顿斯科伊》讲的鞑靼人压制结束的开始，讲怎样可以战胜那些自称不可战胜的敌人。这两部长篇小说之所以被斯大林认为有现代意义，是因为它们讲的历史预告了战败者的灾难，并教育大家如何取胜，加以它们的取材是全民所共知的俄国历史事件之一。

这两部长篇历史小说是在战争前夕出版的。它们一下子在1942年就获奖了。但还有一部在1940年或1941年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根据它的出版年月斯大林当然是读过的，但是过了好几年它才获奖。这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就证实了斯大林对历史作品的看法抱着功利主义的态度。我说的是斯捷潘诺夫的长篇小说《旅顺口》。它的获奖不迟不早，恰好在1946年，在日本被打败，斯大林提出的任务（清算1905年以来的

瓦·格·扬（1874/75—1954），原姓扬切韦茨基。苏联俄罗斯作家。著有历史三部曲《蒙古人入侵》，《成吉思汗》是其第一部。

谢·彼·博罗金（1902—1974），苏联俄罗斯作家。著有历史三部曲《撒马尔汗的星辰》等。

阿·尼·斯捷潘诺夫（1892—1965），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代表作有：《旅顺口》、《兹沃纳廖夫一家》。

账，其中包括归还旅顺港)业已完成之后。在1942年或1943年，斯大林完全有可能读到这本他所喜欢的书：这本书我们现在是否需要？当时，特别是在1943年开始以前，在保卢斯向斯大林格勒的苏军投降之前，是否需要回忆旅顺港的陷落呢？直到1946年，斯大林才认为，这部书是需要的，它是一部非常合乎现代要求的作品；它使人回想起沙皇和沙俄时代在40年前丧失的东西，现在由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国家拿回来了；它使人回想起当时如此英勇作战的官兵，就象现今在这场战斗中英勇作战的苏联官兵一样，只是由于指挥不同，领导不同而终于未能取胜。

也许，我写得有点粗糙和过于简单，但我相信现在我所写的东西的实质。

斯大林按照自己的意见，从相当多的历史作品中挑选出一些符合现代精神的作品。过去陷落而今归还的旅顺港的历史是符合现代精神的，而俄国农村的历史（大约就在本世纪初的岁月），根据他的看法，是不符合现代精神的。所以对于“这本书我们现在是否需要”这个问题，斯大林就作了否定的回答。

我认为，在战后最初几年，给科斯特廖夫描写伊凡三世 的长篇小说颁奖也是与这部长篇小说具有现代意义，具

瓦·伊·科斯特廖夫(1884—1950)，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历史长篇小说《库兹马·米宁》和三部曲《伊凡雷帝》。

伊凡三世即伊凡雷帝(1440—1606)，在位期间，推翻了蒙古鞑靼人的统治。号称“全罗斯”大公。

有时代呼应的想法有关的。伊凡三世初步完成了罗斯团结在莫斯科周围两个世纪。看来，正是在那些年月里，斯大林大概就有了自己在俄国历史中的作用的相似的概念——无论在西方或东方，以前失去的和割让的一切现在都已归还，况且，多少世纪以来要把东部和西部乌克兰，其中包括布科维纳和外喀尔巴阡合并的任务都已完成。

伊凡雷帝这个人物对斯大林来说是很重要的，这对他来说是个人的题材的反映，是他同内部敌人和贵族专横作斗争的反映，这个斗争又是与渴求将权力集中在手里相联系的。这里有历史的自我辩解的成分，更确切地说，不是自我辩解，而是自我肯定的成分。有谁知道，在他的心灵深处这究竟是什么，但在表面看来，在伊凡雷帝这一历史题材中，这与其说是为当代生活所发生的事件而作的自我辩解，毋宁说是为自己干了伊凡雷帝当时干过的事情而作的自我肯定，确认自己有权这样干和历史必需这样干。

应该说，如果在评价战争的事件时，斯大林在参加胜利大检阅的人们面前所作的演讲还可以听到有点对战争初期的事件作自我批评的话，那么，对于1937、1938年的事件他就从来没有处在自卫的立场过。那些没有被碰过的人当然都为自己平安无事而感谢他，那些回来并经判定无罪的人也当然

15世纪起使用的古地名。其一部范围相当于今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州（北布科维纳）。

苏联乌克兰西南部的平原——丘陵地区，1938年被匈牙利占领。1945年并入乌克兰共和国。

为自己回来并经判定无罪而对他感激涕零，而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只好终生终世甘当罪人了。

成为替罪羊的叶若夫已被处决，这是从不公布的，也从不在任何地方提起他。官方之所以从不承认这件事，正因为他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一只替罪羊。就是伊凡雷帝这个人物，根据其全部历史的特点，看来也要对自己有一种辩证的态度，然而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却离辩证法十万八千里。在他看来，伊凡雷帝是绝对正确的，所以爱森斯坦 编导的《伊凡雷帝》上集就以这种正确性来满足了他的欲望。这部影片在其艺术的细节处理上确是妙笔生花，然而在历史的史实上却是不合乎道德的。这部影片的下集在战后拍成，从此爱森斯坦就大祸临头了。斯大林不喜欢这部片子。为什么？这里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伊凡雷帝王朝的历史本身抗拒了这部影片的续集。还在禁卫军之前，在最初的对外政策的成功之后，首先是占领喀山，伊凡雷帝就在军事行动中节节失利了。如果能把俄国历史上的某个人物同俄国谋求出海的斗争联系起来，那么这不是伊凡雷帝，而是彼得大帝，不是那个遭受失败的人，而是那个达到自己的目的的人。伊凡雷帝在军事失败和俄国军事力量严重削弱的环境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想，斯大林始初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是缺少辩证法的。如

谢·米·爱森斯坦（1893—1948），苏联导演和电影艺术理论家，苏联电影艺术大师。曾两次获苏联国家奖。

果我并没有弄错，不仅是影片的上集，而且还有它的下集所包含的剧情，都是以立窝尼亚战争初期的一个胜利场面而结束的，以马柳塔·斯库拉托夫 的出海和在战斗中阵亡告终。至于人民对他的回忆，总是把他的名字与含有残酷无情的意思的普通名词联系在一起，随便与什么联系都可以，只要不与战斗功勋联系就行。影片结束时总是以一个什么光荣结局来收场的。以后成为俄国贫困的序幕的伊凡雷帝王朝，包括混乱时代 在内，在影片中都已不见，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这就是在战前所设计的。我认为，在上集实质上已解决了类似巩固斯大林的立场问题，它已确认斯大林在同他要根除的那种相对说来是贵族气派的斗争中的正确性了。

上集在战争快结束时就开始上映，而下集则是在战争以后。下集结幕时用以装点伊凡雷帝就此被砍短了的自传的那些军事胜利，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后，就显得非常渺小，而与贵族气派斗争的题材在上集就已经解决了。依我看，下集落到斯大林的手上时，他要同伊凡雷帝相比的兴趣已经减弱，在他看来，这已不是当务之急了——也许是暂时的吧。但是，这部影片落到他的手上时，正好是它的某些细节或情节使斯大林十分恼火。这些情节在别的场合下不会砍掉片子的命运，只

立窝尼亚战争（1558—1583）是俄国为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对立窝尼亚骑士团、瑞典、波兰和立陶宛大公国进行的战争。

马柳塔·斯库拉托夫（？—1573），杜马贵族，伊凡四世的亲信，直接听命皇帝，进行恐怖活动。曾谋杀斯塔里茨基公爵，菲利普都主教等多人。1570年在诺夫哥罗德远征中进行大屠杀。在立窝尼亚战争中阵亡。

指俄国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长年战争变乱迭起的时期。

不过做些必要的修改就行。然而在这个已失去了以前对这一题材的浓厚兴趣的场合下，这些情节就变成这部片子的命运的悲局了。

我认为，在这样议论的时候，我在原则上并没有偏离事情的政治实质。斯大林非常爱好规划的正是电影。因为它的艺术形式，比起其它的艺术形式来更具国家化，换句话说，它一开始工作就要求先得到国家的批准和国家的资助，兼之斯大林在其艺术的概念中从不把导演作为独立的艺术家看待，只把他们作为电影脚本的讲解者和实施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斯托尔佩尔 当面给我讲的一个故事，那是在战前 1940 年斯大林极不喜欢的一部影片《生活的法则》中所发生的事情。这部片子是他同导演伊万诺夫根据阿甫杰延科 所写的电影脚本合拍的。可以说，斯大林发起的那阵几近无情批判的猛烈炮火全是针对电影脚本的作者阿甫杰延科的，而斯托尔佩尔和伊万诺夫好象也都在场。在这场歼灭战中，有一个人企图把斯大林的注意力转向在坐的那两位导演。他说，对他们怎么办，也应该惩罚惩罚他们，而不只惩罚一个阿甫杰延科。据说斯大林没有支持这个意见。他漫不经心地在空中用一只手指转了一圈，表示在胶带装置中的转动。他说，“他们有什么？他们不过是把他写给他们的东西转动罢了。”说后

阿·波·斯托尔佩尔（1907—1979），苏联电影导演和剧作家。导演影片有：《真正的人》，《生者与死者》。两次获苏联国家奖。

阿·奥·阿甫杰延科（1908—），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我爱》，《蒂萨河上》，这两本书已有中译本。

又转过来谈阿甫杰延科的问题。

自然，我不是要把斯大林对电影导演的一般概念说得这么简单。他喜欢电影，经常看它，而且亲自给某些导演，其中有齐阿乌列里、多夫任科、爱森斯坦提出过任务。后两人还为自己执导的影片写过脚本，都是亲自执笔，并无旁人协助。当然，斯大林看待电影创作要比他同年轻的斯托尔佩尔和伊万诺夫谈话时所透露出来的看法宽得多。不过，在他议论艺术的样式和类型时，依然有议论类似艺术特性的口吻。不管怎样，他从没有过这样彻底和有计划地对未来的影片进行规划，而这种规划又都是与当前的政治任务有关的，尽管他所规划的一些影片如果不是永远，也差不多是永远含有历史的意义。他不幻想怎样去描写一个现代人的题材。他抓住一个历史中的现成人物，只要他能对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当前的思想斗争有实际效用就行。这可以追溯到他为电影推荐过的一些人物：亚力山大·涅夫斯基、苏瓦洛夫、库图佐夫、乌沙科夫、纳希莫夫。其中最典型的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在苏瓦洛夫、库图佐夫、乌沙科夫、纳希莫夫作为统帅的勋章的设施下，放在首位的不是那些更为人民所怀念的人物——库图佐夫和纳希莫夫，而是那些领导战争并在国内外赢得了辉煌胜利的人。如果苏瓦洛夫和库图佐夫这两人的声望大致是相等的话，那么在别的情况下，联系到纳希莫夫或者乌沙科夫，成为全民皆知的人物自然是纳希莫夫，而不是乌

米·爱·齐阿乌列里（1894—1974），苏联电影导演。导演的影片有：《宣誓》，《攻克柏林》等。五次获苏联国家奖。

沙科夫。但是，一想到进入地中海，想到在那儿的胜利，想到海军的进攻就联系到乌沙科夫。所以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解决海军勋章哪个最高的问题时，较之仅仅保卫塞瓦斯托波尔的纳希莫夫，其冠军荣位自然就落到他的身上。

自然，这一切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这样，但我觉得，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斯大林的考虑正是这样：在斯大林格勒胜利之后所制定的统帅勋章是这样排列的——苏瓦洛夫，库图佐夫，乌沙科夫和纳希莫夫。

关于格林卡（不是与恢复上演的《伊凡·苏萨宁》一剧无关）就接连提出过拍制两部电影。反对崇洋媚外的斗争纲领也预定创作一系列影片。这些影片都肯定了我们在某些范围内的优先地位：战地外科——皮罗戈夫、无线电——波波夫、米丘林——生物学、巴甫洛夫——生理学。我并不是说制作这些影片对于它们的创作者来说是迫不得已的，——制作这些影片大都怀着极大的热情。不过，所有这些情况总合起来，无论是在制作这些影片的排列上，还是在对这些影片提出的要求上，毫无疑问，都有直接出自斯大林的意志的因素，这种因素是与他历史，其中包括文化史和艺术史的功利主义态度有关的，与他支持历史上那种或仅仅是那种直接有利于现实生活的事情有关。

1949年政治局开会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的时候我不在，那时我正好到国外出差去了。其后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是在

米·伊·格林卡（1804—1851），俄罗斯作曲家。所作歌剧《伊凡·苏萨宁》和《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为历久不衰之作。

1950年3月6日举行的，这次有我参加。1948年举行的讨论奖金的会议，我已把它们记了下来，并已在这部手稿中引用和评述过了。在那次会议与这次在1950年举行的会议之间，已经过了将近两年。许多事情都已改变，并且变得更为严厉了。许多人已被逮捕，其中也有文学界的人士。列宁格勒案件一发生就具有恐怖的色彩，继之而来的是一连串被捕和撤职。1947年讲到的反对崇洋媚外的斗争，又获得了新的和更可怕的形式。发表在《真理报》上的编辑部文章《论戏剧评论界的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显然是这方面的一个交合点。这篇文章对文学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而它发表在《真理报》上又显然是由斯大林直接指使的。

我不能在这个时候详细谈及1948年末和1949年期间在文学界所发生的事情。要叙述这一切就得附上我过去的整本笔记，而这些笔记现在又不在我的身边。为避免两次重谈同一个题目，我认为，在这部手稿中早先写下的事情与我马上就要转过来谈的事情之间，至少要省略我将要增补的几十页。先作这点声明，然后我再来谈1950年的事情。

※

※

※

1950年3月6日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之前几天，我当了《文学报》的主编，接替了叶尔米洛夫的职位。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要离开《新世界》或者希望离开它。把我从《新世界》调到《文学报》去的理由，阿历山大·阿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是有的，而且这些理由对他来

说显然相当重要，如果说到那套文学界的政治手腕的话。这种政治手腕有时象寒热病一样，使法捷耶夫全身抽搐，竟不顾他那主要的、健康的、对文学诚实的态度，而把他的真正的本质全部暴露出来。在批判评论界反爱国主义集团的斗争中，他，法捷耶夫亲自领头，并没有料到后来也把他吓坏的后果。我是一个人，从一开始就不同意法捷耶夫对这些评论家采取无情斗争的态度。法捷耶夫重视索弗朗诺夫的杰出才华，但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的实质。开头把他培养成一个唯命是从的帮凶，一有机会就把他变成完全独立的文学界的刽子手。

在这场斗争之后（不管你愿不愿意，关于这场斗争还将会更详细地谈到），法捷耶夫一方面不希望索弗朗诺夫这个作协的党组书记、他自己的主要实际助手出问题；另一方面，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叶尔米洛夫又开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而且公然地和忘恩负义地在一切风险上把扶持他的手咬了多年。

结果法捷耶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说服后来曾为此而屡屡埋怨的阿列克谢·阿历山德罗维奇·苏尔科夫离开他心爱的《星火》杂志，当了法捷耶夫的第一副书记，把索弗朗诺夫调到《星火》杂志，撤掉了叶尔米洛夫的职务，派他去从事创作，而把我调去当《文学报》的主编，并继续留任作协的副总书记之一。这一举我开始并不完全同意。后来我

阿·弗·索弗朗诺夫（1911—），苏联俄罗斯诗人，剧作家。作品有《莫斯科性格》、《厨娘》等。

同意这样做，是特瓦尔多夫斯基起了很大的作用。法捷耶夫很爱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很尊重他的严格而又独立自主的意见，甚至在心里还把他的意见拿来参考呢。他早就真心实意地想把特瓦尔多夫斯基拉过来参加一项重要的社会文学工作。法捷耶夫到底说服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如果出现这种机会，他就同意到《新世界》来接替我当主编。这次关于《文学报》的决定性的谈话是我们三个人——我同法捷耶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一起进行的。我放弃《新世界》并不惋惜，但我不知道，谁来接管它。不过法捷耶夫说服了我之后，特瓦尔多夫斯基使我感到突然地说，如果我同意拉《文学报》这样的一辆大车，那么他，要是有人提议的话，就不会拒绝去牵我在《新世界》的那条轭索。这次谈话就把事情决定了，加上我对未体验过的事情总抱有一种年轻人过于自信的渴求。我从来都没有当过报纸的主编，叶米尔洛夫所编的报纸，我也远非都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是我到那边去的话，我就得照自己的意见把它的许多地方改过来，而且要改得好一些。就这样，在我上面谈过的会议之前几天，我当了《文学报》的主编，而且签发了3期。

3月6日的笔记，开头写得很简单，记的是斯大林的个别的简单意见，这些意见常常是带讽刺性的或者有点讽刺的意味：

就一幅名为《库尔斯克轭》的战地油画提出授奖的问题，斯大林说：“这里没有什么轭。如果不写明这是库尔斯克的轭，那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在讨论能不能给

一个根据没有得奖的剧作家写的剧本改编的话剧授奖时，斯大林表示怀疑说：“怎么会这样？没有剧本的话剧——这绝不可能。”

1979年3月23日

接着讨论给马戏团演员授奖的问题。有人说，人民喜欢这种演出。这时斯大林发表意见：

“这有什么，人民也喜欢看把戏。怎么，把戏也算是艺术？不，我不是因为马戏团就表示反对，对它们应该好好考虑。在这里，我反对的只是你们以人民为借口。”

随后就转而谈到应不应该给一些写出多卷集之第一部的作者发奖的问题，因为他们还要写第二卷，也许还要写第三卷。

“啊，他做得很巧妙。”斯大林谈到一位作家时说，“其实他写的也是第一卷，不过他不把它叫做长篇小说第一卷，而叫它做长篇小说。可别人做得很老实：他写了长篇小说第一卷，就叫它是长篇小说第一卷。试问，这样为什么就不给它发奖呢？”

后来又谈到给康斯坦丁·谢德赫的一部长篇小说《达乌里亚》发奖的问题。

康·费·谢德赫（1909—1949），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草原上的太阳》、《阳光普照的地方》以及两卷集《达乌里亚》。

“我读过评论谢德赫这部长篇小说的文章。”斯大林说，“依我看，这篇评论有许多地方是不对的。他们说他在小说中对党的作用写得不好。可是，我认为，谢德赫把党的作用写得很好。乌雷宾这个中心人物写得非常好，是个出色的人物。他们指责谢德赫，说他没把拉佐写好。但拉佐很迟才到那里，所以就很少提起他。但有他出场的地方，就写得很精彩。谢德赫在小说中批评那些搞分离的哥萨克人。但运动的主导人物——政委恰好也是个哥萨克人。这部长篇小说有些缺点：拖得太长。有些地方很累赘。有些地方简直写得没有艺术性。但这里有人说，谢德赫要修改自己的小说，把一些新的政论性的东西放进去。可我不想劝他修改这部小说，不劝他放进一些政论性的东西，因为这只能破坏这部小说。”

谈了谢德赫的小说之后，就开始讨论薇拉·潘诺娃的中篇小说《光明的河岸》。

“女作家中潘诺娃是最有才华的。”斯大林说，“我总支持她这个最有才华的女作家。她写得很好。但是，如果要评论她这部新的作品，那么这部小说就比她以前的作品差一些了。5年前可以为这样的一部作品给她颁发比现在更高得多的奖金，可是现在不行。潘诺娃在准备写一部作品时有一些古怪的方法。她抓住一个集体农庄就细心研究它。但这是不对的。应该按另一种方法去研究，应该研究几个集体农庄，研究许多农庄，然后加以总结。合起来加以总结，然后再来描写。要不然，象她这样做，这种研究方法就不对头。”

在潘诺娃之后就轮到讨论科普佳耶娃 的长篇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大林认为必需维护这部小说：

“有人在这里对我们说，在这部小说里，伊万‘伊万诺维奇和他的妻子的关系写得不真实。但是，在她的小说里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如生活里常见的那样。他是个大人物。他有自己的重要工作。他对她说：‘我没有工夫。’他对待她不是象对待一个人、对待一个同志那样，而只是把她看作是生活的装饰品。后来她遇到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触动了这根软弱的弦，触动了她这个软弱的地方。于是她投奔他，投奔这个人了。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是常见的，在我们这些大人物身上也常见。所以小说里的描写是真实的。而且雅库特 的日常生活也描写得很好，很真实。人们总在谈论三角关系，在这部小说里就有许多三角关系。这又怎么样呢？这是生活里常见的的事情。”

到此我要离开我的笔记，谈几句法捷耶夫的事情。我记得，这次会议不是在斯大林的办公室，而是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里举行的。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厅，而是一个相当大的房间，里面放着几排带有乐谱架的椅子，其前面放着一张主席用的不大的桌子，它的左边（如果是从我们这边看的话）摆

安·德·科普佳耶娃（1909—），苏联俄罗斯女作家。小说《安娜同志》和《伊万·伊万诺维奇》均有中译本。

苏联的一个地区。

着一个发言人用的不大的讲台。我不记得，在另一次的会议上谁曾经利用过这个讲台发言。但这一次，是斯大林邀请法捷耶夫代表斯大林奖金评选委员会到这个讲台上来作报告的。法捷耶夫就站在这个讲台后面作报告。我记得，法捷耶夫当时还在继续修改他的《青年近卫军》，并在第二稿中添上了新的几章。与此同时，他还在开始收集材料，写他后来还是没有写成的长篇小说《黑色冶金学》。他到乌拉尔去了，是限期在这次会议的前夕把他拖回来的，他花了半天时间就从那边飞回莫斯科。他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市，正如特瓦尔多夫斯基对这方面所描写的那样，简直象牵着一只狗熊走路的样子，加之为使自已清醒过来，他至少还需要一两个钟头来准备作报告。而现在他在这里，在政治局的会议上，面对着斯大林，站在不合他身高的、晃动的讲台后面。他站在讲台后面，两只手笨拙地扶住它，面前放着几张写好的报告或是报告的提纲，身上穿着一件又短又窄的西服上衣，面色象红砖一样，讲话的声调随着身体的状况由嘶哑声变成了童声最高音，这最高音是从刚喝了点解醒酒而变成嘶哑的声音中冲出来的。

斯大林坐在桌子边。我觉得，这一切他都看得很清楚，都能理解，而且大概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怀着好奇的复杂感情在观察法捷耶夫（看他怎样摆脱这种状况），甚至有点欣赏他（看吧，他要摆脱出来了，再看他是怎么摆脱的）。站在这张讲台后面，在斯大林的目光的注视下，看来法捷耶夫

指有点喝醉，走路东倒西歪之意。

在肉体上很不好受，在精神上也倍感痛苦。但是他，尽其所能，把握住自己的意志，完全正常地做完了报告，说了他打算说的一切，甚至为科普佳耶娃的长篇小说起来同斯大林争论，这部小说是他法捷耶夫极不喜欢的。

他对科普佳耶娃的长篇小说的讲话，我已有了记载，但我同法捷耶夫对话时，这一切看来有点不同。斯大林历数这部小说的优点，主要的是说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事。而法捷耶夫不跟他争论，只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当然，这在生活中常见，但这一切都写得不好。三角关系也常有，但这里的三角关系写得很糟。雅库特的日常生活写得都很对，是真实的，但从艺术方面来衡量，却是写得很差，写得很糟。

“不过我还是认为，应该给这部小说发奖。”斯大林最后说，他对法捷耶夫反对意见还是能够忍耐而且多少有点好奇的。

法捷耶夫听了这句话后，开始看来有一阵子把扶着讲台的两只手放开，束手无策地把两手一摊，表示不愿同意给科普佳耶娃的小说发奖，直截了当地说：“这不过是您的意志。”于是他那双表示无能为力和感到诧异的伸到空中的手，停了一会儿之后，又扶在讲台上上了。

现在我回想这件事情，如果不看一看我那记着事情发生的日期的圣徒日历，那我会认为自己可能把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我记不起来的年份和日子都搞错了，我甚至会觉得这

指载有天主教或东正教的圣徒肖像和他们的生辰忌日以及他们的遗言的日历。

是两年以后，即政治局最后一次讨论斯大林奖金的时候发生的。但是，法捷耶夫讲话的神情，他怎样扶着这张讲台，怎样绝不同意斯大林关于科普佳耶娃的小说的意见，说得准确一点，怎样绝不同意斯大林关于这部文学作品的艺术意义的意见，怎样把两手一摊的情景——这一切直到如今在我面前历历在目，言犹在耳，有声有色。

现在我又回到我的笔记上来。这是 1950 年 3 月 6 日与斯大林会晤后我所写的两篇最详细的笔记。这两篇笔记写的是些在原则上十分重要并超出评价所谈作品的范围的事情。

第一篇是与埃马努伊尔·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奥得河上的春天》有关的，这部小说在那年获得了斯大林奖金二等奖。

“小说是有些缺点。”斯大林结束讨论《奥得河上的春天》时说，“那里不是一一切都写得很真实：罗科索夫斯基写了，科涅夫也写了，但在奥得河那边主要的战线是朱可夫指挥的。朱可夫有缺点，他的某些性格在前方不受人欢迎，但应该说，他打起仗来比科涅夫好，也不比罗科索夫斯基差。这方面在卡扎凯维奇同志的小说里就写得不真实。小说中有一个军委成员西佐克雷洛夫，他在那里干了一个司令员要干的事情，越俎代庖了。结果出了一个漏洞，没有了朱可夫，仿佛他不在人世似的。这是错误的。不过长篇小说《在奥得河上的春天》是一部很有才气的作品。卡扎凯维奇能写而且写得很好。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给或不给他发奖呢？如果给的话，那

么要对卡扎凯维奇同志说，让他以后考虑这一点并且予以改正，他这样写是不对的。无论如何他是疏漏了——换句话说，这样写就不正确。”

在我的笔记中，关于卡扎凯维奇的小说的谈话到此结束。在斯大林这些思考之后，卡扎凯维奇的小说终归还是获奖了。第二天，我在作协法捷耶夫的办公室里遇见卡扎凯维奇本人。为什么同卡扎凯维奇谈话这个任务正好落在我身上呢？这我不能准确地回想起来了。现在只好推测，同卡扎凯维奇谈话，法捷耶夫无论就公私方面都要比我方便得多，但第二天他不知为什么没有来，而斯大林委托要同卡扎凯维奇就《奥得河上的春天》谈话毕竟是一个任务，拒绝完成这个任务是不应该的。

我遇见了卡扎凯维奇就把一切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他讲了。他既对别人也对自己大发雷霆，十分恼火。他在法捷耶夫的办公室里前后来回地走着，气得咬牙切齿，哼哧着，骂起娘来。他回想起编辑部怎样把他的《奥得河上的春天》删改，怎样压榨它，怎样逼他不仅拿掉朱可夫的名字，就连前线司令员的职务也要拿掉。他苦恼地说：“自然，斯大林的感觉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西佐克雷洛夫所做的事情，有一半是我的前线司令员做的，可后来硬要我把这一切都转到西佐克雷洛夫身上。我怎么会同意，怎么会屈从的呢？但要是屈从，谁也不会发表它，要是不作这样的修改，那就别梦想要发表它。可现在又怎么把它改回来？这部小说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而且书又出了两版，又译成了许多其他语言，我

怎么又加上一个前线司令员，现在怎么能修改它，把这人换成另一个人呢？”

卡扎凯维奇的复杂感情我是深为理解的。自然，他也感到高兴，他的小说终归获得了奖金，不过逼他走投无路的的感觉，现在即使有斯大林的帮助也不知如何走出这条死胡同的感觉，依然压迫着他。

在 1950 年这次会议上，斯大林的最后发言，我已尽可能准确地记了下来，尽管这次讲话直接与鲍里斯·拉甫列尼约夫的剧本《美国之音》有关，但它明显地有着纲领性的意义，而且对我们的评论和文艺学都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如何会使它们的术语发生改变。但这些影响并没有发生。为什么，我说不上来。很可能是因为这些年斯大林（我后来不止一次地听到过）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提议，而且也回想不起他曾提出过的思想。自然，谁也没有向他提及这件事，所以这些提议和思想就已烟消云散了。有时这是好事，但有时这说不定是坏事。而这一次，我看是坏事，因此，我现在只好逐字引用我当天写的笔记，然后再谈以后的事情。

“好吧，人们都在批评他。”斯大林谈到拉甫列尼约夫时说，“可你们都还记得他以前的一个剧本《决裂》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现在人们提起他就老是从那个

鲍·安·拉甫列尼约夫（1891—1959），苏联俄罗斯作家、戏作家。他的小说《第四十一》、《第七个旅伴》和剧本《决裂》、《美国之音》均有中译本。

立场上去批评他，说什么他不够做个党员，说他是一个非党人士。这样批评正确吗？不正确。大家总在利用一句话：‘打倒无党派的文学家！’可他们根本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列宁什么时候说这句话的？他说这句话时我们是在野党，当时我们需要把人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那时有一些人在那边，有一些人在这边。当时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都把人们吸引到他们那边去。列宁想说的是，文学——这是社会的事物。我们寻找人们，要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边来。我们当时是在野党，要反对无党派，向无党派宣战，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阵营。一到我们掌权，就要对整个社会负责，对共产党人和党外人士的联盟负责，——这是不能忘记的。我们当时在野的时候，反对夸大民族文化的作用。我们反对立宪民主党人以及他们的一丘之貉利用有关民族文化的这句话来掩盖自己。而现在我们要维护民族文化。必须理解两个不同的立场：即我们是在野党还是执政党。你们看，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他叫什么来着？对，叫阿维尔巴赫。开始他是必需的，可后来就变成诅咒文学的人了。

前不久在杂志上发表了别利克的一篇文章。这是什么人？他也利用‘打倒无党派的文学家！’这句话。他利用错了。这是我们当代的拉普分子，新拉普的理论。他们要求所有的主人公都是正面的，一切都是理想的。但

列·阿维尔巴赫（生卒年月不详），苏联文学评论家。“路标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很愚蠢，十分愚蠢。喏，果戈理怎么样？托尔斯泰又怎么样？他们的正面人物或者完全正面的主人公在哪里呢？怎么，要摒弃果戈理和托尔斯泰吗？这也是新拉普的文学观点。他们引用那句话，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引用它。他们拿起一个作家就责备他：为什么你是党外人士？为什么你是党外人士？怎么难道布宾诺夫 写出他的长篇小说《白桦》的第一部时，他是党员不成？不，他是后来才入党的。你们问问这位评论家吧，他本人是怎么理解无党派的？哎！”

1979年3月25日

我当时写的有关斯大林的谈话的笔记到此为止。

我写这篇笔记的时候，认为有必要在其后附带说，我对这个讲话的实质的理解。下面就是我当时所写的说明：“据我对这个讲话的意见的理解，它说的是要更正确地联合文学的各种力量；它谈到对待文学要象对待共同的事业一样。它先谈到作为这种文学的主人公的态度，然后谈到作为它的整个社会财富的主人公的态度，最后又谈到作为整个社会的主人公的态度。它特别强调，有些人引用列宁的话引用错了，除了时间和空间之外，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形势，而对待文学

米·谢·布宾诺夫（1909—），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永垂不朽》和长篇小说《白桦》均已有中译本。

的党性的口号也是非常目光短浅的。他们错误地理解它，而且不懂得它的实质。同时，他们要求描写的不是现实的生活，而是一些理想和超正面的人物，因此，总的说来，他们都与非党作家的文学脱节。”

现在对我当时所写的笔记还要补充什么呢？

这次会议之后过了几天，法捷耶夫召集了一个小型会议。这次会议我也参加了，但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不是作家，而是由他个别挑选的一些共产党员评论家。斯大林关于如何理解文学党性这一术语和关于在评论界出现新拉普倾向的谈话，法捷耶夫比我更重视。这或许是出于他的政治经验，或许是因为斯大林用了“新拉普评论”这一术语，同时又提到阿维尔巴赫这个人，说不定就是指整个拉普，而法捷耶夫本人又曾经是拉普的领导人之一，因而法捷耶夫就更重视斯大林讲话的重要意义，并且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具体说来就是先集体向中央写一份报告，然后把它印成一篇不太长的文章，根据他的初步想法，这篇文章是以问答的方式写成的。在这篇文章中，说明不依具体情况而滥用“打倒非党的文学家”这个口号的危害，提出另外一个批评的术语，这个术语把文学的党性原则归到更广泛的文学思想性里，借以排除无缘无故地欺负非党作家的可能，避免合适或不合适、恰当或不恰当使用“文学的党性”这个术语。我当时参加讨论这个问题，完全站在法捷耶夫的一边，支持他所提出的最原先的建议，因为我觉得，斯大林对这个问题的讲话的实质以及引起这番讲话的原因，法捷耶夫都理解得十分正确，而且因为我本人还觉得“文学思想性”这一个术语，就对我们的整个文学（包

括党与非党的作家在内)的态度来说是正确的和公正的。

我要补充一点,直到如今我还是这么想的,尽管编写这个理论文献的事情,过了一些时候就已一风吹了。怎么会一风吹的,我不知道。法捷耶夫是否给斯大林提起过这件事情,我也不清楚。很可能是:斯大林当时谈了这个问题之后,就认为无需多说了,而他本人又再也没想起这个问题。谁也不敢给他提醒他已经忘记或者认为没有必要重提的事。也许,同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有理由害怕给斯大林提醒他本人倡议而又不愿重新提起的事情。这样做显然是要冒点风险的,过去有不少经验可资佐证。

讨论1950年斯大林奖金的会议我没有参加,因为我发高烧,卧床不起。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例行的肺炎。但在1952年3月中旬,最后一次讨论斯大林奖金的会议,我始终参加了。我不能准确地说明是哪一天开的会,因为我没有把这个日期记下来。但获奖的名单一般都是在会议之后两天,至多3天就公布的。我现在翻开1952年3月15日的《文学报》,心想,我说这次会议在3月中旬召开,离事实并不太远。

这次会议与历次会议显然不同的是,斯大林没有亲自主持会议,一开始就把主席的职位让给了马林科夫。应该说,马林科夫当时感到很不自在,他坐在主席台上,其余的人离他不远。最靠近主席台的是斯大林,他坐在一张如其他的与会者坐的带乐谱架的椅子上。但是,他很少坐着,经常在他坐的那一排位置上前后来回走,看一看出席会议的人,发表一点意见和提出一些问题。马林科夫的主席职责实际上变成了只照草案中分组排列的名单喊出某一本要讨论的作品。

我现在引用当时的笔记并不按照它们保存下来的序列，而照我现在想加以评述的顺序，即由个别到一般，直到最重要的事情。

在讨论提名获三等奖的作品的時候，我首先记得，斯大林并没有完全读过这些作品。当谈到给图尔松的长篇小说《教师》和巴雅利诺夫的中篇小说《伊塞克湖畔》这两本书授奖时，斯大林忽然问：

“为什么要给他们授奖？是为了这是好书，还是为了这是少数民族的代表？”

这样的一个问题使那几个报告这些作品的人都有点难以启口了。斯大林一看到这种踌躇，就立刻说：

“你们会剥夺人们的前景的。他们会认为，这就很成功了。而人们是需要有前景的。如果你们出于怜悯而给他们发奖，那你们就是在扼杀创作。他们还需要工作，可他们认为，这已很成功了。既然这也获奖，那么还需要往哪儿奔呢？培养人们的工作能力只可能从严，只有从严评价才能创造出前景来。”

此后，当谈到扬卡·勃雷利的中篇小说《扎波罗吉村的黎明》时，大家都称赞这部小说，并说这是一个

卡·巴雅利诺夫（1902—）苏联吉尔吉斯作家，著名作品有《兄弟情谊》。

扬·勃雷利（1917—），又名伊万·安东诺维奇，苏联白俄罗斯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鸟与窝》。

很好的中篇，斯大林怀疑地问：

“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中篇？怎么，书中所有的农民都很好吗？所有的集体农庄都先进吗？没有阶级斗争了吗？一切都很好，所以这个中篇也很好。对吗？可艺术方面怎么样，这也是写得很好的书吗？”

只有当大家都热烈地向他证明，从艺术的观点上看，扬卡·勃雷利的这本书真正是一本好书的时候，他才同意把它提出来获奖，同时撤销了先前谈到的那几本作品。

现在，我要离开我的笔记，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今天的想法。这里有些矛盾：斯大林亲自扩大授奖作品的范围，而对此他是怀着一种假情假义的温厚和宽容态度的。试想他曾这样问过：“他很想获得奖金吗？”“他拼命要吗？”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情况就够了。根据他本人的倡议而设立的三等奖金，如果不说得更多的话，那每年授奖作品的数目都要成倍增加。而且这主要是给文学作品的。可又是他本人，却突然开始表现出严格的要求来，把一些较差的作品排除掉，谈起提高艺术质量的必要性，并详尽地讲述一个作家什么写得成功，什么写得不成功，又说什么太多的政论会破坏一部作品，说什么必须接近生活，又说文学作品不能光写一些正面的、理想的人物，诸如此类等等。

怎么解释在他的见解乃至行动中出现的这种矛盾呢？是情绪和心情的变化吗？未必仅是如此。我认为，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在评价文学方面，斯大林同法捷耶夫很有相似之处。首先，斯大林的确喜欢文学，认为文学在其他的艺术中

是最重要的，最有决定性的，最后能决定一切或者几乎其他一切的东西。他喜欢读书，喜欢讲他读过的对事物具有充分知识的作品。他记得书中的详细情节。他有自己的某种艺术才能（这我毫不怀疑），这种才能也许出自他少年时代从事诗歌创作和酷爱诗歌的缘故，不过一般说来他把颁发奖金看作是政治任务，就如一个政治家把一件工作看作是政治任务一样。在所听到的他的无数发言都证实了这一点。同时，他作为读者喜欢一些书，而另一些就不喜欢。他的审美力决非正确无误。但他有自己的兴趣。我不想猜测，他究竟在什么程度上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和帕斯捷尔纳克，在什么程度上认为布尔加科夫是一个严肃的艺术家。有一些理由可以认为：在许多情况下趣味并没有背叛他，可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却背叛他了。比如说，瓦西列夫斯卡娅所独具的那种凌厉而又带有神经质的文笔，那种在细节上完全夸张，言过其实的描写方法，就很合他的心意。他喜欢这位女作家，别人不喜欢她，他就很不高兴。同时，他又喜欢与此完全不同类型的作品，比如：卡扎凯维奇的书和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

他心里大概有一种旁人看不见的斗争，这是个人内心对作品的评价与对作品当前政治意义的评价之间的斗争。对于

鲍·列·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苏联俄罗斯作家。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作者。

米·阿·布尔加科夫（1891—1940），苏联俄罗斯作家。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作者。

这两种评价他丝毫也不感到为难,而且也从不遮掩。比如,在1952年,他给斯捷潘·兹洛宾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拉辛》以一等奖。这是他十分喜欢的一部艺术作品;而同时又给维利斯·拉齐斯的长篇小说《走向新岸》以一等奖,这本书尽管作为一部艺术作品他极不喜欢,但却认为给它颁奖是相当重要的。这种作法在他看来并不构成什么问题。所以在上面谈到的那次会议上,他就这么说过:“这部长篇小说在艺术上有许多缺点,它写得比瓦西列夫斯卡娅的小说差些,但它对波罗的海沿岸各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结果,他作为读者十分喜欢的瓦西列夫斯卡娅的三部曲,照他的意见,由于在当时没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只获二等奖,而拉齐斯的小说《走向新岸》,照他的意见,比瓦西列夫斯卡娅的小说写得差些,却获得了一等奖。

斯大林对这一次应该获得三等奖的许多作品表示怀疑,但却突然(完全出乎我们所有在坐的人的意料之外)建议,要给德米特里·叶廖明的一部长篇小说《罗马上空的雷鸣》发奖,并且提出如下的理由:“我们的一些作家都写同样的一件事,千篇一律。很少写新的、无人知道的事情,大家都写同样的题材。现在有人写了我们不熟悉的生活。我看之后才知

斯·帕·兹洛宾(1903—1965),苏联俄罗斯作家。他早期写过童话、特写和短篇小说。最受欢迎的是历史长篇小说《萨拉瓦特·尤拉耶夫》、《布扬岛》和《斯捷潘·拉辛》。他在卫国战争中一度被俘,胜利后写了长篇小说《失踪的人》。

德·伊·叶廖明(1904—),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太阳照耀在草原上》、《罗马上空的雷鸣》、《家庭》等。

道他是什么人。原来他是一个电影脚本的作者，他在意大利呆的时间不长，却写了意大利的情况，写那边的革命形势即将来临。这本书有缺点，也许还有失误，但这部长篇小说将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它起着有益的作用。”

1979年3月26日

对这部谁也没有提议颁奖的长篇小说《罗马上空的雷鸣》作出这种令我完全感到意外的评价之后，要举手谈谈这个问题是相当困难的，何况斯大林的发言已够肯定的了。

这部长篇小说的作者，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叶廖明是我在文学院和电影制片厂的挚友。不幸的只是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写得非常之差，而且十分平庸。说实话，仅这一点是不会叫我举手的。在法捷耶夫为科普佳耶娃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同斯大林发生争执的时候，当时法捷耶夫基本上就已不同意这部文学作品有艺术价值了，他不能或者不愿强制自己，硬把坏的作品说成是好的。而今天对于叶廖明的这部小说，我就没有象法捷耶夫那样的感情，或者说，没有象他那样的勇气，在斯大林发言之后，敢于就叶廖明的小说的艺术价值问题跟他拌嘴。但这儿有一个附带的情况：就是在这次之前的一两天，《文学报》收到了一封不知是一个还是两个意大利专家的来信，信上写了好几页证明《罗马上空的雷鸣》的作者对其书中所写的材料完全出于无知而犯的各种错误、不确切和荒谬的事情。这封信迫使我举起手来。我

觉得，我有责任谈一谈它。

我讲了这封信以及它的内容之后，马林科夫立刻问我：“信在哪儿？您带来了吗？”这一问就引起大家无言地要我马上从口袋里掏出这封信来并放到桌子上。但是，我当然没有把信带在身边，因为《罗马上空的雷鸣》这部小说出现在将要颁发斯大林奖金的作品之列，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意外的。于是我说，信我没有带在身边，不过如果需要的话，我明天就可以把它带来。

“当您在这里提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您应该随身带着所有的材料。”马林科夫说。

我坐回自己的位置上，而《罗马上空的雷鸣》就还是被决定授予斯大林奖金三等奖。

为了不再回到这个在我当时的笔记中毫无痕迹的话题，我再补充说一件事。在这个以失败而告终的发言之后，据后来了解，我还面临着一次考验。在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看来各项奖全都已研究过了，斯大林摸一摸放在他面前的一捆书和杂志。据我所知，那儿放着的经常是《星》，因为斯大林依然不间断地留心着这份列宁格勒的杂志，并通过它来注意列宁格勒的事情。接着他说：

“这儿发表了一篇写得不坏的中篇小说，是我们著名的潜水员约瑟利安尼写的，由克列姆廖夫从格鲁吉亚文翻译过来。我们要不要给这部东西发奖呢？大家有什么意见？”

意见都是肯定的。

“要给。”“应该给，应该给。”“是一本好书。”——我从坐着政治局委员们的第一排座位上听到的大致是这样简短的

答话。

这时我又举起手来了。这一次我一点也不犹豫，而且认为自己简直无权保持缄默。我知道《一个潜水员的笔记》这本书所发生的事情。这的确是一本写得不坏的书，它是由作家伊里亚·克列姆廖夫根据潜水员约瑟利安尼的口述而写成的。在这本书发表以前，文学界已经发生过几起不太光彩的事情了。一些合著者（回忆录作者和它们的文字整理者）之间为着稿费而发生了争吵。而且在这些争吵当中，那些所谓文字整理者结果都往往失败：在发行第一版的时候，他们和作者照商定的那样共同分享稿酬，而后来各版，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执笔的作者就简直没有他的那一份稿酬了。按照著作权的方面的理解，在以后各版中是可以这样做的。显然，克列姆廖夫害怕这一点，因此，就想出了从格鲁吉亚语译成俄语的花招，这样一来，在《星》杂志上便出现了约瑟利安尼的中篇小说，但实际上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翻译作品，因为约瑟利安尼（他虽是斯万族人，但从小就生活在俄罗斯，是俄国保育院的学生）根本不懂格鲁吉亚语。他只会说俄语，从格鲁吉亚语翻译出来实际上不可能。但小说在杂志上发表获得成功，而且得到很好的评价，后来又出单行本之后，克列姆廖夫想到这本书将来有可能获得斯大林奖金，于是迫使不太熟悉文学界事情的约瑟利安尼跟他克列姆廖夫签订了一份合同，说一旦此书获得斯大林奖金，他们就把这价奖金对半分。据我所知，这样的合同在文学界里是没有先例的。此后过了一些时，约瑟利安尼和克列姆廖夫照例发生了对人品的互相猜疑。在战时表现得异常英勇，而在文学的丛林中却迷

了路的约瑟利安尼，就到《文学报》来找我，陈述了自己的担忧之后，就着重讲了这件有关斯大林奖金的先发制人的合同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所以开始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至我的面上可能露出了惊讶之色。于是约瑟利安尼说，他现在就坐下来照实写出一切情况，让它作为证据放在我这里。我没有理由反对这样做，约瑟利安尼就把他对我讲的一切都写了下来，我也就把这份文件放进保险柜里。

过了个把月，伊里亚·克列姆廖夫显然听到约瑟利安尼的不友好的行动，也带着一封造谣中伤的信来到《文学报》，在这封信上讲了他的合著人约瑟利安尼的各种罪过。我也把这封信放进保险柜里，同第一封信放在一起。事实上会发生由合著者商定共分斯大林奖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不过我作为报纸的主编，已经碰上了这种类似的情况，虽然它们还不足令人发指，但我总还觉得，这些材料和其他的一些材料会帮助我们写出一篇文章来，谈谈我们文学界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并建议把这种事情纳入严格的范围，以免再玷辱文学家以及过来的人们。

因此，在听到了一片呼声：“要给”，“应该给，应该给”，“是一部好书”之后，我就站起来请求发言。大家让我发言了。我说，这本书真的是很有意思，不过不能给它颁发斯大林奖金，因为这本书一开始发表时就有欺骗。这不是由克列姆廖夫从格鲁吉亚语翻译的作品，而是由他作的文字记述。这篇作品不可能从格鲁吉亚语译出来，因为约瑟利安尼根本不懂格鲁吉亚语。

我清楚地记得，贝利亚怎么沉重地把他的椅子弄得嘎吱响，转过身来对着我，猛然打断我的话说：

“他怎么不懂？约瑟利安尼怎么会不懂格鲁吉亚语？他懂得格鲁吉亚语。”

“不，”我说，“他不懂格鲁吉亚语，他的同事，许多海员都知道这件事，何况他本人也不隐瞒这一点。他在给《文学报》的信中已提到了这件事。”

“您这封信在什么地方？您有这封信吗？”

“这封信在《文学报》里。”我说。

我觉得贝利亚还想说些什么，但这时斯大林问：

“好吧。现在还有什么意见，给还是不给这本书发奖？”他说这句话时很平静，可能，他甚至已经决定，这件不是翻译作品的事情，在他看来已不是那么重要，毋须予以重视了。

“斯大林同志，”我说，“克列姆廖夫早就同约瑟利安尼签了合同，如果他们得了斯大林奖金，那他们就对半分。我觉得，既然有人准备这么干，那就不能给他们发奖。”

“您的证据在哪里，真有证据吗？”贝利亚又转过来问我，“您是有证据还是讲空话？”这一次他更加粗鲁地挑衅了。

我来不及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忽然一片沉寂。显然，在贝利亚的狂叫下，我没有听到斯大林开头说的几句话，只是在寂静中才听到他后一句话。

“我们撤销这个选题。”他说。

他脸上露出厌恶和不满的表情。

贝利亚对这件事情的积极干预使我担惊受怕，这里可能埋伏着一种危险，而且是极大的危险。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

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有关贝利亚的事情，但他是一个相当可怕的人，这一点我们已有所认识。正如常言所说，我们对此总是牢记在心。所以，政治局的会议一结束，我便立刻跑回《文学报》去。路上我想，一切都可能发生，在进行会议的时候，在我回到这里之前，说不定已有人先到这里，趁我不在就把保险柜打开，等我回来，保险柜里那些我所引证的文件就已不翼而飞了。那时怎么办？但是一切都在原位，文件还放在那里。我把它们拿出来，不失时机，立刻跑到我的老朋友女速记员穆沙·尼古拉耶芙娜·库季科那里。我让她把这两封信另复制了两份，一份拿回去放在《文学报》的保险柜里，另一份放在我的口袋中，再把原件带到作协去，放在那边的保险柜内。我的行动也许有点幼稚，不过这些行动也有道理：我明白，由于斯大林对我的态度颇为友善，在这种情况下贝利亚未必会对我干出什么，但那些必然会想到的信件就随时可能出问题。不管怎样，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翌晨，我一清早就到作协去，我做得很正确，10点过几分，果然有电话来找我，不过不是贝利亚打来，而是当时的武装部部长布尔加宁的秘书处打来的。他们问我能否立刻把我昨天提到的有关《一个潜水员的笔记》这本书的文件提供他们使用。我说可以，可以派人来把它们拿去。我请我们作协办公室的主任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副本，又从我在作协的保险柜里拿出原件，交给她去核对，然后在副本上签字盖章。这事刚一做完，武装部的信使就来拿材料了。

现在我写这件事情有些怀疑甚至嘲笑自己，嘲笑自己是否小题大做。过了相当一段时间来看，这显然是小事一桩，现

在看来都会令人捧腹大笑，不过那时我怎么也不会感到可笑的，如果讲到那个时代的话，我也许还是对的，尤其在我免不了那种事情的时候。

现在我回到笔记上来。

撤销其他几本书之后，一个出席会议的人提议以奥丽加·济芙的长篇小说《紧张的时刻》来补充获奖作品的名单。后来得知，斯大林是读过这部先前没有被提名获奖的小说的，作为答复给这部小说发奖的建议，他说，小说写得很有意思，但我们的小说为什么几乎从不描写工人的日常生活。工人的日常生活写得很差。所有小说都没有日常生活，只有竞赛，而工人的日常生活却没有被描写，斯大林重复说。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算是例外，那里有工人的生活扣日常生活。但这一本书是唯一的例外，它讲到人怎么生活，他得到些什么，他的文化兴趣是什么，他的生活如何，他的日常生活怎么样。而济芙的书却没有工人的日常生活，既然没有日常生活，那就没有工人，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对事情也具有深厚的知识。

拒绝这本书之后，斯大林还继续讲了几分钟，谈我们怎么很少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说这是我们的文学的一个大缺点。

弗·阿·柯切托夫（1912—1973），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作品《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等均有中译本。

那天的全部讲话都是从讨论斯捷潘·兹洛宾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拉辛》开始的。我想把这篇笔记分出来，特别谈谈这个讨论是如何进行的，因为它使我产生了强烈而又难堪的印象。

笔记的开头是：

“兹洛宾很清楚地看出了拉辛运动中农民与哥萨克的基础之间的区别。”斯大林说，“兹洛宾第一次在文学中揭露这一点，他做得很出色。总之，拉辛，普加乔夫和博洛特尼科夫 这三次运动中，只有博洛特尼科夫的运动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而拉辛的运动和普加乔夫的运动都只有浓厚的哥萨克人的色彩，拉辛和普加乔夫都只是忍受与农民结盟，只容忍这个同盟，他们不了解农民运动的全部力量与威力。”

这就是我当时的笔记。

斯捷潘·拉辛（约 1630—1671），1670—1671 年农民战争的领袖。顿河哥萨克统领。1670 年春领导农民战争。后被出卖处死于莫斯科：叶米利扬·普加乔夫（1740—1775），1773—1775 年农民战争的领袖，顿河哥萨克。1774 年被出卖处死于莫斯科：伊万·博洛特尼科夫（？—1608），1606—1607 年农民起义首领。1607 年被流放到卡尔戈波尔，并被弄瞎、溺死。

1979年3月27日

我清楚地记得，斯大林谈了这部小说的政治方面和它的历史真实性之后，转而谈到它的艺术成就。他用一些他不常使用的词语对兹洛宾的小说夸赞了好几分钟。他称这部小说是非常有才华的，说作者是一个资质深厚的人，说他写了一部杰出的历史著作。根据斯大林对这部小说所说的一切，他是非常喜欢兹洛宾把它写出来的。

看来，到此就应该结束，但是当我和其他的人一样，认为讨论要转到下一部作品，兹洛宾的一切都已明白而且谈完了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我已不记得是谁，可能就是担任主席的马林科夫）翻了翻一个卷宗说：

“斯大林同志，这儿有一个审查报告，说兹洛宾被俘期间，在德国集中营里表现不好，对他提出了严重的追究。”

这真象晴天霹雳，这种事我还从来没有在一次会议上听到过。自然，我明白，在准备讨论斯大林奖金的材料时，会有人按其职务提供有关作者的相应的档案材料。但是，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谈到过，如果有什么与此有关的事情需要讨论，那显然要放到另一个没有我们这些闲人在场的时候。

斯大林听了这番话就停下来（当时他在走动），很久不发声，后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两排人之间前后来回走。突然，他打破沉默，小声地，但在一片寂静中听起来也相当响亮地提出一个问题，这不是问我们，而是问他自己。

“原谅……”他往前走，接着转过身，又停下来，把话说完，“还是不原谅？”

他又开始走动。我不知道，这花去了多少时间，也许不多，但由于气氛紧张，总觉得时间漫长难耐。

“原谅还是不原谅？”斯大林又重复说，现在已经不是把一句话分作两半说了。

他又开始走动，又转回来，又以同样的语调重复说：

“原谅还是不原谅？”

他前后来回走了两三次，然后自己回答自己说：

“原谅。”

就这样，斯大林当着我们的面独自决定了一个我们熟悉的、他的书我们读过的人的命运。对于兹洛宾我比别人知道得少些，对他的书我不感兴趣，对他本人我也无所谓好感或恶感。但是这个人的命运——是生还是死，就在你的眼前决定了。因为用那种语调说出来的“原谅还是不原谅”这句话，我当时觉得，其背后一方面是斯大林奖金，而另一方面则是集中营，也许是死亡。这里面有一种使人感到难受和可怕的、沉重的东西——这不是我后来的感觉，而是当时的感触。

如果讲到后来的感觉，那么，实际上这句话不是说要不要原谅一个对祖国有罪、但又已为这个国家的历史写出了一本优秀作品的人。正如后来所查明，兹洛宾不仅对祖国没有任何罪过，相反，他在集中营里表现得异常英勇，在集中营的苏联人地下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在我们面前所说的这句话，不是说要不要原谅一个罪人，而是说要不要相信对一个完全无辜的人的诬陷，相信那时总以虚假的确凿证据

为其必要特征的那种诬陷。

现在想到这件事，你事后便可以看到斯大林扮演着一个拥有不容反驳的生杀大权的最高法官的角色。这比那时在我们跟前所表演的角色更叫人难受，何况对一切事情都可能产生任何意料不到的想法。事后我有理由认为，在这唯一的场合下，未必会忽然对兹洛宾干出在任何其他场合下都不会干出的那种事情，这种事情一向都是事先讨论过了的。我上面讲过切特维里科夫的事件不能推翻这一点，因为那儿讲的是斯大林读过的一期杂志，他忽然想起来，并使大家感到意外地喊出那个剧本的两位作者的名字，而其中一人却呆在集中营里。这种情况完全是可能的，因为事先谁也不知道，斯大林会提起这个剧本。而对于兹洛宾，对于他的已经首列为获得斯大林奖金一等奖的名单之内的小说，这样的事就不可能发生。

现在我几乎确信，斯大林早在会议之前就已经清楚地知道那个在适当的时候为兹洛宾准备的案卷了，并且已经作出决定授予兹洛宾的《斯捷潘·拉辛》以一等奖，现在也不把它降为二等奖或三等奖，依然给他一等奖。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出戏——“原谅还是不原谅”——是演给我们出席这个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看的。好让我们知道，一如往常那样，是谁最后解决这些问题的。即使是一个有罪过的人，是谁可以作出决定原谅他并给予他以奖金的。甚至对一个人的罪过是谁给他作出这种非常公正的判决的。别的一些人只会记得他的罪过并且认为不能原谅他，而斯大林却认为，如果这个人做出了一件出众的事情，那么这种罪过也是可以原谅

的。

我不敢断言，这一切正是如此。不过我差不多可以确信，我的猜测是对的，而且在某些场合下，斯大林所独具的才能会使他成为一个大的，甚至是伟大的演员，而且这种才能也还是他的政治才干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 1952 年那最后的一次会晤上，还有一件事情使我对此确信无疑。我现在觉得，就在这次会晤上，斯大林曾两次在我们这些专门指定的听众面前扮演了这种角色。一次是为兹洛宾的小说，而另一次是为马尔采夫的小说《南斯拉夫的悲剧》而演的。

我保存的笔记的开头是这样的：

当开始讨论奥列斯特·马尔采夫的长篇小说《南斯拉夫的悲剧》时，斯大林问：

“为什么是马尔采夫，而括号里却是罗文斯基？问题在哪儿？这还要继续多久？去年已经谈过这个问题，禁止以双姓提出来获奖。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写双姓？如果一个人为自己选用笔名——这是他的权利，我们不会谈别的什么，只讲起码的礼貌。一个人有权用他选择的笔名来写。不过，显然有人喜欢强调，这个人有双姓，强调这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散播反犹太人主义？谁需要这个？应该用他本人写的姓名去写。一个人想有自己的笔名。他

奥·米·马尔采夫（1906—），苏联俄罗斯作家。作品有：《群山在颤动》、《春天的朝气》、《南斯拉夫的悲剧》等。

觉得这样做对他本人很自然。为什么要把他往后拉呢？”

这就是有关这方面的全部笔记。我补充一点，斯大林说话时很生气，我甚至要说，他已大动肝火了，而且对发生的事情有誓不两立的样子，因为刚好这时他把一只手指指向天空。

1979年3月30日

问题是：长篇小说《南斯拉夫的悲剧》的作者奥列斯特·米海洛维奇·马尔采夫，在其姓后写上了一个使斯大林大为恼火的姓“罗文斯基”。实际上他的族系是俄罗斯人，出生于库尔斯克州斯卡罗德村。他在以前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匈牙利狂想曲》上，因书名读音相当响亮而在其听起来也是很响亮的名字奥列斯特后面写上了一个犹太人的姓“罗文斯基”，而这个姓又恰好与当时《消息报》的主编的姓相同。这一切原因我当时并无所知。但是，不论愿意不愿意，我不得不站起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括号内写上“罗文斯基”这个姓并无反犹太人主义的意思。现在我自问：为什么当时我要站起来提供这个情况呢？多半是因为在这之前约莫1年，在《文学报》和《共青团真理报》上开展布宾诺夫、肖洛霍夫和我之间关于笔名问题的争论，这个争论既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也引起了作家的关注。这个问题在1949年具有非常重要的性

质，原因是在反世界主义评论家运动的那个可悲的、难忘的年代里，有一些人竭力尽可能经常地在其文学界早已习惯称呼的笔名之后一定加上作者的真实的犹太人的姓。

对于当时出现的一些辩论文章，我个人负有一部分痛苦的责任，这一点我已经谈过，后来也见诸报刊了。当要写到有关 1949 年的一章时，我还要在这些笔记中讲到这个责任。自然，我不是一个反犹太人主义者，在那些阴暗的年代，当我讲话和写文章的时候，都没有在笔名后面加上一个括号。我清楚地记得，女作家费里达·阿布拉莫芙娜·维格多罗娃，一个我非常敬重的、真诚而又严格的人，给我寄来了一封充满愤怒的信，这封信使我感到揪心的痛苦。她在这封信中气愤地说，我怎么能够，怎么容许在我的一篇讲话中把这个该死的括号加在笔名后边。事实上这与我毫无关系，只是那个写总结的人，在说明我在某次讨论会上没有这已够坏的发言时，忽然想起来就随处加上一些括号。

过了一些时候，幸好这个问题的尖锐性仿佛有所缓和。虽然还可以听到一些异常明显的鞭挞声和不公正的吆喝，但已有所改正。1951 年 2 月《共青团真理报》（我不知道是谁指使和在谁的压力之下）忽然抛出了米哈伊尔·布宾诺夫的一篇文章《现在是否需要笔名》。显然，这是有人需要发这种文章，准备为某种新的精神打下基础，为反对世界主义的评论

费·阿·维格多罗娃（1915—1965），苏联俄罗斯女作家。作品有《我的班级》，《这是我的家》等。

家的运动而放出这种试探气球。在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随波逐流的，但反犹太人主义的耳朵就从中竖得相当高了。

我们决定在《文学报》上不让这篇文章不受惩罚，于是我就简短地答复了它。这一来我们就受到了重炮轰击。那篇发表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支持布宾诺夫的、回击的文章是由肖洛霍夫署名的。这是怎么组织和怎样组织的，我简直一无所知。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当我读完这篇文章的时候，就马上打电话去问他（在这之前我们一直都没有发生任何个人的冲突）：“米沙，难道这篇文章是你本人写的吗？”这是愚蠢的冲动，因为对于这样的问题，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别人当然只好回答是的，但我直到如今却还不完全相信这是他写的。

不过，毫无办法，只好再答复一次，而这一次是回答肖洛霍夫的。在我的答复后，辩论也就结束了。显然，策划在《共青团真理报》上放出的试探气球提早落下来了，揭露和铲除笔名的企图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

我在下面用星号隔开，暂时中断我的叙述，把关于笔名问题的辩论文章作为对我的叙述的注释引用出来。尽管这些文章要占去不少篇幅，但我觉得，它们对于我引用过的斯大林关于括号问题的意见，以及对于斯大林在其生命最后的几个月中所发动的某些最令人难堪的事件，也许都有一定的关系。



1951年2月27日，《共青团真理报》

米哈伊尔·布宾诺夫

现在是否需要笔名？

使用笔名，就是说，使用假名，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现象，有它相当深远的历史。在沙皇俄国，这个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暴力和凌辱的社会制度的条件所引起的。许多革命工作者，具有民主倾向的社会活动家、作家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反对沙皇制度，经常进行地下活动，为生活本身以及自己活动的环境所迫，不得不用笔名和暗号隐藏起来。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笔名或则成为伪装以躲开藐视他们“不体面的”活动的“上流”社会，或则成为他们的思想实质和政治倾向的用语，或则表示对现行社会制度的独特的抗议，而有时又表示对未来的想望。最后，一些经常只能用俄语演讲的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代表也不得不使用笔名，所以他们都为自己改用俄国人的姓名。

社会主义革命后，我国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情况

已发生剧烈的变化。促使以前改名换姓的基本理由已经消灭。自然，一些长期使用笔名的同志，在社会主义革命后依然使用笔名，这是完全自然和完全可以谅解的。然而，这只是因为他们的笔名早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共知的姓氏了。但是，从没有一个在革命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党和国家的活动家把自己的姓氏改用笔名。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一般说，在个别情况下，只有一些农村通讯员在某些时候用过笔名，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是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只有文学工作者是这个古老传统的明显的维护者。

在我国建成的社会主义彻底地消除了促使人们使用笔名的一切理由。任何旨在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活动在我国都得到一切鼓励。从事这种活动并借助布尔什维克的批评推动社会事业前进的人们，在我们这里都受到尊敬。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公开讲话，他们无需用笔名避开社会。相反，我们的社会希望知道这些人的真姓实名并给他们以无上光荣。

虽然如此，但一些文学家还抱着惊人的、本应得到最好运用的顽强态度来支持这种陈旧的、早已过时的传统，而且其中有许多是刚开始文学生涯的年轻作家。

我们举几个例子。

年轻的、有才华的俄罗斯作家费连楚克忽然无缘无故地选用一个笔名费连斯。这是为什么？费连楚克这个姓哪里比笔名费连斯差？

马里诗人阿·伊·比克穆尔津采用笔名阿纳托里·

比克，问题在哪里？莫非诗人喜欢这个姓的 1/3，而其余的 2/3 就不喜欢吗？

乌德摩尔梯作家伊·塔·佳久科夫决定改为伊万·库多。为什么他不喜欢他的真姓？

白俄罗斯女诗人尤·卡冈选了个笔名叫爱荻·奥格涅茨维特，有什么必要迫使她这样做呢？

乌克兰诗人叶·邦达连科，显然看到别人这么做，自己也忍不住了，哪怕把自己的姓改两个字也行，现在他的笔名是班都连科。

楚瓦什诗人尼·瓦斯扬卡署名萨兰卡，年轻的莫斯科诗人李杰斯变成了列·李霍杰耶夫，斯·法因彼格成了斯·谢维尔采夫，尼·拉姆巴赫变成了尼·格列布涅夫。

笔名爱好者总是企图为自己古怪的爱好辩护。

一些人说：“我不能用自己的姓署名，因为我同姓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俄国文学中就有 3 个托尔斯泰，大家都认得他们，不会搞错。

另一个人叫喊：“得了吧！我用笔名只是因为我的姓读者很难念，也很不好记。”可是大家都清楚，如果作出一些好作品，读者就会记得你的名字！（自然，我们还碰见一些不好听、甚至有侮辱性的姓名——那是过去奴隶主给自己的奴隶取的。这样的姓应该按规定的程序改换过来。）

总之，辩护的理由是很多的。

不过，我想在这里给所有不尊重自己的姓的人引用

谢尔盖·斯米尔诺夫 的一首著名的诗《献给所有斯米尔诺夫同志》的诗句。谢尔盖·斯米尔诺夫自豪地讲了他在全国有很多同姓的人之后，进而写到他从报纸上得知一个同姓的人——一个被揭露的人民的敌人：

我不隐瞒，
因为他，因为这个坏蛋
我打算，
把自己的姓更换。

但这里斯米尔诺夫想起了所有的亲属和同姓的人，想起了勤劳的、留下光辉回忆的祖父……

如果发生这种改变，
那就十分清楚，
这是对祖祖辈辈，
明显的背叛。
不！
我以自己的全部力量，
对未来发誓，
为了我的亲属与同乡，
为了你们，

谢·瓦·斯米尔诺夫（1913—），苏联俄罗斯诗人。作品有：《坦率的谈话》、《致友人》等。

保家卫国的
新战友，
为了靠正当劳动
生活的
斯米尔诺夫大军
定要保存
这个姓氏！

很明显，诗人谢尔盖·斯米尔诺夫与许多被提到的和这篇文章中没有被提到的人不同，他有非常重要的理由可以为自己不仅采用笔名，而且还可以改换姓氏。但他没有这样做。他为自己出生于斯米尔诺夫的家族而自豪的感情看来是多么强烈！

为什么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现在是否需要笔名？

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文学传统，正如其他许多类似的传统一样，都已经过时，而且在苏维埃的条件下，它有时还给我们带来严重的祸害。一些仇视文学事业而又不愿人民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的人，通常都躲在笔名下。文学界里的一些世界主义者非常喜爱用笔名，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现在，对于个别半吊子文学家以及潦草塞责的家伙来说，笔名就成为他们伪装的手段，并且帮助他们在出版物上从事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和施展鬼蜮伎俩，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他们经常同时用各种笔名写文章，或者常常改变笔名，千方百计地搞乱自己的肮脏痕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不怀好意的人在一张报

纸上夸赞某部作品，而一个星期后又在另一张报纸上辱骂它。

顺便谈谈报纸杂志的编辑在这方面的作用。有些编辑经常对一些作家和新闻记者躲在笔名之下装作不知，而且有时自己还纵容他们去做这种独特的朝三暮四的事情。比如说，一个新闻记者写一篇简短的关于集体农庄开始收割的通讯，他在这篇文章下一定写上一个笔名，而编辑部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可是这样考虑是不应该的！

我们觉得，永远消灭笔名的时候已经到了。任何一个在文学方面竭诚劳动的苏联作家的名字在我国都会被认为是最美的，而且会受到我国各民族人民的莫大尊敬。毫无疑问，同笔名作斗争对提高每一个在文学舞台上工作的人的个人责任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1年3月6日，《文学报》

谈一篇短文

在苏联著作权中指出：“只有作者有权决定，他的作品发表时是用真名、笔名还是不署名。”（见《苏联大百

科全书》第二版，第一卷，第 281 页)但是，这个原先由每个作家独自解决的问题，而今由作家米哈伊尔·布宾诺夫一人包办了，他一个人替大家解决问题，便认为和决定今后笔名是“一种独特的朝三暮四的事情”，“永远消灭笔名的时候已经到了”。

在《现在是否需要笔名》这篇短文中(见《共青团真理报》，第 47 期)，米哈伊尔·布宾诺夫列举了一些年轻作家的名字，这些年轻作家的笔名是不合他布宾诺夫的口味的。

我看，如果布宾诺夫对这些同志分别地当面谈谈自己的想法，而不在报刊上统统拉在一起来谈，那就更聪明了，因为问题是他喜欢或不喜欢某一个同志的笔名——这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

但是，既然米哈伊尔·布宾诺夫决定公布一些有笔名的作家的名单，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在这个第一批的名单中，竟避开了我们许多有名望的、也为自己选用这样一些笔名的作家呢？例如：波列伏依、波戈廷、马尔采夫、雅申、萨麦德·武尔贡、奥斯塔普·维斯

俄罗斯作家，《真正的人》的作者。原姓：卡姆波夫。

原译包哥廷，俄罗斯剧作家，《带枪的人》的作者。原姓：斯图卡洛夫。这里可能是指叶·尤·马尔采夫，俄罗斯作家。《全心全意》的作者。原姓：蒲普科。

俄罗斯作家，《阿廖娜·福明娜》的作者。原姓：波波夫。

阿塞拜疆作家、诗人，《穆甘》的作者。原姓：维基洛夫。

尼亚、加林、艾别克、克拉皮瓦、扬、马克西姆·唐克、马·伊林、基阿切利、图尔兄弟、梅登斯基^⑩、伊万·列^⑪、巴希罗夫^⑫等。

我个人觉得，布宾诺夫是有意识地道出一些年轻作家的笔名而避开这个著名名单（它还可以扩充）的，因为布宾诺夫一列举它，就立刻成百倍地更清楚看出（不过，现在已够明显了）这种把笔名看作是“朝三暮四”的，毫不懂礼和肆无忌惮的指责的绝顶荒谬了。实际上，在他这篇短文中，他把所有因各种理由（这只与他们本人有关，跟谁也没有关系）而使用笔名的作家都非难一通。

我还补充一点，布宾洛夫所引证的反对笔名的论据，

乌克兰作家，《樱桃的讪笑》的作者。原名：巴维尔·米海洛维奇·古边科。

俄罗斯作家，《在一个居民点里》的作者。原姓：罗加林

乌兹别克作家《纳沃伊》的作者。原姓：塔什穆哈麦多夫。

白俄罗斯作家，《最后笑的人》的作者。原姓：阿特拉霍维奇。

见前注。

白俄罗斯诗人，《亚努克·夏利巴》的作者。原名：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斯库尔克。

俄罗斯作家，《山和人》的作者。原名：伊利亚·雅科夫列维奇·马尔夏克。

格鲁吉亚作家，《格瓦基·比格瓦》的作者。原姓：申盖拉亚。

俄罗斯剧作家，《易北河会师》的作者。这是列昂尼德·达维多维奇·图别利斯基和彼得·利沃维奇·雷热伊的共同笔名。

⑩ 俄罗斯作家，《荣誉》的作者。原姓：波克罗夫沃基。

⑪ 乌克兰作家，《山谷中的故事》的作者。原姓：莫伊夏。

⑫ 鞑靼作家，《故乡—我的绿色摇篮》的作者。原姓：巴希罗维奇。

大部分都是令人喷饭的。布宾洛夫说：“我们的社会希望知道这些人的真姓实名，并给他们以无上光荣。”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希望知道卡姆波夫这个姓并给予它无上光荣，为什么它不应该给波里斯·波列伏依这个笔名以荣光呢？

米哈伊尔·布宾洛夫说：“大家都清楚，如果创作出一些好作品，读者就会记得你的名字。”我不明白，为什么读者一定要记住罗加斯这个姓，是什么妨碍他们记住波里斯·加林这个笔名？

谈到一些不好听的姓名时，布宾洛夫说：“这样的姓只应该按规定的程序改换过来。”第一，姓名是否好听——这是一个趣味问题；第二，我不明白，比如说，为什么戏剧家波戈廷，按其身份证上写的姓是斯图卡洛夫，忽然按规定的程序改换这个姓，而他又不向布宾洛夫请示，只给自己选个笔名“波戈廷”，这个情况 20 多年来都完全使读者和观众感到满意。布宾洛夫说：“笔名的爱好者总是企图为自己古怪的爱好辩护。”我不明白，布宾洛夫在这里讲的是什么辩护，因为完全没有人打算在他面前替自己辩护什么。

如果有人现在需要寻找辩解的理由，那么大概只有米哈伊尔·布宾洛夫本人，他发表了一篇按其本质是不正确的、按其形式是大叫大喊的短文。在这篇短文中，充满着妄自尊大教训一切人的口吻，而自己却不愿花一点气力去弄清问题的实质。一个年轻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竟有这样的口吻，那是很可惜的。

至于布宾洛夫在其短文中顺便提及的有关潦草塞责的人的问题，那么，这与布宾洛夫的意见相反，笔名与此毫无关系。确定某篇发表了的文章或短文是否潦草塞责不是根据它的署名（笔名或真名），而是根据它写得怎么样，发表一些敷衍塞责的文章和短文不是由于笔名，而是由于编辑要求不严的结果。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基里尔·米海洛维奇·西蒙诺夫)

1951年3月8日，《共青团真理报》

米哈伊尔·肖洛霍夫

戴着放下了脸甲的……

留心读完了米·布宾诺夫在《共青团真理报》上的文章《现在是否需要笔名》和回答这篇文章的康·西蒙诺夫在《文学报》上的短文《谈一篇短文》后，老实说，对于西蒙诺夫在同布宾诺夫辩论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理解的激怒，以及西蒙诺夫在狂热捍卫文学界使用笔名时所援引的没有根据的理由，我感到十分惊讶。

在为自己捍卫笔名的理由找出“法律依据”时，西

蒙诺夫一开始就援引苏联的著作权，其中说：“只有作者有权决定，他的作品发表时是用真名、笔名还是不署名。”但西蒙诺夫没有提到，这个著作权是25年前才有法律效力的，它已经过时了，未必要把它奉为经典。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我国文学界从未出过一本不署名的作品，况且由于完全合理的原因恐怕也不会出这样的作品，哪怕只是这一个事实也可以证明1925年公布的著作权已经“老朽”了。

康·西蒙诺夫争辩时的热烈劲头和批评别人时的麻利劲儿真是捉摸不透的。要不然怎么解释哪怕是这么一种情况：西蒙诺夫有意识地把牌搅乱，硬说笔名的问题是个人的问题，而不是社会的问题呢？不，这是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问题，如果这是个人的问题，那么何劳《文学报》的主编西蒙诺夫在该报上发表《谈一篇短文》的文章呢，西蒙诺夫打个电话给布宾诺夫私下谈谈不就得了吗？

西蒙诺夫说：“……米哈伊尔·布宾诺夫列举了一些年轻作家的名字，这些年轻作家的笔名是不合他布宾诺夫的口味的。”但问题完全不在于口味，也不在于谁喜欢不喜欢。现在讲的不是奶油冰淇淋，而是文学生活，在这种争论中，“喜欢”这个动词用得也许很不恰当，而且也决不会在西蒙诺夫的论据中加强其阵地。

西蒙诺夫采取无理的盛气凌人的态度指责布宾诺夫毫不懂礼，大叫大喊，妄自尊大，肆无忌惮，绝顶荒谬等等，却看不见自己的文章中所有的这些品质，这些品

质都从他的每一句话中冲出来，而且相当难闻。例如，照西蒙诺夫的意见，他这个主意就无比“聪明”：“……我看，如果布宾诺夫对这些同志（指用笔名的人——肖洛霍夫注）分别地当面谈谈自己的想法，而不在报刊上统统拉在一起来谈……”西蒙诺夫当然清楚，我们使用笔名的作家是如此之多，如果布宾诺夫敢于“分别地”跟每一个人谈自己对笔名的想法，那么布宾诺夫大概就得活到须发皆白。

西蒙诺夫有意把读者引开问题的本质，指责布宾诺夫不在自己的名单中援引一些使用笔名的著名作家。但布宾诺夫的文章讲的不是那些早已为自己选用某个假姓的而又为苏联读者所熟悉的作家。布宾诺夫也没有企图消灭他们的笔名。他讲的是我们今日步入文坛的青年，毋需再继承这个已经过时的“传统”。我想，布宾诺夫提出这个问题是正确的，他说年轻的作家不该为自己的祖辈用了一个不好听的姓而感到羞愧，他们可以寻找一个好听的姓来替换它。

最后，布宾诺夫的文章说得很对，一些新出笼的笔名的享有者使我们的文学界产生不负责任和逍遥法外的现象。那些半吊子文学家和“小甲虫”轻巧地一年换上5个笔名，而且以同样惊人的轻率态度，在失败的时候，就把文学家的职业改换成熟皮匠或钟表匠的职业，——他们给文学带来莫大的危害，并把象洪流一样涌进强大苏联文学河床中的健康青年败坏。

布宾诺夫没有教训也不想教训任何人。他的文章标

题本身就完全取消西蒙诺夫企图给他的指责。至于谈到妄自尊大和忘乎所以，那么愿意的人都可以向西蒙诺夫学会这一点。就拿他在文章末尾对布宾诺夫说的一句话就值得大家学习了：“一个年轻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竟有这样的口吻，那是很可惜的。”这是老爷式的轻慢而又象保护人一般地拍拍肩膀的态度！很想知道，西蒙诺夫什么时候和从谁那里获得年高望重和永世留芳的护照？他自认为是文学“老前辈”不是为时早了一点吗？

西蒙诺夫要保护谁？他要捍卫什么？一下子你也摸不着头脑……

争论应该诚实和正视对手。但西蒙诺夫却斜起眼睛来看。他放下了脸甲，牢牢地拉着下巴的皮带。因此他的话就听不清楚，因此他的话在读者当中就找不到同情的反映。

1951年3月10日，《文学报》

再谈一篇短文

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在《共青团真理报》(第55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为米哈伊尔·布宾诺夫的一篇

遭到我在《文学报》上（第 27 期）批评的短文《现在是否需要笔名》（见《共青团真理报》，第 47 期）辩护。

我想就此提出几个简短的意见：

第一，依我看，在报纸上辩论笔名之是否合法是不必要的，因为选不选用笔名，这是作家个人的事情。强调这一情况正是我简单回答布宾诺夫的目的；

第二，肖洛霍夫问：“西蒙诺夫保护谁？他捍卫什么？一下子你也摸不着头脑……。”我认为，这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了尊重肖洛霍夫的名字，我可以再解释一遍。我保护的是希望选用笔名的作家，免受到别人诬告为朝三暮四。肖洛霍夫说，布宾诺夫说的只是“我们今日步入文坛的青年”，并没有“企图消灭他们（知名作家）的笔名”。肖洛霍夫没有留心读布宾诺夫的文章。布宾诺夫是把所有笔名同“避开社会”的企图和“独特的朝三暮四”联系在一起。他说：“永远消灭笔名的时候已经到了。”我看，无论是 20 年前就已采用笔名的、年高望重的波戈廷，无论是 5 年前才采用笔名的年轻的马尔采夫都一样不应受到这种所谓“朝三暮四”的荒谬的指责；

第三，无论在布宾诺夫的短文或在肖洛霍夫的短文中，把作家的笔名问题与同“个别的潦草塞责的家伙”，同“半吊子文学家和小甲虫”斗争的问题连在一起，我认为对我们的文学来说是错误的和带有侮辱性的；

第四，肖洛霍夫认为我对布宾诺夫说的那句话：“一个年轻而又才华出众的作家竟有这样的口吻，那是很可惜的”，是“老爷式的轻慢”。我至今还确信，布宾诺夫

是一个才华出众和年轻的作家。我把自己同布宾诺夫一起看作是年轻的作家，还要向许多人，包括向米哈伊尔·肖洛霍夫这样的大师学习许多东西，这中间我不认为有什么侮辱。我不想向肖洛霍夫学习的只有一点——就是那种粗野的话和那些古怪的想污辱别个作家的企图，这些企图在他讨论文学最迫切的问题时完全沉默了5年之后，忽然为了个人的事而写下的这篇短文中已暴露无遗了。我坦白承认，我对肖洛霍夫的才华的敬重是如此之深，以至我一开始就怀疑这篇在实质上是错误的、在形式上是带有侮辱性的粗野的文章竟是他写的。我深感惋惜，他的署名就摆在那里；

最后，我相信，这个由布宾诺夫挑起的、虚构的笔名问题是为追求廉价轰动新闻而臆造出来的，它不会引起广大读者的严重关注。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竭力把这两篇短文写得简单，而且不打算对这个问题再写一个字，即使《共青团真理报》再愿意提供自己的篇幅来对我进行不值一顾的攻击。

康·西蒙诺夫

※

※

※

斯大林那段反对双重姓的愤怒的话：“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散播反犹太人主义？谁需要这个？”给我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由于各种原因，我跟不

同辈份的人们谈话时都听到过这种意见，说斯大林不喜欢，或者无论如何不大喜欢犹太人；也曾听到过企图用许多原因来解释这件事，从他对崩得的态度开始直到列举他在各个时期用各种手段处死他的主要政敌的名单为止。所举的名单中为首的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以及其他许多托洛茨基的追随者和左翼机会主义者。从一方面看，这听起来仿佛是令人信服的，而从另一方面看，这并不令人信服，因为被斯大林无情镇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当中，也同样有一些姓俄罗斯的姓和俄罗斯族系出身的人。再从另一方面看，在我们的概念中，卡冈诺维奇大部分时期都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而且大概一直都是这样称呼他的，直到最后他还是政治局的委员；梅赫利斯长年来都是斯大林助手。在战争年代，尽管刻赤矿井塌陷事件会使他大倒其霉，但他依然是各条战线军委的成员，而且后来又当了国家监察部长；李特维诺夫 10 多年来实际上和后来正式领导外交事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在电影界，从它一开始在最有名望的天才之间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在最残酷的年代（1937—1938）里，被镇压的人就少于任何其他艺术部门的。

不错，在战后的近几年中有一些事情变化了和开始发生了。在当时就已引起了对官方的说法产生怀疑的、梅赫利斯

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十月革命后，崩得领导机构同反革命相勾结。1920 年崩得不再反对苏维埃政权。于 1921 年自行解散。

马·马·李特维诺夫（1876—1951），原名瓦拉赫·马克斯，苏联国务和党活动家。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兼驻美大使。

的突然死亡；莫斯科犹太人剧院的不知去向；用犹太语写作的作家中有许多人在战后被捕；出现在笔名之后要用括号写上真姓实名的作法；在《论戏剧评论界一个反爱国主义集团》一文中被点名的人，根据同样的精神被淘汰；对这方面的一些志愿人员（他们在反犹太人运动中有时捞到或者想捞到一官半职）的各种放纵行为。但这一切都不能说就是出自斯大林的有计划进行的事情。比如，我就不想相信他的反犹太人主义，因为这同我对他的印象不吻合，同我读过的他的书所讲的一切不吻合，一般说，这看来与一个作为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联系起来是荒谬的和不相容的。

但总还觉得在这方面有一种什么反常的事情发生，战后有些事情改变了。在我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在学校里，在战前的大学里都不存在犹太人同化或不同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开始存在了。犹太人开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认为自己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逐渐同化是理所当然的，而另一部分人则不理这件事，并且反对同化。在战后这些大变动中，除了表现得横蛮无理的反犹太人运动外，也出现秘密的，但是顽强的、报复性的犹太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在某些谈话中认为是自己在选拔干部方面的一种民族主义，——这一切在生活和意识中都存在着。

但对于斯大林的态度，象我这样的一些人，在那些年代里依然是几乎不加批判的。我们在私下的谈话里不止一次地谈到究竟谁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反犹太人运动的罪魁祸首？谁在这里领头，这是谁的主意，是谁推广它的？是谁在利用犹太人的不满情绪和我们认为可能有的斯大林的谈话，竭力把

它一切加以夸大和利用？各人有各人的推测，这其中可能暗指当时政治局的这一个、那一个，或者好几个成员。

现在，由于奥列斯特·马尔采夫的书和双重姓的问题，斯大林亲自讲话了，这也许对某些人是不满的，但对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满意。斯大林明确表示，如果有人事隔一年还不想执行（看来斯大林曾明白地说过）否决这种双重姓和这种散播反犹太人主义的作法，那么他，斯大林本人就不仅不支持类似的事，而且认为有必要在我们面前对这个问题完全明白地说清楚，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了。这就说明，反犹太人运动不是出自他的主意，他对此是不满的，而且他打算勒令停止。

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而且在斯大林死后我还没有看到一些文件之前差不多一年也还是这样想的。这些文件使人毫不怀疑，在其生命最后的几年中，斯大林对犹太人的问题所抱的观点，与他公开对我们所讲的话是完全相反的。完全可以设想，在一定的情况下，一些在他看来是愚蠢或是不妥当的，象在笔名后边加上括号这种小事，他是不喜欢的，但这与问题的实质无关。只是斯大林那天晚上在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面前（显然，他通过自己的渠道，对于知识分子的谈话、怀疑与困惑都一清二楚）演出了那一场做贼喊贼的戏：把贼抓住！这给我们暗示，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件事情，不管出自何人的主意，只要不是出自他本人就行。这幕短剧是顺便演出来的。他认为毋需就这个问题跟我们多做解释。他这是对的，因为我们习惯从第一句话起就相信他了。

但现在我要回到我久已搁在一边的笔记上来。顺便说说：

现在看一看我随同一些专家就叶廖明的小说有关对意大利问题所提的意见的附函副本，我就弄清楚，上面谈到的那次政治局会议，不是在 1952 年 3 月举行的，而是在公布获奖名单之前大约一周，即 2 月 26 日：

在会议结束时，斯大林开始谈到我国的戏剧，他表示对它不满。

“我们的戏剧很糟，”斯大林说，“据说，毕尔文采夫的剧本是受欢迎的，因为其中有冲突。大家都写外国生活，因为那儿有冲突。仿佛我们的生活没有冲突似的，仿佛我们的生活没有流氓。结果剧作家认为，不许他们写否定的现象。评论家总是要求他们写理想，写理想生活。如果谁在作品中写了某个否定的现象，那么大家立刻就向他攻击。巴巴耶夫斯基就在他的一本书中讲了一个婆娘，讲了一个普通的落后的婆娘，或者讲了一些原先在集体农庄，后来离开了，看来是落后的人们。大家一下子都攻击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要求我们一切都理想化。他们说，我们不应该表现生活的反面。而事实上我们就应该表现生活的反面。有人说，我们这里没有流氓；又说，我们这里没有坏人。而我们是坏蛋和恶棍的。我们还有不少虚伪的人，不少坏人，要跟他们作斗争，而不把他们暴露出来，那就违反真实，犯了罪过，既

阿·阿·毕尔文采夫（1905—1981），苏联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柯楚别依》、《从小要爱护名誉》均有中译本。

然有脓疮,那就得治疗。我们需要果戈理。需要谢德林。我们还有不少可恶的事,还有不少缺点。远非一切都是好的。索弗朗诺夫有这样一种理论,说不能写出好的剧本,因为没有冲突。怎么能写没有冲突的剧本呢?我们有冲突,生活中有冲突。这些冲突应该在戏剧中得到反映,要不然就不会有戏剧。而大家去攻击剧作家表现的一切否定现象,剧作家由于挨骂就索性不再写冲突了。但没有冲突就不会有深度,就不会有戏剧。戏剧因此而受罪了。这必须说明,我们是有戏剧的。我们有恶人,有坏蛋——这应该对剧作家说。可是批评家却说,我们没有冲突。所以我们的戏剧就这么贫困。”

1979年3月31日

我那时写的笔记就到此为止。这是我在举行这些会议的一个比较小的圈子里听到斯大林亲口说的最后一些话。

现在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想,我们当时过的日子,对于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来说,不管他是写,还是象我当年编辑《文学报》那样去编,都是真正困难的时期。在那一年、两年、三年的期间,一切都真的从头到脚和从脚到头好几次翻过来又倒过去。就拿当时那篇论反爱国主义的评论家的文章

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1826—1889),原姓萨尔蒂科夫,笔名谢德林。俄国讽刺作家。他的许多作品都有中译本。

以及后来无数次谈论我国戏剧评论界的文章所讲的内容同3年后，即1952年2月，斯大林对他们所讲的话比较一下就够了。每一次他都是正确的，不可能不正确，但越往后，就越难建立起有关这种正确性的虚假逻辑；越往后，就越难在脑子里把他要求评论界和文学界的东西，即他讲到必须忠于生活真实的话，同那经常围绕着企图说明这种忠于生活真实所发生的事情归纳到一个多少有点象是一致的系统中来。不能归入系统的还有：他有时亲自提议挑选一些确是真实的作品拿来讨论评奖，如潘诺娃、涅克拉索夫、卡扎凯维奇的作品都是这样，但也有一些在他的支持下送来评奖的，远非描写生活真实的作品，如潘菲洛夫的《为和平而斗争》和《在受难者的国家里》以及许多同类的其他作品。

当时我是否这样想呢？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我是这样想的。但我的结论自然不是那么肯定，相反，心里还真诚地希望了解他的逻辑，想把他的意见解释为某种政治上的需要。不过我的脑筋有时由于真心诚意想把那不能相容的东西并在一起而发裂了。

※

※

※

我下面有关斯大林的笔记是1953年3月16日写的，就是说，在斯大林逝世后过了好几天。究竟过了几天，如果做个完全诚实的人的话，我很难说得上来。可能，这其中有关国家机密的印迹。我认为，斯大林可能处于昏迷状态，还没有与生命作几天斗争，一下子就死了。从医学观点上看，第一

天的新闻公布已描绘了一幕不可救药的情景。我可以认为，拖延几天公布斯大林去世这个使大多数人震撼的消息是有必要的。我认为可能是要使我们有好几天习惯于听到斯大林即将去世的消息。我这样想可能不对，但根据新闻公布所写的一切也正是如此。我始终认为，情况就是象我现在所想的那样。我不完全相信，斯大林就如新闻公布的那样死的。他是否真的在那注定孤单的情况下中了风，只经过几个钟头后才发现他人人事不省地躺在地板上？抑或是贝利亚亲手加速了他的死亡？

我这样想有好几个理由。

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特别是由于所谓梅格列尔人的事件，斯大林明显地把贝利亚推开身边，但他做这件事显然做得不完全彻底，也许，他夸大了那个时候自己的潜力，其实有一部分潜力早已被贝利亚卡死了。在这种情况下，贝利亚自然希望斯大林尽快死亡。

这样想的第二个理由是，多年来贝利亚总比别人更能随意钻到斯大林身边，这不管有无斯大林的许可。

第三个理由是，我们所知道的贝利亚的一切情况，以及后来查明他 1953 年 6 月想篡权的企图，都说明有这种可能。篡权的第一步就是要除掉斯大林——或者是直接地干掉他，或者是借口来帮助他。

所有这些推测都是多年来思考的结果，这些思考不都只想到这些最秘密的事情，而是一般更多地考虑到我国历史的

短短的片段上。

当时，在 1953 年 3 月，有我的笔记为证，所有这些我都还没想到过：

党 19 大最后一天，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选举结果已经公布，此后伏罗希洛夫再次让前来祝贺的几个外国代表团逐一发言。在几天没有出席会议之后，斯大林在这最后一天前来参加会议，从会议一开始就坐在主席团上。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紧张地等待着（大家在昨天和今天开会之前都私下议论了）：斯大林是否要讲话？如果讲话，那他谈什么问题？可能，他来致闭幕词吧？

然而会议照常进行，由于它一再延续，大家又产生怀疑：要是斯大林忽然决定还是不讲话呢？伏罗希洛夫让科普勒尼希发言，后来，当他在掌声中离开讲坛，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时，伏罗希洛夫停了一下说：“兄弟共产党代表团的祝词就此结束。”接着不停顿地宣布：“现在请斯大林同志讲话。”

全场起立，鼓掌。斯大林从主席团的桌子后站起来，绕过这张桌子，健步地、毫不摇晃地走下来，几乎是跑步似的走上讲台。他把一叠纸放到自己面前，这叠纸我觉得在他向讲坛走去时是拿在手里的。他平静地和从容不迫地开始讲话。他每讲完一段，全场就响起了掌声。他

约翰·科普勒尼希（1891—1968），奥共主席，1935—1943 年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要员。

对这些掌声也是一样平静和从容不迫的。全场只在这一个地方打断他的讲话，因为如果从被掌声打断的某一句话开始继续讲，那么每一段严密组织的话就会受到破坏。斯大林停下来，等待掌声停止。他不是从被掌声打断的地方又开始讲，而是从前面那句谈到旗帜问题时最先的话讲起：“再没有谁来举起它了。”

在讲话结束时，斯大林第一次略微提高嗓音说：“我们的兄弟党万岁！祝兄弟党的领导人健康长寿！各民族人民的和平万岁！”此后，他长久地停顿，最后说：“打倒战争贩子！”他说这句话时不象别的演说家那样——说到最后一句话时都提高嗓门。相反，他说这句话时压低声音，小声地，带有鄙视的口吻，同时，他用左手做出一个平静的和蔑视的手势，仿佛要把他想起来的这些战争贩子扒到一边似的。接着，他转过身去，慢慢地登上台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此后我还有机会看见过斯大林两次：一次是在中央委员会给外国兄弟党的代表团成员设的宴会上；一次是在斯大林参与工作的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

为了说明和讲述最后一段与我个人有关的一些情况，我在这里离开一下我的笔记。

在19次党代表大会上，我是一个凭票参加各种会议的来宾，自然，除了那次选举新中央委员会的秘密会议之外。这天晚上，作家巴巴耶夫斯基打电话给我，他使我非常意外地向我表示祝贺，说我已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如果给我打电

话的是另一个人，也许我一般都不会相信这件事，而且会认为这是捉弄，会骂对方一番。但巴巴耶夫斯基是大会的代表，我跟他相当疏远，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我感谢了他的祝贺，然后再给我另一个熟悉的大会代表去电话，问他这是否真有其事。在相信确有其事之后，我想，这显然是作为《文学报》的主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后来查明，我的这个猜测是对的。同时，也是生平第一次，我同当时的《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星》主编苏尔科夫一起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委员。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们这三件事都是出自斯大林的主意。

中央委员会为欢迎兄弟党代表团设的宴会大概就在大会闭幕的那个晚上，在宴会上我同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坐在一起，他跟我一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这里毫不怀疑，此事也出自斯大林的授意，——在那时不可能有任何其它理由。朱可夫命运中的这一变化使很多人感到高兴，同时也使很多人感到诧异，它也使我惊奇。不过，我的惊奇可能比别人少一些，因为我记得还在两年前由于讨论卡扎凯维奇的长篇小说《在奥得河上的春天》斯大林讲到朱可夫的那些话。现在，在这个晚宴的时候，我同朱可夫坐在一起，我不仅想起了那次在政治局会议上谈到他的话，而且认为自己有权把这次谈话讲给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听。我通过他那一贯的沉着态度，感到他那天晚上的情绪很好。我想，选入中央委员会这件事对他来说是意想不到的。我同他坐在一起几个钟头所谈的事情对他产生的影响大概更为强烈。不过，自尊心不容许他对这个无疑使他更为激动的

话题有丝毫表示。

伏罗希洛夫主持晚宴，并在宴会上举杯致词。斯大林坐在首席，但离首席中心稍微远一点，差不多整个晚宴时间他都同在坐的人周旋——有时同身边的这一个，有时同附近的那一位；他同多列士谈话，两个人的目光碰在一起，甚至有些特意表示的样子，显然，这不是偶然的，无论如何，我当时就是这么感觉的。

中央全体会议——我生平第一次参加，也是我看见斯大林的唯一的一次会议了。这次会议是在10月16日白天晚些时候举行的。1953年3月讲到这次会议的笔记，我有许多理由不便传播。但它原有的开头部分我还是要引用出来；那时写的笔记很简短，后来根据回忆把它的某些情况补充进去。现在，过了27年之后，这些扩充的部分也许比完全忘却好一些吧。

下面就是原先的部分笔记：

自然，我没有权利记下中央全会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过，我不谈那里发生的问题，依然要记下某些情况。

当会议按指定时间准时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已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斯大林同志同其他政治局委员从后门出来，走到主席团的桌子跟前，聚集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里的人们向他鼓掌。斯大林走进主席团，表情十分严肃、认真，注意力集中。他向大厅迅速一瞥，向我们这边做

了一个非常短促的，但很威严的手势。这个手势表示他理解我们对他的感情，并且表示我们应该明白现在不需要这样做，表示中央全会应该从事一些实际的工作。

一个中央委员在全会上发言。他站在讲坛上，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忠实的学生。斯大林就坐在这个演讲者后边，留心地听他讲话，后来他简单地插了一句话：“我们大家都是列宁的学生。”

斯大林本人开始讲话了。在讲到坚定和无畏精神的必要性时，他讲起列宁，讲起列宁在 1918 年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讲起那时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的环境、以及当时敌人怎样强大。

“列宁怎么办呢？”斯大林问，“而列宁——你们再去读一读列宁当时所讲的和所写的话吧。在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困难的环境中，那时他象雷鸣一样地发表演讲，什么人都不怕。象雷鸣一样发表演讲。”

斯大林两三遍一次接一次重复这句话：“象雷鸣一样发表演讲！”

接着，有关全会上发生的一个问题，在讲到自己的责任时，斯大林说：

“既然把这件事委托给我，那我就去做。不过不应该只把这件事情记在我的账上。我没有受过这种教育。”他说最后这句话时很不留情。

我在 1953 年所做的这个简短的笔记究竟说的是什么事和发生了什么事呢？我试着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回忆并加以解

释。

1979年4月2日

我不想昧着良心瞎说，企图把我记得但没有写下来的那次中央全会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还原。我只想将深入脑海并成为沉痛的、甚至是可悲的回忆写出来。

我觉得，那次中央全会开了两个或两个多钟头，其中大致有一个半钟头是斯大林讲话，其余的时间是莫洛托夫、米高扬发言和选举中央常委。据我记得，斯大林讲话时是马林科夫主持会议，其余的时间是斯大林亲自主持。马林科夫讲了几句话之后，立即就请斯大林讲话。斯大林从后边绕过主席团的桌子，沿着主席团的桌子往下走几步，到了放在中央的讲台跟前。斯大林讲话时从头到尾都是盛气凌人的，没有一点幽默。他面前的讲台上没有任何讲稿。在整个讲话的时间内，他全神贯注，死死地和严厉地盯着整个大厅，仿佛企图看清坐在他前前后后的那些人在想什么。他的语调，他讲话时把两只眼睛死盯着整个大厅的神情，都使所有在坐的人呆若木鸡。我也有点感到愕然。他的讲话的主要之点（如果话不是这么说，那么意思就是如此），是说他自己已经老了，别人来接替他的工作的时间快到了，说世界的局势非常复杂，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是严重的，在这一斗争中最危险的是发抖、害怕、退缩和投降。这里最主要的是他不仅想把这些情况说一说，而且还想把自己已经年老、随时有可能离开人

间这样的一个问题灌输到在坐的人们的意识中。

他讲这一切都是严厉的，有许多地方不只是严厉，而且几乎是发火了。他的讲话在某些时候也许还夹杂着一些相关语和有用意的话。在这些话的后面有使人感到真正的担忧和不无悲剧的底蕴。正因为担忧退缩、惊慌和投降，所以斯大林就诉诸列宁的话，这些话我在当时的笔记中已经引用过了。现在，这些话实际上是讲他自己，讲可能即将离开人世的斯大林，讲那些可能在他身后留下来的人们。不过他不谈自己，只谈列宁，谈列宁面临着各种情况表现出来的无畏精神。

斯大林这次讲话的主要特点，就是他认为无需泛泛地讲什么勇敢或恐惧、坚定或投降。他讲这一切时，都具体地联系到坐在这个大厅里的、在他背后只有两米远的两个政治局委员，这两个政治局委员我过去很少听到斯大林对他们谈论过什么。

在开始指责有人不顽强，不坚定，怀疑他胆怯和投降时，斯大林猛烈抨击起莫洛托夫来。这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以至我始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想，是我听错了还是我没弄明白。结果是，这是完全真的。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他最怀疑可能投降的人，在这个晚上的中央全会上，在他看来，这方面最危险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莫洛托夫。他讲莫洛托夫讲得很久，而且毫不留情，并且列举了一些我已记不清楚的莫洛托夫的错误行为，主要是讲在他斯大林休假期间，莫洛托夫留下来替他处理日常工作时，莫洛托夫错误地解决了一些不应该那样解决的问题。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已记不得了。记不起来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斯大林向听众所讲到的那

些政治上的微妙之处，大家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其次，也许是因为他提出的一些谴责词意犹未尽，含糊不清和不甚明理，无论如何，在我的理解中就是如此。

我简直弄不清楚，莫洛托夫错在哪里。我只知道，斯大林指责的是他战后若干年的一些行动。他指责莫洛托夫时那种气愤的样子，看来已对莫洛托夫构成直接的危险和直接的威胁了。一联想起过去，就可以预期斯大林会给他作出那些最后的结论。实际上，他讲的主要内容，全部精神，无论是遣责怯懦和投降，无论是要求有列宁的那样勇敢和不屈不挠的精神，都是具体地针对莫洛托夫个人讲的。他谴责了在党内不应有其位置的一切罪恶，即使时间一到，他斯大林不再是党的领导人也罢。

斯大林的愤怒有时显得漫无节制，但他讲话时却有着他所独具的严格的语法结构。这种结构在他下一部分谈到米高扬时显得更短，更有自己的特色，也许，还更加凶狠和更加粗野。

大厅里笼罩着一片可怕的死寂。我没有回头看看邻座，但我看见了坐在斯大林讲话的讲台后边那4个政治局委员。他们个个都呆若木鸡，面容紧张，一动也不敢动。他们跟我们一样，都不知道斯大林讲到什么地方就不再讲了，不知道他是否在抨击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之后还要抨击什么人。他们不知道是否还会听到他抨击其他的人，或者，说不定还要听听抨击自己。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脸色苍白得象死人一样。这两副象死人一样苍白的面孔直到斯大林把话讲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而他们（开始是莫洛托夫，后来是米高扬）一个

接一个走到斯大林刚站过的讲台上讲话时还是那样。他们在那里（莫洛托夫讲得长些，米高扬讲得短些）企图向斯大林解释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为自己辩护，向他说情况不是这样，他们从没有一点怯懦或投降，不怕同资本主义阵营发生新的冲突，也不会在他们面前举手投降。

在斯大林讲到这两个人时表现出那种绝情之后，在他讲话中许多地方表现出那种狂怒之后，这两个发言的人看来就象最后申诉的被告，尽管他们都否认所有加在他们头上的罪过，但未必就希望斯大林去改变对他们的命运作出的决定。我想起我当时的一种古怪的感觉：他们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我曾多次相当靠近地看见过的人，而是戴在这些人脸上的一副假面具，虽然十分相似，但同时又完全不一样，已经不是活人的面孔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是否够准确，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没有在事后把它夸大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自己最后一次的发言中选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这两个人作为不可信赖的主要对象。他明显地想损害他们两个人的名誉，想贬低他们，想磨灭在他身后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光环，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想贬低他们，特别是想贬低莫洛托夫，他要把莫洛托夫所享有的盛誉一笔抹掉。尽管莫洛托夫实际上在战后已明显地被撤职了，尽管外交部多年来都已直接由维辛斯基领导，尽管莫洛托夫的妻子还在坐牢，——尽管有这一切，但莫洛托夫的名字，对于许多的人（越扩大范围，人数就越多）来说，依然是在斯大林的名字之后就会直接地提到或想到它。很明显，斯大林不希望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他竭力使所有出席全

接一个走到斯大林刚站过的讲台上讲话时还是那样。他们在那里（莫洛托夫讲得长些，米高扬讲得短些）企图向斯大林解释自己的行为和活动，为自己辩护，向他说情况不是这样，他们从没有一点怯懦或投降，不怕同资本主义阵营发生新的冲突，也不会在他们面前举手投降。

在斯大林讲到这两个人时表现出那种绝情之后，在他讲话中许多地方表现出那种狂怒之后，这两个发言的人看来就象最后申诉的被告，尽管他们都否认所有加在他们头上的罪过，但未必就希望斯大林去改变对他们的命运作出的决定。我想起我当时的一种古怪的感觉：他们发言的时候，我觉得，这不是我曾多次相当靠近地看见过的人，而是戴在这些人脸上的一副假面具，虽然十分相似，但同时又完全不一样，已经不是活人的面孔了。我不知道，我这样表达是否够准确，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此，我没有在事后把它夸大一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自己最后一次的发言中选定莫洛托夫和米高扬这两个人作为不可信赖的主要对象。他明显地想损害他们两个人的名誉，想贬低他们，想磨灭在他身后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人物的光环，这是毫无疑问的。他想贬低他们，特别是想贬低莫洛托夫，他要把莫洛托夫所享有的盛誉一笔抹掉。尽管莫洛托夫实际上在战后已明显地被撤职了，尽管外交部多年来都已直接由维辛斯基领导，尽管莫洛托夫的妻子还在坐牢，——尽管有这一切，但莫洛托夫的名字，对于许多的人（越扩大范围，人数就越多）来说，依然是在斯大林的名字之后就会直接地提到或想到它。很明显，斯大林不希望的正是这一点。因此他竭力使所有出席全

员，斯大林讲话时，主持会议的马林科夫也坐在主席团的座位上。这时我看见马林科夫的面孔现出可怕的表情，仿佛是惊慌，不，不是惊慌，而是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有的表情——他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清楚，或者，无论如何比其他许多人都更清楚地知道那悬在大家头上的、别人还没有意识到的、致命的危险：不能同意斯大林同志这个请求，不能同意他卸去他3个权力中最后这个权力，决不能！马林科夫的脸色，他的姿势，他那双含有深意的举起来的双手都明白地是在请求所有在坐的人立刻坚决地拒绝斯大林的请求。于是，从斯大林背后就响起了呼喊声：“不，我们请您留任！”或者是这样的一些话，但这些话随即被大厅响起的喊声盖住了：“不！不能！我们请您留任！我们请您收回您的请求！”我不必援引这时所有的话和呼喊，但总的说来，整个大厅里的人，也许，是大部分人都比我早就明白了。开始我觉得，这一切是很自然的：斯大林将主持政治局，将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而党总书记则由别人担任，就象列宁在世时那样，但我一时不明白的事情，许多人一下子或几乎一下子就都明白了。而此时主持会议的、负有更大责任的马林科夫，为防犯错误，也一下子明白了：斯大林完全不打算辞去党总书记的职务，这不过是一种试探，想摸一摸全会对他提出的问题的态度怎么样，——坐在他背后的主席团的人和坐在他前面的大厅里的人是不是打算把他斯大林从党总书记的岗位上撤下来，因为他已经年老，疲劳了，不能再担任这第三个职务？

当整个大厅的人们开始轰鸣和叫喊，要斯大林一定留任党总书记和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时候，马林科夫的面色，这

我记得很清楚，就变成了一个刚刚避过了一场真正致命危险的人的面色，因为正好是他做过了党代表大会的政治工作报告，并实际上主持了中央书记处的大部分会议，现在又是这次中央全会的主持人，在进行解决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自然就会成为接替斯大林同志第三个职务的候选人，如果他真的因为年老和疲劳而辞掉的话。但是，一旦斯大林感到在他背后或者在他前面，有人当着他的面满足他的请求的话，那么我想，第一个要拿出脑袋来的就是马林科夫。一般马虎应付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我已不记得，是谁在全会将结束时宣读由中央委员表决的常委的名单，——是斯大林本人还是马林科夫。我只记得斯大林关于没有被选进中央主席团成员或候补成员的安德烈耶夫的一句插话，他说安德烈耶夫已离开了工作岗位并且实际上不能再积极参加工作了。这里定然有什么一种意思。选出主席团以代替政治局，这对很多人来说都是意外的，对我也一样。选出的主席团将代替政治局，这事在批准的新党章中就十分明显了。而这个主席团将由 25 人组成。这样一来，以前的政治局的成员还不到主席团的半数，这就更使人感到意外。

在党代表大会第一天的简报中写着：“晚上 7 时。斯大林和他的忠实战友：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贝利亚、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安德烈耶夫、米高扬、柯西金等同志出现在讲坛上时，代表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全场起立……根据党中央的委托，莫洛托夫同志致开幕词。”

现在主席团里已没有前政治局委员安德烈耶夫，而柯西金只是主席团的候补成员。中央书记处也是空前庞大的，由10人组成。当时我没有想到，但后来我不止一次考虑，斯大林显然想为自己创立一种在主席团和书记处内部有机的自由。他大概有一些更长远的计划，这些计划在他看来同扩大了的主席团和书记处一起去完成就会简单得多。但那时我没有想到这一点，只为某些成员的更换感到惊讶。使我最吃惊的是：尽管斯大林的讲话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猛烈攻击，但他们两个依然是主席团成员，——这使我松了一口气。不过随后发生了一件后来不广为人知的事情：虽然在新党章中没有这种规定，但斯大林还是提议把主席团分出一个主席团的政治局，就是说，实质上政治局换了另一个名称。而进入新主席团里的那些老政治局委员，进到这个政治局里的，既没有莫洛托夫，也没有米高扬。

中央全会后，我回到了《文学报》，把成立主席团政治局的事讲给副主编——波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留里科夫听。我们两个打算把这件事登在报上。但送到编辑部来的《塔斯社电讯》中却没有提到成立主席团政治局的事。于是这件事就搁下来，成为鲜为人知的事了。而在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当我们来参加中央全会的时候，在斯大林去世之前的一个半或两个钟头，全会已组成了一些新的政权机构，在主席团的座位上，坐着斯大林在世时选出来的全体政治局成员，加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除去了斯大林本人。这样，在那次中央全会上通过的，显然是斯大林个人作出的决定，后来就简直无人过问了。只有在苏共中央全会、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的联合决议中，有一项顺便提到了曾在某个时候存在过这样的政治局。在有关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一部分文字里，第一项是这样写着的：“同意根据党章规定，必须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内成立一个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以代替中央的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政治局。”接着一项就是把主席团精简到以前政治局的名额。这一项是这样写的：“为了加强领导效能，规定主席团由10个委员和4个候补委员组成。”代替了19大后曾经一度是25个委员和11个候补委员的名额，——这是我代表自己添上的一句话。

在斯大林最后参加的一次中央全会和他去世之间所过的4个半月，是沉重而又古怪的岁月。一切都仿佛照常进行，讨论了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举行了苏联保卫和平委员会的全体会议，讨论了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问题。《文学报》继续进行自己的报纸活动。而这个时候在捷克斯洛伐克却进行了对斯兰斯基以及其他人的控诉。斯兰斯基我认识，他在斯洛伐克从塔特 起义后，穿过前线，来到乌克兰四方面军占领的地方。当时我在那里，第一天我就看见他，他是同未来的工业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劳施曼一起来的。他们讲了在这次冲出重围的时候，杨·斯韦尔马 因不堪行军之苦，死在他们的怀抱里。这是1944年冬天的事情。现在，1952年11月，斯

塔特在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交界处。

杨·斯韦尔马(1901—1944)，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时牺牲。

兰斯基却被控告杀害了斯韦尔马，并控告他与犹太民族主义组织“乔英特”有联系，说他是这个组织的间谍。在这次被控告的人当中，还有一个前斯沃博达 军团的政工人员，他后来在斯沃博达当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的時候当上了副部长。我曾同这个人（别德尔希赫·拉茵钦）就我那个他很不喜欢的剧本《在布拉格的栗树下》进行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他的意见使我获益匪浅。在我知道斯沃博达对他的态度之后，知道在军团的历次战斗中，斯沃博达对他非常器重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个人会是个间谍。在12月，当我经过布拉格飞往伦敦时，在机场上遇见了失魂落魄的扬·德尔达。他告诉我，斯沃博达不知是关在监狱里，还是在家里囚禁着。这使我十分震惊，因为斯沃博达属于我信任的人物，而且任何时候我都无条件地相信他。

在布拉格，我同费定由此经巴黎飞往伦敦。那几天，大概是临走的前夕，当时在中央机关里工作的，现在已故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列别杰夫同我们相遇时告诉我，说已决定任命我为《真理报》的两个主编之一。我一下子还不明白他所说的事情，但看来这大概是斯大林的主意，要《真理报》有两个主编，所以我就成了其中之一。列别杰夫说，这已经决定，正在办理手续，等我回来，任命就下达了。虽然

鲁·斯沃博达（1895—1979），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68—1975），大将，三次获捷克英雄称号。

扬·德尔达（1915—1979），捷克作家。著有社会心理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他的剧本《罪恶的村庄》已译成多国文字。

这事很奇怪，但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相信他。我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真理报》要有两个主编？这使我心里感到愉快，也使我感到害怕。顺便说说，在我从英国回来之后，谁也没有提到这个方案，也没有谈及这件事情，仿佛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显然，这是斯大林一时心血来潮的想法之一，这些想法后来他又忘得一干二净，以至烟消灰灭了。谢天谢地，就让它烟消灰灭吧！

我们在英国遇见了许多前不久曾到我国访问的英国作家。在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女作家劳美·密茨逊的招待会上，亚历山大·沃思张开两手，走到我和费定面前。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审判（他在那里被看作是与“乔英特”同斯兰斯基之间有联系的人之一）以后，在这里看见他自然使人有点吃惊。不过他走近我们的身边时，却放开喉咙大声地，几乎是叫喊一样地说：“费定！西蒙诺夫！你们认得我吧，我曾经在你们那里当过军事记者，这你们都很清楚。你们知道，我正在写几本书，在这些书里我不同意你们的许多观点。但我向你们发誓，我不认识什么斯兰斯基，连做梦也没见过什么斯兰斯基，从来没有跟他打过任何交道，我没有他的任何印象。请你们把这件事在莫斯科那边说一说。就让他们说我这个人不好，就让他们说我毫不中用，随便说我这个新闻记者是什么都可以，只要你们在那边跟他们说一说，免得他们还认为我是一个我从来没有做过那种事的人。”

亚·沃思（1901—1969），英国新闻记者，政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代表英国许多报刊和BBC担任驻苏记者。

应该说，当时的局势并不轻松，何况沃思身上发生的事情在这个时候会引起人们对他的话产生信任，而在捷克斯洛伐克诉讼案中所发生的事情，则会使人产生相反的感情。

我们在元旦前回到莫斯科。元月3日，各报刊登了塔斯社关于医生谋杀案的报道。这个报道是吓人的。它使人想起1937—1938年那些最坏的年月和同样控告普列特尼约夫及其他人谋杀或协同谋杀奥尔忠尼启则、高尔基和古比雪夫的事情。现在，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扮演了牺牲者的角色，那几个医生杀人犯看来又是那个“乔英特”的特务。他们都姓犹太人的姓，真的，后来有些医生都在犹太人的姓后边附上俄国人的姓了。在这些带有犹太人的姓的医生当中，有一个名叫沃夫斯的教授，我跟他私人颇有交情。他担任红军的内科主治医生的时候，在战时和战后都曾为我治病。现在控告他犯罪我简直无法相信。何况这还不是根本不相信的问题，而且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咄咄怪事。一周以后，当公布授予莉季娅·季马楚克医生以列宁奖金，表示政府感激她协助揭发医生杀人案的时候，这整个事件就显得更加可怕，更加可疑。反犹太人主义的浪潮不断涌上来了，在许多场合下，对照个人方面的各种（前不久或以前的）直接的消息，这浪潮看来并不离奇。

1979年4月4日

元月下半月、2月、3月上半月，包括斯大林逝世后一个

半星期，围绕着医生谋杀案件构成了一种令人沉郁的气氛。看来，1937—1938年的可怕的重演又来临了。即使斯大林死后也不能一下子缓和这种气氛，我凭着自己的感受可以这样说。

我的脑袋完全搞糊涂了。一方面，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前不久有我出席的会议上，斯大林发表了一通反对反犹太人主义的讲话，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可是另一方面，忽然又出现这些医生杀人犯，出现这个多半有犹太人的姓的名单，出现这些与“乔英特”有联系的揭发以及围绕着这件事而从底层下浮起来的全部沉渣。

医生杀人犯——这是一宗可怕的案件，看来它是难以想象的。从最初的说法开始，一切都意引起巨大的共鸣，有意使一些那怕稍微有点听从这件事、有点相信这件事的人都成为没有头脑、朝夕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健康，更可怕的还为自己的孩子的健康而担惊的人。总之，我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觉得这件事的后果可能是真正无穷无尽的。我暗中自问：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斯大林干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要故意欺骗我们，说了一些与现在照他的直接指示和决定（这已毋庸置疑）干出来的事完全相反的话？抑或他当时说的和现在做的都是老实的？那能可怕的，关于他的心理转移的胆怯的传说是可信的吗？我不想相信这一点，相信它是很可怕的。而且关于心理反常的想法与我们会晤时所留给我的那些印象格格不入。这一切都不能装在一个脑子里，一切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

这个时候，各种沉渣都浮上来了！但是，为了不说得太远，我还是从我自己这方面说起，也在自己这方面来结束。

1953年头几个月，阿列克谢·阿历山德罗维奇·苏尔科夫呆在作协里，我象往常一样，接替长期或相当长期没有来的法捷耶夫。苏尔科夫两次向我讲到同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就那些与我有关的信件进行谈话的内容。应该说，苏尔科夫对于反犹太人运动这个现象是深恶痛绝的，对于那些个人的反犹太人主义者也恨之入骨。他从不隐瞒这一点，并在其严厉批驳与此有关的一切时，他比我和法捷耶夫都做得更彻底。

第一次他非常愤怒地对我讲述了一封信的内容。这封信是中央机关拿给他看的，因为他是作协的执行主席。这封投到中央去的信不是匿名信，而是一个曾经在战时有过不少功绩，战后利用别人的手把自己的功绩写成文学记事，借以钻进作协中来的人写的。我不想在这里把这个人的姓名说出来，他的姓名苏尔科夫认为没有必要瞒着我就告诉了我。这个人死后过了一年或两年便已身亡（由于自己做了极其荒唐的事而偶然惨死），因此就不必再提他了。但这封信的本身，甚至现在过了这许多年也还值得作一点简单的转述，因为它说明那个时候的某些气氛。他不匿名，而作为一个人士下决心去做这一些具有反犹太人性质的挖掘工作，这种挖掘工作之深，也许只有法西斯分子才能想得到。

他在这封信中想叫中央宣传部留意我所领导的《文学报》的活动，因为它有纵容犹太人和犹太人把持的行为，其原因是由于我是犹太人出身的缘故。据他查明，我其实不叫西蒙诺夫，而叫西曼诺维奇，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的家庭，是伯爵夫人奥波连斯卡娅庄园里的一家小酒馆老板的儿子，后来伯爵夫人把我收养，作为义子。显然，他认为这些情报相

当重要，就签上自己的姓名把情报寄往中央。正如我已经提到的，苏尔科夫谈起这件事时是非常气愤的，可我听了这件事之后，就顿时哈哈大笑起来。我之所以哈哈大笑，是因为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我将来如何跟母亲谈这件事。她没有庄园，没有姓西曼诺维奇的小酒馆老板，她根本没有庄园，也不是奥波连斯卡娅伯爵夫人，因为没有奥波连斯基伯爵，只有奥波连斯基公爵。不过，说真也不假，她在娘家叫奥波连斯卡娅公爵小姐，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嫁给西蒙诺夫上校，正因为是他就给她亲生的儿子取名基里尔。顺便说说，她最不满意的的就是她的儿子在写文章时署名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妈妈后来的确常常取笑这件事。但是，苏尔科夫当时对我的第一个反应颇不赞同。

“你用不着笑。”他对我说，“最好想一想，怎么会弄到这个地步，让人写这样的信给中央，这是什么一个局面，使人要下决心去写这样的信。”

自然，他是对的，尽管这封信在形式上令人发笑，但作为时代的标志，它还是有其严肃的一面。最后，当我向他讲明为什么我一开始就发笑的时候，苏尔科夫自己也笑起来了。我感谢他给我的信息，而他只是生气地和忧郁地挥一挥手：

“如果我不把这件事告诉你，那我就是好人啦。”一看他的表情我就明白，他曾跟谁谈过这件事，这个人显然劝他不要把这事告诉我，而苏尔科夫不理这个人的劝告，把这事通通对我讲了。

1月底，《文学报》发表了不知是最后还是最后之前的一批有关在作家当中进行讨论《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基本

问题》的材料。苏尔科夫又被召到第一次去过的地方，谈有关这些总结报告有人不喜欢的地方。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克鲁日科夫（此人我曾认识多年，但凭良心说，我不能说他什么坏话，也不能说他什么好话），除了谈一些针对我这个报纸的主编和这次讨论的实际领导人的不满意度之外，大概由于得知并打算跟苏尔科夫谈的事情的突然性而显得有些慌张。他对苏尔科夫说，他们有一些严重的、但还没有完全核对的信息，说在莫斯科的作家圈子里，有一个直接同“乔英特”有联系的集团，为首的不是别人，而是康斯坦丁·西蒙诺夫。这一次，克鲁日科夫没有拿出任何信件给苏尔科夫看。尽管应该想到，克鲁日科夫所谈的事情既然如此严重，那就一定有信件拿出来，但这一次恐怕多半是匿名信吧。不过，克鲁日科夫跟他谈到这件事时所显出的那种慌张的神情，却深深地印在苏尔科夫的脑海里。我不知道，他在那边对克鲁日科夫说了些什么。看来在这种场合下，以他平日的口齿伶俐，大概不愁他找不到词儿去对付，他会怎么想就怎么说了。而在结束同我的谈话时，他痛苦地和严肃地说：

“自然，我本来不打算把这一切事情对你说，而且，说实话，我真不愿讲这些卑鄙龌龊的事情，但是你必需知道这件事。必需知道你身边埋伏着一些坏蛋，他们不管怎样都要给你掘坟墓。而且你要考虑到，虽说这一切都很荒唐，但讲起

弗·谢·克鲁日科夫（1905—），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有俄国历史方面的著作。

来却带着一本正经的样子，以至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几个月，我同苏尔科夫进行的、第二次对我说来十分重要的谈话就此结束。后来还有第三次，不过这已经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了，这次谈话我另外再写。

不管多么奇怪，更正确地说，不管这事我现在看来是多么奇怪，它都没有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当时恰好遇到这种情况：我从报纸或收音机里，或通过其他什么方式得知政府公布了斯大林生病的消息。后来这几天发生的事，当时我都差不多作了简单的记述，并且记在心里，而这件事情却没有留在心中，也没有把它记载下来。关于这几天的事，我现在就直接从我 1953 年 3 月 16 日所写的笔记中开始转录：

谈谈今年 3 月这几天哀伤的日子。要把这些事记下来是很困难的，因为还不能完全意识到，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他已溘然长逝了。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消息当然是对的，这事已经发生了，这我知道，大家也知道，不过同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斯大林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觉得，我什么也不会忘记，也不可能忘记。我觉得，有关这几天的一切细节都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里。所以很难强迫自己去作笔记，去写你觉得反正不会忘记的事情。但记忆是件靠不住的东西。详细的情节可能消失不见，或者可能以后有一天在脑子里弄得乱七八糟，顺不起来，所以哪怕只是其中某些情节，现在也得压下自己的情绪把它们记下来。

一开始控制着我的感情之一，就是极不愿意推究公

告上写的情节，不愿意知道和了解它们用医学语言表示的一切。总觉得议论公告上写的脉搏、血压、体温以及其他的细节如何如何，它们对一个年届 73 岁的人的健康状况有什么影响是毫无意义的。我自己不愿意想这些事情，也不愿跟别人谈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不能把斯大林只看作是一个忽然得了重病的老人来谈论。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这些医学名词，不是这些有关斯大林病况的详细情节，最主要的是另一件事：他能恢复知觉还是不能。最使人害怕的是他完全昏迷不醒，就是说，他没有意志去参与同疾病作斗争。看来，只要他能恢复知觉，他就会有这种意志，他就能活过来。

4 日晚上，我来到克里姆林宫，走进斯大林秘书处的房间，被召到那边去的其他人，也跟我一样，只为一件简单的事，默默地来，默默地脱去衣服，默默地做 15—20 分钟要我们来做的事情；然后同样默默地、彼此不打招呼，不说一句话就走了。

我在这里离开一下我当时写的笔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认为有必要在写这笔记时，借沉默来回避召我们去做的事情。那天晚上，在几个钟头之内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到斯大林秘书处去的有住在莫斯科，也许还有被召到莫斯科来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可能还有其他的什么人（这我不知道），为的是看看有关斯大林健康状况的公告。这样做的理由，正如我现在所想的，可能有双重的意义：第一，可能想让一定范围内的人看到公告的原本；第二，这些公告原本可能比

拿去刊登的公告更详细。事情多半是如此。公告或者是更详细的，或者是按小时报道的，因为，正如我当时所记的那样，既然“要我们去做的事情需要 15—20 分钟”，那么这就需要至少读好几页。

现在我回到 1953 年 3 月 16 日写的笔记上来：

我依然感到，一切仿佛都跟以前一样：还是那一条沿着克里姆林宫院墙的道路；从墙内出来，还是那个军官，在进口处检查证件；还是那扇门；还是那道几年来我曾 6 次登上过的楼梯。但是人们都默默无言，楼梯寂静无声，走廊也一片寂静，以前虽也安静，但此刻忽然特别安静，静得使人们感到，这屋里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我登上楼梯，穿过走廊，开始走进去的并不是我应该穿过去到斯大林秘书处的那个房间，而是到了另一个，到了 1947 年我同法捷耶夫和戈尔巴托夫坐在那里等斯大林（那是我第一次见他）出来接见我们的那个房间。

房间里一切依旧，几张桌子，其中之一也还放在房间的中央。有一个人站起来对我说：“不，现在向左拐，进下边的一道门。”我走出来，穿过下一道门，到了隔壁的一个房间。我想起，这里是我们两三次坐下来等待开会讨论斯大林奖金的地方。当时大家坐下来就讲话，可现在房间里异常寂静，虽然其中已坐着许多人。这寂静是绝对的、深沉的。这寂静使人感到，就在这里，隔几个房间，还有一道走廊，还有一个房间，以后还有一个房间，就在那边的一个房间里，奄奄一息的斯大林正躺

在自己的卧房中。而我们默默地坐在这里，与他相隔只是一段走廊和几道门。可斯大林与我们相隔咫尺，就在我们现在坐着的同一间房子里，怎么也不能恢复知觉地躺着。

这里我又要停下我在 1953 年所写的笔记。现在早已尽人皆知，斯大林不是如政府公告中所说的那样死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住宅里，而是在郊区自己所谓最近的一间别墅中。对于政府在第一号公告中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我就是现在过了这许多年，也还没有想到抱怨，甚或愤懑。看来，当时发表这个公告的人们有或者认为有某些国家的理由要这样歪曲事实。我想，要是把自己放在当时这些人们的地位上，那也不难想象他们的理由有两种可能：其一，如果斯大林失去知觉并面临死亡是在 3 月 2 日，而断气是在 5 日晚上，那么就恰好与前几次的公告和医疗公告相吻合；其二，如果斯大林是在 2 号那天当即去世的，那么死后用 3 天时间发表一些实质上没有任何指望恢复健康的医疗公告，使人们对这个事件有思想准备，不管对斯大林本人的态度如何，这个事件在客观上就表示了我国历史这一段联系着他的名字的漫长时期宣告结束。

说实话，就是现在，过了 1/4 世纪，我也为没有去打听斯大林究竟怎样死的好奇心而苦恼。我没有碰到过能把真实情况告诉我而足以使我相信的人，也没有强求从那些应该了解底细，但并不想跟我谈这个问题的人那里去探个究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但不管怎么样，这一切与知道一

个时代结束和另一个时代开始相比是个次要的问题。

现在我又回到 1953 年所写的笔记上来：

3月5日，晚，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召开党中央、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后来在报纸和电台上都公布了。我在指定时间之前很早就来，大概提前了40多分钟，但大厅里已坐了一半多的人，再过10分钟，全都到齐了。大概只有两三个人在开会前不到半个钟头才到。现在大厅里已有好几百人，其中差不多都是彼此认识的，有的是在工作上相互认识，有的是因为多次见面而彼此面熟。这好几百个在40分钟前比我来得更早的人全都默然地坐着，等待会议的开始。大家坐在一起，肩并肩，互相看着，但谁也不向谁说一句话。谁也不问谁什么。我觉得，在坐的人当中谁也没有感到想讲话的要求。直到开会之前，整个大厅是如此沉寂，如果我不是亲自在这片寂静中呆过40分钟，那我决不会相信，300个互相紧挨着坐在一起的人竟能这样保持缄默。我至死也不会忘记这种沉默。

我当时写的就是如此。真的，如果不是至死，那也在今天事隔26年，我也没有忘记过这种沉默。

现在，我对当时的笔记作些补充。

第一个印象是：从斯维尔德洛夫大厅的后门走进来并坐到主席团座位上的不是斯大林在世时选进中央主席团里去的25个人，而只是斯大林在世时进入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那些

人——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此外，还有斯大林没让他们进入这个政治局去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因此，斯大林的意志一方面似乎已被奉行，让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坐在主席团的座位上，而另一方面，它又仿佛已被否决，因为斯大林在世时不让他们进入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此刻就坐在主席团第九和第十个座位上。现在我是这么说，而当时的感觉也许还更简单一些：进入和坐在主席团上的是以前政治局的成员，只补充了别尔乌辛和萨布罗夫。

致开幕词的，如果我没记错，是马林科夫。这个开幕词（不是按其字句，而是按其实质）谈到斯大林同志继续同死神作斗争，但他的病情相当严重，即使他战胜死神，也不能工作得很久。而在这种时候，国家不能没有全权的领导。不能让国家处于不定的状态。国际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因此现在必需毫不延误地重新组织政府并作出与这个政府有关的一次必要的任命。

接着，马林科夫请贝利亚发言。贝利亚走到讲台前，简短地提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在这个建议已获通过之后，他便回来，登上主席团的座位上，而马林科夫开始向讲台走下来。他们两个互相面碰面的时候，在那狭窄的过道上很难将肚子让开。我补充一句，当时我这样想没有一点讥笑之意，甚至也没有一点讥笑的暗示，只不过（这是常有的），眼睛一瞄，毕生难忘。

马林科夫走到讲台前，开始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第二天大家都在报上读到了，而且在收音机里（看来还早一

些)也听到了——即在通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之后。在4个部长会议副主席中,马林科夫任命贝利亚为第一副主席,其后是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以后的建议则是为了集中权力和与此有关的将一些最基本的部集中在尽可能少的人手里。“为了发挥更大的领导效能”,党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减少一大半,从会议一开始进入和坐到主席团上的人依然是中央主席团的成员。实质上,这用意就是要把权力集中在部长会议主席团的手里。进入这个主席团的有5个人,就是说,有中央主席团的一半成员。进入中央书记处的只有一个中央主席团的成员——赫鲁晓夫,根据指示,他应该集中力量在这项工作上,还有中央主席团的另一个成员——伏罗希洛夫,就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其余3个中央主席团的成员——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就担任部长,不过没有进入部长会议主席团。大概,这样分配力量是想改变党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权力范围的对比。可能,这是贝利亚出的主意,无论如何,他后来积极活动正是在这方面:他竭力把一些主要的头号人物安插到各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而把一些次要的人物安排到各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的岗位上。

当然,我的这些思考不是当时的,而是现在的。

1979年4月7日

会议结束后,我们几位作家(我记得清楚,当时有法捷

耶夫、考涅楚克、我，——我不大记得，同我们一起的是不是还有苏尔科夫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同当时《真理报》的主编谢皮洛夫说定，一起到《真理报》的编辑部去。除了这几个钟头脑袋里看来已完全塞满了那些事件和变化之外，除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和在会上宣布的任命都说明斯大林即将去世之外，我当时还有一种感觉。我想摆脱这种感觉，但又不能。我觉得，从后边房间里走到主席团座位上来的人们，那些老政治局委员，出来时都有一种深藏在心里的、外表上没有流露出来的、然而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的轻松的感觉。这不知怎的在他们的面孔上都流露出来了，也许，莫洛托夫那副死板的、仿佛已经石化了的的面孔除外。至于说到在讲坛上讲话的马林科夫和贝利亚，那他们两个讲起话来却是生龙活虎，振振有词的。在他们的声音中，在他们的动作中，都有点什么与他们讲话的开场白不相称，也与他们谈到斯大林病情时那种哀伤的尾声不相称。我有这种感觉，坐在主席团座位上的人们都从压在他们身上的、把他们捆住的东西中解放出来了。难道他们不象一些被去掉尿布的孩子一样吗？也许，我当时不是用现在我所写的这些话来想这件事的，甚至连类似的话也不是。我想的较为谨慎，较为迟疑。但毫无疑问，我曾经想过这件事。这不是根据今天的，而是当时的感觉，这些感觉后来我一生都记得很清楚。

约莫过了 20 分钟，我们都来到《真理报》编辑部，坐在

阿·叶·考涅楚克（1905—1972），苏联乌克兰剧作家。他的剧本《前线》、《在第聂伯河上空》均有中译本。

谢皮洛夫的办公室里。谈话的声音都压低，特别是谁也不想说话。我们谈到了必需考虑如何让一些知名作家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系列各种题材的文章，大家认为这样做是必需的，而且要订出这些文章的计划，等等。但这一切都讲了，仿佛谈这些事是必要的，不过这讲起来又觉得有点过早，因为，尽管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的成员已经确定，部长会议也确定以马林科夫为首，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尽管有这一切，但要写就应明确地要求必需作家写些什么。可是这种确定性还没有，因为斯大林还活着，或者认为他还活着。这样我们的谈话就拖了约莫40分钟，我也不知道还要拖好久，谈话是无精打彩的和不明朗的，直到专线电话响了起来，谢皮洛夫拿起话筒，向话筒说了好几声：“是，是。”然后转回到我们围坐的桌边说：“他们来电话，斯大林同志去世了。”

尽管有上述的一切——开会，会后我们来到这里和在会上通过的决议，但在这个时刻，在我们身上，至少在我身上，总感到有一种东西在震动。生活中有一种东西结束了，另一种还不知道的东西开始了。它的开始不是因为有什么原因看来必须在斯大林还在世时就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而且当即就任命了，它不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而是现在，在这个电话来了之后。

我不记得，谁担任什么工作，准备做什么和写什么。当时我说，我要写诗。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写这样的诗，但我知道，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写出别的东西。

我没有在《真理报》内耽搁多久就回家去了。《文学报》

只是两天后的7号才出版，于是我一回到家就给副主编波里斯·谢尔盖耶维奇·留里科夫去了个电话，说我过两个钟头就来，然后我埋在自己的房间里开始写诗。写了头两行，我忽然意外地，坐在桌边抽噎、大声哭了起来。现在我能不坦白说出这件事该多好，因为我不喜欢任何人的眼泪（无论是别人的还是我自己的），不过，不这样大概就很难甚至向自己解释出震动的程度。我不是由于哀痛，也不是由于怜悯死者而哭泣。这不是多愁善感的眼泪，这是震动的泪水。在生活中有一种东西翻转过来了，由于这转变而引起的震动是如此之大，以至它不得不也在肉体上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抽噎的大声哭泣使我全身颤抖了好几分钟。后来我把诗写完了，把它送到《真理报》去，接着到《文学报》，把克里姆林宫发生的事情告诉了留里科夫。因为明天我们就要准备下一期的报纸，他应该知道这件事——越早知道就越好。

现在我面前放着一包在1953年当时叠好的有关该年3月那几天的材料和文件。一切都塞进这一包放了多年的纸夹里：有在仪仗队带的志哀黑纱，有到红场去的盖上“随处通行”的通行证，有两次作家追悼会其中一次我同别的许多人一起发言的速记记录，有我在另一次作家大会上朗诵自己那些虽是动情然而很粗劣的诗的剪报，还有一叠那几天的报纸——《真理报》、《消息报》和《文学报》等。

后来，过了若干年，不同的作家都写了有关斯大林的各类不同的诗。当时吉洪诺夫、苏尔科夫、爱伦堡都讲了话，一般说，彼此都很相近。大家当时讲的都很相似。也许在用词上有些不同，但也并不太明显。诗歌中的音调也有惊人相似

之处。写得最好的（以其才华而论，这不足为奇）依然是特瓦尔多夫斯基：更有分寸，更为准确。大家的诗有一个地方非常相似：

在这个最悲伤的时刻，
我找不到任何词句
能够充分表达，
我们举国人民的不幸……

这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写的。

没有这样的词句，
能说出我们难忍的痛苦，
没有这样的词句，
能表达我们对您——斯大林同志
的哀悼！

而这是西蒙诺夫写的。

心中一阵阵痛苦……
我们亲爱的，敬爱的人啊！
祖国人民抱着你的床头，
俯首向你失声痛哭。

这是别尔戈利茨 写的。

就算我们的痛苦不能解消，
但是他，我们的导师，教我们
不管遇到什么不幸，
也不要灰心丧气，悲观失望。

这是伊萨科夫斯基写的。

我们当时写的悼念斯大林的诗十分相似——曾在 1937 年坐过牢的奥丽加·别尔戈利茨、被没收了财产的富农的儿子特瓦尔多夫斯基、贵族的苗裔西蒙诺夫以及老农村共产党员米哈伊尔·依萨科夫斯基。还可以补充一些在斯大林时代具有各种不同命运和各种不同履历的人所写的诗句。然而诗的相似并不来源于要他们去写的义务——他们可以不写，而是来源于内心深感损失的重大，来源于发生的事件及其重大。我们后来还有过一段很长的时间试图探明，如果这个损失不是发生在那个时候，而是晚一些，那么它（我不怕给自己提出这个相当严酷的问题）对我们大家和对我们国家是好一些还是坏一些呢？特别是在 20 大之后，我们更想研究这个问题，不过，在 20 大前也一样。

但是，这件事的重大本身是无庸置疑的，而斯大林个人以及与其个人有关的一切对我这个圈子里的人影响之大是无

奥·费·别尔戈利茨（1910—1975），苏联俄罗斯女作家，诗人。回忆录散文《白天的星星》的作者。

可怀疑的。所以当时我们所写的那些诗，作者无需强迫自己，“悲伤”这个词就与“损失”这个词和睦相处了。稍后，我们最先的、比别人更深刻地开始考虑这个问题的特瓦尔多夫斯基就对一些人说：“这样的事是地球上空前未有的。”

现在，再次翻阅那些日子的报纸后，我想回过头来谈谈自己的想法。斯大林究竟是什么时候去世的，是当即死了而让我们对此事有思想准备，还是在开会进行新的任命之前他就已经瞑目了，还是真的在3月5日晚上10点钟左右我们在《真理报》时给谢皮洛夫打来电话的时候逝世的？我不想把猜测建立在别人都看不到的材料上，但现在我看的是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联席会议的决议，这个决议在公布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之后第二天就发表了。我看见，在决议的序言中没有谈到斯大林的去世，谈到斯大林去世的是前一天在告全体党员和苏联全体劳动人民书中，而决议的序言写得让人不知道这个联席会议是在什么时候召开的，是在斯大林去世之前还是其后。我把这序言援引出来，从这个观点上看，这个序言是颇有意思的：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在这个对我们党和国家困难的时刻，认为党和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证不间断地和正确地领导全国的活动，同时要求领导加强团结，不容许有任何混乱和惊慌，为此必须无条件地保证我党和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所制定的各项政策顺利实施。据此，为制止国家和党的机关领导活动中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苏联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

《真理报》这一版的反面，公布了将斯大林的石棺与列宁的石棺放在一起的决议，建造公墓的决议，规定3月6日、7日、8日和9日为志哀日的决议，同版还发表了治丧委员会关于进入圆柱大厅和安葬日期的通告，发表了来自圆柱大厅的第一篇报道《在斯大林的灵柩旁》。但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采取措施的决议的序言中，既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他还活着还是辞世了。

逻辑使我们猜测，这一切就如我们所想的那样，就是说，联席会议召开时，斯大林已处于绝对无望的状态。只等他随时断气就是了。决议早已拟就，并准备到最后就把它公布出来，如果斯大林还拖个一天、两天或好几天，看来，他们也不打算把它搁在一边了。也许，他们把它公布出来甚至不是在7号，而是在6号，即在中央全会过后立即同那个绝望的公告一起公布了。但斯大林几乎是在全会结束后就立刻去世的，所以先决定发表关于斯大林去世的告全党和全国人民书，然后在第二天发表政府机构的成员和部分改组的决议。逻辑的推论有这种可能，但不完全排除还有其他各种推测。

现在我回到1953年所写的笔记，说得确切些，回到那篇最后谈到圆柱大厅和安葬斯大林情景的笔记上来：

尽管有电话叫我在3点钟左右到圆柱大厅去，但我非常困难地直到5点左右才到达那里。步行走到圆柱大

厅已经几乎不可能……

我对当时写的笔记补充一点，我那时虽然住在普希金广场的一角，但无论怎样也不能穿过高尔基大街，也不能顺着季米特洛夫卡或彼得罗夫卡往前走。在特鲁布尼广场上，我同当时的林业部长格奥尔基·米海洛维奇·奥尔洛夫在人群中相遇。我们是由于在《文学报》上就纸张问题发生争论而彼此认识的。我们一起沿着涅格林大街往前走，尽管我们有中央委员会的证件，但也很难从塞满莫斯科各条街道的那些沉默的、混乱的人群中挤过去。我们是在拦住涅格林大街的一些卡车底下钻过去的，后来又爬过一些再次拦住这条街的卡车。我们被四面八方来的人挤得无法从口袋里掏出证件。我们同这些人群一起有时拥上前，有时推往后，只有到最后在小剧院的后边我们才得以从这拥挤的地方脱身。我不知道在其它的时间怎么样，可在我们挤过去的那两个钟头，人群并不为这种拥挤而恼怒。他们不恼怒，只是痛苦的沉默，同时，他们这种一致顽强地要走近圆柱大厅去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警察面对着这种沉默的和一致的顽强行动慌了手脚。

现在我回到笔记上来：

在主席团后边的一个房间里，人们在袖子上戴上黑纱。一些人去参加仪仗队，另一些人返回原处。这样大概过了将近一个钟头，最后轮到了我们。我同一些不熟悉的人站在一起，站在两个妇女的身边。我跟他们一起出来，就站在床头的右边。我刚在那里一站，转过头去，

就看到躺在灵柩内的斯大林的面孔。他的面容十分安祥，一点也没有消瘦，也没有变形，他的头发近年来开始有点稀落（当他在开会时来回走动，走近你的身边，侧身转过来时，这就可以看到），但现在这已看不到了。他的头发平静地往后垂下，落到枕头上。后来，我们变换位置，开始沿着灵柩走一圈。我从另一个方向看见斯大林的面孔。我又想，这面孔完全没有改变，没有消瘦，他非常平静，完全没有变老，而且还年轻了。后来，我从圆柱大厅出来，回家的时候，我想，近几年没有看见过，或者只从背后看见过，或者主要从战争时期和战前的一些肖像中认识斯大林的人，现在在圆柱大厅内，忽然挨近地看见了他，就可能觉得，他已经变老了，病痛把他的面容改变了。但实际不是这样，疾病一点也没有改变他的面孔。他那双手平静地放在那件灰色的弗伦奇式的军衣上。

1979年4月8日

这一天我还有好几次当仪仗队，大概在人们进来的门口站了两个钟头。人们排队来同斯大林告别。我站在右边的门口，倚着门框，整时都看到斯大林的面孔。人们走进来，肩并肩地同我一起站在那里，这时他们一进来，就立刻看到了大厅、灵柩和躺在灵柩内的斯大林。我不知道怎样把这情景写下来才能完全准确，不是所有的

人都哭泣，不是所有的人都发抖，不是所有的人都在那一瞬间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感情。可是我在那个时候却感到每一个走过我身边的人在他们的看见灵柩里的斯大林时那种内心的颤悸和心灵的震动。我不知道，也许我不过是无法表达我在那边所感到的东西，然而有一种东西很象我说过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在我身上曾多次重复过。

3月9日，在安葬的那天，我们在9点钟来到圆柱大厅。开始参加仪仗队，后来就进了大厅（这里说的“我们”，显然是指同我住房一起的苏尔科夫和法捷耶夫）。更换了最后几班仪仗队——一时奏音乐，一时妇女合唱。当我站在最后一班仪仗队时，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忽然沿着停放灵柩的木板台走上两三步台阶，久久地注视着父亲的面孔。她转过身去后就离开了，又坐到放在斯大林头部右边的椅子上。最后几班仪仗队还继续替换着。党和政府的几位领导人，从后边的一扇门里走出来，他们走到灵柩跟前。就在这个时候，几位元帅开始拿走别着斯大林的勋章的垫子。虽然这几天我都值了好几次班，但只有现在我才发现放在灵柩前脚下的这些垫子。布琼尼拿走了第一个，随后其他的人也开始拿了。人们用一个带有半圆形的、玻璃或者有机玻璃的小灯的罩子盖在斯大林面孔上头的灵柩上，把它抬起来，然后抬走了。送葬的行列慢慢地移动着，我们走在最后的一排，在我们后面，还穿过一两排就是外交官员，我回过头去，看见他们有些人戴着大礼帽，在这送葬的行列中，其样子显

得古怪，甚而荒唐。

前面炮车旁边摇晃着一些马头上的饰纓，在灵柩四边的四根士兵的尖细刺刀闪着寒光。我们走过“莫斯科”饭店，在它对面，可以看到提着花圈向前移动的队列走上红场。

灵柩停放在陵墓旁边之后，追悼会便开始了。追悼会一结束，灵柩就被抬入列宁墓，大家也开始鱼贯而入。

还在圆柱大厅的时候，我几番想过，为什么斯大林的手要这样放呢？当我进入列宁墓的时候，我忽然明白，他的手原来要跟列宁的手一模一样地放在弗伦奇式的军衣上。

在陵墓里边，我们开始沿着台阶走上去，经过列宁的石棺，然后转过来，走过斯大林的灵柩，它与列宁的石棺并排摆着，放在一块狭窄的黑大理石上。我走过只隔伸手之道的灵柩时，再次看见斯大林的面孔。他就象活人一样，如果可以这样说一个死人的面孔的话。就在这时，我怀着一种特别的、可怕的震动力量想，他已经死了。后来，我们走到楼梯的台阶，一切都已在后头，我们已走出陵墓了。

1953年3月16日写的关于斯大林逝世及其安葬的情景的笔记就到此为止。此后我什么也没有记载了，从那时起一切都只记在脑子里。开始大概记得多一些，后来就越来越少了。剩下的都已从记忆中消失。没有消失的只有两个观感还牢牢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第一个观感与我在陵墓中的所见有关。我当时没有把它记下来大概是因为心里感到不舒服，这种感情我现在已经没有了。在那里一看到与你相隔这么近，只离你半公尺远的地方，极象活人一样的斯大林的面孔，再把它的面孔与安放在石棺里列宁的面孔一比，就产生了这种感情。在这之前我曾多次到过列宁墓，并已习惯于列宁这副早已变成腊黄的、与我们相隔数十年的面孔了，而在这旁边的斯大林的面孔，不仅不习惯，而且与早已去世的列宁的面孔相比，它就显得极象活人。在那副石棺中，躺着的仿佛是列宁的肖像，而在这里，则是用玻璃罩着的一个活人，一个活着的和可怕的人，因为他在中央全会上发言时，我就有后面这种感觉，觉得当时发生的事情是非常可怕和危险的。

第二个观感是在 1953 年我当时完全有意识地不记下来的，但它总是异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在追悼会上发言的有 3 个不同的人。这 3 个人讲话我都一样留意。第一个是马林科夫，第二个是贝利亚，第三个是莫洛托夫。他们讲话的本文的差别我当时觉得并不明显，就是现在，当我在旧报纸上重读这些讲话时，它们互相之间也并无太大的差别，只是在莫洛托夫的讲话中，在它的第一段谈到斯大林时，讲的比其他人发言多一点人情味，少一点官腔气。但现在就他们讲话的本文难以看出的，然而在当时对我来说已十分明显的那个差别，就是马林科夫，随后是贝利亚在斯大林灵柩前所讲的话纯粹是这方面所需要的一些政治辞令。他们的讲话听起来没有暗示出一点他们个人对死者的态度，没有丝毫个人的哀悼、惋惜、激动或受损的感情——在这方面，他们两个

人的讲话都极其一样地冷漠。马林科夫用他相当圆润的嗓子发表的讲话，稍为较少地显出他缺乏任何哀伤的感情。然而贝利亚的讲话，一口土音，声音中充满严厉的、有时叫人感到不祥的腔调，则较明显地显出他缺乏哀伤的感情。总之，这两个演讲者的心态是一些已获得权力并为此而心满意足的人的心态。

莫洛托夫的讲话，我已经说过，就讲话的本文来看跟别人讲的很少有什么差别，但是，这是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诀别时讲的话，这个人他不管怎样都爱他，而且这种爱是同丧友的悲痛一起从这个最坚强的人的声音中甚至显得有点发抖而冲出来的。我想起，也不得不想起，在那次中央全会上斯大林怎样无情地鞭挞莫洛托夫。在这一对比之下，我不能不估计在莫洛托夫身上仍然存在着那种感情的深度，这种感情并不因为斯大林去世而完全中断了，它还把这两个人——生者与死者联系在一起。这一点我是用今天的话来讲的，因为当时没有作这方面的笔记。当时用什么话来考虑这件事（大家以为就是用这样的一些话吧），我已不能使之还原了，不过我当时想过，而且以后在一生中也曾不止一次地想起这件事，尤其莫洛托夫后来的命运和后来的行为更使我经常想起它。

很明显（这是我现在想的），在“学生”、“最亲密的学生”、甚至“最优秀的学生”，“战友”、“忠实的战友”、“最亲密的战友”这些词与“志同道合者”这个词之间在语义上的差别是很大的。我想，在长期同斯大林一起工作，并在他的领导下在各个时期获得了“最优秀的学生”、“最亲密的战友”这些称号的人当中，“志同道合者”这个词的概念最可能

属于莫洛托夫。

现在翻阅 1953 年 3、4 两月各期的报纸时，把这一切与我个人的回忆对照一下，我不能不注意到那时报纸上的某些公告的日期次序，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没引起我注意而今非常触目的那些图片。1953 年 3 月 10 日《真理报》。它的第一版，陵墓的观礼台，在它下面的边上第一次出现的不是一个名字，而是两个名字：“列宁，斯大林”。而在大理石上，这两个名字则是上下刻着的。戴着护耳皮帽的马林科夫站在扩音器旁，在他的右边，在戴着包子一样的羊皮高帽的赫鲁晓夫和戴着毛茸茸的中国皮帽的周恩来之间是贝利亚，他的宽肩膀把站在他旁边的人都挤瘪了。他穿着一件大衣，裹着一条围巾，把围巾包着下巴，戴着一顶宽边的皮帽，把帽子扯到夹鼻眼镜上头。他的样子阴沉而又意志坚定，但不象站在陵墓上的其他任何人。更象的是当时没有而稍后才有的电影中一个秘密的黑手党的头目。第二版，他还是站在周恩来与赫鲁晓夫之间，也是穿着大衣，裹着围巾，也是戴着那顶宽边皮帽，扯到夹鼻眼镜的上边，跟在斯大林的灵柩后头走。正如后来所表现的那样，他希图走捷径来取得政权。这些希望的产生是由于他在斯大林在世时多年获得了特殊的地位，由于他为此而早已准备一些忠于他个人的干部，这些干部不管怎样全都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也由于他本人具有冒险家的坚决而又大胆的性格，敢于在某个时候为自己的利益而把形成的集体领导的局面推翻。在大家决心支持下，集体去接替斯大林，作出一些对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妥协性的决定，尽可能避免任何内部冲突，——在这种局面中，象贝利亚这样的人，大概

已掌握对他最为有利的一切了。他的表现越主动，越多提建议，越多在大家不希望发生内讧的心理中进行投机，他就越能顺利地达到巩固自己的阵地和扩大夺取他梦寐以求的政权的可能。除了一件事实之外，其余的都是我根据当时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报纸去作的彻底的研究。

马林科夫几个月前享有代表中央在 19 大作总结报告的资格之后，现在他在斯大林快要过世或已经去世的时候，就有可能被看作是斯大林的继承人而登上国家首脑的地位。很明显，贝利亚这时就抓住马林科夫，跟他一起草拟将来改组的最初方案，并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地把他推上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上。

1979 年 4 月 9 日

当时这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没有什么理所当然的事。另外还有一种抉择：在政治局的老委员当中有莫洛托夫，他过去曾担任部长会议主席达 10 年之久，在重新分配工作职位的时候，如果马林科夫走上党中央总书记（不管是否这样称呼）的岗位，接替了斯大林，那么莫洛托夫就可能接替斯大林而走上部长会议主席的岗位。莫洛托夫深得众望，这样的任命在广大群众中显然会得到普遍的支持。但斯大林亲自帮助了贝利亚。在最后的一次讲话中，他根据自己的某些理由（也许不全是他自己的，而是听进了别人的谗言），对莫洛托夫横加攻击，其力量之猛，使所有听到过斯大林讲话的人，都

会认为莫洛托夫担任斯大林曾经担任过的两个工作职位之一是对他的意志的违抗。那究竟为什么贝利亚如此关心，让马林科夫成为斯大林的接班人，并担负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而斯大林在中央书记处的职位（从贝利亚的观点看是次要的）则由赫鲁晓夫（贝利亚直到自己垮台之日还不了解他的性格和个性）来担任呢？这很简单。贝利亚始终认为部长会议主席在领导国家中起着主要的作用，而部长会议的几个副主席，也差不多全是由他和马林科夫在那个方案中提为主席团委员的。这样，整个国家的权力就集中在同时领导部长会议的主席团委员的手中。第一个提议任命马林科夫为未来部长会议主席的贝利亚，随即就由马林科夫任命他为4个副主席中的第一副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认为这样按排列称呼在传统上就有其继承上的次序意义，就是说，万一马林科夫不在或者生病，这个排列就表示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职责的将是第一副主席——贝利亚。

从这里开始，我们研究下去。贝利亚在斯大林逝世之前的某个时候就已不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了，虽然他实际上还在某种程度上继续控制着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斯大林在最后几个月才任命老党员伊格纳季耶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之职。

在联席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有许多部因一些部与另一些部合并而扩大了。其中国家安全部就因与内务部合并而结束工作，于是贝利亚就作为马林科夫第一批副主席中的第一副主席同时兼任这个新的合并了国家安全部的内务部的头头。前不久担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伊格纳季耶夫就当了中央书

记，正如后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为期也不久。

这样，贝利亚就预先为自己篡权和今后的行动建立了最有利的阵地，要是考虑到贝利亚的个性的话，那么这些行动的规模和性质都显然具有相当阴险的和无所不包的性质。

在把权力集中到部长会议，而把次要的职能归到中央书记处之后，贝利亚就竭力把权力的重点移到地方，移到各加盟共和国，把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的权力移到各国的部长会议去，在某些场合下，特别是在巴库，他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随后，他作为内务部部长提出了实行大赦的构想。在1937年底斯大林派他接替叶若夫的时候，贝利亚在莫斯科的活动一开始就是给无数的人平反，停止审理案件并使成千上万的人从集中营和监狱中回来。当时斯大林派他来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他在战前就已出色地扮演这个角色了。贝利亚记得这件事并认为别人也会记得这件事，无论如何，他立志要使人们回忆起这件事。他希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大赦命令时将提到他这个内务部长，将归功于他的努力。根据这个命令，不仅一些被判监禁为期到5年的犯人全可释放，而且那些正在审理但预计量刑不会超过5年的案件全都终止，同时那些经济犯，职责犯和军事犯也都释放了。这个措施自然是人道主义的，所以它执行起来特别顺利。这就使人产生一种印象：以后，在一定的环境中和一定的宣传工作上，这一部分被释放出来或未被判刑的人就会成为支持贝利亚他在这方面发展的培养基了。

发布这个命令之后过了6天，即4月4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以贝利亚为首的苏联内务部的一则通告，说苏

联内务部就所谓“医生谋杀案”进行了缜密的审查：“检查结果表明，一些受此案牵连的医生……（接着一长串名单）被前苏联国家安全部逮捕是错误的和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现已查明，似乎确定他们有罪的所有被捕者的供词，都是前国家安全部侦查处的工作人员采取苏联法律所不容的和严厉禁止的刑讯手段取得的。”这样，前国家安全部就成为这一切罪行的罪魁祸首，而现在的内务部则是前国家安全部的一切黑暗手法的揭露者了。又过了两天，《真理报》的社论阐明，发生这种事的主要原因，是前国家安全部部长谢·德·伊格纳季耶夫所表现出的政治上的无知和粗心大意，以至受一些犯罪的冒险家支配。贝利亚便作为新的内务部的头头揭露了这一切非法行为。同一天，公布了伊纳格季耶夫被解除中央书记职务的消息。

所有这一系列措施都是通过报纸抛出来的，只有后来才发现贝利亚内心的目的。他匆促地一步紧接一步在篡夺政权的道路上迈出了准备的步伐。

这些步伐之一没有见报，但我是知道这一步伐的人之一。我不能准确地回忆起，这是哪一天发生的事情，也许，经过一番努力，这个日期是可以想起来的，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曾当过中央委员的法捷耶夫和考涅楚克两个人都为和平委员会的事出国去了的时期。在公布医生案的伪造之后不久，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都被召到克里姆林宫去，在两三个房间内看文件。这些文件有证实斯大林直接参加“医生谋杀案”的整个事件的，有已被逮捕的前国家安全部侦查处处长柳明同斯大林的谈话和他关于斯大林要他搞逼供信的供词等

等。那里还有一些其他人的口供，都证实斯大林直接参与这个案件。此处还有一些同斯大林就这个问题谈话的记录。但是，我似乎不大相信这些原先用打字机打，后来才复印到纸上的文件。

我分四次去读这些文件，差不多花去了一个星期。后来一下子终止，不准再读了。要给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去读这些文件的主意，毫无疑问，是贝利亚出的，因为只有他才拥有这些文件，后来查明，情况确是如此。他想捞取额外的声誉，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不偏不倚的人，显示自己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被撵到一边去并非偶然，因为斯大林已不相信或者不再相信他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再搞那些惨无人道的、令人愤慨的非法行为，根据提供给我们阅读的文件，这些非法行为都直接与斯大林有关，都是他的主意，是他要求搞的。贝利亚把这些文件提出来给大家评论时，仿佛要证明，他与这类事无关，他是坚决反对这一切的，他不打算掩饰斯大林的罪过，相反，他要暴露斯大林的真面目。

读这些文件是很痛苦的，这些记录都象是真的，都证实斯大林的心理病态，证实他几近心理反常的多疑和残酷。文件就是这样分类的，使人只从这方面来看斯大林。

瞧，这就是你们的斯大林，贝利亚仿佛在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可我跟他一刀两断了。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可我打算把他的真情全都说出来。自然，他在这些文件上只提供对他有用和有利的那种真情，而其余的一切就不用去看了。

这些文件看了将近一个星期，此后再没有谁看到它们了。当考涅楚克和法捷耶夫回来，我向他们谈及这些文件的时候，

他们听了吓得睁大眼睛,但是他们不能亲自读到这些文件了。

应该说,虽然贝利亚的目的相当卑鄙而且不久我都完全知道了,但是这些文件,尽管经过特别挑选,也还不是假的。所以我对赫鲁晓夫在 20 大讲话时我所经受的那种精神上的打击,就比其他许多人大概有准备得多。

斯大林逝世后过了 4 个月,在 1953 年 7 月 3 日那天,我在《文学报》编辑部正在看应出的一期报纸的版面时,前《红星报》责任书记,后来是该报的主编,1953 年当了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斯科夫斯基忽然打电话给我,问我应出的这期报纸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电话来得相当晚,已是晚上 11 点钟了,我说,有一版已经上机,其余的我和几个“新头头”还在看。

“停下来。”瓦西里·彼得罗维奇对我说,“暂时任何一版也不要印。”

“为什么?”我问。

“要跟你谈谈。”

“好。我停下来。”我说,“我马上来见你。”

“不必来我这里,我马上来见你。但是你要停印。”

我把各版都停印了。我说,可能来了什么一份官方的材料。这通常不是非要不可的,不过这一回也许对我们是非要不可了,但还要看看,我们是否要发表它。所以就让几位“新头头”把其他各版看完,然后再把全部连接印下去。我没有多作详细的解释。

约莫过了 15 分钟,莫斯科夫斯基已经走进我的办公室里来了。他请我嘱咐在他离开我这里之前,不让任何人进来。于

是我嘱咐我的女秘书塔吉扬娜·阿历山德罗芙娜，叫她不要让任何人进来。她听后大吃一惊。

“什么人都不能让进来？”她反问，因为在我们编辑部里是从来没有过的。

“谁都不让进来。”

我回到办公室，关上门，坐到莫斯科夫斯基对面的椅子上，等他把我非常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毫无疑问，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还在莫斯科夫斯基到来之前，我认为这件事是很好解释的，我想，正象在这之前曾经发生过一次的事那样，无非忽然决定把我从报纸的工作岗位上撤下来，并且不让我在正要出版的一期报纸上签上我的名字。但为什么要把所有各版都停下来呢？只把最后一版留下来不就可以了么？不，很明显，这件事的确将比我不会为之懊丧的解除我的编辑职务更重要得多。

“你认真听我说。”莫斯科夫斯基改用官腔的口吻说，“我受中央委托把这个消息通知你这个《文学报》主编个人，只通知你个人。贝利亚同志今天已被开除出中央主席团，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解除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部长的职务，并因自己的罪恶活动而被捕。”莫斯科夫斯基是用官腔一口气把这事情告诉我的。他甚至没有发觉，在开始把这事通知我的时候，由于习惯已深，忘了把贝利亚后面机械地说出来的“同志”这个词拿掉。

“明白了。”我说，“可出了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呢？”

“你明天早上 10 点钟去参加中央全会就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我暂时只把这件事通知你，你要亲自再看看各版，不

要在报纸上谈到贝利亚的任何事情。”

“那里没有什么要谈到贝利亚的，那里怎么会有他。”我回忆一下今天报纸的四个版面说，“我们没有发表任何专稿，怎么会有他呢？”

“我不知道有没有。”莫斯科夫斯基说，“我正式提醒你了，我没有更多的时间，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而你要亲自把各版看一看。不要跟任何人说什么。明白吗？”

“明白。”

于是我就不跟任何人说什么，象个傻瓜一样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又呆上两个钟头，把四版报纸重读一遍，看看贝利亚的名字有无出现在各版上，说不定在某一篇谈论农村经济的短文里会提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集体农庄或国营农场。但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发现，于是我深夜就把各版签字付印了。

现在，我试着回忆这件对贝利亚的命运发生巨大转折的事情在那个晚上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主要的印象是有一种轻松的感觉，将来不会发生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了，一切依然照旧。贝利亚同斯大林很接近，他在莫斯科的期间无论如何决不止从事内政部或国家安全部的工作。在战时，他又钻进国防委员会，作为一个领导或监督侦察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人，总是同时获得了某种附加的权力——这一切大家都是清楚的。显然，在工业方面执行国家某些及时的紧急任务时，他为自己所创造的一部分威信，都夹杂着人们对这种兼职感到恐惧和颤栗，——这是不难想象的，我们也都猜到了。

斯大林在世时贝利亚所占有的那个地位，使他在斯大林逝世后成为国家的首要人物之一，这看来似乎是理所当然的。

不过，他一下子成了第二号人物和变得非常积极，而且不是别人，正是他提议马林科夫为候选人，——这就使人产生了某种危险的感觉。这种感觉很多人都体验到了。时代依然残酷无情，特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的头几个月，而在他身上首先可以触摸到的变化，就是在揭露“医生谋杀案”的伪造和释放这些人之后不久发生的事情。时代并没有促使人们去过分公开谈论这些问题，不过我记得，各式各样的人在谈话时都言留三分，这就显出他们心有余悸，这是与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占据了那个地位有关的。在以各种不同方式表示出的这种担忧当中，也有这样的一种口吻，贝利亚是不是想名副其实地依据继承权去接斯大林的位置呢？

至于我，那因为我曾在 1948 和 1953 年之间有过两三个月的所谓创作假，先到苏呼米，而后到苏呼米附近的古尔里普沙镇去。在那里我认识了许多阿布哈兹人，也认识了许多格鲁吉亚人，我知道贝利亚在高加索时期的活动，知道他在高加索那边具有什么影响，首先是在格鲁吉亚的，然后是来到莫斯科之后的。这一切我比不曾在那边呆过的人都知道得更多。不管在哪里都会接触到回忆全家人失踪，回忆在格鲁吉亚被处死、被干掉的人们，其中有党的工作人员，也有知识分子——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把贝利亚调来莫斯科扮演改正叶若夫错误的角色之前的事。

我的谈话者决非信口开河的人，而且时代也不容许这种信口乱说，不过从他们的口中总能听到这件或那件事。于是

我逐渐获得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就是给那些还活着的人施恩并在叶若夫之后把他们从集中营和监狱中释放之前，贝利亚就比叶若夫杀掉大批俄罗斯人更干净地杀掉大批格鲁吉亚人了。而且在讲述 1936、1937 和更早一些年代里所发生的事件时，在某些细节中还提到了一件有关报仇和挟嫌报复的可怕的事情。我的阿布哈兹的朋友中，有两三个人看来完全信任我，给我讲述了一些贝利亚在阿布哈兹为所欲为、草菅人命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其中哪些事情可信，哪些事情不可信，这在那些年代里，在中央全会审理贝利亚的案件之前很久，在 20 大审判他之前很久，要使之区分出来看来是很不合理的。有时，当年觉得不可信或不完全可信的事情，到后来，过了若干年后，就感到一听人家讲就不相信是很荒唐的。所有在谈话中讲出的这许多传说和暗示，以及忽然提起的那些很久以前，或不那么很久以前的详细情节，都是与这个出生于离古尔里普沙镇（我在这里住过）不过 10 公里远的米格列尔人村庄梅尔赫乌里的人有关。这使人觉得，他这个人不仅是过去可怕，而且将来也是很危险的。这个感觉在我身上相当顽强。所以瓦西里·彼得罗维奇·莫斯科夫斯基给我带来的那个消息，立即就为我接受，感到有一种还未完全考虑过的、本能的轻松，仿佛它是一件解除我们头上的危险的事情……当我晚上在读报纸的各版时，我的脑子里总在盘旋着有关那些直接的谈话，有关那些暗示和半暗示的回忆。不过这只是我的第一个感觉的补充。后来很快弄清楚，就这种感觉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已相当普遍地传开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参加中央全会，依我看这次会议开了

5—6天，会上把贝利亚的一切事情都说了，但只能谈他，同时尽可能庇护斯大林，不过这远非总能使人信服，也远非总能做得成功。

赫鲁晓夫在全会上讲了贝利亚准备篡权的前夕把他抓住的情况。使用“抓住”这个词更符合赫鲁晓夫讲话的实质，更准确地描述了他讲这一切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激情和万分高兴的样子。

从他讲述（谁也没有在会上提出反驳和异议，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中可以得出结论，在捕获和解除这只巨兽的武装时，起主要作用的正是他——赫鲁晓夫。当我听他讲述的时候，我完全清楚，赫鲁晓夫是当场捕获这只巨兽的发起人，因为他比其余的人更有远见，更有天才，更有气魄和更有决心。但从另一方面看，促成他做出这件事的是贝利亚太小看了赫鲁晓夫。他对赫鲁晓夫的品质，对他天生深厚的、纯粹是农民的、顽强的机智，对他健全的头脑，而且对他的性格的力量都估计过低了。相反，他还认为赫鲁晓夫是个圆颅方趾、笨头笨脑的小傻瓜，而他贝利亚，搞阴谋的专家，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巧妙地骗过他。赫鲁晓夫在自己的讲话中不无高兴地谈到，贝利亚怎样把他看作是个小傻瓜。

我不想再写这次中央全会的事情了，再写就会使我离开这篇笔记的主题。在这次全会上，除了赫鲁晓夫的讲话之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大概就是扎韦尼亚金和柯西金的特

阿·巴·扎韦尼亚金(1901—1956)，苏联国家活动家。1955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中型机器制造部部长。

别聪明、严厉、合情合理和引证论据的讲话了。

可以说，贝利亚的垮台就象一颗最后最后的、在长久停歇之后突然爆炸的炸弹一样。如果不用比喻的说法，那么，所发生的一切，贝利亚想干而且试着干的一切，以及把他的手抓住后，一下子向他摊出了他多年来所干的一切，——所有这一切，即使是最后的，但也使我们认为是斯大林那个时代的一次最公开、最丑陋、最难闻的呕吐了。

如果试图把那个时代一切对人的意识最难堪、最残酷、最悲惨、最凶狠和最肮脏的东西搜集起来并压成一件唯一的東西，然后又把它从那个时代也有的其他的一切东西中分开和拨出来的话，那么贝利亚本人，他的活动，他在斯大林在世时长期生存的可能本身，就全是那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呕吐之物，这堆呕吐出来的东西在因斯大林逝世而结束了那个时代之后就显得突出和一目了然了。

写完了这一切之后，我想试一试弄清楚在斯大林去世和20大之间那3年的期间我对斯大林的态度。

在那些年月里，我的心态的复杂性就在于：总的说来，我是在斯大林时代成长和受到教育的。他在世时我读完了小学。他在世时我进入了工艺学校。他在世时我当了工人。他在世时我成了文学院的大学生。他在世时我开始写作。他在世时我当了职业作家。他在世时我在战前就成了候补党员，而后来是党员。他在世时我当了军事记者。他在世时我得了六次斯大林奖金，其中一次我认为无功受禄，其余都是应得的。他在世时我当了《新世界》和《文学报》的主编，作协副秘书长，中央候补委员，好几次我都能博得他的信任。他在世时

我的继父坐牢，而后来又被他释放出来。他在世时我的姨妈和我的表姐都被流放。他在世时我的一个可爱的和一个不可爱的姨妈都死于流放之中。他在世时我最喜爱的一个人——我的第一个创作研究班的领导人被投进了牢狱，尽管我几次写信请求，依然不把他放出来，也不让他上前线。他在世时我的一个还留在人间的姨妈由于我的申请而回到莫斯科。他在世时发生过我不完全明白的多次审判。他在世时发生过我准备去参战的西班牙内战，也发生过我曾参加过的哈拉哈河会战。他在世时发生过我在其中看到许多可怕的、许多错误的、许多令我气愤的事情，但毕竟我们还是取得了胜利的伟大的卫国战争。他在世时我听到过他在我看来是明智的、正确的有关文学的谈话。他在世时发生过与这些正确的谈话背道而驰的根除世界主义的运动。他在世时我们没有在战时发了横财的美国面前低头，那些年，我们头上还有他们的原子弹，而我们自己却还没有。他在世时还出现一些使人想起 1937—1938 年的新的战后大逮捕。他在世时开展过我曾参加的战后争取和平的运动。所有这些我随想随写的杂乱无章的事情都是他在世时发生的。一切都是他在世时发生的。

读完贝利亚一个星期来塞到我们的鼻子跟前而后来又突然收回的那些文件是很可怕的。那些文件都证实了斯大林个人开始衰变；证实了他的残酷无情和近于疯狂的多疑。对贝利亚的揭发和由此而暴露出来的那些政治上以及道德上令人作呕的东西，尽管各式各样的人都企图庇护斯大林免受打击，但这些事情总还落到他的身上。而且斯大林去世后立即广为人知的事情，那些在他在世时多年来积聚起来的疑惑，对他

所做的事情表示不完全有意识的不赞同以及他所做的事情是否公正表示怀疑，——这一切都不能让人在斯大林逝世后的3年间用新的观点来看待他。我今天对斯大林的态度是逐渐地、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形成的。这个态度差不多成型了，之所以说差不多，是因为只有在我写完这本书的第一部后它大概才能最后定型。而我在那3年间对斯大林的态度，我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来，因为它很不稳定。我在各种感情与对各种事物的各种观点之间被折腾得够呛了。

我最先的、主要的感情是：我们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不过后来又产生了另一种感情：他最好早一点死，这样在他生命最后几年就不会有那么多可怕的事情。但不管怎样，历史上再没有同样的作法了。同样的作法只有在将来才可能有，在过去已经不存在了。最先觉得损失重大的感情很久都控制着我，在最初的几个月，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显然，在这种感情的影响下，我还同一个喜欢显示自己一生性格刚毅，但一发生危险就立刻藏到灌木丛里的作家共同写了一篇社论，发表在1953年3月15日的《文学报》上。在这篇社论中，除了别的话之外，还有如下的一段话：“在苏联文学面前迫切地摆着的、最重要的和最崇高的任务，就是要为自己的同时代人和未来的几代人，把一切时代和各民族人民的最伟大的天才——不朽的斯大林的形象宏伟而又完整地描绘出来。”不错，以后在社论中还阐述过，在描绘斯大林的形象时，作家要创造出联系着他整个时代的活动和这个时代的各项成就以及其他等等的形象来，但是原先的措词正好是这样的。这篇社论名叫《作家的神圣职责》，所以在我引用的一段话中，

首先就认定作家的神圣职责乃是在文学中创造斯大林的形象。根本没有任何人逼我这样写，我可以把一切写得完全不一样，但我写出来的正是这样，而且这一段话不是出于别人，而是恰好出自我的笔下。这篇社论的整个调子也都是我定的，而其中谈到作家的神圣职责首先是指作为纪念的任务，而不是指那种对今天和明天的呼吁。

从我当时的观点上看，社论就是社论，我没想到会因它而发生什么祸福。我在这之前举行的作家集会上的发言就是这篇社论的基础，那次发言的意思与这篇社论的意思毫无二致。但是，这篇社论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之前，我同各式各样不愿意理解我还要继续创作点什么的人作了长期斗争之后，取得了每周三期报纸中负责出两期的权利，而第三期只同副主编一起草草准备。这第三期是星期六出的，由副主编签发。有《作家的神圣职责》这篇社论的一期是星期四出的。它出版后的星期四我来到编辑部准备下一期，看到深夜。星期五我就到郊外的别墅去了，好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天在那边写点东西，星期一早上回编辑部来，从清早起准备星期二的一期。在别墅时没有电话，于是我星期一早上就回莫斯科来了，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这儿有一件事。”我的副主编科索拉波夫碰见我时说。我刚拿起星期六的一期报纸，还未来得及读完。“最好让苏尔科夫跟您谈谈这件事，您给他去个电话。他说过，您一回来

里·伊·科索拉波夫(1930—)，苏联哲学家，新闻工作者。1974年起任《真理报》第一副总编辑。1976年起任《共产党人》杂志总编辑。

就给他去电话。”

我给苏尔科夫去了电话，我们见了面。于是得知如下的事情：当时领导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不知是在星期四晚上还是在星期五早上，读了有我那篇社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一期报纸，就给编辑部打来电话，我不在，后来就给作协去电话，声言必需把我从《文学报》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认为不能让我再出下一期报纸了，直到把问题彻底解决为止（大概还要到政治局去，这我自己也想到了）。下一期，也许还有以后各期，就由执行作协总书记职务的苏尔科夫去审阅和签发。

苏尔科夫从后来的谈话中了解，问题出在那篇社论《作家的神圣职责》，说在这篇社论中，我号召作家不要往前走，不要工作和考虑未来，而只往后看，只做歌颂斯大林的工作——在这样的立场下，就谈不到要我再去编报纸了。

据苏尔科夫说（我不记得是他直接同赫鲁晓夫讲话还是通过第三者），赫鲁晓夫当时非常生气，凶神恶煞的。

“我个人，”苏尔科夫说，“在这篇社论中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看到有这种意思，不过，这篇社论写得很不妥当，的确，那里有太多的地方谈到要创作描写斯大林的作品，这是最主要的。归根结底，事情就是这样。可以在其他的一些社论中去掉这种用不着的过时的口吻。开始我想派个急使来找你，叫你来谈，但后来决定不派了，免你感到心烦。说不定这段时间一切都会过去的。这一期，正如科索拉波夫对我说，已经准备好了，我来看一看就签发了。没有要求把你的名字取掉，只要求我审查和签发这一期。现在我想，会不会破坏你的生

活常态，你不是在那边写作吗？你星期一回来，可能到那个时候一切都解决了。”

结果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不知道，这是在哪一级解决问题的，是在书记处还是在政治局，总之，问题已经解决了。当苏尔科夫当着我的面给宣传部打电话时，那边告诉他，我可以回到自己的编辑部和出版应出的一期报纸了。事情就这样结束。看来，这是赫鲁晓夫个人的感情冲动。他当时（在1953年）大概已经想到过，再过一段时间他就可以试一试把斯大林的问题不爽毫厘地谈出来；结果后来他就认为有必要在20大全都端出来了。自然，在这种情绪下，那篇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社论，号召作家创作划时代的斯大林形象作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就如常言所说，完全不合他的口味了。显然，有人说服了他不要采取他在发火时提出来的处理方法，但他直到我的《生者与死者》发表之前，多年来都是不喜欢我的，认为我是文学界最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之一。显然是这样。顺便说说，我现在翻阅那个时期的报纸时，看到了一件早已被遗忘的事：正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由于命运的作弄，当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任，并且在红场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致了开幕词和闭幕词。这本来与问题没有任何关系，但这件事既然落到眼皮底下，那我就不想把它放过了。

我不是狂热的斯大林主义者，不管是在1953年，还是在1954年，还是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但在1954年，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我家里的书房挂着一幅我十分喜欢的斯大林的相

片，这是在伏尔加——顿河运河上从武切季奇的雕塑上拍摄下来的，——一个强大有力的、充满智慧的老虎的面孔。斯大林在世时我家里从未挂过或放过他的肖像，可现在我拿到它就挂上了。这不是斯大林主义，至多是一种仿佛象贵族知识分子的自负：当时你们挂我就不挂，而现在你们不挂我就挂。此外，这幅相片我确实喜欢。

1955年，当出版我的一本诗集的时候，我曾收进去一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不久，在1943年写的拙劣的诗。有一首描写斯大林从察里津给列宁打电话的情景，现在这个场面又重演了，但这是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一个不知名的将军或司令员从斯大林格勒给斯大林打电话，正如当年他给列宁打电话一样。这首诗，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处理上都写得不好，当时没有拿去发表，就这样搁在我的文稿档案里。可是在1955年，我突然拿出来并把它发表了。为什么？显然，这也是出于一种矛盾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示威性。当我下决心写一部描写战争的长篇小说并以战争最初的日子开头的时候，我对斯大林的活动就已抱着批评的态度了。我写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的第一部（这一部后来没有收进长篇小说去纯粹是由于其结构和艺术的原因）是在1955年12月底，1956年1月和2月初。这是在20大之前，在它召开的前夕，当时还没有赫鲁晓夫的任何报告，也没有随之而在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上发生的一切。我的长篇小说的这一部分，我

叶·维·武切季奇（1908—1974），苏联雕塑家，塑有许多英雄象征形象以及许多名人的肖像。五次获苏联国家奖。

在 1957 年把它分作两个中篇——《潘捷列耶夫》和《列瓦绍夫》发表了。我并没有在 20 大之后把它们修改或改写。它们恰好就是这样一口气写成的。其秘密就在于：尽管我把这部描写战争，描写 1941 年的长篇小说的开笔日期一拖再拖，但我写它并非偶然。我对于那个时代的一些回忆，我首先要依靠的我的日记，都不可避免地令我在内心上对许多与斯大林有关的事情重新作出评价：他对战争的准备，他在 1937—1938 年实行的的大逮捕对我们失败的影响，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日记是在战争的时期写的。长篇小说与这些日记相隔 13—14 年。为写那部长篇小说而思考的日记，对我本人来说是另一种东西，它们在这之前早已在我的脑际了。它们成了对斯大林各个时期（其中包括战争的前夕和开始）那些不容争辩的功绩的习惯评价方面的揭发文件。我一钻到那部长篇小说去，就越加对斯大林，对他的作用，对他所做的一切都重新作出评价。没有这一点，我是不会，也不想，也不能（三者合一）写出 1941 年的事件的。

看来，我应该在这里结束我这部手稿的这一部分了，以便接着转到我暂时命名为《斯大林与战争》的那部分，它将试图探讨我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弄清楚我曾就这个题目同他们谈过话的其他许多人的思想和感情。

下面就是为本书的第二部——《斯大林与战争》而整理的部分材料。

给我讲述这一切的人渴望做到非常客观，渴望把斯大林各种不同的特性（招人喜欢的和令人讨厌的）都讲出来。这些回忆主要是战前的，有一部分是战时的。我将如我所记得

的援引出来，而不恪守它们的连贯性：

苏联海军元帅 伊·斯·伊萨科夫的谈话

1962年5月21日

依我看，我要说的第一件事是在基洛夫被杀后不久发生的。那时我在一个办理庞大军事建设的委员会里工作。这个委员会每周定期开会——有时在斯大林的办公室，有时在别的地方。会后有时举行晚宴，人数极少；有时看电影，人数也极少。看电影时大家喝点酒，吃点东西。

我要讲的那次会议，晚宴是在下边的一个房间里举行的。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四周都放着书柜，厅相当狭窄。从我们开会的办公室里走到这个客厅，要经过一些有好几个拐弯的、相当长的走廊。在这些走廊上，每个拐弯的地方都站着岗哨——不是哨兵，而是内务部的值勤军官。我记得，那次会议后我们来到这个客厅，还未坐到桌边，斯大林就忽然说：“你们发现那边站了多少人吗？你每一次路过这些走廊的时候都会想：他们当中哪一个会出来杀掉你？如果是这一个，那他会在你背后

开枪；如果你拐个弯，那下一个又会朝你的脸上开枪。你在走廊上经过他们的身边就会这么想……”我象大家一样，默默地听着他讲。这件事当时使我十分震惊。现在，过了这许多年，这件事还给我说明斯大林的生活和行动的某些方面，自然，不是说明一切，但总说明某些方面。

第二件事。

我到北方出差回来。那边建设一个军事设施，是一项大工程。到这个军事设施去的道路非常不好走。当汽车走过时，这条道路就象枕头一样在颤动。后来，为了加快工程，铁路建设还未竣工，就直接在这条砌石路上面铺设了铁路路基。这条路有一部分是走汽车的，有一部分是走轨道车或者是列车的，一列车一共只有两节货车。总之，这条路不会发生问题那真是胡说八道。

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都是各机关的代表。委员会主任与交通人民委员部无关，所以他对道路不感兴趣。尽管我表示异议，但他向斯大林报告时说，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妥当。表面上看来是对的，因为由他直接领导的军事工程的方针路线，一切都确实没有毛病，所以关于道路问题他连提也都不提。当时我发急了，请求发言。我谈到这条铁路支线，说这毫不中用，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把工程建设起来。我说这种在砌石路面上，而且是唯一的一条路面上铺设铁路，一般说来不是别的，而是破坏行为。当时“破坏行为”这个词儿，可以说是很通行，很时髦的，所以我就使用这个词儿了。

斯大林把我的话听完，然后平静地说：

“同志（他喊了我的姓），您分析问题，相当有警惕性。的确，客观地说，那条道路做成象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别的，而是破坏行为。但这里首先要弄清楚，谁是破坏分子？我是破坏分子。是我下命令建设这条路的。有人向我报告说，没有别的办法，说这样能加快速度，详细的情节他们没有报告，只报告一般的概况。为了加快速度，我同意这样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破坏分子。我们把真相说明了。现在您来作出决定，今后怎么办？”

这是许多事情之一，在他显示自己所独具的、与众不同的幽默感时，一般说，他能独自说出自己的错误或过失。

第三件事。

有一个建造庞大舰队的问题。筹划建造一艘主力舰，据所有重要资料看，这艘主力舰在当时是一等的。估计这将是世界上一些最有威力的主力舰之一。同时，在这艘主力舰上计划装置 6 门大口径的高射炮。会议是在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内举行的，由斯大林主持。委员们作了报告。哦，大家都向他报告了。我不同意这个设计。在这之前我虽长期地在各个时期进行过斗争，但我不能在委员会上说服我的同行的顽固态度，不得不在这里讲。我说，英国少于这种威力的主力舰装了不少于 12 门高射炮，如果我们不考虑空军的发展，不估计它的前景，把这样少的大口径炮装配在我们新的主力舰上，那么我们就把它送去给空军炸沉，把几十亿丢进水里。最好多

花一些钱，但要改进设计。我明白，改造工程是很艰难的，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安装大炮，增加其数量，必然要改变一系列结构，要设置许多新的隔舱，要改变战舰一切基本数据的结合。总之，这对设计工程师来说是一件极不愉快的事情。但我看没有别的办法。大家都同我争，我也争，而且争得面红耳赤。伏罗希洛夫最后将我一军，他说：“他想干什么？在罗斯托夫大桥上，我们担负着保卫整个高加索，而且还负责全部交通线，但我们那里一共只有 8 门大炮，可一艘战舰 6 门炮他还嫌少！”

这看来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它一点说服力也没有，桥上的高射炮不多，但几个方面军都集中在它的周围，自然它的大炮就多得多。而且一般说来，这同主力舰没有任何关系。但外表上看来它有说服力，结果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我很沮丧，走到一边，坐到椅子上，我坐呀坐呀，思想不知飞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常有的事。我明白，在这里我不能推倒一堵墙。在会议快结束时大家七嘴八舌的嘈杂声中，我的思想开了小差，不知谈的是什么事情……忽然，就象嘈杂声有时会把一个人从沉思中惊醒一样，我被突然一阵沉静惊醒过来，我抬头一看，斯大林站在我的面前。

“伊萨科夫同志为什么这样忧郁？啊？”

沉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斯大林走到我的身边，二是因为他开始说话。

“很想知道。”他重复说，“伊萨科夫同志为什么这样忧郁？”

我站起来说：

“斯大林同志，我把自己的观点说了，大家不同意，我依然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是这样。”他说，走向桌子跟前，“那么，我们确定这个基本方案了？”

于是他说：

“我们给这方案作点补充：‘鉴于情况需要，在那条主力舰上还增加4门高射炮’。伊萨科夫同志，这您就满意了吧？”

这并不完全使我满意，但我已经明白，这是可以期望的最大限度了。反正我不能在任何地方再得到什么，于是我说：

“是，当然，谢谢，斯大林同志。”

“那么，我们就记下来。”他结束会议时说。

还想起一件事……开始一般都是他主持会议的。

应该说，他一向都是按传统军事会议的原则主持会议的。他很留心地把大家的话听完，不慌不忙的，不打断别人的话。同时，他竭力大致按职位高低让人发言，以免前面的发言妨碍了后者。只有到最后，他才从大家的讲话中挑出主要的东西，从各种观点中取出有用之点，加以概括，作出结论。当他一开始还没有完全确定自己的观点时，常常是这样。自然，这说的是讨论军事和技术问题的时候，而不是讲一般的政治问题。讨论政治问题

的会议，很遗憾，我没有参加过。

当他预先觉得问题的主要方面按某种办法解决时（这称之为“预先准备问题”，顺便说说，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叫的），他就叫两三个人去，给他们建议按一定的方向发言。那些不是头一次参加这种会议的人，一听这些人的发言就明白，问题趋向哪一方。但就是在这种讨论中，他也不慌不忙，不中断别人的话，不妨碍别人说出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有时会成为他的观点的某一部分，后来归纳到他的结论中去，并且成为决议的基础。换句话说，尽管有预先的决定，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还考虑到别的意见。

还有一件事。

这也是发生在 30 年代中期的事情。我记得不很清楚，看来这是庆祝五一节游行之后的事，当时参加大检阅的人都被请来了。啊，这里所谓“参加大检阅的人”不是指来参加大检阅的指挥官，而是指司令部的上层人物。我记得不很清楚，这是哪一年的事了，但我记得，这一次谈的是加速发展太平洋舰队的建设，而我因为自己的专业在一定范围内被邀来参加讨论这些问题。会后有晚宴。晚宴时斯大林坐在首席，他身旁坐着日丹诺夫。日丹诺夫主持晚宴，而斯大林相当明显地给他暗示，让他什么时候给人敬酒和（在某种程度上还指明）说些什么。

大家都喝得相当多了。虽然我一般不会喝酒，但从来没有醉过，可是这一次，不知怎的我忽然喝多了。我明白自己喝多了，我用全力支撑住，免得旁人发现。

但斯大林，说得更准确些，是日丹诺夫根据斯大林的暗示，绕过同我坐在一起的我的顶头上司（大家还没有向他敬酒），举起杯来向我敬酒，我站起身来，一饮而尽。大家开始从桌边站起来，乱作一团，于是我走到斯大林身边。我随便地走到他面前说：

“斯大林同志！我们的太平洋舰队会落到陷阱里。这一切都是没有用的。它会落到陷阱里。必须另外解决问题。”

于是我挽着他的手领他到一幅大地图跟前，这幅地图就挂在我坐的那张桌子的对面。看来，这是一幅远东地区的地图，它使我在醉意朦胧中产生一个想法：现在正好给斯大林看看必需解决有关建设太平洋舰队的某些问题。我把他领到地图跟前，开始对他表明，由于我们还没有收回库页岛，我们的舰队便会落到一个陷阱里。我对他说：

“远东那边没有南库页岛，建设庞大舰队是不可能的，没有意义的。当我们还没有收回这个南库页岛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到太平洋去的出口。”

他相当平静地把我的话听完，然后说：

“您别着急，将来会有南库页岛的！”

但我把这句话看作是开玩笑，于是我还带着醉醺醺的固执态度，再向他证明，我们的舰队在远东会落入陷阱，我们必须有南库页岛，没有这个岛就别想在那里建设庞大的海军。

我还讲了些什么，于是他把大家叫来，说实在的，他

无需把大家叫来，因为大家已围拢在我们的身边了。他说：

“你们看，伊萨科夫向我提出要求，要我们拥有南库页岛。我回答他说，我们将来会有的，可他不相信我的话……”

这次谈话我后来在 1945 年想起来了。当时我想起了它，也不能不想起它。

还想起了一种情况。

斯大林生气时是很可怕的，说得更准确一些，是很危险的。这时候很难看他的样子，也很难处在这种场面下。我曾好几次碰见这种盛怒的场面，但它不是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这你根本还没见过。

下面讲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盛怒之一。

在讲到这个具体的情况之前，我想大致谈谈与我回忆这些盛怒的情况有关的事情。有一部天知道是不是从腓特烈朝代开始的普鲁士操典，在这部现今东西德两边还照用的操典里有这样的一条规定：不能在犯错的当天就决定纪律处分的办法。应当不早于第二天才能作出决定。可以说，您犯错误就要坐禁闭室，但坐几天（5 天，10 天，20 天）这一下子不能说，没有规定。这在第二天才能决定。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是为了提高指挥员的威信，为了让他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决定，以免在气头上作出决定，以免在还未完全了解情况和还未冷静思考时，就作出过轻或过重的处分，以免在后来弄清楚这是错误的处分时却已不能改正，因为这个处分已经执行。这

是我想到斯大林的愤怒时首先想到的一点。在我回忆的那些日子里，不管怎样斯大林都有这种习惯——少许克制着自己在愤怒时打算采取的决定。

第二个联想。您是否看见过动物园里老虎和小虎玩耍的情形？这是很有意思的场面。老虎懒洋洋地躺着，又大又雄伟，而那只小虎爬到它的身上，爬呀爬呀，扯它，咬它，把它惹烦了。后来老虎突然举起一只脚掌要打它，但在最后一刹间他克制住了，按住 9/10 的力气，只用了 1/10 的力量打它。它想到了这一掌的全部力量，明白这一掌打下去，那只小虎就会断腰，就会被打死，所以它克制住了。

这个联想也是我想到要讲的事情而产生的。

下面就是我要讲的事情之一。这事发生在军事委员会里，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绝对不久，就在战争开始前那几天发生的事情。问题讲到空军发生的事故，这事故相当严重。斯大林照平常的习惯，在这种会议上通常都抽着烟斗，沿着桌子前后来回走，看着出席会议的人，有时直视着，有时看着背上。

在还没有轮到当时的空军司令员雷察戈夫发言之前，大家对事故的发生都作了种种解释。雷察戈夫看来是个中将，一般说还很年轻，外表上看来象个小孩子。轮到他讲话时，他忽然说：

“事故当然很大，因为您要我们用棺材去飞嘛！”

这完全出人意料之外。他冲口而出，脸都红了。一阵绝然的死寂。他还没有从自己的叫喊中清醒过来，仍

然站着，脸上通红，非常激动。斯大林只离他几步远。他本来是来回走动的，当雷察戈夫说出这句话时，他就站住了。

我想谈谈自己的意见。在军事委员会的会议上，不应该用这种方式说话。斯大林为空军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为它做了许多工作，相当认真地研究了许多问题。不管怎样，他比当时领导国防人民委员会的大多数人都认真得多。他非常熟悉空军。毫无疑问，雷察戈夫用这种方式说出这句话对他本人来说是一种侮辱，这大家都是明白的。

斯大林站着，默不作声。大家等着会发生的事情。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桌子走，依然是在他原来走的方向。他走到尽头，转过身来，在一片寂静中走过了整个房间，然后又转过身来，从嘴里取下烟斗，慢慢地，小声地说：

“您不应该这样说话！”

接着他又走起来，又走到尽头，又转过身来，走过整个房间，又转回来，停在差不多原来的地方，又以同样平静的嗓音小声地说：

“您不应该这样说话。”他停了一阵，补充说：“现在散会。”

他第一个走出房间。

大家开始收拾自己的文件夹、公文包，走出去了，等待着将来会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第三天，又过了两天，三天，都没有发生

任何事情。可是，一个星期后，雷察戈夫被捕了，从此永远消失。

事情就是如此，这就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斯大林的盛怒。

当我说我只有几次看见斯大林愤怒的时候，应该注意到，他善于隐藏自己的感情，而且隐藏得十分巧妙。为此他早已养成了一些技巧。他来回走动，转过身来，看着地板，抽着烟斗，玩弄它……这一切都是为了抑制自己，不把自己的感情暴露出来而使用的一种手段。必须认识这一点，才能注意到他在某些时候表现出来的这种伪装的平静。

1962年9月20日

曾担任过方面军司令的罗科索夫斯基告诉我，他有一次偶然成了斯大林同科兹洛夫作最后一次谈话的见证人。科兹洛夫在刻赤惨败之后就被解除了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的职务。

罗科索夫斯基得到新的任命，看来是要把他从集团军调到方面军去。这是1942年5月底或6月间的事情。

康·康·罗科索夫斯基(1896—1968),苏联元帅,波兰元帅。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1956—1962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

罗科索夫斯基在斯大林那里就这件事谈到最后准备辞别的时候，波斯克列贝雷夫走进来说，科兹洛夫来了并等待接见。斯大林开始本来要同罗科索夫斯基告别，但后来忽然留住了他，说：

“您等一下，我这里有一次谈话，这说不定对您也是很有意思的。您待一会儿。”

斯大林转过来对波斯克列贝雷夫说，让科兹洛夫进来。

科兹洛夫走了进来，虽然刻赤惨败的事很快过去了，但这件事记忆犹新。斯大林接见他时异常平静，没有一点怒意，也没有一点不满。他跟科兹洛夫握了握手后说：

“您说吧，您请求我接见您。您有什么问题要对我说？”

科兹洛夫本人在被解除克里米亚方面军司令一职和降级之后请求斯大林接见。他开始谈到他认为这样处理他是不公正的，他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为掌握情况，他付出了一切努力。他讲这一切时声调异常激动，有点歇斯底里。

斯大林平静地听他说完，没有打断他的话。他听了很久，后来他问：

“您说完了吗？”

“说完了。”

“您看，您想做您能做的一切，但您却不能做您应该做的一切。”

为回答这些非常平静的话，科兹洛夫开始谈到梅赫

利斯，说梅赫利斯不让他做他认为需要做的事情。他进行干预，卡住他，由于梅赫利斯，他没有可能指挥他认为必需做的事情。

斯大林心平气和地止住他问：

“等一等，科兹洛夫同志！请您说说，你们那里谁是方面军司令，是您还是梅赫利斯？”

“是我。”

“那么，是您指挥方面军啦？”

“是。”

“您的命令都应该在方面军里全部执行吧？”

“是，不过……”

“您作为司令员要负责作战的全部过程吧？”

“是，不过……”

“等等，梅赫利斯没当过方面军司令吧？”

“没有……”

“那么，您是方面军司令，而梅赫利斯不是方面军司令了？就是说，指挥应当是您，而不是梅赫利斯，是这样吧？”

“是，不过……”

“等一等，您是方面军司令吧？”

“是我，不过他不要我指挥。”

“为什么您不打电话来，不报告？”

“我想打电话，但没有机会。”

“为什么？”

“梅赫利斯老跟着我，我不能甩开他来打电话。要是

他在身边我能打电话也就好了。”

“很好。为什么您不能有他在身边的时候打电话？”

他默不作声。

“为什么？如果您认为有理的是您，而不是他，那为什么有他在身边时您不能打电话？显然，科兹洛夫同志，您害怕梅赫利斯更甚于德国人吧？”

“您不认识梅赫利斯，斯大林同志！”科兹洛夫叫起来。

“啊，科兹洛夫同志，这未必可靠，我熟悉梅赫利斯同志。现在我想问您：为什么您要埋怨？您指挥方面军，您要为方面军的行动负责，为此人家来追问您，要撤您的职。我认为，科兹洛夫同志，对您的处理是正确的。”

后来，科兹洛夫走出去了，这时他才转过身来同罗科索夫斯基告别说：

“罗科索夫斯基同志，这是一场多有意思的谈话。”

此后，伊萨科夫还对我讲道：

在 1941 年深秋，说得更准确一些，在冬天，我曾两次在克里姆林宫的地下办公室里会见了斯大林。两次我都是在空袭警报发生时到那里的。斯大林当时已下到那里。

想起这个办公室的一切也很有趣：到那里去的道路很平常，水泥路面，应有的设备都有了，但您离开前室

走进这办公室，您就觉得不是在地下，而是在上面了。这里跟中央的斯大林办公室一模一样。也是一样高高的橡木板壁，也是一样的桌子和椅子，也是一样的写字台，墙上也挂着一样的列宁和马克思的肖像，甚至窗帘也是一样的遮盖着那些假窗户。只有办公室的面积（这一下子也看不出来）比上面的小一倍。

在这个办公室里有一次同斯大林会晤的时间很短，这是日美战争爆发后过了几天的事情。斯大林同我握了握手之后说：

“请您到远东去一趟。看看那边的事情怎么样，免得日本人也给我们来个珍珠港。您的任务明白吗？”

“明白。”

“那您就去一趟吧。”

全部谈话就是如此。任务确是明白的。

在这次会见中阿伯纳先科也在场，他当时是远东方面军司令。他请求增派坦克，说日本关东军有雄厚的坦克力量，我们远东完全没有新的T—34。阿伯纳先科讲到这件事时声音有点激动。他请求给他派很多坦克去，大约要有一个军团。

斯大林说：

“不，我们不能给您坦克，您还没有打仗就想要坦克！”

丝·罗·阿伯纳先科，(1890—1943)苏联大将，1938—1943年任军区司令和远东方面军司令。

坦克我们这里很需要,我们在打仗,而这里也还不够用。”

接着,据我回忆,他转而又对沙波什尼科夫说:

“我们还是要给阿伯纳先科同志一些坦克,好让他们知道T—34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学会掌握它们,让一部分人能够驾驶这些坦克。”

阿伯纳先科听完这番话就走了。

我第二次在这个地下办公室里会见斯大林是在1941年的冬天,是从远东回来之后。开始是我一人报告,后来,当时管理编制问题的夏坚科在报告时也来参加。

夏坚科报告了用受过训练的干部来补充部队的复杂性。这些在当时暴露出来的复杂性,是由于在许多共和国里几乎没有受过训练的、真正担任过军职的民族干部而引起的。为此斯大林讲了下面的原话:

“您说,有些民族干部不会打仗。那您还要怎么样呢?!那些几十年来免服兵役,而且从来没有军事知识分子的民族,一样都不会很好地打仗,他们不会很好地打仗是由于历史环境造成的。”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的谈话人转而谈到在这两次会见中斯大林给他留下的印象:

波·米·沙波什尼科夫(1882—1945),苏联元帅。曾先后任伏龙芝军事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他的著作《军队的大脑》等对苏联军事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1937—1945年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

叶·阿·夏坚科(1885—1951),苏联将领,上将。1943—1944年为南方面军和乌克兰第4方面军的军委会委员。

在战争爆发的前两周，我向斯大林报告了日常的各种问题。这是真正的日常问题，而且其中有一些甚至不是非讲不可的。我记得这次会见，而且我绝对相信，斯大林当时完全确信，战争不会爆发，德国人不会进攻我们。他绝对相信这一点。稍后几天，我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了一些情报，这些情报证实了德国人准备发动战争，确实有完全明显的征兆，他们将在日内开始战争，我请他把这件事向斯大林报告，这时我的顶头上司说：“已经向他报告了，报告了……这一切他都知道，都知道，你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一切他都知道！”

我也要负起自己的一部分责任，没有进一步试图亲自向斯大林报告我已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过的事情。不过，尽管我觉得自己背上了这个过错的包袱，而且不打算推卸下来，我还是应该说，斯大林“一切都知道”这句话在我看来是完全可靠的，因为斯大林在我当时的心目中已享有崇高的威望。

我在多年任职期间确信，斯大林通过各种渠道——党和政府各机关，内务人民委员会，侦察机关等各条路线的确拥有大量的情报。常常有这种事：我们刚打算向他提供某方面的情报，他就已经知道发生的事情。例如：有时空军失事，海军失事，陆军庞大设施上发生的各种事故，有关的领导知道此事后，不管怎么不愉快，也将立即把当前发生的事件或事故向他报告，用预先拟好的格式呈报上去。比如：“在某地区发生空难，原因在调查，

容后报告。”或者：“发生了战舰相撞事故。调查委员会已成立。事故规模及其损失程度正在查明。”

大家这样写是想拖延时间。尽管都知道，有一艘战舰已经沉没，另一艘在船坞修理，同时死了 62 人。凡是要对事故负责的人都喜欢这样写，以便拖延到进一步组织各种调查委员会以及其他等等。但不需为此负责的人则相反，他们赶紧向斯大林报告，甚至比赛看谁更快地报告发生的事情。于是他几乎总是从另一方面，而不是从应该向他报告事故和负有责任的这方面得到情报。

我记得斯大林的一次电话，当时我和我的顶头上司正讨论如何把一次死了好几十个人的事故呈报上去，这时斯大林打电话来问：

“你们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顶头上司说正在调查，“要查得更准确一些……”

“您要查清楚——这很好，不过别忘了要准确一些，究竟是死了 62 人还是死了 63 人！”

因此我有这种感觉，他真的一切都知道，即使我不说，那些消息也会有人向他报告的。我并不借此来为自己辩护，情况确实如此，自然会有人通过许多渠道向他报告的。但他有偏见，一个司令员，一个为首的人物，对敌人将如何行动和事态将如何发展抱有固执的偏见，一般说来，这在军事上是一件可能发生的最为可怕的事情。这就是那些最大的惨剧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

据我记得，斯大林对战争如些迅即爆发感到十分震

惊。他绝对没有料到有这种可能。震惊之大是与其责任之大有关的，而且与斯大林平日习惯于完全服从，绝对支配，不容违抗自己的意志有关，现在他却突然在战争的头几天就碰上了在当时看来比他更强大的力量。面对着这股力量，他当时无法对付得了。这种震惊是十分巨大的。据我所知，他当时有好几天都处于几近沮丧的状态。我认为，在电台上宣布战争开始的讲话，虽说这自然由斯大林来做，但他没有出来，而由莫洛托夫来讲，这也与他当时所处的心态有关。只是在7月3日，斯大林才开始讲话，他用前所未有的口气开始讲了，他说：“兄弟们和姊妹们……”在这个讲话中，我个人感到这个讲话的人有一种深沉的、良心上的震动。

但是，当我在1941年12月初见到斯大林时（这之前我在战争期间没有见过他），斯大林已经跟以前完全一样了。这是以前的那个斯大林。他还是那样从容不迫，还是那样经常地在出席会议的人的坐椅后边轻轻地走来走去，还是那样悠闲地、有节奏地踱步，还是那样慢吞吞地讲究说话的方式，每讲一段就长久地停歇一阵，说话的声音还是那样低沉而平静。

很难说，他是否总是那样沉着，显然，不总是如此。不过他早已披上了这副假面具，象披上一张皮子一样，对于这张皮子他已习惯到变成他的第二天性了。这不是简单的沉着态度，这是一种手法，一种癖性，这种癖性已精练到这种程度，以至不能把它只看作是一种手法了。他没有多余的一个手势，没有多余的一句话。这种已练到

炉火纯青的手法使人看来是很自然的。但实际上这种手法是打算不让任何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不让任何人猜到自己的思想，不让任何人预先知道他可能说些什么和可能作出什么决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这种从容不迫、停顿都是希望不说出任何反悔的话，不说出一时气头上的话，并让自己有时间来掂量掂量自己的每一句话而做的。

应该提前说一说，后来，在胜利和狂欢的时候，他也能保持这种沉着的态度。比如说，1944年与1941年相比，他就较为快活，常常说点笑话，露出笑容，这一点，大概就是他的行动的全部变化了。

他讲话的时候，善于巧妙地隐藏自己的思想。这一点我已经向您讲过了，但我想再重复一遍：他的面部表情是非常淡薄的。他没有显露过特意表示的神秘莫测的表情。他的面孔总是那么平静。此外，他喜欢这样来回走动，使在坐的人都看不见他的面孔，由于这是他自己来选择时机，所以就能帮助他掩饰自己的思想感情。看他的面孔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猜出他的心思。这其中也有一层意思，因为想猜出他的心思的人太多了，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既知道自己有什么威信，也知道那些竭力向他唯唯诺诺的人怎样善于拍马屁。所以他十分谨慎，尤其是谈到他不清楚的问题而他又想详细了解别人的意见的时候。他甚至会挑起意见的冲突，问：“可某某会说什么呢？……那么某某会说什么呢？”显然，听完了别人的各种意见之后，他就检查和修正自己的意见。在别的

场合下，他寻找对自己的偏见的支持，寻找证实他有理的意见，如果找到了足够的支持，那么他最后才把自己在讨论过程中作了某些修改的意见说出来。我看，他有时碰到了一些反驳的意见，与自己原先的见解相反，迫使他要改变自己的意见，这时他就把话题岔开了，不再谈它了，好让自己有机会来考虑一下已经形成的局面。

当他情绪很好或者有什么逗他发笑的时候，他微微一笑。但这种微笑仍是持重的，只是嘴角稍微一绽，甚至还用一只手和烟斗把这种淡淡的微笑遮住。

我个人感到惊奇的是：他竟自封为大元帅，而且穿起元帅的制服来。尤其古怪的是：全世界都早已习惯他这个半军人的容貌了。众所周知，这副容貌，只是从战争开始才名副其实的。在这职称和服饰当中，遮盖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这是从他青年时代，从他在社会地位上还是一个小人物——梯弗里斯气象站的观测员时而来的。要把一个党和世界领袖的地位同大元帅的职称，同穿元帅服的欲望，同那两边有着红镶条（这是沙皇时代最令人反感的标志之一）的裤子结合在一起是颇为古怪的。我不由想起他早年的一张照片——您知道脖子上围着一一条围巾的那个人吧，拿这张照片对照一下，他却从桌子底下伸出一只脚来，脚上穿着软羊皮皮靴，刷得锃亮，裤子上还有红镶条和套带。

顺便说说，在我看来，斯大林对于这种制服总的来说都过于重视了。因此那些非常迷恋按职位发明新制服或者恢复旧俄制服的人，就在这种制服中得到了某种反

应而表示赞同。我记得，关于制定副官制服的穗带和肩章问题曾经认真地讨论过。我记得，有6个穿着带穗肩章的陆军制服的人，6个穿着带穗肩章的海军制服的人，坐着一辆遮盖起来的汽车开进克里姆林宫去……这不是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而是在战争最激烈的时期。

不过有一次同斯大林的谈话我永志难忘，因为这次谈话把他在心目中的地位提高了。这是1933年第一批小舰队通过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又从波罗的海到白海之后的事情。在波利亚尔内，在驱击舰的休息室里，斯大林看着舷窗，仿佛是自言自语似的，忽然说：

“里海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只木盆。波罗的海是什么东西呢？是一只瓶子，可我们没有瓶塞。这里就是海，这里就是窗户！这里，这里应当有一支强大的舰队。必要时，我们可以从这里把英美两国的舰队抓活的。再没有别的什么地方可以这么做了。”

他说这番话的时候，要在北方建立一支庞大海军的想法甚至在一些最先进的海军人士中还没有成熟。他说了这番话之后，还从舷窗上注视着前面一片灰色的、忧郁的天边，后来他补充说：

“今年还应该试一试派一支舰队从波罗的海开出去。怎么样，可以做到吗？”

同时我还想起第二件事。在索罗基，当舰队通过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时候，曾举行过一次规模不大的群众集会，会上有不知是白海工程局局长还是副局长拉波特、列宁格勒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以及另外一个人

发了言。大家请斯大林讲话。斯大林推辞了，不想讲话，后来，他无意中自言自语地说了几句。

应该说，在这之前，所有的讲话都是十分激昂的。他们说，我们现在根据斯大林的意志要在这里站住脚根，不再走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海是我们的，我们要征服北方，我们要在这里击溃任何敌人等等。就在这些讲话之后，斯大林才勉强地讲了下面这番话：

“大家在这里谈到：我们要拿过来，我们要胜利，我们要占领……战争，战争……这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战争，要来就来吧！这是北方……”他还重复一遍：“这是北方，应该了解它，研究它，开拓它，习惯它，掌握它，然后再谈到别的事情。”

当时我也喜欢这番讲话，喜欢对我们这个还刚刚开始研究的复杂问题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

后来，我的谈话者把话题（这与斯大林没有直接关系）转到刻赤的惨败上，因而想起了梅赫利斯：

我看到过梅赫利斯，当时我们接到命令把能从刻赤半岛上撤退下来的人都撤走。顺便说说，尽管这是我们惨败的奇耻大辱，但我们还是撤走了 121000 人，这一点我们不会忘记。不能想象，要所有的人都在那边阵亡，一个也不生还。因此，在最后几天，我接到了命令参加撤退工作，就在刻赤的附近看到了梅赫利斯。他装作想死。他的前额不知是被打伤还是受了点轻伤，但没有包扎，那

儿有一块带淤血的血迹。他好几天都没有刮脸了，手脚也很脏。看来，他曾帮助过司机把汽车拖出来，而后又认为没有必要把自己弄干净。他的样子很悲观，他的汽车也是一副可怜相。他同司机一起两个人走，没带警卫。尽管情况很悲惨，但其中有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人表现出打算要寻死。

谈到这里，我插话说：“梅赫利斯也许不只是让人看出他打算寻死，说不定他当时真的寻过死了。”

“可能。”我的谈话者回答了我。

“也许寻过死了。但他当时表现出来是打算寻死，而且特别表现这一点，这使我感到厌恶，直到如今我还是很厌恶。”

我说，据我的观察，梅赫利斯是个勇敢的人。

“是呀，也可以说。他在刻赤附近，总是往前爬，往前爬。我同样知道，他曾在芬兰前线参加过战斗，他在一个营里参加进攻。但是，第一，这不能为他开脱什么——既不能为他开脱在芬兰战争上表现出来的碌碌无能，也不能为他开脱在刻赤惨败中他应负的主要责任。其次，依我看，他不是个勇敢的人，而是一个神经过敏、感情冲动和狂热的人。顺便说说，我曾在斯大林那里参加过讨论芬兰战争的总结，出席的人有梅赫利斯、铁木

辛哥、伏罗希洛夫。梅赫利斯好几次冒失地一时详加评述，一时插上几句话，后来，斯大林忽然说：

“总的说来，梅赫利斯是个狂热的人，不能把他派到军队里去。”

我记得，当时使我吃惊的是，尽管斯大林说了这些话，但梅赫利斯依然象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继续参加这次会议，并且还多次冒失地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苏联元帅阿·米·华西列夫斯基的谈话

1967年

我同斯大林第一次会面是在芬兰战争的期间——1939年12月30日。

波里斯·米海洛维奇·沙波什尼科夫被召去见斯大林，我当时担任作战部副部长的职务，因此就同他一起去。从此我便经常参加最高军事委员会的会议。

1939年12月30日，沙波什尼科夫被召去见斯大林，他是从休假当中被召去的。这次召见有其以前的一段历史。

芬兰战争是怎样开始的呢？同芬兰谈判移动边界并给我们让出卡累利阿地峡（给予相应的补偿）以保列宁格勒的安全一事宣告彻底失败之后，斯大林就召开了最

高军事会议，提出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得不同芬兰作战的问题。沙波什尼科夫作为总参谋部的首脑，被召去出席讨论作战计划。自然，同芬兰作战的计划早已拟就，沙波什尼科夫只是将它呈报。这个计划是根据叶芬军和对芬兰设防地区的实际估计而编写的。为此它要求集中最大的人力与物力，以保证这个军事行动的彻底胜利。

当沙波什尼科夫把总参拟就的、必须在这个军事行动之前集中一切人力物力的计划提出来的时候，斯大林就开始嘲笑他。仿佛说，为对付这么一个……芬兰，您就要求这许多人力与物力。这样规模的作战没有任何必要需用这许多东西。

随后斯大林转向当时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的梅列茨科夫，问他：“怎么样，为了对付芬兰，您真的需要这么大的帮助吗？”

梅列茨科夫回答说：斯大林同志，这要计算，考虑考虑。帮助是需要的，不过，可能不需要象刚才所说的那么多。

接着斯大林便作出决定：“将全部对芬作战的行动交由列宁格勒方面军执行。总参谋部不担负这项任务，而去作其他的工作。”

他就这样事先排除了总参谋部领导面临的作战行动。不但如此，他还当场对沙波什尼科夫说，要他休息，

基·阿·梅列茨科夫（1897—1968），苏联元帅。苏芬战争期间任集团军司令。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集团军和方面军司令。

建议给他提供一幢在索契的别墅，派他到那边去休息。沙波什尼科夫的同事也都被分别派到别的地方去，出差到各地视察。我呢，也被赶到与立陶宛交界的地方。

以后发生的事情大家都已知道。列宁格勒方面军还未做好一切准备就开始发动战争。由于人力与物力不足，在卡累利阿地峡中来回转了整整一个月，损失惨重，其实，我们只占领了最前的防御地带。一个月后，才到了“曼纳林防线”，但到了那里已是筋疲力尽，毫无办法把这防线拿下来。

这时斯大林把沙波什尼科夫从休假中召回来，并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讨论如何进一步进行战争的问题。沙波什尼科夫实质上还是将那个在一个月前呈报过的计划向他报告。这个计划被通过了。问题是：谁来指挥在卡累利阿地峡里的军队。斯大林说，我们不再派梅列茨科夫去了，因为他对付不了这件事。他问：

“那么谁愿意担任指挥卡累利阿地峡的军队呢？”

大家久久不作声，一片沉默。最后铁木辛哥站起来说：

“如果您给我在这里所讲的一切，那么我愿担负指挥这支军队。我希望，我不会使您难堪。”

这样就任命了铁木辛哥。

前线上沉默了一个月。军事行动实际上是在2月份

“曼纳林防线”是芬兰以前的工事体系，在卡累利阿地峡沿苏芬边境上。这是以当时芬兰陆军元帅曼纳林男爵命名的一道防御工事。

才重新开始的。这一个月都用于详细研究作战计划，调集军队和装备，训练军队了。这一切都是在卡累利阿地峡上做的，铁木辛哥干起来精力充沛。他训练军队，锻炼它，培养它——这都应该给他以应有的评价。空军、坦克、超级威力的重炮都已补充了。结果，当用这些必需的人力和物力重新开始作战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取得了胜利——曼纳林防线很快就被摧毁了。

谈到苏芬战争的初期，应该补充一点，我们在那边遭到巨大的损失时，给他们补充的都是很不象话的部队。不过令人十分惊讶的是：怎么在这短短的期间就会丧失整整一个军呢？夏坚科当时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从各个军区，其中包括最边远的军队，每团抽出一个连来补充在卡累利阿地峡地区作战的部队。

芬兰战争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耻辱，它使我军在国内外造成极不良的影响。这一切都不知应该怎么解释。当时斯大林召开了会议，解除了伏罗希洛夫的人民委员之职，而任命了铁木辛哥。同时，斯大林也认为沙波什尼科夫必须多少负点责任，于是在体面的借口下，把他从总参谋长职位上撤下来，任命他为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负责照管新边界的防御工程。他这项新的工作据说是非常必需的，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这要求有一个象他这样的专家去完成。

接着产生一个问题，谁来当总参谋长？斯大林就在这个会议上，不与任何人事先商量，就直接向新的人民委员铁木辛哥问：

“您推荐谁来当总参谋长呢？”

铁木辛哥踌躇起来。

“喏，您跟老参谋部的人员当中谁共过事？”

在芬兰前线铁木辛哥刚好同老参谋部的人员梅列茨科夫共过事。于是他把这情况说了。

“那么。梅列茨科夫来当您的总参谋长合适吗？他在您那里工作怎样？”

铁木辛哥说：他工作得不错，他来合适。

这样就任命了新的总参谋长。

说实话，梅列茨科夫担任这个职务也并不长久。1941年2月，当举行参谋人员大竞赛的时候，他作为总参谋长不得不去作报告。大家很清楚，这个报告将使他垮台，而当时担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的朱可夫，恰好在这次竞赛中表现出自己的才华，于是当即被任命为总参谋长。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1941年7月28日，就自动请求解除这个职务，派他到前线去了。这时斯大林满足他的请求，任命沙波什尼科夫代替他，而沙波什尼科夫就带着相应的报告进来，当时我就被任命为他的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

我担任总参谋长之职实际上是从1941年10月15日开始的。当时沙波什尼科夫病了，并且同几乎全体总参谋部的人员一起到了阿尔扎马斯。斯大林叫我到他那里去，吩咐我领导在莫斯科他身边的一个总参谋部小

组，为此他给我留下总参谋部的8名军官工作。我开始提出异议，说这样少的军官（8个人）不可能保证完成必需的工作，这样少的人不可能工作，需要派更多的人来。尽管我提出异议，但斯大林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重复说只给我留下总参谋部8个军官，连我自己是9个。

稍后我才明白他那天的顽固态度。原来是，在机场上已停放着一些随时待命的飞机，在万一的情况下，将大本营和政府机构撤离莫斯科。这些飞机上的位置全部分配好了。按照这个分配，我们总参谋部小组共分到9个位置——我和我的8名军官。这一点是波斯克列贝雪夫后来告诉我的。一般说，在那种情况下飞机随时待命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当时德国的坦克只要几个钟头就能闯进莫斯科的中心了。

应该说，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总参谋部就分散了，说实话，它的工作已不能算作是正常的了。第一副总参谋长瓦图京已被派到前线去了，沙罗欣也一样，作战部部长马兰金也一样。所有总参谋部的领导人都被派到各条战线和军队中去，这自然无法促使总参谋部的工作走上正轨。斯大林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就把总参谋部

民·费·瓦图京（1901—1944），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西北方面军参谋长、副总参谋长。负伤后牺牲。

米·尼·沙罗欣（1898—1974），苏联上将。伟大卫国战争初期任副总参谋长，后历任西北方面军的集团军参谋长和集团军司令。

格·卡·马兰金（1894—1967），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西方方面军参谋长。1958—1961年任总参军事学院院长。

的人分别派走。瓦图京，索科洛夫斯基，沙罗欣，马兰金——都派到前线去了。

关于 1937—1938 年对军队产生的后果有什么可说的呢？您说，没有 1937 年就不会有 1941 年的惨败，而我要说得重一些，没有 1937 年，就可能没有 1941 年的战争。希特勒决定在 1941 年发动战争，很大的程度是估计到我们的军事干部有许多人已被消灭。

很明显，1939 年我在列宁格勒军区由霍津 移交给梅列茨科夫的委员会里的时候，那里有许多师都是由一些上尉指挥的，因为所有高级将领个个都已被捕。

1941 年，斯大林很清楚，军队还没有作好打仗的准备，所以千方百计地拖延战争。他在芬兰战争之前就企图这样做，而芬兰战争更使他大开眼界，看到我们对战争完全没有准备。开始他企图同西方大国达成协议。后来情况十分明显，西方大国极不愿同我们商谈，他们都在摸德国人的底。结果就同希特勒签订了那个条约，希特勒借此欺骗我们。

1939 年，里宾特洛甫乘专机到莫斯科来的时候，在路上，在大卢基地区，遭到我们的一个高射炮组的射击。这个高射炮连的连长下令向这架飞机开火——显然，这

瓦·达·索科洛夫斯基（1897—1968），苏联元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方面军参谋长，司令。1946—1946 年任驻德苏军总司令。

米·谢·霍津（1896—1979），苏联上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任列宁格勒方面军参谋长，集团军司令，西北方面军副司令等职。

是出于他对德国人的情绪而做的。况且，这架飞机在莫斯科降落后查明，这一开火，高射炮的弹片就把机身好几处打穿了。

我知道此事的全部过程，因为我同委员会的人一起被派去就地调查这件事。但最有意思的是：尽管我们等待德国人的声明和抗议，可他们却没有发表任何声明和抗议。不管是里宾特洛甫以及他的随员，还是莫斯科德国使馆的人员，都没有对谁提起过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是：德国人的反应是可以判断的。看来，他们下定决心，不管怎样，无论如何都要达到签订条约，所以就不发出抗议，唯恐这个抗议会在某种程度上妨碍预定的计划。——西蒙诺夫注）

所有在 1940 年 11 月同莫洛托夫一起到过柏林的人都确信，虽说有了条约，但德国人已准备好了战争，而且，一定会打起来，我也作为总参的代表之一，随同这个代表团一起去过那里。访问之后，在那边接待和谈话之后，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丝毫怀疑，希特勒已暗中对我们摸家伙了。这一点大家都曾对莫洛托夫本人讲过，据我记得，他也支持这一个观点。

不但如此，陪同我们一起往返的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不顾冒自己地位的风险，在回来的路上找机会同我们谈及条约的事情，同时极力暗示，我们两国的关系还远不能如意。简单地说，他竭力让我们知道，他认为发生战争很有可能。

在柏林的招待会上，我同布鲁希奇 坐在一起。虽然我穿着便服，而且在正式介绍时没有说我是总参谋部的代表，但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他通过翻译问我，是否还记得我们是老相识，说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当然记得这件事。还在 1932 年，在奥夫鲁奇 地区的一次大演习上我们就第一次见面了。当时我们和德国的关系异常密切。在我国领土上有许多地方是训练德国军官的中心，因为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人无权在德国境内做这件事。在我国有坦克和空军的训练中心。在 1932 年的大演习上，我们第一次展示（当时）最大的机械化兵团——坦克旅，参观的人有各兵种的武官，其中包括德国的代表。但给其他国家的军事代表看时我们只展示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是德国人我们则全部给他们看。我们从别的路线领他们到别的地方，坐另外的汽车，避开其他国家的军事代表。我参加了这次大演习，在我的指挥所里，布鲁希奇同伏罗希洛夫和斯莫罗金洛夫在一起。他观察了演习的全过程，时间相当久，他走了以后，斯莫罗金洛夫回来告诉我，布鲁希奇对我说了一番恭维话，他说，他在这里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按德国军事学校最好的传统做的。我同他第一次会面就是这样。不过，在 1940 年，在柏林见面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布鲁希奇，而

维特·布鲁希奇（1881—1948），法西斯德国陆军元帅。1938—1941 年任陆军总司令。因对苏闪击战失利并同希特勒不合而被撤职。

奥夫鲁奇是苏联日托米尔州的一个城市，在诺林河畔。铁路枢纽

是完全另一个人了。

除了 1937—1938 年的事件之外，在西班牙国内战争之后所作出的某些结论，也对训练军队准备战争产生极大的危害。在西班牙战争后提升起来的如库利克这样的人的影响之下，使用坦克部队的观点已被修正，已经建立起来的庞大的机械化兵团均被取消——当时流行的理论是：用不着机械化兵，坦克只直接用于支援步兵。只有在战争的前夕，在德国人事实上显示出这样的兵团能够摧毁敌人之后，我们才重新建立庞大的机械化兵团。但这已失去了大量的时间。

在希特勒登台之后，我们同德国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我国领土上的德国军事训练中心均已取消，关系越来越敌对了。因此作战计划开始修正。以前，根据以往的作战计划，我们在西方的主要敌人是波兰，而今，根据新的作战计划我们的主要敌人则是希特勒德国。

当人们提出有关军事的问题时，问我们是否在战前就有战争的作战计划，这听起来是有点荒谬的。作战计划自然有，而且还有非常详细的、象动员计划那样精确的计划，动员计划都已原原本本通知到每一个部队，包括那些次要的后方部队，如大后方仓库和生产部队。计划已经传达并作了检查。而且还作了专门的动员检查。

至于谈到作战计划，那么我作为总参谋部的一员，按照自己的职责范围，负责拟定北方面军，波罗的海海军、列宁格勒军区、西北方军区和西方特别军区的详细作战计划。我很清楚，所有这些计划都是相当详细的。我从

1940年起就从事拟定这些计划，并将其中作了必要的修改。因为这些计划涉及到两支舰队的行动，所以我无法离开库兹涅佐夫的参谋长加列尔的办公室。

倒霉的不在于我们没有作战计划，而在于没有可能在当时的局势下实施这些计划。这种局势之形成，正如我已经讲过的，是因为斯大林不择任何手段，千方百计地竭力拖延战争。尽管我们拥有大量情报，说明从1941年2月起就直接在我们的边境附近集结了大量德军，但他还是断然拒绝把我军开到某个边境地区以备迎战的一切建议。不管对什么意见，他当时的回答只有一个：“您别来挑拨！”或者，“您别受人挑拨！”他认为，德国人会利用任何情报，说我军已作好战斗准备而发动战争。他始终不相信德国人在拿不到我们方面的任何借口，并且有条约在先的情况下会发动战争。不但如此，他还对所有提议在边境地区作好战斗准备者大发雷霆。很明显，他认为我们的军事行动会挑起同德国人的战争。

铁木辛哥曾无数次向斯大林报告了德军集结的情况和必须采取措施以加强战斗准备，但他所得到的答复始终是绝对禁止。为此，他曾利用自己人民委员的职权，避开一些禁令，竭力做他力所能及的一切，其中包括进行

尼·格·库兹涅佐夫（1922—），苏联海军中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海军总司令。

列·梅·加列尔（1883—1950）苏联海军上将。1938年起任海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地方的演习动员和其他某些措施。

不过,在我谈到战争年代作为一个军人的斯大林时,必须将真实情况写下来。他不是一个军人,但他具有聪颖过人的智慧。他善于深入问题的本质和提醒别人作出军事决定。

说到您的书,我要谈谈我曾指挥过的那场斯大林格勒战役。

在最后的一段时期,在我军开始 11 月反攻之前,我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在那边我跑遍了所有地方,准备进攻,西南和顿河方面军定于 19 日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方面定于 20 日开始。

忽然于 17 日晚上,我刚从部队回来,指挥所里就来了斯大林的电话。斯大林在电话里说:

“您好,您有一件紧急的事情。您必须到莫斯科来。”

“怎么能到莫斯科来呢,斯大林同志?后天就开始进攻,我不能走!”

“这种事情必须要您到莫斯科来。赶快回来。要跟您研究……”

我试图再解释为什么我不能离开前线的原因,但斯大林一再重复,事情要我必须明天就到莫斯科来见他。不管怎么解释他都无动于衷。

翌晨我飞走了。飞到莫斯科已是上午 11 点钟左右,我打电话给波斯克列贝雪夫。他说,斯大林在“近郊的别墅”里,不过,看来他还在睡觉,我只好等待,我请求转告他,说我已经来了,并且照吩咐在等着他。

两三个钟头后，波斯克列贝雪夫来电话，要我下午6点钟到“小角落”去——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里的住宅是这样称呼的。如果是在孔采沃的别墅里，就叫“近郊的别墅”，如果是在克里姆林宫，就叫“小角落”。

当我6点钟来的时候，完全难以想象，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召我回来。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在开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会上有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莫洛托夫。

斯大林同我打过招呼并请我坐下。然后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了一个信封，坐回到桌子上后，把这封信沿桌面抛给我：

“喏，您拿去看，等我们在这里把自己的内战打完……”

他同国防委员会的成员继续讨论在我来到之前已经开始的问题。我从信封里抽出几张信纸，开始一读，感到十分惊讶：

这是坦克军团司令沃尔斯基 将军写给斯大林的。这个坦克军团是混成的、完全配套的、训练有素的，它应该成为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冲击敌军的主要打击力量。它要从南方切断德国人，冲到卡拉奇以同西南方面军的坦克部队会合。指望在斯大林格勒前线作为打击力量的正好是这个军团。最近一个时期我特别经常去的也

瓦·季·沃尔斯基 (1897—1946)，苏联坦克兵上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指挥近卫机械化军和近卫坦克集团军。

正好是这个军团，我曾在那里度过日日夜夜，检查它的准备工作，多次同它给我非常良好印象的司令沃尔斯基将军谈过话。也正好只是昨天白天才同这个沃尔斯基分手，我从他那里回到指挥所就碰上了斯大林的电话。

沃尔斯基给斯大林的信大致如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有责任告诉您，我不相信当前的进攻会取得胜利。我们缺乏进攻的人力和物力。我相信，我们不会冲破德国防线，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任务。这场战役将以惨败告终。这种惨败将导致难以估计的后果，会使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危害到我国的整个局势，从此德国人不仅能占领伏尔加，而且还能占领伏尔加的东岸……

随后是一个使我大吃一惊的签字：沃尔斯基。

我非常惊讶地和怀疑地读完了这一封信。在沃尔斯基的行动中，在他的情绪中，在他的军队的状态中，绝对没有任何一点东西能使我相信，写这封信的就是这一个人。

我读完了这封信，把它放回信封里，等了几分钟。

斯大林结束了他们讨论的问题，抬起眼睛看着我问：

“嗯，您对这封信有什么要说的，华西列夫斯基同志？”

我说，这封信使我感到惊讶。

“那您读完这封信后，您对当前的行动有什么想法？”

我回答说，关于当前的行动，在读完了这封信之后，我依然象过去一样，认为进攻必须按期开始，我深信，这次进攻将会获得胜利。

斯大林听完了我的话问：

“那您怎么解释这封信？”

我说，我不能解释这封信。

“您怎么评价写这封信的人？”

我回答说，我认为沃尔斯基是军团的出色的指挥官，他有能力完成托付给他的任务。

“那现在，读完了这封信之后呢？”斯大林问，“照您的意见，是否还能把他留在军团里呢？”

我对这个问题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个人认为不能在进攻前夕撤换军团司令，我认为把沃尔斯基留在职位上是正确的，不过，当然要跟他谈一谈。

“那您能不能将我同沃尔斯基联系上？”斯大林问，“让我能同他谈一谈。”

我说，我马上想办法做。我通过高频电路呼叫前线指挥所，命令他们去找沃尔斯基，并通过高频电路和战地电话同他联系。

过了一些时候找到了沃尔斯基。

斯大林拿起话筒。我记得这次谈话，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您好，沃尔斯基！我看过您的信。我没有把它给谁看过，谁也不知道这封信。我认为，您对我们的和您的能力的估计是不正确的。我相信，您能够应付委托给您的一切任务，能够使您的军团完成一切并取得胜利。您是否愿意做委托给您的一切，完成摆在您面前的任务？”

很明显，回答是愿意的。

于是斯大林说：

“我相信您能完成您的任务，沃尔斯基同志。祝您成

功。我再重复一遍，关于您的信，除了我和华西列夫斯基（我把信给他看过）之外，谁也不知道。祝您成功，再见。”

他讲这些话时绝对平静，完全沉着，我甚至可以说，他同沃尔斯基讲话时语气十分温和。

应该说，我看见过各种神态的斯大林。我毫不夸大地说，我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如果说到那些曾经吃过他的许多苦头的人的话，那么我比任何人都吃尽他的苦头。他对我和别人都经常粗暴，粗暴和不公正得难以容忍。不过，应该说实话，他也经常象刚才的那个样子。

他讲完之后就对我说，我可以回到前线去了。

在前一个时期，我同朱可夫一起（他在北边，我在南边）准备好了这次即将到来的进攻。可临近这个时候朱可夫就被调去执行别的新的任务了，而我只好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指挥整个战役。我一早从莫斯科飞回来，没有到斯大林格勒前线，而到了进行主攻的西南方。

我到达那边的时候已是白天了，是开始进攻后过了几个小时才到的，进攻全照计划进行，但是我不在。

我飞回来后，就去见参加主攻方面的坦克兵。我呆在那里。后来，当奇斯佳科夫的军队和克拉夫琴科的坦克兵那里出了问题的时候，我就去见奇斯佳科夫，打算压一压他们，为行动迟缓而痛骂他们一顿，尽管这一

伊·米·奇斯佳科夫（1900—1979），苏联上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步兵师长和军长。

安·格·克拉夫琴科（1899—1963），苏联坦克兵上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担任坦克旅长、军长。1944年起任近卫坦克集团军司令。

般说来不符合我的性格，但也必须不顾情面地跟他们谈一谈。算奇斯佳科夫和克拉夫琴科都走运，我到达那边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克拉夫琴科冲过去了。结果，我们就没有进行那场严厉的谈话，这对他们算是走运的，自然，对我也算走运。

在斯大林格勒战线的南部，事情也很顺利：自然，我们冲过了罗马尼亚人的防线，沃尔斯基行动坚决，得心应手，他全部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两条战线在卡拉奇地区会合之后，过了一两天我才在发生这一切之后重又见到了沃尔斯基。

我还在西南战线时就已向斯大林报告两条战线的会合，并报告组织战线内外的包围圈。在报告时他问我，沃尔斯基和他的军团的行动怎么样。我如实告诉他，说沃尔斯基的军团及其司令的行动异常出色。

“那么，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斯大林说，“既然如此，那么我请您到前线那边去，哪怕只呆一阵，马上代表我给沃尔斯基嘉奖。请转达我对他的感谢，代表我给他嘉奖，并且通知他，给他和别人的另一些奖以后再说。”

打了这个电话之后，我想：给沃尔斯基嘉奖什么呢？我身边只有一支战利品德国的“瓦尔德”式手枪，于是我命令就地把它固定在一块小木板上，写上相应的题词。当我和沃尔斯基见面的时候，我祝他胜利，感谢他的出色的行动，并把斯大林的话转告他，代表斯大林把这支手枪奖给他。我同沃尔斯基站在一起，互相看着，他全身颤抖，竟当着我的面大声痛哭，象个孩子一样。

沃尔斯基的事情就是如此。他在这之前和以后，一直在我的心目中都是一个出色的坦克兵司令和一个极好的人。

您问：他为什么要写那封信吗？我认为，在进攻之前他内心感到紧张，震惊，他真的吓坏了。他觉得，一点希望也没有，紧张，震惊——这在作战时人们经常会发生的。这不仅在我们刚开始战胜敌人的时候会有，就在后来，过了很久，神经也还是支持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重大的责任感和害怕孤注一掷以及我们突然辜负国家的期望的恐惧心理就特别尖锐。这种感情对那些还没有参加过顺利进攻的人来说就特别强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那些曾在莫斯科会战中参加过进攻和驱逐德国人的首长和司令员都有较大的信心，而那些迄今还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的人（他们是大多数）就感到极度紧张。他们想：我们的计划是否会成功呢？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过以后也还有。人们常因过度紧张而突然不再相信自己会获胜。

例如，我记得，在米乌斯河 一带已经准备好进攻的时候，我便到格拉西缅科的军中去了。在面临的进攻中格拉西缅科不扮演主要角色，这个角色由茨韦塔耶夫 和别人担任，但他的军队也要完成进攻的任务。所

米乌斯河位于苏联欧洲部分的南部。注入亚速海的米乌斯湾。

维·德·茨韦塔耶夫（1893—1950），苏联上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集团军司令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

以我同托尔布欣 一起在进攻的前一天早晨就来到了指挥所。我们同格拉西缅科谈过话。一切都很正常。在这之前，我曾到过他那里。他准备好了进攻。无论我还是托尔布欣对他都没有任何特别的意见。在谈话时我问他：

“嗯，你的部队怎样，他们的自我感觉怎样？”

他突然叫喊起来：

“部队……部队……”他把手一挥，接着说：“我们不会有任何结果！”

“怎么会没有结果？”

“我们不会有任何结果……”

我们当着他的面把参谋长叫来，问他关于部队准备作战的意见。他说，一切都正常，一切都已就绪，对胜利有充分信心。于是我不得当托尔布欣的面说，既然军长没有信心取得胜利，并且在进攻开始之前就声明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向大本营提出撤掉他的职务的问题，因为抱着这种情绪去进攻是不可能的。格拉西缅科突然全身瘫软，他的样子痛苦不堪，可以说，他几乎咽着眼泪说：

“请原谅，我不知道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累坏了。通夜没有睡觉。我想，将来会怎么样，结果会怎么样……神经紧张极了，苦恼极了……我疲倦了，要去睡一睡觉。”

费·伊·托尔布欣（1894—1949），苏联元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一些方面军的参谋长，集团军司令。乌克兰第3、第4方面军司令。

我们没有向大本营报告要撤他的职。他睡足后，清醒过来，后来，他完成了分配给他的一部分任务。

讲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我不能不对我在尼·尼·沃罗诺夫的回忆录中所发现的那些失实的地方感到惊奇。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期间，我和他曾作为大本营的代表一起工作过。在这个战役中他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互相之间的关系都非常好。但在他的回忆录中有一个地方使我感到惊奇。他在那里描写我和他在进攻的前夕均被斯大林召见，并在一起从西南战线上飞走。来到莫斯科后，在那里闲荡了一天，没有见到斯大林，就是说，我们不知为何被召见。后来有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往回转，于是我们一起回到了西南战线。

这里所写的全不真实。至于说我飞到莫斯科去，我已经讲过，是因为沃尔斯基的那封信的缘故。我不可能同他一起飞到莫斯科，因为沃罗诺夫当时在西南战线，而我在斯大林格勒战线。如果说他也飞到莫斯科去，那么我们是从完全不同的地方起飞。而我回来时，据我记得，也是一个人，没有跟沃罗诺夫一起。我回来后一下子就去参观坦克兵，只是3天之后我在奇斯佳科夫的军中才见到他。我不明白，在他的回忆录中怎么会出现这些事情。

[我想作出自己的猜测。尼·尼·沃罗诺夫也许记不清楚详细的情况了。他也许离开阿·米·华西列夫斯基后单独飞往莫斯科，而把这一点忘记了。但我很难想象，如果尼·尼

尼·尼·沃罗诺夫(1899—1968)，苏联炮兵主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红军炮兵司令。在许多战役中，他是最高统帅部的代表。

· 沃罗诺夫根本没有飞往莫斯科，那么记忆怎么会哄骗他到这个程度。这样推测是否正确：沃尔斯基的信在实质上不仅怀疑斯大林格勒战线的行动，而且怀疑整个战役的行动，就是说，怀疑所有三条战线的行动，所以斯大林收到这封信之后，就不仅召见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阿·米·华西列夫斯基，而且同时（也不说明理由）召见西南方面军的尼·尼·沃罗诺夫呢？当尼·尼·沃罗诺夫已经飞到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已经决定不让他知道这封信，而只叫阿·米·华西列夫斯基到他那里去并只同他谈及这件事情。这样，尼·尼·沃罗诺夫就什么也不知道，于是自然而然地产生这样的印象：在最重要的战役前夕无缘无故地把他召到莫斯科去，在那里耽搁一阵。什么也没说就把他打发回来。

我想，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至于说到尼·尼·沃罗诺夫忘记了，他是同阿·米·华西列夫斯基一起还是单独地飞往莫斯科，这是次要的问题，这里可能是想不起来了。——西蒙诺夫注]

您的小说里流露出一個想法，认为把马利诺夫斯基的第二近卫军从北方调到南方，受斯大林格勒方面指挥，以反击曼施泰因和戈特是错误的（我回答说，我不认为自己有权维护这种观点，但我知道，围绕这个问题有许多争论，我想在小说里让大家知道这个问题存在

罗·雅·马利诺夫斯基（1898—1967），苏联元帅。1957—1967年任苏联国防部长。

伊·曼施泰因（1887—1979），法西斯德国陆军元帅。在苏德战场上任集团军群司令。

着许多不同的观点。——西蒙诺夫注)。对于第二近卫军调到斯大林格勒前线来对付曼施泰因,这件事我负责。我力求做到这件事,我坚持了这一点。过去和现在我都认为,这件事是必要的。

在曼施泰因进攻斯大林格勒防线期间,我在后撤的沙普金骑兵军团和其他后撤的部队里。形势相当严峻。曼施泰因的进攻部队和保卢斯的军队会合指日可待。我认为,再过一昼夜,至多两昼夜,要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就迟了。他们一联合,保卢斯就会逃出斯大林格勒,这不仅招致包围圈的瓦解,导致我们在辛苦创立起来的包围圈里歼灭保卢斯集团军的希望破灭,而且将对整个军事行动的进程产生不可估计的后果。

当初我们对被包围的军队的数量估计不足,计算错误。其实在包围圈里有 3000000 人,他们完全可以冲出来,在与曼施泰因会合之后逃跑。这样,我再说一遍,其后果是不可估计的。

我认为斯大林格勒战线以其现有的力量已不足以抵御曼施泰因的进攻。我亲眼观察到这种情况,就到西南战线指挥所,从那里打电话给斯大林,坚决请求将第二近卫军调到斯大林格勒战线上来,以反击曼施泰因。第二近卫军按原先的计划确是被指定加强对罗斯托夫的进攻,并指望这一进攻的结果不仅切断在斯大林格勒城下被包围的敌军,而且要切断高加索方面的德军。我自然知道这一点,但在那危急的关头我还是坚持要把第二近卫军调来。

斯大林坚决不肯调动这支军队，不肯改变原先交给它的任务。在我再三要求下，他说，这个问题他要考虑考虑，然后再给我回答。在等待他的答复时，我已不顾自己的恐惧和冒险，下令马利诺夫斯基开始把部队调来新区，使它从这一地区去抵挡曼施泰因，同时命令他立刻到指挥所去见托尔布沃，从他那里拿过一切联络线，立即组织好指挥新来的军队。这个命令很晚才下，而当时斯大林的答复还没有来。

后来我知道，斯大林这一夜在大本营里讨论我的请求，那里的意见纷纭。特别是，朱可夫认为没有必要把军队改换地方。万不得已就让保卢斯冲出斯大林格勒与曼施泰因会合而且跑往西方。反正什么也不改变，要按照原先的计划让第二近卫军和其他的部队向罗斯托夫进攻。这个问题那天晚上在大本营里争个不休。

可我从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等待着怎么答复我。因为事实上我已调出了军队。终于在早晨5点钟，斯大林给我打来电话，气势汹汹地对我说：

“好吧，就算这样吧！”

于是他放下话筒。

这个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可是，沃尔斯基和格拉西缅科所发生的那种情况，在战争中是常有的。这一切看来好象没有什么，但在进攻前的最后一瞬间，两脚会突然发抖起来！

我见过生气、愤怒、甚至暴跳如雷的斯大林，他

骂起人来也是毫不留情的。我记得大概是在霍尔姆（我不相信是这个地方——西蒙诺夫注）地区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是1941年冬天，马斯连尼科夫的一个师陷入重围，而且口粮将尽了。我作为总参谋长受命组织给这个师空投补给。曾当过飞行员的日加列夫参加这次飞行。可问题发生了，前去空投食品的整队运输机都没有投中，就在马斯连尼科夫一师的眼皮下，把全部食品都抛给了德国人。马斯连尼科夫看到这种情形，发来一份绝望的电报：“我们都快饿死了，可你们还去喂德国人！”电报落到斯大林手里。斯大林把我和日加列夫召去。他在谈话时显出暴怒得忘形的样子，真使我霎时感到害怕，怕他会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就地亲手枪毙了日加列夫。

快到1943—1944年冬天的时候，我们第4和第3方面军已到了第聂伯河下游并切断了克里米亚，但还没有冲进去，当时德国人还在第聂伯河东岸的一个所谓尼科波斯据点抵抗我们。我和各方面军的司令一样，不认为这个据点对我们是直接的危险，而认为必须进一步解决第聂伯河西岸的问题——横渡第聂伯河，深入这个据点靠北的地方进行攻击。我们认为，这样就能迫使德国人自己离开这个据点。

我们向斯大林报告的正是这个意思，而且向他报告

霍尔姆——苏联诺夫哥罗德州的一个城市，在洛瓦季河畔。

伊·伊·马斯连尼科夫（1900—1954），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集团军司令，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等。

不止一次了。但他这时非常固执。这个据点使他极度不安。他害怕德国人在这个据点上集中力量，从这里向东南方面进攻，到海边切断乌克兰第4方面军。我们任何的劝说对他都不起作用，他还要求我们无论如何都要把这个据点从德国人手中夺过来。天知道，我们放了多少人去进攻这个据点而失败了啊！我们曾经把每次进攻这个据点对我们怎么不上算的事实作为理由，多次坚持请他收回成命，但是毫无结果。

两三个月之后，已是隆冬季节，斯大林开始征询我们对乌克兰第4和第3方面军当前进攻的意见。我作为大本营调配两个方面军的行动的代表，同几位司令一起提出了我们的看法。我们的力量已不那么多了，特别是在尼科波尔据点上受到损失之后，所以我们请求补充相当数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我们看来，这是为两个方面军坚持进攻所必需的。

我们把意见送到大本营去之后只隔一天，斯大林就打来电话：

“我是斯大林，您是华西列夫斯基吗？”

“是，是我，斯大林同志。”

“华西列夫斯基，您说说，你们那里谁是总参谋长？”

怎么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我回答说，直到今天为止，正式的总参谋长还是我。不管怎样，我认为是如此。

斯大林对此回答说：

“我直到现在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既然您是总参谋长，那为什么您在自己的指示草案中给大本营写出这

种胡说八道的东西。总参谋长没有权利写这种无稽之谈。您向大本营要这要那，但您作为总参谋长应该知道，我们没有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地方可以拿到您要的东西。”

我回答说，我们指定了我们进攻所必需的东西，而且我认为，无论如何，这些东西有一部分可以从别的方面军那里得到。

“别的方面军也要进攻。”斯大林回答说，“这一点您作为总参谋长是知道的，可您却写出这种无稽之谈。”

我们沉默一阵子，他也沉默了。后来他说：

“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您去抢托尔布欣的吧，他有空军军团，有机械化军团。在后方，在第2梯队中，他还有一个军。您从他那里把这一切都拿过来，您去抢他的吧。您把整个乌克兰第4方面军拿去防守，把一切都交给马利诺夫斯基。您自己前不久不是提议过在第聂伯河西岸解决问题的吗，那现在您就去解决吧，不过不要一下子用两个方面军去解决，而要保持连续性。您去抢托尔布欣的吧，要他去防守，把他拥有的一切都交给马利诺夫斯基，用马利诺夫斯基的军队去进攻，别拖到春天，马上在冬天就干，越早越好。在您取得胜利和马利诺夫斯基推进后，那您就把他调去防守，再把他的东西抢过来，交给托尔布欣，然后全力向克里米亚推进。”

话虽不中听，但不能不同意它的实质。在许多场合下（越到后来越经常），斯大林善于正确地 and 深刻地解决一些战略战术问题，并且提出一些最可靠的解决方法，所

以谈到他的时候，这一方面也是不应该忽略的。

我去找马利诺夫斯基，同他谈了谈，我们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订出了作战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后来在实践中证明有效。

我谈过在我们的纪实文学中存在某些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特别表现在罗科索夫斯基描写白俄罗斯战役的回忆录里。他在那里描述怎样拟定这次战役的计划。他说，他曾被召到大本营去，怎样建议在他的战线上同时进行两方出击，而不只是一方，斯大林怎样否定这个建议。他又怎样再次提出这个意见，斯大林又怎样否定它，并说要他回去想一想。他回来后又提出同样的计划，要在一条战线上同时进行两个方面的出击，斯大林怎样终于把手一挥，同意他的建议了。

在这次战役中我调配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 的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和巴格拉米扬 的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的行动，我参加过这次战役计划的讨论。第一，我不记得有过这样的争论；第二，在罗科索夫斯基的回忆录中，这方面（在一条战线上同时进行双重打击的建议）是作为一种新的作战方法谈出来的。这就十分奇怪。

伊·达·切尔尼亚霍夫斯基（1906—1945），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坦克军军长，集团军司令，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在战斗中牺牲。

伊·赫·巴格拉米扬（1897—1982），苏联元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任集团军司令，1943年任波罗的海沿岸第1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

在一条战线上用两股力量进行的攻击，这在 1944 年对我们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事儿了。这种进攻的方法早就有了。只举莫斯科的战役为例就足以证明。那时我们西方面军同时在南翼和北翼向德国人进行反击，斯大林格勒的战役也一样，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战线同时在两个方向进行攻击，过去白俄罗斯方面军的许多战役也一样。

回忆录应该准确，不加不减，不夸大自己的功绩，也不推卸自己所犯的错误的责任。比如说，我就知道和明白，延误组织沃罗涅日方面军的责任正好是我这个总参谋长。按照自己的职责，我应该及时提出组织这一方面军的问题。可我没有这样做。这就是我的，而不是别人的错误，我不能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我们很少利用文件这件事也使人感到惊奇。从战争结束算起已过了 20 年，人们在回忆，在争论，但争论常常不按文件，不经过很容易就能办到的查对。前不久，在寻找某些文件时，我发现在总参的一个部门里存有大量文件。一些有关最重要的战役的报告和谈话，都绝对准确地证明事情经过的真相。但从战争开始直到今天，这些文件过去和现在都躺在那里。谁也没瞧它们一眼。

总参谋部的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它要求大家关注和认真的分析。总参就是总参，这是军队的大脑。我读过斯捷潘·兹洛宾的《失踪的人》这本书。这是一本好书。其中许多篇幅我读时不能无动于衷，但它的第 8 章谈到总参谋部的工作，我读后不能不感到愤怒。这是肤浅的描写，缺乏业务知识，不注意环境，把总参的工作

人员描写成一些不爱干粗活的人。可是，如果您想知道，从战争一开始，总参就在最艰苦、最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尽管战前我们一再要求，但还是没有批准我们建造地下指挥所，建造地下办公的地方。只有在战争的第一天，大致在同一个时候，开始动员，而动员（不管听起来多么奇怪）是在7月22日14时宣布的，换句话说，就是在战争开始后过了20个钟头。在这个时候，国防人民委员部第1馆的院子里才开始刨土，挖防空洞。8月，总参谋部才在国防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室里工作。说来也可笑，总参作战部是在一间储藏室里工作的。到8月才安排在“基洛夫”地铁站的一个地方。后来，在战争的过程中，总参就搬到与它毗邻的一幢大房子里，实际的情况就是如此。

读多卷集的伟大卫国战争史（现在是一卷的修订本，但还远没有把应该改正的地方改过来），有时你也会感到惊奇。在准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期间，在这个战役的进行期间，包括在同科捷利尼科沃的德国集团军进行最残酷的战斗的期间，我乘车从这一个军到那一个军，从这一些部队到那一些部队，都确实实地总是同赫鲁晓夫坐在一辆车子里。他没有离开过我的车子，我在什么地方他就在什么地方。但读这本战争史时，其中写着：“赫鲁晓夫同志到什么地方去了”，“赫鲁晓夫同志到某个军团的指挥所来了”，“赫鲁晓夫同志在那边讲了话，并且同什么人讲了话”，等等。而总参谋长在什么地方，那就无人知晓。

在这部战争史中描写拟定库里斯克突出部的战役计划更是离奇古怪的。这一描写使人感到，这场会战是按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基本计划进行的，事实上为拟定这场会战的计划，当时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我、瓦图京都来参加了。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期间，赫鲁晓夫也曾到那边去过。这是实际的情况，但不能把它夸大。

至于战争的开始，应该说，德国人在准备和如何准备战争，许多人都已经知道了，大家都料到会发生战争。

在医院里的谈话

1976年4月—5月2日

这两周来，我同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见过好几次面并谈了话。

我觉得，在这个人身上既有温顺的柔情，又有刚强的意志。最近几年，无论他在写作还是在维护自己的观点上，我认为，在所有写军事回忆录的作者当中，至少是在所有刊登出来的回忆录的作品当中，他是最坚持自我批评的一个。不但如此，就是在对自己、对自己的健康、对自己的起居作息、对自己献身工作的态度上，他也表现出无比刚强的意志。

一个久已身患重病的人，对于这种病痛，对于这种经常

折磨着他的沉重负担都已经习惯了，而这种对病痛的习惯又跟早已养成的忘我工作的习惯结成了一体。

意识到自己患病和有计划地与之抗争的时候，这个人并没有成为自身病痛的奴隶，没有沉溺于它，没有拿它作为谈话或思考的主要课题。

有一些人喜欢谈病痛怎么妨碍他们工作。但他是另一种人，这种人虽然意识到病痛会妨碍和中断他们的工作，可是他们考虑自己的病痛正是从这种立场出发的，而不是一般地想起它。想到自己觉得好一些还是坏一些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这种病痛经常变幻而又十分现实的情况下，自己能工作得少一些还是多一些，好一些还是坏一些。

这种对待病痛，对待工作和一般说对待生活的态度，真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的话题各式各样。开始谈起了叶廖缅科。我曾听到过有关叶廖缅科的相当严厉的评定，说他是一个好逢迎的、狡猾的人，在一些场合下善于溜须拍马，而在另一些场合下则能把你骗得如坠入五里雾中。

根据我的谈话人所讲，叶廖缅科，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最困难的日子里，当时崔可夫那边已处于一发千钧之势，斯大林通过华西列夫斯基要求叶廖缅科到伏尔加河西岸崔可夫

安·伊·叶廖缅科(1892—1970)，苏联元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布良斯克方面军、东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面军和一些集团军的司令。

瓦·伊·崔可夫(1900—1982)，苏联元帅。1949—1953年任苏联驻德军队集群总司令。1960年起任国防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

那里去支援他（华西列夫斯基的这种措词显然是斯大林的原话），可他把这件事拖了两天，到第三天才开始动身前往，而同时对斯大林的命令又执行得相当独特。

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怀着极善良的感情回忆起《真理报》的摄影记者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他说这是一个沉着而谦逊的人，他的性格和脾气与大多数别的摄影记者都不相同。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说：“我保存着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冲到克里米亚之后拍摄的。在这张照片上有我、伏罗希洛夫和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拍摄这张照片的是我当时的一位司机，他拍照一般都拍得不错，可以说，是我编制内的一名摄影记者。我们拍完了照，卡拉什尼科夫就往前走了，到一个集团军里去了，三个钟头后，我接到电话说，他被打死了。这张照片我保存着，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补充说：“如果您想要，我可以把它送给您。”

我们回到原先谈到叶廖缅科的话题上。他说，当时斯大林格勒的情况是这样的：德国人拼命向崔可夫进逼，这使斯大林极度不安。在这之前，华西列夫斯基谈到自己的时候说：

我在伏尔加河东岸，叶廖缅科也在那里。他还在9月上半月就从斯大林格勒到那边去了。叶廖缅科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而我是受命准备我们未来进攻的战役的。在斯大林格勒最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斯大林打电话给我。他说，斯大林格勒崔可夫那边的情况使他十分不安，要我把他的命令转达给叶廖缅科，叫他亲自渡过伏尔加河到斯大林格勒去支援（如他所说的）崔可夫。

这个电话来得很晚。我同叶廖缅科取得联系后，就把斯大林的命令转告他。他回答说，一切都将照办，说他当晚就到斯大林格勒那边去。翌晨，我得知他并没有到斯大林格勒那边去，依然呆在这里的指挥所里，这使我十分吃惊。在同他谈话时叶廖缅科说，他派人到过渡口，但那边的情况看来在当晚不可能横渡。他要在下一个晚上去。

在同斯大林谈话时（他每天都打电话来找我），我回答了他的问题，说叶廖缅科已经报告，昨天夜里看来不可能横渡伏尔加河，他在今夜就要渡河去见崔可夫。

晚上我得知，叶廖缅科已到了渡口横渡伏尔加河，但早上我又知道，他这次也没有横渡到那边去，说是因为情况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的副司令马尔基扬·米海洛维奇·波波夫也跟着一起到过渡口。后来他对我说，那天夜里渡口的情况跟其他夜里一样，都很正常；自然，冒险是有的，但人们在那天夜里渡过那边去后又转回来。

我不得不在又一次同斯大林谈话回答他的问题时说，叶廖缅科还未能横渡过斯大林格勒。

“您把他赶到那边去。”斯大林生气地命令道，“要他今天夜里就到崔可夫那边。”

我把这个命令转达给叶廖缅科。夜里，他又到了渡口，其实他事先已同崔可夫联系上了，并且已经商量好

马·米·波波夫（1902—1969），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一些方面和一些集团军司令。1956—1962年任陆军总参谋长。

在什么地方接应他。但他横渡伏尔加河并不是在原先约定的地点，而是在别的地方。崔可夫在约定的渡口上等他等了好几个钟头，还是看不到叶廖缅科。其实这时他在别的地方横渡过去了，并且到了一个师部，我想起，是到了柳德尼科夫那里，从柳德尼科夫那里又与一些师长联系，跟一些人谈了谈，然后回到渡口，到天亮转回到伏尔加河东岸，这样就没有遇上白等他一场的集团军司令。

他善于溜脱，同时又有极大的才能溜须拍马。据我观察，他不喜欢（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说的是“很不喜欢”——西蒙诺夫注）爬出掩蔽部或地下室。在开始进攻斯大林格勒南部的期间，我常为科捷利尼科沃附近的事态多次到那边去过，但我不记得曾有一次是跟叶廖缅科一起去的。通常跟我一起去的不是他，而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真的经常到处跑。

我问，照他的看法，为什么斯大林在战争快结束时，改变了自己对许多过去有功，但在这场战争中显得没有多大才能和前途的人的看法，而不改变自己对叶廖缅科的看法，甚至还多次任命他到各条战线，在不同的时期指挥不同的方面军呢？同时，不言而喻，此人显然远非总是称职的。

您可知道，我已经说过，他善于溜脱，花言巧语和

伊·伊·柳德尼科夫（1902—1976），苏联上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步兵师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

溜须拍马的本领起了作用，但是，应该说，在斯大林格勒事态的初期，在这种严重的时候，斯大林对叶廖缅科当时的行动，有相当的理由要给他肯定的评价。在8月份准备进攻斯大林格勒的时期，叶廖缅科的行动是坚决而又果敢的。他为了刹住德国人的进攻做了许多工作，这应当给予应有的评价。斯大林对此评价甚高。后来，斯大林讲到叶廖缅科的时候，常称他是一位防守将军。当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这时已经改称为南方面军）的进攻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林大斯认为改变方面军的司令是适时的。他问我认为可以推荐谁出来担当方面军司令。我对他说，马利诺夫斯基适合担当这个角色。因为他很成功地指挥过在科捷利尼科沃附近的军队，后来又有指挥方面军的经验。斯大林这时提起了马利诺夫斯基作为方面军司令，在德军夏季攻势时被他们占领了罗斯托夫和新切尔卡斯克的败绩。不过，在我一再提出我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良好的评价之后，斯大林就同意决定任命他为方面军司令，而把叶廖缅科调到西北方面军去了。

斯大林也把伊万·叶菲莫维奇·彼得罗夫称为守将。他对彼得罗夫的看法是由于彼得罗夫在敖德萨、塞瓦斯罗波尔和高加索等地的行动而构成的，因为他能够顽强地守住阵地，但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毅力进行逼攻。不过我觉得，斯大林对彼得罗夫的看法是不公正的。彼得

伊·叶·彼得罗夫（1896—1958），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一些集团军、黑海军队集群、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司令。

罗夫是有一个方面军司令所必需的各方面的条件，能在任何环境中进行活动，能攻能守的。

我回过头来谈赫鲁晓夫。我问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对这个人有什么看法。华西列夫斯基说：

在赫鲁晓夫还是方面军军委会委员的时候，我同赫鲁晓夫有过多次见面。这个时候我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肯定的。赫鲁晓夫是个精力充沛、勇敢的人。他经常呆在部队里，从不坐在参谋部或指挥所，竭力同人们见面和谈话，应该说，人们都喜欢他。

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

有一次，我同赫鲁晓夫一起从莫斯科飞到扎沃尔日耶，后来改乘汽车，沿着光秃秃的扎沃尔日耶地区的草原往前线指挥所方向驶去。我们走了一些时候，看到了一个敞棚，离敞棚不远有一幢房子。我们决定停下来吃点东西。在莫斯科，无论是我还是赫鲁晓夫，都没有工夫去吃东西。当那些护送我们的人快手快脚地在给我们弄来食物的时候，赫鲁晓夫看到了在远处一间不大的房子附近有一男一女，于是他对我说：“走，去谈一谈。”他就同我一起走到他们的身边。这是两个上了年纪的人，男

的愁眉苦脸，满脸胡子。他回答了赫鲁晓夫的问好之后，赫鲁晓夫问他：“喏，你们这里怎么样，生活怎么样？”那个男人开始什么也没有回答，忧郁地默不作声，后来也一样忧郁地说：

“这里有啥生活，这算啥生活？”

“您不是本地人吧？”

“我哪儿是本地人，我不是本地人，是尼古拉耶斯克人。”

“您以前在那里做什么？”

“我原是农庄主席。在尼古拉耶地区那边才是生活。那边才有生活，那个农庄才好！我参加过农庄庄员代表大会，发过言，讲我们自己的农庄。我同米基塔 见过面，谈过话，他夸赞我们农庄的工作。”

应该说，赫鲁晓夫当时穿的是一件普通大衣，戴的又不是一顶将军帽，看不到任何等级标志。于是我向这个前农庄主席问：

“您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您也许认识的。喂，您仔细瞧一瞧。”

他过细瞧瞧，忽然大声叫喊：

“这就是米基塔。您也在这里？”

他见到赫鲁晓夫非常高兴，开始拥抱他，而赫鲁晓夫也很乐意拥抱他。后来，自然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吃早

饭。那次在扎沃尔日耶草原上对我们双方都感到意外的邂逅就是这样。

据我记得，赫鲁晓夫当时的地位虽说是方面军的军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但赫鲁晓夫没有亲自给斯大林打过电话。他只有时请我去打。有一次，斯大林打电话叫我去莫斯科去。赫鲁晓夫知道此事，就对我说：

“我也想到莫斯科去，到政治部去一趟，同谢尔巴科夫谈一谈。要是能跟您一起去就好了。您给斯大林打个电话，让他召我去莫斯科。”

我回答说：

“您自己去打吧。”

但赫鲁晓夫推托，坚持请我去打电话：

“您打更方便。他已经叫您去了，您对他解释，我也很需要同谢尔巴科夫见见面。”

结果我去打电话了。斯大林问：

“怎么，他为什么要到莫斯科来，他要干什么？”

我解释说，他要到政治部去同谢尔巴科夫见面。

“好吧，让他跟您一起来吧。”斯大林说。

我们一起去一起回。据我所知，赫鲁晓夫在这次飞往莫斯科去的整个期间，没有同斯大林见过面，也不想见面。

阿·谢·谢尔巴科夫（1901—1945），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曾任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苏军总政治部主任，新闻局局长。

据华西列夫斯基所讲，这样的事不只发生过一次，至少有两次，无论如何，他讲到这样的事情时，仿佛在他的记忆中有过好几次似的。

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曾简单地描述过什捷缅科。他说：

这是一个在军事方面很有教养、很有工作能力的人。他不仅有工作能力，而且很有才干，是个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人。在南方面军失败之后斯大林派贝利亚到高加索去解救那边的困境，这时贝利亚请求给他推荐一个总参的工作人员随他一起去。我们就给他推荐了什捷缅科，说他是年轻有为的参谋人员，于是他带什捷缅科走了。什捷缅科同他一起工作了几个月。很遗憾，这后来就有许多地方决定了他的命运和行动了。

后来，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对我来说是完全意料不到的。战后，当布尔加宁任国防部长，而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总参谋长的时候，我曾向布尔加宁请求解除我的一个职务，因为我简直无法同时对付这两个职责。

“那么任命谁来担任呢？”布尔加宁问。

“安东诺夫”我说。

于是我介绍了安东诺夫的许多优点，同时指出，他

谢·马·什捷缅科(1907—1967)，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1946年任副总参谋长，后任陆军第一副总司令。

阿·英·安东诺夫(1896—1962)，苏联大将。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几个方面军参谋长。1945年任总参谋长，后任第一副总参谋长。

具有总参谋长的工作经验，而且曾担任过这个角色。在这个谈话之前，安东诺夫是总参谋部第一副总参谋长。布尔加宁同意了。我们就带着这个意见到政治局去。可是在政治局却发生了一件使我感到完全意外的事情。当我们报告自己的提议时，斯大林说，应该推举什捷缅科担任总参谋长。我们要想坚持任命安东诺夫已不可能。这个问题还在开会之前就预先解决了。我们就这样走了。什捷缅科直接从作战部部长提升为总参谋长。

而安东诺夫则被解除副总参谋长之职出任高加索军区副司令。我记得，当我把这个完全出乎他的意外的消息告诉他时，他几乎哭了。

解除什捷缅科总参谋长之职也是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这事来得这么突然，一如任命他的时候那样。

有一次（这时我已是国防部部长），把我召到政治局去报告当前的工作。同我一起去的有索科洛夫斯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总参谋长什捷缅科。

斯大林听完了报告之后说：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要任命一个新的总参谋长来接替什捷缅科同志。您有什么提议？”

我说，我没有准备好意见，我要考虑考虑。

“总是这样，要放一放，要考虑考虑。”斯大林说，“为什么您没有意见呢？”

于是我说，我完全没有准备要谈撤换总参谋长这样严重的问题。对这种问题提意见不是简单的。

这时同我坐在一起的索科洛夫斯基推了一下我的腰

旁，小声地说：

“沙萨，我愿意去，到总参谋部去。”

“可您是我的副部长，谁来接替你呢？”

“考虑考虑吧。”索科洛夫斯基同样小声地说：“我暂时身兼二职都可以，我不哄你。”

我知道索科洛夫斯基是个很有魄力的参谋工作人员，在他向我提议推荐他担任这个职务之后，我当即对斯大林说，我认为，可以任命索科洛夫斯基担任这个职务。

斯大林提出了我曾向索科洛夫斯基提出的问题：

“那谁来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职务？”

我用索科洛夫斯基的话来回答他说，我希望他能身兼二职。于是这个提议当即被采纳并写上了相应的决议。

此后我们就走了。第一个走的是什捷缅科。接着我同索科洛夫斯基一起走。什捷缅科在会上一言不发。当我最后一个走到门口的时候，斯大林把我叫回去。我明白他想同我，同我们三个当中的一个人说什么，于是我往前走过去。

“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想让您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解除什捷缅科的职务。因为他老是写呀，写呀，替您写些小报告，讨厌极了，所以我们就解除他的职务。”

任命什捷缅科为总参谋长显然是贝利亚炮制的。当贝利亚同他一起在高加索的时候，一方面看他是一个有魄力的工作人员。而另一方面，贝利亚对他显然有自己的打算（什么打算华西列夫斯基没有说。这是我个人的

想法，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我的猜测。我认为，正是这一点——贝利亚对什捷缅科有自己的打算，就成为斯大林撤掉他的职务的理由。斯大林不愿意贝利亚在军事问题上有过多的和直接的影响。很明显，过了一个时期，斯大林看出了贝利亚正在实现这种影响并且从什捷缅科那里得到相应的情报之后，就决定解除什捷缅科总参谋长的职务。——西蒙诺夫注。

什捷缅科到伏尔加沿岸军区当副司令去了。我也许记错，不一定是这个军区，但他的职务——在总参谋长的职务之后，就是这个范围。

贝利亚是一个十分粗鲁和十分活跃的人。对此，我记得曾有过这样的一件事：

在解放克里米亚的战斗期间，我坐的一辆汽车触了地雷，这使我暂时不能工作。但后来知道，汽车触雷的事并没有向斯大林报告（这是贝利亚干的事情），也没有说我受到轻微的震伤和轻伤，所以斯大林一直相信我在生病，得了流行性感冒。只有我飞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的时候，他才看到我头上扎了绷带，问我出了什么事，才知道发生的事情。

我随身带着一张照片。我们都奇迹般地安然无恙。我想把这张反映我们的汽车变成了什么个样子的照片拿给斯大林看。我掏出过张照片并想递给斯大林看时，可贝利亚把它从我手中夺过去并撕成了碎片，说：

“为什么要拿出来看，为什么要使他感到不安。”他就这样不让我把这张照片给斯大林看。

(阿历山大·米海洛维奇同我谈到这件事时未加评论。我甚至不很明白，这件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斯大林接见之前，是斯大林不在，而贝利亚在身边的时候，还是斯大林转过身去或是走开了。我不方便再问他，但这件事情看来永远使人难忘。

我个人的猜测是：华西列夫斯基的假流行性感冒和撕毁照片的事情都是非常简单的：按职责，贝利亚要保卫各方面军的司令、大本营的成员和它的代表。因此，华西列夫斯基差点被地雷炸死，只靠奇迹幸存下来这件事情，最后结果还是要他、他的部门多少负点责任。所以他就不愿意让斯大林知道这件事情，虽然现在斯大林已经知道，那他还是不愿意让斯大林知道任何补充的细节，免得引起斯大林的关注。我相信，事情就是那么简单。——西蒙诺夫注)。

华西列夫斯基也曾讲到他不得不退休的事情。他说：

在这之前(这已经是赫鲁晓夫当权的时候)，我是朱可夫的第一副部长。有一天，我同朱可夫一起坐汽车出去，朱可夫对我说：

“怎么，沙萨，你没想过你要写部战争史吗？”

的确，这个问题对我来得很突然，但是我很快就明白，这里面是什么意思。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朱可夫：

“怎么，格奥尔基，这是什么意思？是要我退休吗？该下台了吗？”

朱可夫也直截了当地说：

“是的，这个问题讨论过了，赫鲁晓夫坚持要你退休。”

此后我便退下来。给我保留我应有的一切，全薪和相应的福利——一位副官，一辆汽车等等。不久我就生病了，早期中风。当我复原的时候，朱可夫已经被撤掉部长的职务。我忽然收到了当时已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的戈利科夫的一件公文，说我在总参的党的关系要转到别的地方。我打电话问戈利科夫，我要把关系转到哪里？我的党的关系一直在部队里，我习惯这样。

“要转到格拉诺夫斯基大街您居住的地方。”他回答说。

我问，能不能另外办？戈利科夫说，他是执行命令，这是决定，他无法改变，这是共同的决定。于是我打电话给马利诺夫斯基，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安慰我说：

“见他的鬼，你把这文件撕了吧！我们改过来，我们另外办。”

于是我就照做了。不久成立了一个将军检查组，我就从退休中回到这个小组里来。

回想起朱可夫时，华西列夫斯基讲了他们两个是怎样来到军训局的——这是30年代最初的事情。在组织大会上（这

费·伊·戈利科夫（1900—1980），苏联元帅。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先后任好几个集团军司令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1958—1962年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主任。

个局是新设立的，要在那里建立新的党组)，朱可夫被选为党组书记：

应该说，格奥尔基办事很严。在他那里职位不起作用，他当党组书记的时候，所有在党组内的大人物都不敢随随便便，都战战兢兢地做事：维塔利·马尔凯维奇·普里马科夫 和局长阿历山大·伊格纳季耶维奇·谢佳金 都毫不例外。他在这个职位办事很严，以后在其他一切职位上也一样。

接着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他自己怎样转来这个局里：

在这之前，对于团长的条件是很优厚的（我是驻在特维尔 的一个团的团长），那时有规定：我们每个人都有汽车——当时出产的福特牌汽车，每个团长都有房子——有些是单独的套间，有些甚至是单独的一幢房子，有骑的马，除汽车外，还有车马。在享受了这一切之后，我被调来军训局，把团长的三横杠换成了菱形章，当时还没有军衔。他们告诉了我住的地址。我便到了索科利尼基 ，找到了这幢房子——有一些狭小套间的新

维·马·普里马科夫（1891—1937），苏联将领。大清洗时被枪决。

阿·伊·谢佳金（1893—1938），苏联将领。国内战争中历任旅长、方面军参谋长、师长，大清洗时被枪决。

这是苏联加里宁市的旧称。

莫斯科东北部的一个区，位于亚乌扎河畔。

楼，找到了自己的住宅门号——分给我的是一套有几个房间的住宅，可我们有4个人——我、妻子、岳母、儿子。我面临的生活条件就是这样，我当团长时那些条件都没有了。朱可夫也被派到这个局里，可他在这之前是个副师长，他的情况也一样。

我记得，有一天，我从人民委员会出来，看到格奥尔基带着一个大书架站在电车站上。我说：

“你怎么站在这里？”

“住宅空荡荡的，房间里什么都没有摆，所以我就在这里，在行政管理处订购了一个书架，好把书放进去。我已经站了半个钟头了——过了三四辆电车，我一辆也上不去，人挤得水泄不通，你看，有人还吊着哩。”

“嗯，好吧，我也等电车，跟你一块儿走。”

我们等呀，等呀，又等了五六乘电车，一乘也上不去。于是朱可夫说：

“喏，你坐车走，我走路算了。”

“到哪儿？到索科利尼基？”

“是呀，到索科利尼基，只是不知对这个书架怎么办，又不能把它送回去。”

于是我对他说，既然命该如此，那咱们就一起走吧，我可以帮你抬书架。就这样，我和朱可夫走遍全城，直到索科利尼基，把书架抬到他的新居。